

◎ 本书由广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文化大革命”中的

# “教育革命”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 周全华 \ 著



馆

广东教育出版社

◎ 本书由广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文化大革命”中的 “教育革命”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 周全华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周全华著. -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7  
ISBN 7-5406-4073-1

I. 文… II. 周… III. 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史料 IV.  
G5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763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郊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80 000 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5406-4073-1/G·3770

定价: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广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 管理委员会

- 主任: 于幼军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王屏山 (原广东省副省长、九年义务教育教材 (沿海地区) 编委会主任)
- 副主任: 江海燕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  
刘达中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吴至强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朱仲南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叶世雄 (广州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廖棧武 (深圳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 成员: 黄尚立 (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  
李镜池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助理巡视员、计财室主任)  
周育安 (广东省教育厅助理巡视员)  
余潮波 (广东省高教厅助理巡视员)  
苏立功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图书管理处处长)  
彭玉麟 (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金炳亮 (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 广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 评审委员会

- 顾 问：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授）  
许嘉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李连宁（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颜泽贤（华南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赵学漱（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科研规划办公室  
副主任、研究员）
- 主任委员：黄尚立（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编审）
- 成 员：苏武冬（原广东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劲予（广东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江家齐（原广州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  
郭 鸿（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主任）  
麦 曦（广州市教育委员会教研室主任）  
郭思乐（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冯增俊（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伍柳亭（广东省教育学会秘书长、副研究员）  
唐 迅（广州师范学院教学与师范教育研究所  
所长、副教授）  
张积均（原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编审）  
彭玉森（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编审）  
金炳亮（广东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编审）

# 目 录

前言 .....	1
<b>第一章 “教育革命”的由来与内涵 .....</b>	<b>5</b>
<b>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由来 .....</b>	<b>6</b>
一、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回顾 .....	6
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全面开展“阶级斗争” .....	13
三、毛泽东早年对传统教育的激烈批判 .....	18
四、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批评 .....	22
五、新的解决方法——“教育革命” .....	27
<b>第二节 “教育革命”的内涵 .....</b>	<b>39</b>
一、“教育革命”的理论依据 .....	39
二、“教育革命”理论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	45
三、“教育革命”的内涵——“五七指示”分析 .....	48
<b>第二章 “教育革命”的全面展开 .....</b>	<b>55</b>
<b>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发动——“砸烂旧学校” .....</b>	<b>56</b>
一、停课闹革命 .....	56
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61
三、形形色色的教改方案 .....	73

---

第二节 向新体制过渡——“搞好斗批改” .....	79
一、工宣队进驻学校 .....	79
二、“斗批改” .....	83
三、清队整党 .....	85
四、精简下放 .....	90
五、大批判与改革教育体制 .....	94
第三章 “教育革命”新体制的确立 .....	101
第一节 三结合的新领导体制——所谓“无产阶级领导 权”问题的解决 .....	102
一、突出“阶级斗争”的领导机构 .....	102
二、工宣队状况 .....	107
三、贫管会状况 .....	112
四、解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问题的种种措施 .....	116
第二节 开门办学的新教学体制——两个突出一个削弱 .....	132
一、“三结合”之称名实不符 .....	132
二、突出“阶级斗争主课” .....	136
三、突出生产劳动课 .....	138
四、削弱“主学”文化课 .....	148
第三节 文化平均主义的新学制 .....	159
一、单一结构的中等教育 .....	160
二、自发转向职业劳动教育的普通中学 .....	164
三、废除重点学校制度 .....	167
四、盲目缩短大中小学的学制 .....	169
五、大学分散到农村办学 .....	172
六、政治夜校模式的群众业余教育 .....	176
第四章 “教育革命”的种种“新生事物” .....	179
第一节 工农兵大学生 .....	180

一、工农兵大学生招收概况	180
二、工农兵学员的文化学习状况	183
三、生产劳动与专业实践	186
四、政治活动与专业实践	188
五、“上管改”状况	189
六、工农兵学员教育质量评估	192
第二节 “结合典型产品教学”与“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195
一、“打破老三段，火烧三层楼”	196
二、打破传统教学组织形式	197
三、“边干边学”	198
四、政治需要出“经验”	200
五、文科“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201
第三节 七·二一大学与五七学校	204
一、七·二一大学开办概况	204
二、七·二一大学学习状况	207
三、五七学校概况	211
第四节 “朝阳农学院经验”——向政训班与生产队看齐	219
一、朝阳农学院概况	219
二、对朝阳农学院的政治宣传	220
三、集“左”之大成的“经验”	223
第五节 其他“新生事物”综述	236
一、下放农村公办小学教师	236
二、城市中小学下放工厂、街道办	238
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	239
四、中学“结合典型产品与战斗任务教学”	240
第五章 围绕“教育革命”的两次斗争	243



---

第一节 1972年教育的调整与复苏 .....	244
一、周恩来发动教育调整 .....	244
二、教育悄悄复苏 .....	252
第二节 教育事业再度陷于动乱 .....	262
一、从批陈批林到批林批孔的转折 .....	262
二、张铁生答卷(1973. 7. 19) .....	269
三、考教授事件(1973. 12. 30) .....	272
四、清华园的三个月运动(1973. 10) .....	275
五、刘丽华谈话(1973. 11. 21) .....	277
六、黄帅来信和日记(1973. 12. 12) .....	280
七、马振抚中学事件(1974. 1. 25) .....	283
八、永乐中学事件(1974. 3) .....	285
九、批判湘剧《园丁之歌》事件(1974. 8) .....	286
第三节 1975年再次整顿教育 .....	289
一、1975年的政治转机 .....	289
二、教育的整顿 .....	298
第四节 教育界又成战场 .....	306
一、清华大学的“大辩论” .....	306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	311
三、“反击”的两次升级 .....	312
四、教育界的“反击” .....	315
第六章 “教育革命”的终结与教育的拨乱反正 .....	322
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严重后果 .....	323
第二节 推倒“两个估计” .....	327
第三节 1977年恢复高考 .....	337
一、恢复高考的决策经过 .....	337
二、12届考生同考盛况 .....	347
三、招生录取情况 .....	349

四、恢复高考后的风波 .....	356
第四节 教育的整顿与复兴 .....	364
一、恢复招考研究生 .....	366
二、1978 年的大学招生高峰 .....	372
三、稳定与建设师资队伍 .....	377
四、建设与改革学校各项制度 .....	381
五、恢复与增设高校 .....	382
六、复办重点学校 .....	384
七、创办大学少年班 .....	385
八、整顿与发展各类成人教育 .....	386
九、清算“左”的教育思想 .....	389
第七章 “教育革命”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	392
第一节 关于农村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不正规教育 经验 .....	393
第二节 从狭隘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蒙昧主义 .....	399
一、近世学风一变 .....	400
二、狭隘经验主义的抬头与盛行 .....	405
三、滑向实用主义与蒙昧主义 .....	410
第三节 关于文化平均主义 .....	414
一、解决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回顾 .....	414
二、文化平均主义的源流与实践 .....	425
第四节 关于“教育为政治服务” .....	434
一、“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经验教训 .....	434
二、关于“智育第一” .....	436
三、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	439
第五节 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中国的实践 .....	441
一、教劳结合溯源 .....	441
二、1958 年的教劳结合没有找准结合点 .....	444

## 6 目录

---

三、把教劳结合变成“革知识分子命”的阶级斗争命题·····	448
四、把教劳结合作为培养“全面发展新人”、向共产主义直接 过渡的捷径·····	451
五、以教劳结合作为解决普及教育问题的手段·····	452
第六节 关于“精神贵族”及“培养劳动者”方针的 演变·····	459
一、关于“精神贵族”·····	459
二、“培养劳动者”方针的演变·····	464
参考文献·····	469

---

---

## 前言

先说一则现代寓言。一群动物讨论书有什么用处。象说：书和纸是竹和草做的，干嘛把挺好吃的东西弄成枯燥无味呢？蠹虫说：差矣，书能住也能吃。老鼠说：书是万恶之源，人类治我们的坏主意，好多是从书上来的。熊说：有人说读书使人聪明，可在我们的世界里，无知笨拙才是最高的美德。动物们争执不下，请一个小女孩评理。小女孩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书看，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动物们当然不同意小女孩的评判，一致请书自己回答。书说：我赞成小女孩的意见。如果她的意见和你们一样，那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寓言产生于“文革”噩梦乍醒、渴求知识和书籍的七八十年代之交。当时，中国刚刚走出一个“读书无用”的时代，随之汹涌而来的是出版热、买书热、办学热、考试热、文凭热。

寓言对读书有用、无用没有作功利性的回答。因为仅以功利看待读书，会有更多答案。“读书误我我误家”，这个读书人常有的感慨谁说不是真的呢！有用？无用？抑或有害？象与蠹虫讨论的是书的功利，老鼠与熊说的则是政治。在那个时代，读书不是有用无用、有害无害的问题，而是读书有罪。

一个有数千年文明、以诗书礼教著称的古国，一个曾经把书放在第一位（“惟有读书高”）、把书比作食粮、华厦、美人（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民族，何以突然发疯，革书命，革文化命，革教育命，革知识分子命，上至饱学文宗，下到村学先生，无不被革，视知识反动，令斯文扫地。这一切，何从而来又如何展开及了结呢？

一部轰轰烈烈又扑朔迷离的“文革”史，已有若干先行者埋头苦干，给后来人勾勒出一个不再是若明若暗而是比较清晰的轮廓了。至于“文革”专题史如文艺、教育、经济、科技、工农业，则付阙如。其中“教育革命”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是最先点火于教育而最后终于教育，中间又与政治斗争相纠结，缺之则不全。

现有涉及“教育革命”的论著极少，笔者所见如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写“文革”中的教育计 1.33 万字。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谈到“文革”10 年教育计 800 多字。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连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起论述教育改革计 2500 字。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写到“教育革命”不足 3000 字。严家其《“文化大革命”10 年》也有零散论及。

教育通史、新中国教育史诸作仅有少数几种涉及“文革”中的教育。这就是中央教科所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

记》，起于1949年，迄于1982年，共33年，“文革”期间的教育占了10年，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汇编。国内教育科学诸名家汇撰的大型多卷本《中国教育通史》和《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分别以最末的第6卷和第8卷述新中国教育（1949~1985），两书皆以一个专章写“文革”对教育的破坏，篇幅皆为4万余字。两章皆为苏渭昌一人执笔，体例、观点、材料大同小异，论述“文革”10年教育为国内最详，也是写“教育革命”开先河的教育史专论。近有中央教科所编的《当代中国教育》，涉及“文革”中的教育仅万余字。

以上所列，可见对“文革”期间的“教育革命”所作研究甚为单薄。治史的侧重高层大人物而略于下层人民活动，侧重政治斗争而略于经济文化，侧重理论与决策而略于其实际作用与影响。治教育史的则偏重两头（建国头17年与新时期）而绕过中间（“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研究，确是一枚不好啃的坚果。毛泽东本人的教育思想，就是一个丰富生动、深刻复杂的体系。可是迄今的研究工作，连这个体系的内涵也没描述出来，仅限于罗列毛泽东的若干最表面的观点，罗列一些最正确又最一般化的思想，把毛泽东最具特色、最富于创造性、最带有他个人色彩的东西舍弃了。

笔者在研究“教育革命”中遇到的一大困难，即在于可资借鉴的先期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当然，这也就提供了拓荒的机会。

另一个困难是材料多如山堆海积，不可不看，又无法全看，三年之中，过目文字达亿。困难还在于这些“文革”时期的经验、总结、报告、报导，皆假、大、空，多是信息量为零的颂词，根据“精神”编造的事迹，歪曲变形的典型，真伪难辨。

但这又毕竟是原始记录，是第一手的历史材料，比后来的采访、追述文字更具历史气氛。筛取这些虚虚实实材料，如披沙拣金，旷时费日。“文革”中学校究竟如何进行“教育革命”的？既缺乏统计数字，也是统计数字难以反映的。报功的数字浮夸乏信，多不足取。所以本书使用大量的个案材料，经解读、鉴伪、脱水、精选，才予以采入。马克思曾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提供的历史细节比全部经济学家提供的还多，这至少说明论文可以向小说学习细节表述方法。《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史论性的著作，有相当强的可读性又有很高学术价值。笔者也学着摆脱那种只是理论演绎不见史，只有宏观大论而缺微观研究的论文作法，而尝试一种夹叙夹议，论从史出的写法，这也是以零散思想感悟补救理论功底的不足。

写作一开始就在金春明教授的指导之下进行，五易论题，八改提纲，行文布局亦多得指点。陈雪薇教授也贡献许多宝贵意见。初稿既成，又承中共中央党校郭德宏、谭宗级、范守信、于南、何仲山，北京师范大学王炳照、苏渭昌，北京大学肖超然，中国人民大学陈明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杨先材、刘友于、郑谦，广东教育出版社金炳亮，华南师范大学冯增俊，广州师范学院江家乔诸先生审阅和提出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

## 第一章 “教育革命”的由来与内涵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说到发动“教育革命”的原因：“1958年，毛主席号召‘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冲破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压迫和破坏，蓬蓬勃勃地生长出来。”“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一伙破坏了。他们诬蔑这场革命是‘乱、糟、偏’，疯狂地反攻倒算。”“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教育革命问题作了一



系列指示，并且尖锐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刘少奇一伙竭力封锁、抵制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终至作出“教育要革命”的错误判断。

## 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由来

### 一、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回顾

进入近现代以来，由于社会发生了政治的、经济的剧烈变化，中国教育一直处于变革之中。教育变革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仅仅是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适应，合乎规律地发生。

清末民初发生了近现代第一次教育改革（亦有人认为应前伸到洋务运动）。这是用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服务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取代为延续封建主义自然经济服务的古代伦理本位教育；用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民主教育，取代为延续封建主义专制统治服务的读经科举教育。这一场由传统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变的革命，延续时间达几十年之久，才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新的教育体制。

在办学目的、培养目标上，旧学无论私学、书院、官学等各类正统学校，高度一致，都是科举预备学校，为培养儒士和官吏而设；新学则多样多层，分别培养现代社会所需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各方面人才。“废科举，兴新学”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在课程设置上，旧学千年不变，四书五经学到老；新学废读经，设立语、数、理、化、外、音、体、美等工具课目、基

础理论课目，大学设专业课目。

在学制上、学校教育体系上、教学方法上以西方教育为蓝本，不断改进。1902年清政府制定我国第一个新学制——壬寅学制。1903年又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拟定癸卯学制，基本照抄日本教育制度，又保留了封建性的长学制，读完最高一级学府——通儒院得25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先后于1912年、1913年颁布新学制，是为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比较具有现代性，设小学7年、中学4年、大学预科3年、本科3年，学制长17年；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上设大学院（相当研究生院）。

1922年11月颁布的《壬戌学制》基本定型，奠定了我国现代学制的基础，以后变动不大。这个学制改小学7年为6年，以利普及小学教育；取消大学预科，教学内容下放到中学，改中学4年为6年，以利提高中学水平；中学3年分段，设独立初级中学，以利扩大初中教育；高等师范分本、专科，后来大学亦分。这种6-3-3-4学制，一直沿用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初，历时44年。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社会性质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头7年的短暂过渡，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时代，同属于现代社会，同样建立在机器工业文明的现代生产力水平上，这就决定了二者同样要求实施现代教育。但又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上都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二者建立不同的现代教育制度。这就发生了第二次教育改革，实质即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建国初期的教育改革。

(1) 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前提。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由半资本主义半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早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首先在大工业部门确立，全国即转入计划经济，随后在中小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部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政治经济状况，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教育的要求。

(2) 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性质。一方面继续清除传统旧教育的封建残余，保留和吸收资本主义现代教育中的进步因素、科学因素、民主因素，推进教育的现代化程度；一方面改造资本主义现代教育，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教育。

(3) 建国初期教育改革的内容。1949年9月产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提出反买办、反封建而未提反资本主义，也未提社会主义。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即明确对旧教育的改造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

这个改革方针是谨慎的、正确的，以学习、吸收、继承为主。旧中国教育经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虽仍残留一些封建、半殖民地色彩，但基本属于资本主义现代教育。对于旧中国教育不简单否定，而提出吸收其有用经验即现代教育因素。接受这一份遗产是明智的。中国没有重复俄国十月革命初期对待旧俄教育的“左”的错误，当时一些左派人士甚至提出取消学校，还发生过全俄教师协会罢工事件。借鉴苏联经验可以说是新中国教育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尝试，尽管存在机械照搬、全盘苏化的缺点，但是成绩巨大。苏联教育是已有3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

义现代教育，发展水平很高，居于世界前列，他们的经验许多都反映了客观教育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运用这些规律。后来批凯洛夫、批“修正主义”教育，造成教育思想的混乱。这次对外开放的另一缺点是没有同时放眼世界，学习其他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老解放区教育在中共领导下已有多年历史，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可以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但必须在改革中提高现代化、正规化程度。

经过三个方面三种因素的融合，在改革中逐步形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正规的现代教育。具体的改革简述如下。

办学目的、培养目标上，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在1950年《人民教育》创刊号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中提出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50年代初经济建设高潮中，教育确实是努力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培养各方面人才，1956年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1958年“大跃进”中毛泽东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由于党的工作重心尚未由经济建设向抓“阶级斗争”转移，而且他头一年提出的培养目标仍是有益经济建设的，要求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文化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因而对学校教育冲击不大。但是“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为此后实行“为阶级斗争服务”方针开了方便之门。

在课程设置上，废除了国民党时代的党义课、三民主义课、公民课，设立了宣传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史、革命史、时事政策等政治课程。语文、历史教材进行较大的改编。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与大学专业课则变动甚小。

学制改革。在办学体制上，按照“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

针和计划经济的要求，对大学院系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对大中专学生实行了统招统分全部包；对占总数 38.16% 的私立大学、48% 的私立中学、56% 的私立小学逐步进行维持、改造、接办。（据山东教育出版社版《中国教育通史》：1947 年全国大学 207 所，其中私立 79 所。1949 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除西南、西北 9 省，共有私立中学 1467 所，占总数 48%。京津沪宁武汉五市私立小学 1452 所，占总数 56%。）

根据《共同纲领》和尔后教育部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方针，对初等中等教育体制进行一些改革，增设大量工农速成中小学，有 5 年制的小学、2~3 年制的初等学校、3~4 年制的中学以及业余初等学校、识字学校。这一举措解决了一部分工农积极分子和工农干部的文化需要，但也存在种种问题，1955 年 7 月教育部下文停办。同时正规中、小学也放宽年龄限制和交纳学费限制，招收大批超龄工农子女入学。

大、中、小学学习年限基本照旧。小学曾想学苏联 5 年一贯制，但不合中国初小、高小分段的国情，未果。

1951 年秋对广大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适应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新的社会制度之下工作。随着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旧教育也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其标志是在 1956 年 1 月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旧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建国初的教育改革，其实质就是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 1956 年到 1966 年，新中国教育不断向社会主义现代教育推进，规模上、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是，新中国教育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跨越，后来毛泽东

却未能正确地给予确认。他从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实践概括出一条结论：所有制和政权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而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右以前没有进行。所以，他在1958年提出“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命题，并据此发动了“教育大革命”，但不久即因“大跃进”失败而一起收场，用“文革”中的说法是“被扼杀了”。因而再进行一次“教育革命”，便是顺理成章的了。他着手这方面的舆论准备。1963年12月12日，他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说“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10月16日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说：“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1966年3月17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他认为在上层建筑各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成功，还是资产阶级盘根错节的世袭领地，共产党没有实现领导权，所以要补课，要进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

建国后虽然留用了大部分旧公教人员，然而学校的领导班子都是共产党建立的。1949年建国之初即抽调大批文教干部接管各类学校。1957年反右后至“大跃进”中，又从各条战线选调大批干部充实教育部门。以1957年8月15日中央决定从中直机关抽调1000名干部派进大学、中学为开端，全国各地纷纷仿效，到1959年2月，据中央宣传部干部处统计，仅16省市就向高校派出领导干部1230名，中学6162名，任小学校长和中小学骨干教师13453人（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以太原市为例，根据1966年“文革”前夕统计，这两类新老干部占文教系统行政领导的95%以上（据《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8日第3版）。

这种干部构成情况，从组织上保证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17年历史实际也表明，教育部门各级领导是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既执行了党的正确领导，也执行了党在某些时期的“左”的领导，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想跟上战略部署的，积极组织了对本部门、本校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错误批判。无论是成绩，还是所犯错误的性质，都不能否认教育部门各级领导是共产党的领导。

“教育革命”就是以不承认17年教育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为其基本前提的。不承认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跨越，源于不认识不可超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的教育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不可避免带有“旧的痕迹”，如脑体劳动差别、社会分工差别、优生差生在升学机会和劳动就业上的差别、城乡学校的差别、重点非重点学校的差别、正规全日制学校与职业技工农业劳动学校的“双轨制”差别，等等。“左”派们却把这些“历史的遗留”统统看作资本主义，因而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作为“革命的对象”了。企图用降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降低教育水平、要大学生与工农兵划等号的做法，去缩小消灭三大差别，企图过早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只能沦于空想社会主义了。

这样看来，“教育革命”的前提不是客观的要求，而是脱离现实的主观误断。因为1966年的中国社会，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出现进行大革命的客观要求。当时的客观要求是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现代化计划，为此需要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渐进性的改革。而对教育的要求，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完善新教育制度，不断推进教育现代化。

## 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全面开展“阶级斗争”

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及其后的持续“大跃进”，造成严重后果。党的高层领导开始反思“大跃进”的错误。国防部长彭德怀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认为错误的性质是“左”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他的意见得到不少高级领导的内心共鸣，得到党的元老、时任政治局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公开支持。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认为困难的性质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此前后，居于一线领导岗位的刘少奇在陈云等一批领导骨干的协助下，力纠“大跃进”的错误，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调整。这就同坚持“大跃进”错误的毛泽东发生了冲突。他终以“阶级斗争”为题目，作了回应。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确立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会上，对经济形势估计严峻的领导人，被批判为刮“黑暗风”；农村“包产到户”的尝试，被批判为“单干风”；为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中错误处置的干部群众甄别平反，被批判为“翻案风”。会议认为城乡资本主义在猖狂进攻，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尖锐激烈，毛泽东据以提出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后不久，不少地区就报来了阶级斗争激化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毛泽东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了河北保定“小四清”和湖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贪污、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后来城市



“五反”也纳入统一的社教运动。运动中揭露出许多所谓的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假象，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愈益严重，于1963年9月，正式把八届十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自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城乡全面铺开，一直持续到1966年，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合并进行。

社教运动对列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论有无现行破坏活动，一律小事拔高、无限上纲，给予狠狠打击；对于存在某些政治、经济、思想意识问题的干部，进行了过火的斗争批判。社教运动在全国城乡煽起了炽烈的“阶级斗争”火焰。

与此同时，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政治批判运动。首先在文艺界试刀。1963年5月江青初显身手，找到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帮助，组织人写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批判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即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这次批判，当时尚不为人注意，风暴正在积聚。9月27日毛泽东严厉批评“《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这次批判锋芒直指文化部，引起不小的震动。过了两个半月，为了给意识形态批判升温，毛泽东于12月12日又批给北京市委彭真、刘仁一个材料：“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族、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个批示把批评面扩大了，从戏剧扩大到其他7个艺术门类，说“问题不少、人数很多”，不过也留了一点余地，提了一下“成绩”。可是半年后，毛泽东批判的调子骤然升高，他在1964年6月27日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批示中竟然断言：“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那样的团体。”

半年连下两个批示，辞重判严，空气紧张，文艺批判运动所需要的政治气候造成了。这两个十分武断的批示，等于给文艺界领导判了死刑。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各直属文艺团体立即整风检查，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遭批判处置，文化部班子被改组。

1964年夏意识形态各领域一齐掀起风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批判电影《北国江南》（7月3日批判）、《早春二月》（9月15日批判）的请示报告上指示：“可能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这些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于是大批影片横遭扫荡，《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逆风千里》、《抓壮丁》等等，还有戏剧《谢瑶

环》，小说《刘志丹》等。

批判运动同时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史学界先是根据毛泽东 1963 年 9 月对李秀成问题的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6 月起批判所谓“美化叛徒”的史论和历史剧作；接着批判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的“让步政策”论和“超阶级的历史主义”。哲学界根据毛泽东 1964 年 6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批判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上海，5 月开始批判名教授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经济学界批判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论。文学理论界 10 月 31 日开始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北京大学根据毛泽东 8 月 24 日对周培源等人的讲话“你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个修正主义分子，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11 月 25 日开始批判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由此开始了“国际反修，国内防修”的斗争。会后不久，1962 年 12 月 8 日党报首次公开了中苏分歧，发表了中共代表团在捷共十二大的书面声明，声明回击了东欧亲苏共产党的攻击。同月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借批意共、暗指苏共。

进入 1963 年，论争急剧升级。2 月 27 日《人民日报》答法共领袖多列上，3 月初连续公开批评意共、美共、印共。这是中苏两党论战的前哨战。此后从 6 月 14 日起，至 1964 年 11 月止，中苏两党就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苏共于 1963 年 7 月 14 日突然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此后三个多月发表反对中共

的文章 2000 多篇。中共则组成专门理论班子，撰写长篇论文。自 6 月 14 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起，又连续发表 9 篇统称“九评”的重头理论文章，次年 11 月 21 日发表最后一篇总结性文章《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论战的积极意义是：中共顶住了强邻大国倚仗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欲控制中国的企图，捍卫了国家主权。消极意义则是强化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灾难性的错误路线与错误理论。由于误把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旨在纠正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弊端的改革视作“修正主义”，误把这些国家出现的特权腐败官僚主义等某些阴暗面视作产生了“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得出党变性质国变色的结论，以之反观国内 1961 年以来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各方面政策调整、反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阴暗面，便有了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的危机感。

如果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提出中国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是不真实的，以之为斗争对象的“阶级斗争”是人为的，那么把“反修防修”的内容注入“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就有了现实的针对性了。根据大论战期间勃兴起来的“反修”理论，共产党干部演变成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几乎是一个规律性、普遍性的现象，演变是从思想变“修”开始的。当然，思创业之艰难、保持艰苦奋斗、反对居功忘本是对的，任何新兴阶级的有识之士都是如此提倡的，问题是“反修防变”的含义，远远不止这一个“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守业命题，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阶级斗争”命题，甚至认为 800 年前的宋江就“搞修正主义”。守业教育，仅仅是“反修防变”大题中的小义。“反修防变”，是与共产党内规律性产生的“资产阶级”进

行的长期“阶级斗争”。

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互相推进。毛泽东越来越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修正主义”势力。1963年5月他在浙江省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批示，认为干部不参加体力劳动，不搞阶级斗争就会变“修”。1964年12月对工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新的阶级概念：“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1965年1月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最终确定了“阶级斗争”的新内容：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就是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实质内容，也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内容。“阶级斗争”重点由老的“阶级敌人”转向新的“阶级敌人”，中间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间，大抵起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完成于1965年《二十三条》的发布。而国际国内的反修斗争，规模巨大的反修教育，则为这一转变以及尔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政治的、思想的、理论的、舆论的推动力。

“反修防修”的急迫感使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鉴于苏联发生的变化，他忧虑中国年轻一代被“和平演变”过去。所以他对学校教育的作用持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对中国教育现状极端不满。他1964年6月16日所提接班人5个条件都是政治和品德上的笼统标准，而没有能力和文化知识方面的要求。

### 三、毛泽东早年对传统教育的激烈批判

建国后毛泽东对教育的批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他对教育的严厉批判，都与他早年对传统教育的态度关涉较深，

所以这里作一简略追溯。

两千年传统教育的主流是儒学教育。在孔子那个时代，在私学开始兴起那个时代，作为“学术下移”、“官学分立”、“官师分业”教育大改革的产物，儒学教育曾经是生动活泼的、学用一致的、有朝气有生命力的。六艺课目的设立，说明其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礼即政治教育，乐即艺术教育，射御即军体教育，书即文化教育，数是包括算术、天文、历法、五行在内的自然常识教育）。“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时习之”等一系列教学原则的提出，说明其对教育基本规律的认识深度。但至汉唐，经学勃兴，读书人以“皓首穷经”为事，排斥六艺（只放在小学）。至宋重文轻武，读书人愈陷于空谈心性，四肢萎顿，虽有胡瑗提倡重振六艺，但于科场无益，士人不从。明清八股取士，变经书为应试技巧，所教所学更为无用，造就大批“废人”。

自戊戌维新至五四运动，对这种日趋腐朽的传统教育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斥旧教育为“吃人”，又以一个受摧残的读书废人典型——孔乙己控诉旧教育。维新运动中虽有“废科举，兴学堂”之革故鼎新，但千年传统教育的消极影响至深且坚，渗入新学堂，新旧并存，不中不西。诚如鲁迅、陈独秀所言，“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sup>①</sup>“我们中国，模仿西洋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所教的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不过把学校毕业当做出身

<sup>①</sup> 鲁迅：《随感录》（54），载《新青年》第6卷第3期，1919年3月。

地位，这与从前科举有何区别呢？”<sup>①</sup>

毛泽东青年时期，先是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影响，后是接受了五四精神洗礼，服膺陈独秀、胡适之。五四时期毛泽东对传统教育的激烈批判，与五四文化先驱们是一致的；不同之处是毛泽东终生保持了这种激烈情绪，而且对现代教育的某些弊病也持同一过头的批判态度而显得偏颇，偏颇得如同一个痛恨关学的叛逆者，始终置身于正统教育之外。他在早期的名篇《民众的大联合》中控诉旧学校摧残人：“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视我们如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使我们成了‘近视’”、“成‘脊柱弯曲症’”、“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何以这样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啊，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一大堆古典式的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我们已经堕在苦海！我们要求讲自救！卢梭所发明的‘自教育’正用得着。”<sup>②</sup>后来他又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4月7日）中批评旧学校“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残践人性”、“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清理传统的同时，意外地发掘出自己的思想先驱，这是几个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他们深切反

① 参见《新青年》第2卷第6期所载陈独秀文章。

②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载《湘江评论》1917年7月28日。

思宋灭明亡的民族痛史，从学风上、从教育制度上找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学用脱节是宋明之学的最大病根。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船山（1619～1692）高倡“经世致用”，批判时儒迂腐，只知“徒以（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铃束天下，一具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sup>①</sup>主张“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读书人应务实，“能士则士，次则医，次则农，农、工、商、贾，各惟其力”。<sup>②</sup>其中尤以颜元（字习斋，1635～1704）的实学、实行、实用思想对毛泽东影响大。梁启超称颜学为“思想解放的炸弹”。毛泽东在早期教育论文《体育之研究》中盛赞颜元、李塨：“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较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sup>③</sup>

毛泽东后来批评读书越多越蠢，书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要走向反面，皆有所本，多得之于颜元对读经教育的批判。颜元把读死书比为吞砒毒，“耗竭心思气力，深受其害”，“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sup>④</sup>如果“天下人皆读书、著述、静坐，则使人咸弃士、农、工、商之业”，就要亡国亡种。<sup>⑤</sup>他讥读书人：“子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使愚，多读多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sup>⑥</sup>

① 黄宗羲：《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见《南雷文定后集》。

②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

③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载《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9年4月17日。

④ 颜元：《朱子语类评》。

⑤ 颜元：《习斋记余》卷二。

⑥ 颜元：《四书正误》。



毛泽东对传统教育的激烈批判态度，首先源于他早年读书求学的切身体会，由此产生的叛逆反抗精神；二是五四思想解放大潮的直接影响；三是继承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学风；四是来自后来办平民教育、工农教育、干部教育、军事教育的直接实干经验，这一点容后再述。

#### 四、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批评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同时，在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反修”论战、抓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

毛泽东早年对传统教育非常不满，上已简述。他对建国后的新教育也有诸多意见，多次批评学校课业重，挤了政治，害了学生身体。1950年6月19日他致书教育部长马叙伦，“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1951年1月15日再次致信马叙伦，要他对学生健康问题“采取行政步骤”。11月18日批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信，“必须减少学习时间，保护健康”。1953年5月17日和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教、教育两部请示报告时又指示要注意学生健康，功课重，不得太多，可少学点。6月30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指示减少课时，初中上5堂课多了，考虑上4堂，把身体好列为第一，学习好和工作好列为第二、第三。

对课程设置、教材、讲授方法也不断有批评。1957年2月14日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说：“政治课讲的没兴趣，要打瞌睡，这样最好不讲，打瞌睡时可以节省精力保养精神。”3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学校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比如课太多，学生负担太重。我看我们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要末一个字不认识叫文盲，要认字一天给你堆一大堆。”3月7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和7个省市教育厅局长的谈话中说：“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古典文学要减少。《诗经》大部分没有诗意。”“减少门数，减少分量，为的是全面发展。”“你们管教育，教育部是苏联教育部还是中国教育部？教材为什么不用老解放区的东西为蓝图？”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插话说，“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书又劳动”。

总之，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批评并不是在1964年春节讲话之后才突然发生的，批评是一直就有的。但是，春节讲话却非同寻常，这是一个全面的批判，又是一个政治的信号。

春节讲话是在一个有高层领导、教育界官员和耆老名流出席的正式场合作的，毛泽东出言还比较谨慎有分寸。当时教育部正召开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检查工作（1964.1.25~3.7）。会议期间2月13日这一天，适逢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开了一个教育座谈会。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5位领导人陪同，请了民主人士和文教部门负责人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林枫、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11人参加。

毛泽东首先肯定“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接着拉开话题，痛陈正规学校教育积弊，纵谈古今中外，一反俗见，奇论迭出。他俯视正规科班出身，张扬自学成才，旁征博引，累兵列阵，一口气连举十多个著名人物事例。李白、杜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曹雪芹、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出身，孔子、祖冲之、李时珍都没进过什么大学、中学，

高尔基、富兰克林、瓦特都出身低贱，他们都成了一流人才（稍后，6月8日又举肖楚女没上过学校为例）。讲话确实鼓舞人心、振奋斗志。但新言科班出身“就少有真正好学问的”，“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行了，国家就管不好了，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是害人的事”，则缺乏统计学的依据。正规科班出身的人才还是大量的，治国也还是要重用一批饱学之士，不能因为有自学成才和布衣起而称王的个例就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毛泽东这个讲话主旨是谈改革教育方法问题。要点是：①学制要缩短。②课程多，害死人，可以砍掉一半，孔子教学生课程只有6门。书不能读得太多，读多了就要走向反面——成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③考试不得法，突然袭击，题目古怪，是对付敌人的方法，不是对人民的方法。可以开卷考试，交头接耳，冒名顶替，互相抄袭。有创见的即使只答对一半也可打100分，无创见的即使答全对也只给50分、60分。④讲授不得法，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要灭亡。五经、十三经注解那么多，灭亡了。佛经，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太长，难读，玄奘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到一千字，比较好读。讲得不好，要允许学生打瞌睡，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

毛泽东对学校教育积弊的抨击，可谓入木三分，是真知灼见。尤其对烦琐哲学的批判，痛快淋漓，对机械呆板的考试极尽揶揄之能事。但说到学制和课程“砍一半”，就嫌失之轻率。

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第一篇集中谈教育，全面阐述他的教育学见解的公开讲话。既浓缩了毛泽东一生多次从教的体会，又表明毛泽东这一段时间特别关注教育问题，亲自抓教育问题。春节讲话之后毛泽东谈教育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批评的密度，批评的分量陡然上升，语气越来越严厉，错误

越来越夸大，没有以前批评的平心静气、实事求是，而是咄咄逼人、武断误指。这与“文革”前夕毛泽东的心态相关，他已经满眼见“敌人”，迫在眉睫的是“修正主义”即将篡权。或许也是为了让“文革”能够有根有据地发动起来，他需要社教运动提供领导班子大多已经“烂了”的结论，需要意识形态批判运动提供上层建筑大多部门“不在我们手中”的结论，也需要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结论。此后两年多时间一直到“文革”中，毛泽东一直盯住教育，不时就教育问题讲话、发批示，引起教育界频频震荡。教育部天意莫测，穷于应付，后来才知是拿教育开刀，意在发动“文革”。

不到一个月，即3月10日，毛泽东又对北京铁路二中一封信大为看重，批给刘、邓、彭办：“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太多，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育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毛泽东将他春节讲话提到的4个问题中的3个（除开学制问题），再次提出催办。可见春节讲话并非一次即兴的泛泛之谈，毛泽东确是在认真抓教育了。

6月8日，在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又一次批评教师讲授不得法。“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记笔记就不怕犯错误？”“你应该少讲几句么！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我的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大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你们看么！”“写好了就不要讲了么！人家看么！现在的教员蠢得很，懒得很。”毛泽东确实抓住了教学

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积弊：照本宣科。这个问题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存在。有水平的教师总是有限。庸师离开讲稿不能讲，发下讲稿则怕学生不再听。

此后到1964年夏天，随着“阶级斗争”的升温，毛泽东对教育问题有了更新的想法，在新的思路酝酿解决办法，也即是考虑发动“教育革命”。毛泽东这一条新思路后面再说，因为原有的进行方法改革的思路还在发挥作用。

12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小型会议上，又一次回到教师照本宣科这个老问题，讲了对付的经验：“要允许人们打瞌睡、养神。我过去读书就看小说，老师一查，就把课本放在小说上。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先生的不对，不如看小说。后来发明可以打瞌睡。你不要讲我这个人没有创造，还是有一些。这样一来，就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有了讲义就不要再讲了。”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就教学方法改革问题发出最后一个指示。因为他感到只是方法改革不解决问题了，重心在思考根本的革命的解决办法。这个指示只是一个权宜的措施，说得简单、含混、朦胧。这是就《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sup>①</sup>一文，发给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批示。批示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当时学生的学习负担，因毛泽东春节讲话以来的一系列批评已大大放松，但各种政治学习会议、学毛选、学雷锋、做好事、下乡劳动、访贫问苦、参加“阶级斗争”、听忆苦思甜教育报告、军体活动

<sup>①</sup> 系北京市团委对该校历史系2年级（1）班的调查。调查说学生学习负担太重、体育运动量过大、课余活动过多、劳动多、会议多，4年课程压为2年半完成，影响到学生健康。全班52人，患慢性病者28人，占52%。

等等政治活动和公益劳动活动量空前增加，导致负担太重。毛批示却不点明哪一种“负担太重”，但后一句“学了也无用”，似仍指学习负担。“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砍掉什么呢？学习已砍掉不少，政治与劳动活动，谁敢砍呢？而且在不明“战略意图”的情况下得“决定实行”。后来许多官员因此而获罪——他们根据实情砍去一些政治活动和劳动，后被攻击为“竟胆敢反对学毛选！反对突出政治！”实际他们确实是照“最高指示”行事。

教育部门从春节讲话一开始，就努力贯彻、尽力紧跟伟大领袖一个接一个的指示，分批在大中学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掀起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修正主义教育思想（不点名批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浪潮，探索教育方法改革，突出政治、抓阶级教育、抓学毛选、学雷锋等等。但是由于教育领地不满人意的积习太多，积重难返，是一条在运动风浪中摇摇晃晃跟不上队的旧船，看错风向，终于被弃。五七指示一下，船翻舟沉，全军覆没。

### 五、新的解决方法——“教育革命”

1964年夏，阶级斗争大大升温，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全面开花。毛泽东对当时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能达到的斗争深度广度仍不满意，他在思考探索新的斗争形式。与此同时，他对教育工作的批评，也开始转向新的思路。这年7月5日，他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儿毛远新有一个私人谈话，但不久就成为公开传达的文件了。毛泽东把“阶级斗争”估量得相当严重，说：“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

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里怎么没有？”“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接着就批判军事院校政治思想工作不落实，提出要军校学生下去学习阶级斗争，并且第一次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主课”的教育思想。后来成为“文革”时期的教育指针。可见从春节讲话到夏天，半年之中，随着“阶级斗争”升温，毛泽东关于教育的看法有了新的异变。“教育革命”的思想已经萌发。

以前毛泽东主要是不满教育方法，抓的是方法改革问题。这次暑假谈话，仍然也有一半篇幅谈方法问题。他讨论教学方法这样的“纯学术”问题时，总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他说“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那个五分。你不要去争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的”，要看透分数，“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优，工作不一定是全优”。“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毛泽东关于分数的见解确是方家之见，最早提出“高分低能”问题。

这篇讲话还提到反对注入式教学法，提到“教改的关键是教员”等方法问题。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最核心的，是“阶级斗争”主课题。这是1964年夏天毛泽东关于教育思想的最新发展，这是他“教育革命”思想的起点。把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论、教育改革思想与他后来的“教育革命”思想区别

开来非常重要。以前，“文革”中是把二者搅在一起，统称为“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最早最权威的证据，是由陈伯达主持选编、1967年12月7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个选本混选了毛泽东以上两类言论，后来10年之中都统称“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新时期一些毛泽东教育思想论者——无论持肯定或批评态度的，也未将二者作区别。区别问题后面还要论述，此处从略。

同一个暑假，8月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所有学文科的，学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法学的，通通都要去”参加“阶级斗争”，当年冬天就去，农村5个月，工厂5个月，“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一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继提出“阶级斗争主课”论之后，毛泽东又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对现行教育制度发难，这确是学校工作中难以克服的一个顽症，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旧教育”这一致命的要害：脱离实际。“脱离实际”此后成为攻击教育界的一个威力无比的武器，后来“文革”中无限夸大教育“三脱离”的缺点，又将缺点无限上纲为“两个阶级的斗争”，以致走到“以干代学”，取消教育的地步。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表露了对教育部的不满，说：“现在要改革还有很大困难，有许多人就是不赞成。目前赞成新方法的少，不赞成的多。”同时以主要篇幅集中指责教育脱离实际，并将以前批判的学制多、课程多、教法不当等方法问题都归为“脱离实际”这一根本问题。这表明毛泽东进一步理清了批判的思路。他说：“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牛、鸡、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



麦、黍、稷。学生要读到二十几岁才能读完大学，学年太长了。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文学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法律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毛泽东在这儿提出后来“文革”中影响广泛的一句话：“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提倡教育要结合实际是最正确的，而最重要的是怎么结合、怎么找到这个结合点。这是需要反复试行和长期探索的，靠大批判不能解决。同时，提倡教育要结合实际是不错的，错在以“教育脱离实际”一句简单的判词，就低估或否定教育及教师。

此后，毛泽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批评教育工作。1965年1月27日接见印尼总理苏班德里约时，指责“军事学校办得一塌糊涂，正在整理。过去没有军事学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学校。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学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书可以读一点，但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3月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又说：“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我不反对，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读二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海、陆、空学校，不怎么高明。”6月26日接见医务人员时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么！”8月2日接见卫生部钱信忠和张凯时说

“高等教育要学五年，读那么长时间书，值得研究”，“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招些政治好的中学生就可以了”。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田家英等人的谈话中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么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该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出哲学，文学家写不出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乡搞工业、农业、商业。”“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洋楼里教吗？”1966年2月18日同毛远新的谈话中说：“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有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际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讲原子物理只讲板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板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医学先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从物理模型中抽象出来，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他又修正了前些时候说大学读两年就可以的说法，说六年制理工科“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三年，尖端科学三年，要有针对性才行。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

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六年改成三年，这样做以后，步骤妥当，方向对头”。

这样，毛泽东从1964年夏天起到1966年初，一年半的时间里反复阐发一个主题：教育脱离实际。对各类教育“脱离实际”的学制、课程、教材、教法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并具体分门别类地涉及军事教育、文科教育、医学教育、理工科教育。

前面说过，毛泽东青年时代就继承了明末清初王船山、颜元等人经世致用、实学实行的学风，又经受五四反传统教育的精神洗礼，对旧教育脱离实际的学风深为痛恨。现在要补充说一个方面，即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从教实践经验。他在长沙船山学社主办过湖南自修大学（实分为革命干部学校与群众业余学校二部），在韶山等地开创农会夜校，大革命时期接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赣南办红军学校，在陕北办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毛泽东的办学从教经历，主要限于革命战争年代。革命与战争对教育有特殊的要求，要求教育直接为政治和战争服务，战争高于一切。这就决定了根据地教育鲜明的政治性、实践性和实用性。共产党人不可能先进军事院校学习战争，而是战争开始时才学习战争，从战争学习战争，在干中学，学了就用。不仅教条主义与繁琐的学理探究无存身之地，就是必要的理论研究也暂时顾不上（如毛泽东提出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边币法币经济理论问题等）。

同时，游击战争环境与相对落后的乡村环境，决定了根据地教育的不正规性，普及重于提高、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低要求、低质量，总之一切从边区和战争的实际条件出发。40年代初，由于战争处于相对稳定阶段，边区相对和平、经济发展，

边区教育有了一个规模上的大发展，加之大批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教育上就出现了一个后来称为“旧型正规化”的运动。向城市正规教育盲目看齐，脱离了边区实际，受到批判和纠正。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5月27日社论再次明确边区教育是“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战争生产知识技术教育重于文化教育”。同时再次重申打破正规学制衔接，入学资格限制，在学年、办学形式均作便于战争和生产的变通。

革命斗争高于经济建设，对培养目标也有不同于一般教育的要求。学校教育不是培养各方面经济建设人才为主，而是培养革命干部为主。大部分高小，即办成干部准备学校，初中以上即是按干部学校的要求来办了，政治训练重于文化课学习。群众教育也不是一般扫盲识字，而以政治教育、政策宣传、启发阶级和民族意识为主。教以初浅文化，首先是为了让群众听懂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

毛泽东成功地举办了根据地的革命教育、军政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他多次亲撰讲义，亲上讲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是一位成功的教授。因为他一切从实际出发，他的办学从教，也跟革命斗争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当战争已经成为过去，小米加步枪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当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进行了十六七个月，当新中国教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正向着现代教育转变的时候，毛泽东仍不能忘情于他几十年奋斗的艰难岁月。他从游击战争学校的经验出发，责备把核弹火箭列入教程的现代军事院校；他从几百上千年前的华佗、李时珍从医道路和农村培养土郎中、卫生员的经验出发，责备学制长达5~6年的现代医科大学；他从李白、杜甫、高尔基写作成才的

实例出发，责备现代文科大学不出作家哲学家；他从百年前未读大学的瓦特、爱迪生搞出大发明的个例出发，指责现代理工科大学基础理论讲多了。他忽略现代科学教育已经发展了，17年新中国教育不仅不同于辛亥、五四时期半新半旧、新旧并存的教育，也不同于边区共产党所领导的非正规教育。它有不少需要改善的落后面，但最主要的改变应是向教育现代化前进。但是毛泽东囿于过去的经验，反感正规化。早在1958年就痛批主持南京军事院校致力于军事现代化的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和“正规化”错误。

他在五四运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之后，重复五四运动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在王船山、颜元批读书（指经书）、倡实行两百多年之后，重复他们的重经验、轻书本主张。17年教育已经不是200年前的读经教育，也不是几十年前的由中古向现代过渡的转轨型教育，它正向教育现代化大步前进。然而，毛泽东的批判比王船山、颜元前进不了多少，仍停留在五四的批判层次上。这样来批判“17年教育脱离实际”，结果是批判本身就脱离了现代教育的实际。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17年教育存在脱离实际的一面（确实有），但是由于他对正规教育和现代教育缺乏必要的认识，把这种教育区别于乡村教育和战争教育的一面，区别于社会生活的一面——即教育的特殊性，也笼统当作“脱离实际”来批。教育区别于社会生活，教育之为教育即教育的特殊性，是不能指为“脱离实际”的，正如不能指责工厂脱离农村、农民脱离工人老大哥一样。取消教育的特殊性，要求它等同于社会，这就取消了教育或者削弱了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曾经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用以打破传统教育脱离实际的弊

病。后来陶行知易之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打破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界限，提出以社会生活为学校，比杜威更激进。这在当时既有打破传统教育脱离实际的积极意义，也存在取消教育、取消学校的倾向。以中外教育史为借鉴，本可以吸取教训。但当时凡有举措，即头脑发热地宣布为史无前例，前无古人，自认为是“崭新创举”，与前人有“阶级本质不同”，拒绝接受前人的历史经验教训。

“脱离实际”被具体为“三个脱离”，这不是“文革”中的发明，是承袭1958年大跃进“教育大革命”时的说法。一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补救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二曰“脱离生产劳动”，三曰“脱离工农”，补救是兼学工、学农、学商、学军。实际毛泽东还有一个意思没被概括进去，这就是“理论脱离实践”。毛泽东对这第四个“脱离”的批评，原则上是正确的。理工科要到工厂进行专业实践，文科以社会为工厂实践，是正确的。对第一个“脱离”的批评，它从属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当然错了，教育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主课。

至于批评“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劳动”，则要分析。城市学生不知马、牛、羊、鸡、犬、豕，不分稻、粱、菽、麦、黍、稷，农村学生不知工人怎么做工，学校看不到怎样做买卖，这恐怕不是学校的过错。这是社会本身的产物，是三大差别和社会分工的产物。而三大差别与社会分工则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将来如果它阻碍历史进步自会被历史淘汰，企图在现阶段，在学校阶段就采取实际步骤去“缩小三大差别和社会分工”是不现实的。而毛泽东不久果然就拿出了合工农商学兵、融生产劳动工作教育政治批判为一体的“五七公社”方案。学生在校期间主要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完成学生的社会化应在他们毕

业走向社会以后。在校期间就责以“拿起锤子能做工，扛起锄头能种田，操起秤杆做买卖”全面多能发展是不必要的，即使步入社会以后也不必要。工人也未必稻粱菽黍稷样样懂，怎么能以之苛求尚未成年的年青学生。

当然，要求学生就近劳动锻炼，尤其是参加专业对口劳动，实现教劳结合，则是有益于教育的。

毛泽东认定 17 年教育“脱离实际”以后，把这事上纲为“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严重现象，成为他提出“教育革命”的主要依据之一。

提出“教育革命”的依据之二，是他对教师队伍的估计发生越来越大的偏差。1964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对北京大学周培源等人的谈话中提出对教师的估量：“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此时意识形态批判正如火如荼开展，毛泽东对文科知识分子日感厌恶。次日他接见非洲、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说：“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很少有我们的教授，很少有我们的教员，那些人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替我们服务。”此时他尚认为教师中左派和中间派占 90% 以上，只少数人“赞成修正主义”，“希望蒋介石再来”。

10 月 16 日毛泽东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特别值得注

意，与8月底对教师队伍的估计大为不同。他说：“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这种情况，再过几年可能会在你们国家出现。”

到1966年，毛泽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他在3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反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正因为他认为学校已经是资产阶级统治，所以他开始鼓动学生跟学校捣蛋，甚至“造反”。

早在1965年，毛泽东同尚在北京外语学院读书的外甥女王海蓉，有一次妙趣横生的对话。这个谈话纪要不久即广为流传，对青年学生的影响犹如开笼放鸟，真是一次“大解放”。

毛：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打瞌睡，要爱护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有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就敢星期日不按时回校。回去以后你告诉那个学生，八九点回校太早，可以十一二点再回去。谁要他们晚上开会嘛！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天一律要回校，否则别人就会说破坏学校制度。

毛：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好，会挨批评的。

毛：我看你这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什么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上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就带头造反！……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啦！你说正因为我是主席的亲戚，我才听他的话，正因为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我看你讲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学。

当时人们看来，这不过是家庭私语闲聊，是幽默，是调侃。谁也没想到一年以后，毛泽东正是按这个思路，打开潘多拉盒子，放出“天兵天将”，大乱校园，大闹天宫，以致局面不可收拾。结果，毛泽东不得不转而支持批无政府主义。

1966年4月在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指示，表明毛泽东“教育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方法已经考虑明确了。他说“这方面的革命要靠青年，党中央号召你们青年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你们青年批判到哪里，党中央就支持到哪里”。他准备为青年学生冲击学校规章制度，开放绿灯。

这一年的5月7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对林彪5月6日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作了一个长达600多字的批示，批给林彪。5月1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称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五七指示”内容向全国公布。

“五七指示”后来成为“教育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正式提出：“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经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关于教育的结论就成为党的组织决定。这个决定宣布：（1）学校统治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2）要进行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的正式提出，教育部首当其冲地垮台。随后，各级各类学校的行政领导无一不垮，教师大多落难。

## 第二节 “教育革命”的内涵

### 一、“教育革命”的理论依据

“五七指示”只用一句话揭明“教育革命”的依据，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后来，1971年春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产生的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文件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一句论断，分解为两个估计。

第一个估计是：“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个估计，与毛泽东一贯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基本吻合。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里都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但是他又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据此定其阶级属性为“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政治、思想两分法，暂时避免了在政治上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时陷于自相矛盾境地，但这种理论上的矛盾终将危害到政治实践。

对知识分子、对广大人民教师阶级属性的误断，成了这次“教育革命”的最根本、最主要的依据。这也是1957年以后，党与知识分子关系几度紧张的根本原因。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误断，说来话长。

本来经过建国初6年多的“团结、教育、改造”，新老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56年初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肯定了这种进步，并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予知识分子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信任。但是，党内认识并不一致。周恩来是从为哪个阶级工作这个角度确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而党内许多人仍是从世界观角度看知识分子问题的。如毛泽东同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认为受过西方教育的文化、技术工作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过，还是认为，“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转过来了”。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国内出现学生闹事，这不能不影响到毛泽东的看法。他在1957年2月书记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说：“石家庄三千人游行示威，全国大（中）专学校一千五百多所，有三十二所发生了问题，同时许多学校也出现了典型人物……他们说，社会主义不行了，他们要上台。现在大学里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

在我国长期存在。”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列在一起了。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改变了一年前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的定性，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月20日关于思想工作问题的讲话中再次强调：“现在的大学，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耐心争取他们……另一面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要向现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因为，除他们就没有知识分子了。”

毛泽东给知识分子定性的标准，一是出身，二是世界观。这就改变了土地改革时期划分阶级的标准。当时发布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文件中规定“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

世界观标准带有极大不确定性，引起理论的混乱。4月30日毛泽东约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正确地指出：旧经济基础“早已挖空”，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此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毛已经附在此皮上”。但是却没能由此引出类似1956年的结论来，而是继续认为知识分子“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有些不自觉”，“思想上还认为马列主义不好”，不能归入工农劳动人民队伍。世界观标准还导致毛泽东改

变他以前的一些分析。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一文中根据经济地位（生活条件）、政治立场和家庭出身，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归入小资产阶级劳动者范畴。现在他却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从经济地位看，知识分子与资本家差别很大而与小资产阶级类似；从政治态度看，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旧中国极具革命性而在新中国拥护社会主义，也与小资产阶级类似。但是世界观标准却导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论，结果对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估计，反而较旧中国知识分子低了。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大量吸收、团结使用的，但是政治上不很放心，理论认识上有矛盾之处。1957年反右之后，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更加发展起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误断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席宣、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对此有详尽论述，现略加发挥引述如下。

1957年夏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判断，把少数敌对分子和多数仅仅是由于某些不满或基于善良愿望而提意见的人，不加区别，笼统断为“资产阶级”，而且是这个阶级的右翼。被认作“资产阶级右派”的55万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而当时拿定息的真正资产阶级才70多万人（经1979年落实对原工商业者政策，又将70万人中的大部分人划出，确认为小商贩、手工业者，属劳动阶级）。70万资产阶级已同生产资料分离，作为一个阶级正在消灭过程中，此时忽又冒出50余万这个阶级的右翼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断言：“在我国社会

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里又把反右派斗争的意义大大拔高了，认为是思想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之后，又提出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么一个含义不确的命题，这就为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于确认存在一个50余万人的“资产阶级的右派”，毛泽东断然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进一步论证关于主要矛盾的新提法，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这在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得到确认。一个“剥削阶级”是并无资产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已无土地的地主及买办阶级，一个是已交出资产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认定这几种人仍然构成阶级，这同他以前的理论失误相关，即世界观标准相关。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的原理。毛泽东力图对此作出解释，他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已经消灭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在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在一份发言提纲上提出：不忙于宣布消

灭剥削与消灭阶级问题（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仍然存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这一理论观点，一是源于以前的世界观标准，二是源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因为划分“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即是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标准是不科学的。政治思想比世界观更加易变。

反右斗争对毛泽东影响很深，直到1959年，他于1月27日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还说对知识分子“又要用他们，又要同他们作斗争……不然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又会出来反对党。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中国搞了几千个小匈牙利……在每一个大学、中学、工厂、政府机关，右派想怎么做就让他们怎么做，让他们尽量讲……这就给他们造了像”，“抓住了他们的尾巴”，“不搞这一手，对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中间派当中还可能有人又会反对我们，世界上有混乱的时候，他们又会起来，我们要有准备”。

1962年调整各方面政策时，周恩来和陈毅曾经在广州召开的戏剧会议和科技会议上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的帽子。毛泽东不予同意。他8月9日在北戴河中心小组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尽管把上千万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策略思想（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多数人是好的，因而要相信多数、团结多数、依靠多数），但是符合他此时的政治目标（确立“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定性仍然维持下来。所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这第一个估计并非新的发明，它只是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定性。

第二个估计是：“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在教育战线上，这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严重现象，引起了全国广大工农兵的强烈不满。”

这样，两个估计归纳起来就是：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这是对学校政治关系的虚假捏造。教师是劳动知识分子，而教育行政干部明明是代表共产党领导、管理学校。在路线正确的时候，这些干部同广大教师团结合作，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共同作出贡献。而在“左”的政治运动干扰之下，他们一般是努力跟上上级意图的，不仅不敢“包庇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或还伤害过一些教师，干群之间关系紧张，广大教师深受压抑，常如惊弓之鸟，如何谈得上“统治学校”？

而10年“教育革命”，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虚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理论依据上。

## 二、“教育革命”理论从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教育革命”从属于“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教育革命”理论当然从属于这个总理论，是这个总理论的一个分支，又与这个总理论互相印证，互为依据。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文件——1966年5月16日中



其中央通知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这一段话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其中夺取教育领域的领导权又是“教育革命”的任务。

1966年8月8日，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设了一个专条，即第10条专谈“教育革命”：“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里再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夺取学校统治权。

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由陈伯达和姚文元主持起草的，经毛泽东审阅过的二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社论第一次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这个理论有6个要点：（1）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2）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3）阶级斗争的核心仍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4）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有代表人物，即走资派，要整倒他们；（5）要开展自下而上、放手发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根本

纲领是“斗私批修”，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上层建筑。

其中第三个要点提出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在教育领域则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师“全面专政”。第六个要点提出“改革教育”，这是“教育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教育革命”包括：（1）通过批判斗争，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夺权；（2）在“斗批改”中建立对他们的“全面专政”；（3）通过“改革教育”巩固和深化这种“全面专政”，阻断学校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防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复辟”。“教育革命”理论和“文艺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两大主要支柱。6个要点可简化为这么一种理论逻辑：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其中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核心是政权，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没有统治权（这一武断结论以教育界和文艺界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作依据），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有政治代表即“走资派”，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整倒他们。因而“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和文艺两个领域开刀，通过批这两个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向手握大权的领导干部问罪。越是糟蹋教育和文艺，说得一团漆黑，领导干部越无法自辩，终至整倒。所以“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搞得最凶，持续时间最长，理论形态最完备。

从“文化大革命”整个政治斗争背景来看，“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和文艺改革，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又是另一场更大政治斗争的工具或道具。如果说教育上确有人真心想进行一些改革，也由于不得不从属于政治斗争或被政治斗争所左右而步入歧途。

### 三、“教育革命”的内涵——“五七指示”分析

“教育革命”内涵可归总为两句话，即：在教育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这里作些具体阐明。

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何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讲话到1966年5月提出“五七指示”的两年多时间里，对教育现状进行了一系列的抨击。毛泽东所抨击的，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种种表现。概括起来主要是：

(1) 脱离生产劳动实际。这包括学制长、课程多、书本多、讲得多（繁琐），使学生长到二十多岁还无法走向社会。

(2) 脱离阶级斗争实际。不知道阶级斗争怎能算大学毕业。

(3) 理论脱离实践。军校念多了书不会打仗，医校念多了书不出华佗、李时珍，文科念多了书不出小说不出历史不出哲学。

(4) 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

(5) 分数第一，摧残学生，毒害学生。

以上指责，有的是确实存在的弊病，有的是夸大，有的是误指，即使统统算数，也难以得出“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继续论证学校的“资产阶级统治”，报刊大批判和学校里批判斗争又提出一批证据。主要是：

(1) 三脱离关门办学（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生产劳动、工农大众）。

(2) 用对付敌人的考试方法对工农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用分数线把工农子女卡在校门外，实行“文化专制”。

(3) 用“智育第一”、“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工农子女，使他们在这样的学校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忘本变质，成为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精神贵族”。

这些指控基本是诬陷，指白为黑，全盘否定正规教育的基本规律，废弃考试、废弃评分，不要读书学习，不培养知识人才。

由此可见，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表现，原来就是指：（1）教育中一些不可避免但可以不断克服的弊病；（2）按正规教育的基本规律办事。

接下来，就可以弄明白“教育革命”的基本内涵了。“教育革命”就是要打破上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而“五七指示”就是指导这场“教育革命”的总指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重申走“五七道路”，“毛主席指示的这条道路，是彻底破除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兵群众的旧教育制度，把教育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五七指示”的基本内涵如下：

(1) 教育要革命，夺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权”。后来派出工人和农民分驻城市和农村学校，把原有教师置于接受批、管，接受“再教育”的地位，这就是落实“统治权”问题。实际上工农与教师都属劳动人民，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利益冲突。文化较低的工人农民调离生产岗位、担任陌生的管理学校的任务，根本不具有“阶级夺权”意味，更不是什么“革命”。这只是重复一次“外行领导内

行”——上一次有政治上的必要，这一次却是给学校和教育添乱。

(2) 打破小学校，建立“大学校”。这个“大学校”不是单纯的学校，是一个按“五七公社”模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八年抗战中的各个根据地（军队和实行供给制的机关团体），就是这种“大学校”的样板。这是在战争环境和物资匮乏的特殊条件下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其特点是：高涨的革命热情，高度一致的政治信念，高度军事化的集体生活，高度平均分配的供给制，高度统一的社会组织，分工极度缩小，商品经济极度萎缩。军队是这种“大学校”的典范，“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合战斗队、学习队、生产队、工作队为一体，“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工作都可以兼起来”。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这很多人，包括三国时代张鲁的“五斗米道”制度，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等等，差不多都是存在于战争环境下的起义军事组织之中。毛泽东希望向全社会普及这种“大学校”，这就不仅是教育制度的改革，更是社会制度的大变动。“五七”道路即是用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经验，来改造现代教育和改造现代社会。

(3) 如果说军队和党政、事业机关都是特殊的社会团体，比较容易实行“五七公社”方案，那么向军队学习，把全国都办成“大学校”会怎么样呢？工人以工为主，亦工亦农，兼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合农工军学为一体，组成工业五七大学校；农民以农为主，亦农亦工，也兼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也是合农工军学为一体，组成农业五七大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也分别组成

商业五七大学校、服务业五七大学校、党政五七干校。全国各行各业各社区，都组织在这种一边参加本行业工作，一边参加他行业劳动；一边学文化、学政治，一边军训、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大学校中。“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打破学校与社会的界限，打破学习活动与社会实践、生产实践的界限，打破学生与工农兵干的界限，打破教育与社会生活的界限，社会就是学校，学校就是社会。并期望以此缩小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者的差别，进而缩小各行各业分工差别和城乡差别。历史上有过民粹公社设想，没有实行。梁漱溟有过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村学”“乡学”计划，实行不了。陶行知办过实践“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思想的山海工学团，办不下去。同样，“五七公社”或“五七大学校”的设想，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狂热的政治条件下也没有实施。张春桥、姚文元投毛泽东之所好，曾将上海市政权机关取名为“上海公社”，为毛泽东所阻止。后来又将同济大学的两个教学系与科研单位设计院和生产单位施工队，拼合成一个集教学、科研、生产一体的怪物——“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学生、技术人员、生产工人混合为教学班，“并进行军事编组”，坚持试行10年之久，是“文化大革命”中惟一在办的“五七公社”。但究其实，只是取了一个名字而已，其教学、生活、工作、组织、分配，与其他大学并无差别，只是出了一些“左”花样、“左”经验。

(4) 如果说全社会办成“五七大学校”的设想并未实行，那么全国学校走“五七道路”倒真是“教育革命”10年的方向。毛泽东认为过去教育最大弊病就是脱离实际，其他弊病如学制长、课程多、讲得多都是为脱离实际而设计的，考试刁难、分数卡压也都是督促学生死读书而不问实际的。他提出“以学为

上，兼学别样”，即“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主学”与“兼学”的提法，应该说关系还是摆对了，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强调“阶级斗争主课”，强调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以“转变思想”，强调生产劳动改造思想的作用，实际上“兼学”摆在“主学”之上。学工、学农、学军、批资是讲劳动、讲改造、讲阶级斗争，都具有压倒的政治意义，而学文化则有“智育第一”和“读书做官”之嫌：不仅毒害学生，而且扩大三大差别。全国许多学校都易名为五七中学、五七小学、五七大学，标示自己走“五七道路”。而“五七道路”的含义，几乎等同于“学工、学农、学军、批资”，学校开门拆墙，走向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

总括以上各点，“教育革命”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教育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用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大学校”，来改造现代正规教育并进而改造现代社会；改造的重点是摧毁“脱离实际”的现代教育制度，强化阶级斗争实践与生产劳动实践，削弱文化教育以阻断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培养亦工亦农亦军亦文、能够批判资产阶级敢于“反潮流”的新人，以教育作缩小、消灭社会分工和三大差别的工具。

“四人帮”利用“教育革命”搞政治阴谋、搞政治斗争，则加剧了“教育革命”的破坏作用。“教育革命”在政治上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应予否定；在思想上，从属小生产者空想社会主义体系，貌似公平而实为倒退，与现代教育格格不入；在实践上，为时十年多的全国性的大试验，付出了过于沉重的历史代价——教育事业的大破坏大倒退和整整一代人的耽误。

关于“教育革命”的提法。毛泽东 1964 年春节讲话以来，一直用的是“改革教育”的提法，报刊也全部是“改进教学方法”、“改革教育各项制度”的提法。直到 1966 年 5 月，“五七指示”才提出“教育要革命”。“五七指示”发出的同时，一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正在起草，稍后在 5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正式文件把“教育革命”列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采取同“文化大革命”相统一的步骤：清洗混进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这里只提及教育领域的夺权斗争，还无暇论及教育改革问题，“教育革命”四字也没有出现。

两个多月后，8 月 8 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专门设了一个章节谈教育，用的节题是“教学改革”，内容基本照抄“五七指示”，提出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方法和教材。在第一节总目中，则重申了“五·一六通知”关于在文化领域夺权的规定。整个决定中仍没出现“教育革命”字样，但“五七指示”阐述的“教育革命”内容已全部收入。这样，就以党的全会决议法定程序，再次认可“五七指示”提出的“教育革命”。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造成两年多的动乱，“教育革命”开了个头（“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的批判、夺权）即告中断。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央文件中关于学校的，如 1966 年 12 月 31 日的《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1967 年 3 月 7 日《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同日毛泽东关于天津延安中学军政训练的批示、同日《人民日



报》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10月14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教育革命”提法极少见，而较多的提法仍是“改革”。

直到1967年11月3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之后，报刊才将提法统一起来，从此只称“教育革命”了。

1967年12月7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系陈伯达等人辑录毛泽东历来论教育言论而成，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通知称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纲领”，要求“立即在学校中掀起一个学习和执行这一文件的群众运动”。至此，“教育革命”的提法完全固定下来并深入人心。

---

## 第二章 “教育革命”的全面展开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五·一六通知”

这一段话是动员令，后来被简化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红卫兵把 16 个字变为一个字：破。破什么？怀疑一切！打倒封资修！

“封资修”三个字，把从孔夫子起的两千年传统教育，西方 300 年、中国近百年的近现代教育，苏联几十年、中国 17 年的

社会主义教育，一网打尽。

人们幻想在“旧世界”的废墟上从零开始，凭空创造“全新的无产阶级教育”。人们为此激动，为此行动，以为“斯文扫地”就是革命。

他们就这样开始“革命”了……

## 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发动—— “砸烂旧学校”

### 一、停课闹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首先拿教师和学校干部开刀祭旗的。学生初期造反行动与红卫兵运动即是“教育革命”第一个战役，它的任务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批判、斗争手段，在几天、十几天至几十天时间里摧毁学校的行政领导权、全部规章制度和名教师名教授学术权威的声望名誉。少不更事的年轻学生是初期“教育革命”的先锋和主力军，按照“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理论，他们一开始即被授予两样武器：政治裁判权和暴力。他们以大字报作起诉书，检举教师干部的“罪行”；以大字报作判决书，给他们定“罪名”；以大字报作文告、勒令、通令，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及监控他们的行动。他们往往突破“文斗”的规定，滥施暴力，揪斗、刑讯、抄家、折磨。他们受“阶级教育”多年，知道“阶级仇恨”是“阶级立场”的表现，因此举凡“反毛泽东思想的敌人”，他们都能施以无情斗争，哪怕昨天还是可亲可敬的老师。

学校的运动始于1966年5月初。早在4月17日，高教部召开14所高校座谈会，部署进一步批判《海瑞罢官》，说这是“破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争夺教育领导的斗争”，力图跟上运动的步伐，但高校还未形成群众运动。5月8日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在《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5月10日，姚文元的几万字长文《评“三家村”》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全国所有报刊立即转载这些文章，各地各单位纷纷集会声讨“三家村”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掀起了群众批判运动。学校开始半停课，集中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当时尚未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法，《解放军报》根据江青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写成的1966年4月18日社论，标题即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直到《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首一句首先使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学校初期运动的特点是在校党组织领导下，统一部署，集中学习报刊大批判文章，开会声讨，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左”的学术大批判。“联系实际批判”，一是联系教师、学生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教育，二是联系各地党委抛出的本地“三家村分店”人物和学校党委指定的本校“三家村小分店”人物进行批判。如北京大学在5月8日以前已经写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群众批判运动早于全国。5月14日，校长兼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传达市委指示并布置运动，说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做，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

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对于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sup>①</sup>初期运动是受控制的群众批判运动，受批判的本地、本校“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数目有限，但大都是有名望的文化人和教师。

第二期运动斗争矛头直指校领导，首先起于北京大学。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责难校领导“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这张大字报表达偏激学生想突破学校领导的束缚搞运动的狂热心理，又发明了一个打倒学校领导的方便罪名——“压制群众运动”。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配发《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革命烈火”果然一下子烧遍全国大中学校，许多学校的领导班子在学生的第二轮大字报攻击下垮了。此时，学校完全停课搞运动。为了让学生放手参加运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6月13日下达通知，决定将1966年度夏季招生高考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理由一是大中学校的“资产阶级统治根深蒂固”，文化革命运动还没“搞深搞透”；二是高校招生考试办法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sup>②</sup>结果一推迟便是11年，这几届高中生一直等到30岁才有机会参加高考。

① 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

② 改革招生考试方法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

鉴于许多学校党组织瘫痪，中央决定派出工作组接管大中学校领导权。工作组领导学校的运动 50 多天，稳定了学校的秩序，制止了乱揪乱斗。但在当时条件下，工作组只能继续执行“左”的方针。一是给少数过激学生戴上“右派”、“反革命”帽子，后来被江青等人利用了；二是组织了对学校干部、教师的过左批判斗争，奉中央指示集中教师，让他们交待问题，搞人人过关。但工作组的一些措施是要结束混乱、约束运动的。如 7 月 13 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已提出要“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同日，刘少奇指示教育部负责人何伟签发了《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问题的通知》，各地中、小学不组织考试，初三以上学生和全体教师不放假，毕业推迟到寒假。<sup>①</sup>

毛泽东于 7 月 18 日回北京以后，又发动了学校的第二期运动——驱赶、批判工作组。自 8 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后，学生完全“甩脱保姆”，“自己解放自己”了。早在 6 月，高教部部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即被斗。7 月 23 日，高教部、教育部合并，由何伟任部长。9 月何伟又被斗，教育部自此瘫痪。

8 月 18 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戴上红卫兵袖套。自此，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8 月下旬，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以打、砸、烧等过激行为震撼了整个社会。此后学生介入地方政治斗争，无暇过问学校事务，学校“教育革命”停止了。他们跑出学校，到处串连、冲杀，制造一个又

<sup>①</sup> 参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红卫兵编，196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1966 年 6 月条。

一个政治事件。从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各地党政机关，到1967年“一月革命”夺权，批“二月逆流”，冲击军队，两派武斗，一直闹到1968年夏天。

“停课闹革命”，自1966年5月中旬起，到1968年7、8、9月工宣队进驻学校止，时间长达两年多。其中真正用于“教育革命”的时间，是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的9个月。这9个月运动分为三期。第一期由学校党组织领导运动，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第二期由工作组领导运动，斗争矛头除知识分子，还加上学校领导干部。第三期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群众运动，斗争矛头转移到各级党委，运动发生了方向转变，开始实施“文革”的另一个打击目标。此为后话。这9个月完成了“教育革命”的发动，完成了“砸烂旧学校”的任务，即打倒校领导、打倒教师、破坏学校“旧的规章制度”、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破”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学生忙于社会上的夺权斗争和派系武斗，学校关门，教师赋闲，既不“改革”，也没“立新”。学校教育停止了，“教育革命”也停止了。

在“砸烂旧学校”的初期运动中，斗争虽不及后来残酷，也还是祸及许多教育干部和教师。这里仅举武汉大学校长、马列主义理论教授李达为例，以见一斑。李达是全国大学中第一批打倒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是学校批判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

1966年3月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大肆泛滥，李达曾表示反对。有人提醒他这是林彪说的，他说：“我知道是他说的。不管是哪个说的，不合辩证法，我不能同意。”李达当然知道林彪的权势，但他没有料到在马列主义居领导地位的国家里，竟要为捍卫马列主义付出生命代价。不久，他就被林彪在会上点名，

指控他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自称是李达学生的康生则诬陷李达“对毛主席刻骨仇恨”。“文化大革命”运动一起，这些无权的学术权威便被首先推出来开刀祭旗。1966年5月10日，李达被勒令停止编书，交待罪行，失去人身自由。6月3日，向全省宣布揪出一个以李达为首的“武大三家村”，200多名教师干部、工人被打成“李达黑帮”。从此，声讨、批斗、辱骂、审讯、罚跪，接踵而至，逼他承认“反毛泽东思想”。李达患有胃出血、糖尿病，此时大发作，却停了医药供应。8月13日，李达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大小便失禁，血压下降，却不准送医。李达愤慨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对待印度战俘，也是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给我治病啊！”一直拖了10天，才押送医院，不准家属护理、看望，改名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甩在一个普通病房，仅两天，8月24日就死在医院。（林彪事件后，1973年7月其遗孀石曼华赴京申诉，周恩来指示立即给李达平反，批示家属迁京。）<sup>①</sup>

## 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教育革命”发动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砸烂旧学校”，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打倒领导，打倒教师，破坏“旧规章制度”，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四者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纲。运动一开始就是发动群众性的大批判，群众以“四大”为武器，裁定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打倒之，裁定教师宣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打倒之，裁定学校规章制度

<sup>①</sup> 石曼华回忆文章，载《光明日报》1978年12月12日。



体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破坏之。

那么，何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呢？“文化大革命”初期，几百所大学，几万所中学，几十万所小学贴出的数以亿计的大字报，所指控的罪名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基本是重复毛泽东历年来对现行教育的批评。前面分析过，有些确是现行教育的弊病，但并非敌对罪行，如“片面追求升学率”、高分低能等；有些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不可免的“历史遗留”，如不能超阶段去取消脑体差别；还有些则是以革命战争年代的农村经验、军事共产主义经验来看待现代正规教育，批评的正是各个阶级都必须遵循的客观教育规律，如考试、评分制度、教学工作的“三中心”（教师中心、课本中心、课堂中心）等。

学生大字报大都“大批判联系实际”，即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各个罪名落实到具体的教师、干部身上，加以无限上纲，定为“反毛泽东思想的敌人”。

这里援引几段泛指的文字，以见大批判一斑。

1966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4）班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中批判说：“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在扩大并延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这三大差别。”其具体“罪状”如下：

（1）助长“惟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

（2）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

（3）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严重的阻碍作用。

“因此，这种升学制度，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

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难怪邓拓反党黑帮把它奉为至宝，难怪美帝国主义洋洋得意地把‘和平演变’寄托在中国的‘技术官僚’、‘意识形态专家’们的身上呢！”<sup>①</sup>

1966年6月10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5）班革命同学写的一份致全市中学生的倡议书批判道：“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现行高考制度的反动本质越来越暴露无遗了。它的流毒极广，影响甚大。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剥削阶级愚昧人民，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成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进行修正主义复辟的重要手段。

“它，严重地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不是政治，而是分数挂帅，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它，突出业务、贬低政治，鼓励走‘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严重地阻碍了青年的革命化。

“它，是新的科举制度，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不能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罪恶制度再毒害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我们要坚决打倒它。

“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精神贵族和高薪阶层的温床，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阶石。我

<sup>①</sup> 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4）班同学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信，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

们这一革命行动是给资产阶级的致命打击。困兽犹斗，资产阶级必然要作垂死挣扎，负隅顽抗，死斗到底。他们骂我们这是‘造反’，这是要‘翻天’。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造资产阶级旧制度的反，就是要翻资本主义复辟之天，他们要骂就随他们骂去吧！”<sup>①</sup>

河南许昌一中高三（1）班团支部书记慕振奎在运动初期被树为与“修正主义教师斗争的标兵”，他写文章说：与班主任的“修正主义观点”作斗争的经过是一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这个班主任是个得力教师，过去他抓的班是红旗班，1964年8月底派到慕振奎所在班。文章追述说第一次班干会班主任让大家谈新学年应该抓哪些工作，慕提出“这一学年首先要狠抓阶级斗争”。班主任“皱了皱眉头，突然转了话题”，说他“对干部要求最严，干部不以身作则就不客气”。文章接着评论说“这位班主任是不是就真的不抓阶级斗争了呢？不，全不是这样，表面上避谈阶级斗争，而其实他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拼命地搞同无产阶级进行争夺青年的阶级斗争”。第二天几个学生干部开碰头会，“一致认为搞不搞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从此就对班主任“提高了警惕”。“他第一次和我们全班同学见面，就迫不及待地推销修正主义的黑货，他想骗我们走个人奋斗的绝路。他对同学们说：‘自己的路要自己来铺，现在把路铺好，将来自己方便，不然，会后悔的！’……这位班主任公然引诱我们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死路，这不是煽动我们脱离党的领导吗？

<sup>①</sup> 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二（5）班同学致全市中学生的倡议书，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

够上毒草的条件了！团支委马上开了个碰头会，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在放毒！”立即向党支部和团委会汇报了情况。又奉党支部和团委会指示，在班上组织同学批判班主任的“反动观点”。“快段中考试了，他跑来对大家说：‘你们读书，尽管读，只要政治上不反动，把知识学到手，就能为人民服务！’并且介绍了一套死读书的‘好经验’”。“这不是说还要什么革命化？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干什么？还坚持什么反帝反修、援助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这难道不是在宣扬阶级合作？一个不听党的话，只专不红，甚至同敌人合作的人，怎么能谈得上为人民服务？”团支部开会研究，组织全班学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展开讨论，“狠狠地批判他这种谬论”，“这样，‘白专道路’被搞得臭臭的，政治空气被搞得浓浓的”。“这位班主任是很狡猾的，他知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反击他们最厉害的武器，所以他就非常仇视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千方百计阻碍我们掌握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著作有空可以学，没空就算了’”。 “没多久，段中考试开始了。这时，班主任又施出了新花招，他非叫我们考前订指标，考后搞分数评比不可”。“少数干部有点犹豫，觉得也得‘照顾点儿教师的面子呀’”。干部们又一次讨论，决定：“哪怕与他翻船也决不能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于是干部带头互相约定，不订指标，不比分数”。段中考试后，在这个班的“强烈要求下，学校领导撤消了他的班主任职务”。<sup>①</sup> 文章在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各学校掀起掀斗班主任的浪潮。

中国人民大学李豫生等7名学生1966年6月22日写信批判

<sup>①</sup> 河南许昌一中学生慕振奎的文章，载《人民日报》1966年7月8日。

“权威老爷”，“妄想让我们无产阶级断子绝孙，企图使我们青年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公开信认为现行学制年限太长，“罪状累累，必须缩短”！

“其罪状如下：

“一、这种学制根本违反了毛主席的认识论，把书本知识奉为至宝，轻视实践，脱离工农，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其结果不出修正主义，就出教条主义。

“二、扩大三大差别，为资产阶级传子续孙。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惟恐青年们在校时间太短，惟恐读的本本太少，惟恐受资产阶级影响不深，惟恐他们成不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三、现行学制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一般5年，从8岁上学到大学毕业，已三十五六岁了，在学校的时间占去了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17年寒窗苦熬苦度，真是误人青春，误人子弟。

“四、学校的师生每日钻书堆，读死书，不问政治，不知校外别有天地。

“五、拼命强调所谓系统知识，实际上是在宣传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六、学习内容庞杂重复，越学越糊涂。教师在那里进行无聊的考证，填鸭式的灌注，学生则整日、整月、整年埋在故纸堆里，其后果是弄得青年们晕头转向，体弱多病。

“七、国家急需人材，学生迟迟不能走出校门。由于学制太长，学校的周转率极低，既不能尽快满足国家需要，又不能使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复员军人入学。

“八、浪费师资、浪费人力。如果能够把学制缩短一半，那

么一个教师，就可以多教出一倍学生。

“九、由于长期脱离实践，脱离阶级斗争，不少学生在学校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改也不好改，结果国家花费那么多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是不受欢迎的。这样的学生远不如那些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但经过生产斗争或实际工作锻炼过的基层干部；更不如那些只读过几天书，甚至一天书也没有读过，却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革命老前辈，更不如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陈永贵、王铁人、李素文等先进人物。可见，真正的革命者不是学校里培养的，真正的英雄不可能在学校里产生。”<sup>①</sup>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大字报批判说：“在版画系的画室中，公开贩卖马蒂斯、毕加索的野兽派艺术。在画室外又成立小沙龙，以20世纪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为追求的榜样。……美术学院院务委员会集中了大批牛鬼蛇神。在版画系全面推行了画室制，在画室是完全由‘专家、权威’说了算，上上下下都排除了党的领导，实现了右派分子所未能实现的教授治校。”<sup>②</sup>

中国舞蹈学校的大字报批判说：“12年来，把舞蹈学校办成了‘天鹅王子’学校、‘少爷小姐’学校。在‘舞蹈是为一切人欣赏’的口号下，在所谓‘遵守舞蹈规律’的幌子下，我校为所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开绿灯。12年来，我校演出和创作了很多坏节目，如《天鹅湖》、《鱼美人》、《春江花月夜》等……甚至还准备拍摄更加荒唐的舞剧《白娘子》和排演反动的鬼戏《李慧娘》。他们得意忘形，反党

① 中国人民大学李豫生等7人的批判信，载《人民日报》1966年7月12日。

②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大字报，载《人民日报》1966年7月16日。

反社会主义猖狂到了极点!”<sup>①</sup>

北京化工学院有机系61级袁祖仁等4人的文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利用讲台千方百计向我们灌输名利思想，腐蚀青年，为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服务。……大肆宣扬高人一等的思想。有一个教师，一次在讲塑料成型曲线的时候，他用手指沿着另一条曲线往上一划，提高嗓子说：‘从这里就可以得到高奖金！’看！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这样猖狂地用什么高奖金、高薪等物质刺激谬论来腐蚀我们。”“他们总是极力打击、排挤工农学生，其中一条办法就是把‘分’当作绞索，套在我们脖子上。许多工农子弟都为过这个‘分’关而被迫不问政治，埋头读书。‘分’，实际上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同学实行专政的一种手段。”<sup>②</sup>

湖南衡东县大浦镇农民、省贫代会代表邓方柏的文章说：17年来全镇10人考取大学，全是地富反坏右子女，难道他们天生“聪明”，我们工农子弟生来“愚蠢”？不，是资产阶级“专我们的政”！“我们镇上一个大地主，他的8个子女就有6个是大学生，一个是高中生，一个是初中生。现在他们都钻进了北京、武汉等地，在重要机关和大学里工作，他们每月光给这个地主和地主婆寄回的钱，就达180元之多，把地主喂得像肥猪一样”。而他女儿1958年上小学，因有时迟到，有时请假参加农忙劳动，被学校以“吊儿郎当，成绩不好”罪名让退学。二女儿1964年上学，因交不齐学费4个月没发书。“很显然，这种教育制度不是向工农兵开门，而是向工农兵专政。”“对我们工人、贫下中

<sup>①</sup> 中国舞蹈学校的大字报，载《人民日报》1966年7月16日。

<sup>②</sup> 北京化工学院有机系61级袁祖仁等4人的文章，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农、革命干部的文化翻身，所以这样深恶痛绝，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妄想长期霸占教育界的领导权……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作精神准备和‘人材’准备。”<sup>①</sup>

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生殷承宗在大字报中控诉学校“毒害”他，“把我从一个12岁的少先队员‘培养’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他12岁那年由厦门文化局保送到音乐学院附中学习，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多次接见，说：“要好好学习，提高艺术修养，将来才会有成就。”“几年来，他们是怎样毒害我的呢？”“请来大批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阶级调和论和满脑子钞票挂帅、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外国专家‘培养’我。他们专门给我一间琴房、一架钢琴，并借照顾演奏家的手为名，长期不给我下乡与工农兵接触的机会。把我关在‘象牙之塔’里。”“从14岁开始，我就不得不经常每天练琴8至10小时，整天泡在琴房里，泡在大、洋、古里，去钻研、体会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贵族、少爷小姐的感情。”“要求我大量去阅读西欧古典小说，欣赏洋唱片，欣赏大自然。”“18岁，我在中学毕业了，黑帮们迫不及待地把我送到国外去‘深造’，让我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熏染。”“黑帮为了毒害我，大搞物质刺激……中学时代，除开伙食费外，我每月只有零用金6元。可是1962年得奖回国后……发给我每天5元的生活费，要我去吃高级饭馆。到上海、广州演出，都叫我住最高级的饭店，还要我去疗养。两次给我上千元的唱片税。”“1964年初，在音乐舞蹈会议期间，贺绿汀把我叫到民族饭店……说‘你别和人乱搞什么大跃进、革命化的作品，这都是大合奏，简单化！你还是

<sup>①</sup> 湖南省贫代会代表邓方柏的控诉发言，载《人民日报》1966年7月19日。



练你的琴吧!’……在我身上大搞‘和平演变’。今天是和你们清算的时候了，我要控诉你们的反党罪行。”<sup>①</sup>

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廖助荣等 14 人在大字报中追述：1958 年北京大学招收一批工农调干学生和工农出身的学生。陆平对此说：“为了照顾工农同学，拉低了大家的水平，名义上是阶级路线，实际上对国家不利。”“培养一百个半拉的，顶不上一个完整的。”陆平黑帮百般刁难、排挤、打击工农学生。物理系一位已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的同学，最后一门考了 63 分。系主任却说：‘63 分不算及格，标准提高，65 分才及格。’这位同学就这样刚好凑满三门不及格而留级了。”“陆平黑帮为了早日把工农同学推出北大，搞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首先他在教务长例会上提出把 58 级工农同学改为 5 年制的方案（当时北大实行 6 年制）。他又给高教部写了报告，捏造说，工农同学希望能改为 5 年制，还说这部分学生年龄大，学习上困难大，基础差。”“就这样，大批工农同学，留级的留级，退学的退学。数力系 58 级工农出身的同学 48 人，呆不下去的 10 人，留级的 5 人，被迫学 5 年制的 25 人，只有 8 名学 6 年制。生物系 50 多位工农同学中学 5 年制的 22 名，6 年制的只有 7 名，其余 20 多名留级的留级，退学的退学。其他各届的工农同学都遭到同样的迫害。物理系 60 级总招生 209 人，6 年来 52 人离开这个年级，其中 31 人是工农同学……8 名工农调干学生，就被赶走 7 名。看！陆平黑帮就这样对工农学生恨之人骨。”“而对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则视若宝珠，精心培养；对反革命分子、叛徒，则千方百计包庇。1962 年学校把许多右派分子调了回来，让他们继续学习。数力

① 钢琴家殷承宗的大字报，载《人民日报》1966 年 7 月 18 日。

系55级有一个右派分子，地主出身，反动思想极其顽固，陆平黑帮把他调了回来，并发给最高助学金19元5角，加以精心培养。”<sup>①</sup>

北京大学哲学系芮盛凯等10人的大字报评该校《师资培养暂行办法》说：“根据这个纲领，教师的教学、科学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导师指导’，教师的‘考核’、‘定职’、‘提升’等，要唯‘导师’之命是从。”“我们要问：你们奉若神明的‘导师’究竟是些什么人？你们吹捧得令人肉麻的‘导师’们，就是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如反共老手翦伯赞，国民党御用哲学家冯友兰，老牌修正主义者冯定，等等。”“陆平黑帮奉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校务委员会，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教授的‘合股公司’。”“陆平黑帮对资产阶级‘教授’‘权威’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在北大实行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陆平迫使青年教师“终日埋首书堆，为完成一篇‘纯学术’论文而奋斗，为通过外文考试而奋斗！……现在每个系都有一些‘学者’、‘教授’精心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穿戴打扮都学他的‘导师’。”<sup>②</sup>

北大哲学系61级学生的大字报揭发陆平对1958年“大跃进”反攻倒算，“陆平在1961年9月16日的迎新会上公开叫嚷只红不专是空头政治家。红必须落实，不能空洞，要有所表现。要在钻研业务上表现出来，对学生来说，就是刻苦读书、刻苦

<sup>①</sup> 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廖助棠等14人的文章，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5日。

<sup>②</sup> 北京大学哲学系芮盛凯等10人的大字报，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5日。

钻研’。……‘58年劳动多了，现在就是要强调发奋读书’，‘是学生，一万年也要发奋读书’”。“庞杂的课程，繁重的作业，压得学生气都喘不过来。学生每天的生活就是‘宿舍——食堂——图书馆’。”“在陆平黑帮的支持下，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纷纷出笼，在学校里刮起了一股资产阶级‘权威’讲学的黑风，让反动文人大办工具书讲座，请资产阶级‘权威’大讲《燕园史话》，让资产阶级反动哲学的‘祖师爷’大肆宣扬孔子‘仁’的思想，由反共老手吴晗来校大讲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让所谓‘红学专家’来校大讲如何欣赏《红楼梦》等等。”“自1961年以来，陆平黑帮在‘继承中外文化遗产’，‘让学生看一些反面东西增强免疫力’的幌子下……当时文艺书籍出纳处九架书，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学作品竟占了七架之多……像《红与黑》、《傲慢与偏见》、《静静的顿河》等西方资产阶级、苏联修正主义小说在同学中广为流传。”“在文化生活领域内，同跳交际舞这般黑风同时刮着的另一股黑风，便是大演黄色电影风……是香港影片，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影片，苏联修正主义影片和中国‘30年代’影片。”<sup>①</sup>

到1967年“一月革命”风暴刮起之后，学生忙于夺权、派斗，很少去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反动学术权威”了。报刊批判还在坚持，但是声势小多了，并且不为热衷于冲冲杀杀政治行动的群众所关注。但是批判的水平有所提高，更系统了。如196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9月《红旗》杂志第10期发表的《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批判1961年制定的人、

<sup>①</sup> 北京大学哲学系61级学生的大字报，载《人民日报》1966年8月15日。

中、小学工作条例是“智育第一”，“技术至上”；党组织监督保证的条款是把“教育大权让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刘少奇主张的半工半读是“资产阶级的职业学校”；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人才教育和劳动者教育双轨制的翻版”；重点学校是培养“精神贵族”。

### 三、形形色色的教改方案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专门谈教育改革的社论，说“旧的招生考试制度”是资产阶级“对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实行专政”、“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称改革高校招生考试是改革全部教育制度的“突破口”。“教育革命”第一刀，就是砍去高考制度。接着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虽由于全国动乱，学校停课而无法试行，但是它们为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教育革命”作了舆论宣传和精神动员。这里作一简略回顾，可以了解“教育革命”思想的发展经过。

6月1日中央批转高教部《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根据刘少奇在1965年11月1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建议（从1966年招生起，大学毕业不包当脑力劳动者，既可当技术员、干部，也可当工人、农民），规定多招具高中程度的工农兵，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取消分数段。该报告保留了考试，不久即被斥为改良。

6月13日，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改革内容：（1）废除现行升高中考试，改行推荐与选拔制。（2）推荐与选拔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保证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

女优先升入高中。<sup>①</sup>

同日，还批转《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报告》。内容：（1）现有政、语、史三门教材存在严重问题，决定停印、停发、停用。（2）历史课暂停开设。（3）政治和语文两课并为一门，以毛主席著作和“文化大革命”文章为教材。（4）初小学毛主席语录、高小学“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下达《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提出：（1）现行高等学生招生考试制度“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必须彻底改革”。（2）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sup>②</sup>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专论。社论复述了上面三个文件的内容：（1）“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2）高中招初中毕业生也实行推荐和选拔。（3）毛主席著作是必修课，初小学毛主席语录，高小学“老三篇”，中学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大学学《毛泽东选集》。

同日，《人民日报》公布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4）班和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5）班的高校招生改革方案。其内容，一是在高中毕业生中选拔部分人升学，其余到工农兵中劳动改造，因为等到大学毕业“再改造就困难了”；二是大学直接大量

① 苏渭昌：《中国教育通史》卷6，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页。

②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摘要公布的文件内容。

招收工农兵。当局不表态却让高中生自己提出大学不向高中招生，令其自拆梯子，这是谨慎。未料举国学生皆狂热，无人异议，热烈赞同。

7月12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国人民大学李豫生等7名同学的大学文科改革方案，要点是：（1）现有文科大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去工农兵中“补课”，把大学位置让给工农兵。（2）文科大学的学制改为一年、二年、三年。（3）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并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学军事。（4）教学改为自学、讨论为主，废除教师灌注式方法。（5）大学招收工农兵，不必具备高中毕业水平。第5条比两个中学的方案又发展了，成为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的主要章程。

7月14日《人民日报》又公布文科、农科、工科大学三个教改设想。南京大学中文系4年级同学的信提出：（1）大学文科使青年进了死人洋人的故纸堆，变成老夫子，还要不要办？（2）要办的话，不相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招工农兵。（3）全国文科大学都办在公社和工厂，办成党校和轮训班，“永远生活在贫下中农之间”。

北京农业大学全体师生的信提出：（1）农业院校办到农村去，全部实行“半农半读、社来社去”。（2）招收工农兵。（3）学制缩短为二、三年。（4）砍掉脱离实际的专业和课程，以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以阶级斗争为主课。（5）“改造教师队伍，废除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资产阶级的学级制度，废除资产阶级的研究生招收和培养制度”。

清华大学电机系电72班全体学生的信提出：（1）工科大学一律实行半工半读。（2）学制缩短为二、三、四年，现有大学生提前毕业。（3）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首位教

材，并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军训，教学以生产实践为主。(4)改造教师，今后工科大学教师应该同时是工人，是生产者。(5)废除研究生制度。(6)大学招收工农兵，不必具备高中毕业生水平。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宣布取消高考，采取推荐与选拔方式招生，招收的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当技术员、干部，也可以当工人、农民。宣布停止执行6月1日高教部的报告。

从以上各科大学的改革方案看，一个共同点是“首先办成政治大学”。这是后来“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又来源于毛泽东1964年夏天对毛远新的谈话——“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1966年“红八月”之后，政治斗争风暴横扫神州大地，各级政权机构瘫痪，各派群众组织勃兴，“教育革命”无人提及。一年之后，毛泽东急于结束内乱武斗局面，巡视大江南北，发表一系列讲话号召大联合，采取一系列措施：清洗文革小组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戚稍后半年），停止“揪军内一小撮”，让造反派办学习班整风，提出“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提出“搞好斗、批、改”，尤其是一再催促“复课闹革命”，等等。这样，作为结束动乱、实现稳定的一种宣传手段，又谈起了“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以通栏大标题《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发表三个大学的改革方案。上海同济大学的方案是：(1)整个学校改为一个由学校、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三结合的“五七公社”。(2)公社废除系和教研室，代以若干个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下设若干个教学班；教学班由教

师、学生、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混合，按军事编组。(3) 公社设政治工作部，各专业委员会设政治指导员，各班设政治干事。(4) 学制缩短为3年，第一年以一半时间参加施工劳动，第二年以2/3的时间参加设计实践，学设计基本知识，第三年部分时间劳动，大部分时间专业课学习。(5) 课程为毛泽东思想课、军事课、专业课。

北京林学院的方案是：(1) 废除教研室，代以专业连队，把基础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混合分别编入各专业连队。(2) 专业连队建立干部、教师、学生三结合领导小组，领导政治又领导教学。(3) 具体实施——把林业学17个教研室合并为林业、森林保护、林业经济、水土保持4个专业连队；把森工系7个教研室合并为林业机械、木材机械加工、林产化学3个专业连队。

北京师范大学的方案是：(1) 考试少考或不考，不搞回忆性的，搞辩论性的，可以看书，允许互相讨论。(2) 废除留级制。(3) 以推荐和选拔方式，招收工农兵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4) 允许插班上大学，不受年龄限制。

次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北京31中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教改设想：(1) 改变中学传授知识为主，而以掌握毛泽东思想为头等重要任务，以毛主席著作作为中学教育主要内容，以阶级斗争为主课。(2) 生产劳动作为中学教育重要课程。(3) 改变资产阶级循环往复教学法，单一递进。(4) 打破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四级制，建立单一普通教育制度。

11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央美术学院教改小组的设想：(1) 到工农兵中办学，办短期毛主席画像学习班，大量速成工农兵美术人才。(2) 艺术团体与艺术院校合并，组成创作、教学一体的美术工作队，到工农兵中劳动、军训、改造、教学。



上面几个方案，较之“文革”初期，并无新东西，最引人注目的是打破大学体制中教研室这一环，认为教研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基础。教研室其实并非什么阶级组织形式，它只是教学科研的业务性机构。改为“专业委员会”和“专业连队”，不利教学而利于“阶级斗争”、“突出政治”和否定教师的主导地位。

为了以重新开展“教育革命”吸引红卫兵返回学校、谋求稳定，毛泽东在11月3日发表关于教育的最新指示。全文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后几天，《人民日报》突出地报导各地各大、中、小学集会游行，热烈拥护，誓作“教育革命红色尖兵”。但是，仅仅是纸上表态，红卫兵关心的仍是校园外面的“革命”，而非乏味的教育。毛泽东依靠学生、教师、学校工人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展“教育革命”的打算落空了，同济大学等几个方案也很快被人遗忘了。“教育革命”没有开展起来，“斗批改”的部署无人响应，局势又乱糟糟拖了一年。到1968年7月底，毛泽东改变上年“要依靠学校中”的师生工人的指示，转而依靠学校外的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了。

## 第二节 向新体制过渡——“搞好斗批改”

### 一、工宣队进驻学校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实行“天下大乱”的方针，放红卫兵出笼，“许多事学生一冲就解决了”。在基本打垮“刘少奇司令部”之后，毛泽东就要恢复秩序，要把学生收回校园。1966年12月31日中央发出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训的通知，要求“学生加强组织纪律性”。后来形势又发展到“一月革命”夺权，这一军训计划便服从夺权斗争的需要而搁置了。

“一月革命”造成一系列分裂、混战，到1967年3月初又提出军政训练复课了。中央转发毛泽东3月7日对天津市延安中学的批示，提出大、中、小学实行军训、开学、整顿群众组织、建立领导机关、进行斗批改5项任务。同日，中央发出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人民日报》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重复上述5项任务。可是，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和尔后各省的两派大武斗，又使“复课”的计划成为泡影。

动乱愈演愈烈，其顶峰是1967年夏爆发武汉七·二〇事件。未几，北京又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全国各地多处发生派斗流血事件和向军队冲击、抢枪事件，局势进一步动荡。为了稳定全国局势，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发表巡视讲话，号召“实现大联合”、办学习班，警告红卫兵现在有可能犯错误。整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逮捕其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

批准一系列制止武斗、保障秩序、维护交通的文告。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地区和部门实施军管。同时，再次命令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

把学生收回校园成了稳定局势的关键举措，因为学生组织是参加各种街头斗争的主力 and 先锋。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签发《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10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1月3日，毛泽东发表进行“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报刊掀起复课、进行“教育革命”的宣传高潮。12月7日中央发出坚决执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但由于许多地区尚未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或是被打倒，或是参加群众组织受学生管辖，不能恢复正常的工作，所以复课难以实行。许多学生仍散落社会 and 家里，返校的学生也仍然是派系林立、派斗不断，无政府主义盛行，大联合无从谈起。显然，依靠学生自身或某一个学生组织、某一个学生领袖都无法建立起学校的秩序，派驻临时工作队，这一传统的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又非用不可了。

为了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派出的工作队，在名称和人员组成上作了变通，通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当时无干部可派（大部分干部尚未解放），实行军管亦有种种不便。抽调组织纪律较强的工人担任临时工作队则有苏俄的先例，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集体化时期均向军队、农村派出过工人小组担负各种临时任务。所以派驻工宣队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可行之计，但在宣传上却称此举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永远领导学校”的形式，这就造成理论的混乱和尔后实践中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早就说过工人阶

级领导是通过其政党来实现的，崇尚工人的自发的阶级本能只会走向工团主义，工人阶级的领导不等于工人担任领导。后来在实践中又发生已经恢复的学校党组织与工宣队的关系、新一轮的外行领导内行等等问题。

名虽曰“宣传队”而实际行使比“文革”初期工作队更大的权力，难怪学生不理解甚至抵制，说是“新工作组”、“新保姆”、“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初放纵学生“自己闹革命”、无分析地批判工作组这一形式的不良后果现在暴露出来，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面做工作。事实上，这时的宣传队比“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人数更多，包办更甚，做法更“左”，而政治素质更低，领导经验更少，文化水准更差。

全国第一支工宣队是1968年7月27日上午派出的。北京市抽调60多个工厂的3万多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派斗激烈的清华大学，当晚发生冲突，致死工人5名，伤731人。<sup>①</sup>同一天，对教育部实行军管（工宣队于1969年4月3日进驻）。

7月28日凌晨3点半，毛泽东召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的5个学生领袖，参加召见的有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长谈5个小时。毛泽东开口即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接着提出批评和严厉警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

<sup>①</sup> 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第1124号，载《历史的审判》（续集），1982年版，第82页。

就要实行歼灭。”

讲话要点通过学生组织自行传达下去，骄狂一时的红卫兵立即俯首听命。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确保了工宣队迅速进驻和接管学校。

工宣队的使命就是要结束红卫兵运动，结束学校的混乱。围绕工宣队登上政治舞台，报纸、电台、传单、标语等传媒开展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8月5日下午毛泽东把巴基斯坦外长阿法德·侯赛因送的“圣物”——芒果转赠首都工宣队，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被突出地反复地渲染，清华园正中设红案陈列，人民印刷厂特制玻璃盒盛药水保存起来，首都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开万人庆祝大会，还在全国各地举行充满迷信色彩的游行、庆典、敬迎、巡展等仪式。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就云南省建立革命委员会发表社论，公布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8月26日姚文元赶写出系统宣传工宣队的重头理论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中又传达一条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一条指示把工宣队稳定学校局势的临时作用加以延伸和扩大，赋予参加教育革命、领导学校的新任务，以后又发展为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向“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掺砂子”、“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和世袭领地”等一系列错误方针政策。这样，工宣队就从最初稳定局势的阶段性作用，走向执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理论的长期战略性作用，其意义被极度夸大。

鉴于工宣队成功进驻和接管北京市的第一批高校，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向全国推广这一办法。通知“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抽调工人总数可达当地工人总数的1/10。9月2日，中央军委也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随后，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进驻了工宣队、军宣队，农村中小学则进驻了贫宣队。

以工宣队进驻为标志，全国学校进入“斗批改”阶段。工宣队实际是“斗批改”工作组。

## 二、“斗批改”

各地结束动乱、实现两派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之后，即进入“斗、批、改”阶段。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各地重建政权的时间有先有后，实际上并未在同一时间进行“斗批改”。一般以1968年秋“全国山河一片红”和次年春的“九大”作为全国运动进入“斗批改”的标志。而以1971年的九·一三突发事

件，作为“斗批改”阶段的结束。这三年虽暗中酝酿着权力分配问题上的高层斗争，整个局势却是平静的。

“斗批改”原先是“文革”初期提出的三项任务。《十六条》规定：“斗”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针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及其意识形态；“改”指改革教育、文艺及上层建筑其他部分。后来含义有了一些变化。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就“全国山河一片红”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指出“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并且传达了毛泽东对“斗批改”的具体说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表明“斗批改”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收尾阶段，这一阶段以重建政权机关为开端和前提，以清队和整党巩固新建政权，剩下的两项任务是大批判与改革机构、规章制度。

大批判是把被夺权斗争打断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大批判再恢复起来，发展它的既有成果，批判得更加细致、深入和系统化；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渗透到各个领域、各门业务、各种制度中去，形成“文化大革命”各分支理论。其中，“教育革命”理论是发育得最完备的一个分支理论。

改革机构与规章制度是以大批判为指导，进行“大破大立”。其中，教育是“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为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中小学停课“革命”两年之久，大学竟关门四年半，这是世界大战中也没发生过的事件，创人类教育史上停学之最。

“斗批改”阶段专指自1968年工宣队进驻，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为止的3年时间。但“斗批改”作为一种运动形态，从“文化大革命”10年全过程看，却是反复进行了多次的。这是导源于“文化大革命”中各派争夺权力的斗争具有反复性，不断发生权力的更迭与转移。每一次夺权斗争或斗争妥协产生的新权力，都进行一番“斗批改”运动。“斗批改”以权力为前提，权力以“斗批改”求稳定，而在两派斗争中出现权力真空时，“斗批改”就停止。就学校而言，第一轮“斗批改”发生在1966年5月至6月初，由校党委领导批判“三家村”、本校教师和“旧教育制度”。第二轮“斗批改”发生在6月初至7月底50多天里，由工作组领导批判“黑帮分子”、教师和“旧教育制度”。第三轮“斗批改”由各派学生组织“轮流坐庄”，批斗黑帮、教师和“旧教育制度”。这一轮“斗批改”，两年里时停时续，又由于“多中心即无中心”，出现权力真空，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了。第四轮“斗批改”的领导重任，便历史地落在工宣队肩上。

### 三、清队整党

在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人宣传队前后，发动了一场贬斥知识分子的宣传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发端于1968年7月2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插手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报告，用歪曲事实的手法，全面贬低大学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说他们“思想落后”、“工作能力差”、“追求资产阶级名利”、“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是“三脱离的精神贵族”。

8月25日，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对红卫



兵换了一种说法，称他们是“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以及其他任务”。学校是“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独立王国”，要“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

9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上海的又一份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新提法：“再教育”。“再教育”是一个新闻，比“改造”好听一些，这是因为凡从大学、中学毕业的新老工作人员都摆在“再教育”之列，包括仅仅读中学一年而经“文化革命”锻炼改造已两年多的68届初中毕业生在内。9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再教育”一词作出说明。这篇题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文章说，知识分子“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和“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造”。

这一场宣传运动主要针对红卫兵，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树立工宣队的政治优势，确保工宣队的领导。同时为即将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造舆论。

工宣队首先着手大联合工作，瓦解各派学生组织，在此基础上建立或加强原有的革命委员会。一俟权力机关建立，“斗批改”便顺利进行。首先是清理阶级队伍与整党建党。

在公开讲话中首先提到“清队”的是江青。她于1967年11月27日在北京工人座谈会谈到工厂的“斗批改”时，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整党建党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

伍”，清党内的“叛徒”、“特务”及“死不悔改的人”，清党外的国民党、会道门、一贯道、地富反坏右。方法是“群众处理”，“群众监督改造”，不“专门靠政府这个专政机关”。中共中央于此前的11月13日曾转发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11月9日和12日），讲话中还没出现“清队”这个词，但以揪敌人促联合的意思已经有了。她说两派组织都混进了坏人，在背后操纵打内战，文艺界的运动没有“搞深搞透”，“把队伍先树立起来，把敌人狠斗狠批”，“要稳、准、狠——对敌人”。<sup>①</sup>

清队运动真正开展起来，是在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发布之后。这条指示，由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芙蓉园里尽朝晖》传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批文说要“把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揭露并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北京市首先开展清队运动，并于5月15日下午召开市革委会会议，制定了一些具体政策。其要点是：（1）学习好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江青1967年11月在文艺界座谈会和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清队是一场肃反。（2）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以反右为中心，发动对敌斗争。（3）没

<sup>①</sup> 参见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第619~634页。

有实现大联合、没有建立权力机构的单位，暂不进行清队。(4)清队与大批判（批刘少奇）结合起来，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5)不许武斗、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打死人犯法，防止自杀。(6)学生中有个别坏人，但处理一定要谨慎。<sup>①</sup>

5月25日，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指示。该厂的做法是：(1)军管会2月21日进厂，引导两派大联合，调查阶级斗争状况。(2)4月11日、4月16日开了两个斗争大会，共斗10人，引起震动，掀起揭发高潮。(3)群众发动起来后，认为坏人很多，想层层揪斗，计有百人之多。军管会又进行政策宣传。打击重点是坏头头，叛徒特务，攻击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此后，全国开展清队运动，报刊开始公开提“清理阶级队伍”。

学校的清队，是在工宣队进驻之后才真正开展起来。清队是“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扩大打击面的整人运动，一是给“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揪斗的干部、教师定性、结案、戴帽子，二是整群众组织的头头和骨干，三是整出身不好或有问题的一般群众。以清华大学为例，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后，“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无休止地搞斗争，随心所欲地审查立案、批斗关押。清队两个月，就逼死人命十多条”。在化工系“大搞逼、供、信，给这个系的两位党总支副书记扣上所谓‘三反分子’、‘走资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加以残酷斗争，致使这两个好同志在几天之内相继含恨死去”。还在全校学生中划出

<sup>①</sup> 参见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117~120页。

1424个“可教育好子女”，占学生数17%，威逼他们“划”、“清”、“站”。4000多教职员中立案审查人数1228人，定为敌我矛盾178人，划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00余人。清队搞出的案子大部分是冤假错案。<sup>①</sup>北京大学4700多教职员，开始揪出近千人，又打又骂，搞了半年多。1969年7月又清队两个月，定案102人。<sup>②</sup>

清队稍后，又开展整党建党工作。主要是清除“叛徒”、“特务”、“走资派”，另外要求党员知识分子检查“白专道路”、“成名成家”思想。北大化学系一个讲师撕了留苏副博士证。生物系一个讲师被“谈话”8次，大小会检查5次，直到亮出“有本事可以出人头地”的思想才被通过。<sup>③</sup>在错误地清除了一部分党员之后，恢复了大部分党员的组织生活，重新建立了学校党组织。这方面文章较多，此处从略。

学校的清队与整党，重点在打击知识分子。清华大学工宣队、军宣队1969年1月29日的清队报告，就以《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为标题，说知识分子“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多，有历史问题的多，有海外关系的多（因为留学的多），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有封、资、修学术思想的多”，说土建系材测教研组39个人只有3个干净，“宣传队员扒拉来又扒拉去，觉得都不可靠，都不可信。有的甚至于说‘干脆一窝端到农场劳改算了！’”

通过几个月的清队与整党，学校建立起新的秩序和工宣队的领导权。下一步就是大批判与改革“旧教育”了，也即真正

① 清华大学群众大会控诉材料，载《人民日报》1978年10月19日。

② 参见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413页。

③ 同上。

意义上的“斗批改”。这一步之前还有一个酝酿已久的大行动——将过去的“文革功臣”、现在的政治包袱，自1966年的初中一年级至大学毕业年級的11届学生，全部“礼送出境”，从学校从城市送往农村、边疆、基层。

#### 四、精简下放<sup>①</sup>

“斗批散”或“斗批走”是一句戏言。这是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针对当时学校不斗不批而忙于打内战提出的批评。不久之后，这倒真成为红卫兵毕业离校写照。

到1968年底，大学积压了三届毕业生，他们是66届、67届、68届，应继续在读的还有两届，69届和70届。总人数是67.4万。中学里原有的6个年级的学生全部过了应该毕业的时间。他们是66届、67届、68届初中毕业生和66届、67届、68届高中毕业生。老三届高中毕业生130.8万，老三届初中毕业生802.9万，总数近千万。他们滞留学校，则小学生升不了中学。分配工作，则为连续两年衰退的经济所负担不起。任他们失业流散城市，则要影响政治稳定。此外还有积压的中专毕业生54.7万，农职和职业中学毕业生443.3万。<sup>②</sup>因而继续采取“文化革命”前“上山下乡”的做法，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恰巧政治难题、经济难题与一贯宣传的意识形态题目一拍即合，天衣无缝，是一着走活困局的妙棋。革“旧教育”的命，即论证了红卫兵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客观上做好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的舆论准备和精神动员。

<sup>①</sup> 部分数据来自火木著《光荣与梦想》，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sup>②</sup> 此数据来自苏渭昌著《中国教育通史》卷6，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有的论者至今惑于“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与1968年“再教育”在理论上的一贯性，仍认为“上山下乡”是基于“改造知识分子、缩小三大差别”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是没有注意到“上山下乡”理论上的漏洞：“上山下乡是改造的必由之路”，那么进厂下矿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是不是“必由之路”呢？这些中学生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进中学三年只读了一年书，却批了两年“旧教育”，能称为知识分子吗？他们究竟中了多少文化知识的“毒”呢？现代化必然要求城市化，中国却反向朝乡村移民，与现代化背向而行。实行计划体制各国皆未发生此事。苏联移民开荒，以5年为期。柬埔寨红色高棉下放金边人口80%，自取其败。中国人口压力大，计划体制和连续经济衰退无法消化城市过剩人口，是一大原因。“一五”计划期间和尔后新时期的经济高涨，都向乡村大批招工，可印证此事。

在发动“上山下乡”舆论宣传运动之前，往农村和边疆安置大中毕业生的工作，即在具体部署试行。革委会建立较早的边疆省份黑龙江从1967年9月起，就着手进行，到1968年春，已将全省18所高校的7000余名毕业生中的4000多派遣完毕，80%以上分到县以下农村（包括农林牧场）。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委会上交一份《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亲笔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可见，10多届毕业生的安置问题，愈来愈困扰着他的心思。4月4日中央转发黑龙江报告，要求对全国大中小学毕业生及时做好安排，去向是“四个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农村是首位。

6月，中央批准筹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准备安排大中毕

业生（后来实际接纳 45 万人，全国最大知青农场），其余 6 个边疆省份也陆续筹建生产建设兵团，安置百万以上知识青年。

6 月 15 日中央又发出《关于 1967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1967 年 8 月曾发 3 个分配 1966 届大专毕业生的通知，由于当时“全面内战”未能执行，所以这一次实际是分配 66 届、67 届两届毕业生。通知说大学毕业生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安排在军垦农场和国营农场劳动，群众组织负责人要带头去。如不服从分配，逾期两月，取消毕业生资格和在校生待遇。同日还发出中专毕业生分配通知，也是以农村为首选的“四个面向”。11 月 15 日，68 届大、中专毕业生也开始分配到农场、农村去。至于在校的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69 届、70 届）和未让及时毕业的派系头头，到 1970 年夏经毕业鉴定，大部分毕业。所谓鉴定学习班，是对“可教育好子女”搞“划、清、站”，对“文化革命”中犯错误学生搞批、拉、定案、监督改造。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去农村、边疆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因为这 120 万人中的多数当的是带工资的农民，实为农场工人。剩下将近千万高、初中毕业生的安排早已经定为“上山下乡”，不叫分配而叫下放，不发工资。宣传动员工作从毛泽东的 9 月 5 日指示开始。《红旗》杂志发表上海机械学院报告的按语中公布毛泽东这一指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9 月 7 日，在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在此前后，一些省份的中学生开始

下乡。如6月黑龙江已有2万知识青年下乡，到10月贵州有6500人下乡，到11月江苏有5万人下乡。报纸也不断报导红卫兵高举语录牌下乡插队，但毕竟是少量人，高潮远未到来。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只有688户人家的宁夏会宁县下放191户居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的消息。编者按传达毛泽东头一天发出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夜就开始了全国大动员、大宣传。“全国的城镇、乡村、牧区和海岛，到处一片欢腾。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sup>①</sup>

在“·二·二一指示”发布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到1970年春，全国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已达500万人。“文化大革命”前的10多年总共上山下乡人数才100多万，年均10万多人。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总共下放知识青年1700余万人。年均近200万人。

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又于1968年5月7日试行了下放干部，办五七干校（实为农场）。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该省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传达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掀起

<sup>①</sup> 全国军民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消息报导，载《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3日。



下放干部运动，并与精简机构合并进行。后来不仅医生、演员，连工人、店员、手工业者、闲散居民也统统下放。江西到10月底，即下放14万余名干部，大、中、小学的教师、干部也在下放之列，主要是出身、家庭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有问题”的。大学的干部、教师一般集中在五七干校。1969年林彪战备一号令下达后，高校大多外迁，以办五七干校、农场、分校、教改小分队名义下农村。如长春市10所高校到1969年11月，下放干部教师4400人，占总数的58.6%。<sup>①</sup>

经如此大精简、大下放之后，城市、机关、学校似乎显得“纯洁”了，“革命化”了，下一个题目就是“改”和“立新”。

### 五、大批判与改革教育体制

大批判贯穿“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动乱一过局势稍稳，就强调大批判。以大批判促进稳定，以大批判统一思想，以大批判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斗批改”阶段的大批判，又是改革教育的推动力。

但是这一时期的大批判并无新意，仍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的重复，不是探索，而是造声势。其中写得比较系统而理论性较强的只有一篇，即《红旗》杂志1970年2月发表的《谁改造谁？——评凯洛夫〈教育学〉》一文。这篇文章用教育的阶级性否定学校传授知识的任务，进而否定学校为传授知识而建立的整套管理制度、教学制度、考试评分制度。可以说是“左”的大批判深入、广泛发展的一个理论成果。

另一篇体现大批判成果的文献，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

<sup>①</sup> 参见《吉林省教育大事记》，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1969年条目。

前夕产生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它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提出了“两个估计”（前面已述）；二是歪曲归纳了17年教育的“路线斗争”史，称赞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说1961年以后的教育调整“扼杀”了教育“新生事物”，这就点明了这次“教育革命”的起源；三是归纳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八根“精神支柱”，即“全民教育”、“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其实，以前的批判文章和大字报已经提到这一切，此文只是集其大成。

如果说大批判成果不大，教育“改革”的实践却是做了许多工作，可以说全部“斗批改”，以教育改得最多，“破旧”最多，“立新”最多。

这一时期教改方案更多了，中央不作统一规定，“放手发动群众搞教改”，各地自行其是。总的特点是，开始的方案“左”得出奇，新得离谱，“群众建议”是“左”的大比赛。后来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渐褪理想色彩，渐趋务实，也就渐趋统一了。

这种现象，姑名之为“斗批改逆转”现象。起初“大破旧世界”，越彻底越革命越好，把许多虽不公正但合理的东西也破了。此时只顾宣传鼓动群众的热情，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狂热的、理想主义的“革命”目标和口号。等到旧的打破，建设“新世界”时，就不得不务实了，不得不向实际（“旧事物”）妥协，不得不放弃当初的空想“革命目标”。“革命”的衰退不可避免，暗中的“复旧”成为必然的趋势。

何以会发生这种矛盾？这是由于毛泽东赋予“斗批改”两重任务：一是用它推动、发展、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二是用它建立秩序、恢复稳定。这两重任务是相互矛盾的。因为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脱离中国实际，正是致乱之源，而“斗批改”为了止乱求稳、重建秩序，只得悄悄降低、修改、放弃“文化大革命”那些狂热的目标，在“改”的实践、“立新”的实践中走向务实、妥协、“复旧”。政权机关、工农业生产这一点很明显。因为这些都不能大乱太久，国不可一日无主，民不可一日无衣食。教育就不同了，乱了教育一不流血二不饿死人，10年不读书不会一下子造成危机。所以教育领域的“斗批改”坚持空想目标最久，逆转现象最大程度地被遏制。尽管如此，务实“复旧”还是悄悄发生，许多貌似革命然而脱离实际的教改方案，在执行中被悄悄修正。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公开纠“左”，而在此之前的“斗批改”阶段则是“左”不断碰壁、不断被暗中抵制。以1971年8月经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与以前的批判文章和教改方案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一些极左极端的提法去掉了，比较温和了。这一点后面再细说。

工宣队进驻的半年之中，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清队、整党、精简、下放，各项目标都实现了。大学走了三届毕业生，还剩两届（四年制的大学只剩一届）。虽已半空，但还未招生，继续搞大批判。中学6届学生全空（少量招工、大部分下乡），开始招收高小毕业生了，此时已是1968年尾、1969年初，从此改变多年的秋季始业。当时批判者认为这是一种“破旧立新”，毫无根据地说秋季始业是“资产阶级”的，春季始业是“无产阶级”的，殊不知我国封建社会也是春季始业。

1969年1月，《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兰州五中《厂办校、两挂钩》的调查报告，给正在复学的全国城市中学示范。该校由兰州铸造厂派驻工宣队，又改为厂办中学，把全日制中学改

成半工半读学校，师生每周两天全学习，其余四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原中学的 17 门课，精简合并为 5 门：毛泽东思想课、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革命文艺课、军体课。

5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吉林省梨树县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农村中小学大纲》，供全国讨论，给农村中小学示范又不作硬性规定。该方案要点是：（1）领导体制，中学设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革命委员会，小学由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领导。（2）经费，民办公助；教师工资改为工分加补贴。（3）师资，留任经清理后的原有教师，另建干部、贫下中农、民兵组成的讲师团。（4）学制，实行中小学 9 年一贯制。（5）课程，小学设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体、劳动 5 门，中学设毛泽东思想、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体、劳动 5 门。（6）废除考试、留级制。

这个方案较兰州方案具体得多，但实行很困难。比如公办教师取消工资就行不通；原公办中小学改民办势必加重农民负担，也行不通；大多数农村也不具备实行中小学 9 年一贯制的经济条件，中小学分段更为符合实情；中学不设工业基础，只讲农业，过于实用化而束缚学生发展。这个方案不久就被抛弃。

1969 年中共九大闭幕不久，一个多月之中张春桥、姚文元三次亲临上海调查、座谈、组织，于 6 月 16 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决定上海试行中小学 9 年普及教育，既可以“小 5 中 4”分段，有条件的也可以 9 年一贯制。这比吉林方案符合实际，但将原中小学 12 年缩短为 9 年，则太短了，不符合青少年身心发育的阶段性的。该纲要于师资提出工农兵讲师团和工农兵专、兼职教师；于教学法提出自学、讨论、讲用和现场教学（即后来的“开门教学”）；把理、

化、生三科改成工农业基础知识课，只讲三机一泵和四大作物；把秋季始业改为春季始业，把“考试”易名为“考核”，把“批改”作业易名为“评改”，等等。这些条款和该方案的一些其他条款基本为全国各地中小学仿效，后来农村中小学也照此办理。该纲要可以视作中小学“教育革命”新体制的初步形成。其原名即是《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后顾及以上海一地而为天下“制礼”定法，恐过于露骨，才更后名。该纲要对全国学校不具约束力，各地各种方案仍在自行其是，但大都因太“左”太脱离实际而不断被抛弃，渐走向务实。

11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小将上讲台》调查报告，介绍北京草场地中学的一项教学改革。该校军宣队把学生分成10人一小班，每班包教二门课，集体备课，人人轮流上台讲课，称此“打破了旧教育制度加在学生身上的桎梏”。这只能偶然为之，锻炼学生的能力，而不能以此代替教师的作用。后来“教育革命”中，不少学校玩此花样，都不长久。草场地中学军宣队如此做法，系源自陈伯达1967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在该校、23中、泄水湖小学和清华附中视察的即兴讲话，他提出“让学生教学生”、“兵教兵”。<sup>①</sup>

1969年是试行新法的一年，各种方案都想标新弃旧，但是一实行，无不乱糟糟。农民上讲台，学生上讲台，下面看戏，教学成了游戏一般。因此到1970年走向务实。这年2月底，《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市31中革命委员会文章《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文化课》，提倡上好文化课。此后各报刊相继发表文章，鼓励上好文化课。7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国务院科教组，李四光、

<sup>①</sup> 苏渭昌：《中国教育通史》卷6，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刘西尧、迟群出任正、副组长，把教育和科学工作管起来，原教育部所管机构则撤消了（1969年10月原教育部及所属机构1258人全下放至安徽凤阳五七干校）。11月6~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抽了5个夜晚与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师生座谈外语教育。强调专业学习要“天天练”，批评外语教材中政治词汇太多而生活语汇少。到1970年后，各地中、小学的“教育革命”渐渐统一到《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上来。这个纲要的大部分条款被两年后产生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所吸收。

大学的改革自工宣队进驻以后，一直在讨论之中。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复旦大学工宣队、军宣队文章《我们主张彻底革命》，以此发端开办专栏讨论“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讨论竟长达8年，到1976年7月为止共办78期。由于恢复招收的新生，在1971年春入学，1969年、1970年两年只有个别大学试招了一两期工人短训班，并无多少教改实践可言。1970年1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说“革命大批判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1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科就是要办成写作组》，说“工农兵写作组才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好样子”，提出一个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文科大学办学模式。

7月21日，《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插手，经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讨论，以清华大学工宣队、军宣队名义发表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科大学而奋斗》的重头文章。此文提出的方案被一年后产生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全部吸收，这篇文章标志大学的“教育革命”新体制初步形成。文章提出理工科大学改革方案：（1）“革命大

批判”、“阶级斗争”是主课。(2)由工农兵、革命技术员、教师组成三结合的师资队伍。(3)“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4)打破旧教材,打破基础课、专业课界限,编写新教材(在

---

## 第三章

# “教育革命”新体制的确立

在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现场会上，提出如下命题：

——为什么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会反对我们？是学校制度有问题，是教师有问题，是传授的知识有问题。

——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旧教育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它在那里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造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革”以前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这个部门，已经



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sup>①</sup>

上述命题的错误就在于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于是追究学校的教育体制。因此“教育革命”的核心就是阻断知识分子的培养，连“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提了，只提培养“与工农兵划等号的劳动者”。

这种倒退的培养目标，与学校的历史任务、与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实质是取消教育、取消学校，当然遭受顽强的抵制。因而“教育革命”新体制建立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斗争，这种斗争当然不是所谓“两个阶级的斗争”，而是狂热盲动与实事求是的斗争，唯主观意志论与尊重科学的斗争。

## 第一节 三结合的新领导体制——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解决

### 一、突出“阶级斗争”的领导机构

建国以后，学校领导体制变动不大。初期是校长负责制，1957年至1958年之后实行党委领导制，1961年以后制定的大、中、小学工作条例规定大学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小学为校长负责，支部保证、监督。

1968年夏工宣队进驻学校稳定秩序，应是一项权宜之计。

<sup>①</sup> 新华社记者：《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右派口号——揭批“同17年对着干”》，载《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5日；批判“朝阳农学院经验”文章，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22日。

但由于毛泽东说：“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发展为“工人占领上层建筑论”。他说，“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这样，在学校革命委员会和党组织建立之后，工宣队仍领导学校。另外大学还建立一个“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从下至上（班、系、校）参与各级领导。

这就有了领导、管理的四套班子，这种新领导体制颇为混乱，叠床架屋。究竟是党组织还是工宣队代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呢？这一点很长时间未明确过。而工宣队与革委会的分工上总算比较早地明确下来，1968年9月6日中央转发北京市的工宣队会议报告规定：工宣队实行政治领导，革委会做日常工作。<sup>①</sup>直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才明确规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长期留下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政治作用”。此时的党组织是按照毛泽东50字建党方针重新建立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方针赋予党组织单一的阶级斗争职能。学校党组织应抓的惟一大事，就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与改造。

工宣队、贫管会和学员“上管改”委员会的状况，下文有专门论述，此处从略。学校革委会的构成，“实行军干群、老中

<sup>①</sup> 参见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195页。

青三结合”。“军”指军宣队、工宣队、农村民兵的代表，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军代表的作用影响渐趋缩小。“干”指从被打倒的原当权派中挑选出来的幸运者，他们的领导作用越来越大。“群”指教师和学生代表，初期参加革委会的师生代表一般是群众组织负责人，实力比较大。后来，随着群众组织的瓦解，其负责人不断被清洗出来，学生负责人已毕业离校。代替的是一些出身纯洁的学生和教师。他们平时发挥的作用虽有限，而在运动来时则不同了。

革委会的构成模式，也影响到学校党委、党支部的构成，也基本包括三方面代表。大学恢复招生以后，大学的党委和革委会三方面的代表的实际地位是：老干部凭经验和较高文化政治素质担任主要职务，居于决策地位。军代表、工人代表也拥有不小权力，由于军、工宣队人数众多，又从下至上自成组织，与行政机构平行，成为学校抓运动、抓阶级斗争的一大政治工作部门，这些工作的宗旨是“占领学校”，改造知识分子。学生代表已由当年红卫兵负责人更替为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的代表。“上管改”组织参加校系领导班子。它与传统学生组织（学生会、学生党团组织）不同，它不是组织学生自身活动的组织，而是监督、改造教师的组织。学生被经常提醒：不要忘记自己的工农兵阶级意识，警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复辟”。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党委会和革委会中没有教师的代表（设有“革命教师”席位，但不代表教师）。所谓“三结合”，就是老干部、工农兵（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代表和学生代表的结合。教师是学校的基本群众、基本劳动队伍、基本生产力，却在“三结合”政治结构中没有自己的地位。相反，“三结

合”三方中的两方——外请的工农兵和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却是监管和改造教师的依靠力量。新体制四套班子只有革委会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和抓教学业务，另外三套班子是专门用以“改造知识分子”的；党委、党支部是“抓大事”的——抓“阶级斗争”、抓知识分子改造；工宣队（军宣队、贫管会）实际成为党委主要的最大的工作部门；学员“上管改”组织实际成为类似农村“贫协”一样的组织。

“三结合”的新领导体制，在领导方式和路线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它将过去基本上依靠教师治校的政策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予以推翻，而施行一套史无前例的“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新法。它新在依靠外来工农兵和依靠学生治校，而将原来的依靠力量教师置于受监管、受改造的地位，并宣布这种荒谬之举为“实现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的全面专政”，“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校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学校领导体制的这种变化而言，其性质并非是“资产阶级统治”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是党的正确领导被错误领导所取代。

领导机构突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功能，下设的行政工作机构也势必带有这种特点。学校的首位工作部门不是教务处（科），而是政治工作部。“文化大革命”前，学校的教导处权力很大，因为它是学校的业务领导部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掀起“突出政治”、大批“业务挂帅”的政潮。毛泽东1963年12月16日致信林彪等人，说：“国家工业各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教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亦提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像石油部门那样。……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

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此后，各行各业开始设政治部、政治处。1964年6月10日中央批转高教部加强政治工作的报告，大学设政治部，每百名学生配一名专职政工干部。到1965年各大学陆续建立起政治部，中小学后来也建立了政治处或政工组。政治部一经建立，就成为“六部之首”，专门抓运动，抓阶级斗争；在学校主要是抓知识分子改造。不独大学，各行各业政治部的设立，都是适应“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批“业务挂帅”、“单纯生产观点”的需要。大学政治部的最终撤消是在新时期。

教育业务部门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它降为与组织学生劳动的机构并列（各校名称不一），其作用大为削弱，远不及地方上和其他行业如厂矿的业务部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大学的系，原是行政、业务合一的中层领导机关。除少数学校外，在新体制中保留了系，但是其职能大大单一化了，突出了政治功能、行政功能。不注重抓教学，更不组织学术活动。

教研室或教研组，是大、中、小学的学科教学活动与学术活动的基层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先提出“砸烂教研室（组）”，说教研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是“知识分子成堆的独立王国”，是“只讲教学、科研，不管政治路线”的修正主义组织。把教研室统统解散，把教师编入学员班。教师失去自己的工作编组，分散在学生中，一切教学计划、教学任务分配、参加政治活动都交由学生班级支部讨论安排。甚至在学员中公布教师档案材料，北京大学一个系还向学生交底说只有两个教

师是干净的。<sup>①</sup> 取消教研室，把教师下放到学生中，赋予学生班级管理教师的权力，是新领导体制突出“改造知识分子”功能又一体现。而且同一学科的教师分散到不同的班级，同一班级由学科不同的教师混合成“包乘组”，从学生入校带到毕业。教学的分工不按学科而按班次，犹如分工明确的工业经济向小而全的自然经济倒退。

## 二、工宣队状况

选调工宣队员的方法，据 1968 年 9 月 5 日中央批转的北京市规定：（1）抽调全市产业工人的 1/10。（2）分期分批轮换，每次轮换 1/3 以下。（3）配备少数干部，不要出头，只负责内部工作。<sup>②</sup> 派驻在北京大学的工宣队、军宣队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占班子成分的 39%。<sup>③</sup>

上海派出工宣队 10 多万人，掺入几千个刚解放，尚未结合的干部，比例是 3%~4%。<sup>④</sup> 进驻同济大学的工宣队近百人，其中进入校系、基层支部各级领导班子的队员 69 人，占队员总数 70%<sup>⑤</sup>。上海 513 所中学，平均每校派驻工宣队 50 人，1249 所小学划为 110 个学区，每学区派驻工宣队 50 人。<sup>⑥</sup> 派出工宣队的厂与接受学校结成挂钩关系。上海棉纺第四机械配件厂自 1968 年底派出工宣队进驻五七中学，6 年先后轮换 7 批工宣队员。随学校党组织建立、秩序稳定，工宣队人数也渐减，到

① 《评“上、管、改”》，载《人民教育》1978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 194 页。

③ 参见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 420 页。

④ 参见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 292 页。

⑤ 参见《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5 页。

⑥ 参见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第 212 页。

1975年初驻校工宣队为11人。其中5人进校党支部、革委会领导班子，每年级派一名工宣队任年级指导员。该厂选派工宣队员方法是：“领导提名，群众讨论，红榜公布”。工宣队由厂党委组织部分管，实行“三定”：（1）定期汇报，每学期结束，工宣队向厂党委交书面总结汇报；（2）定期劳动，每周四回厂劳动一天；（3）定期轮换，每年轮换工宣队总人数的1/3，平均每人驻校两年，已先后有109人任过工宣队员，占全厂职工总数1/10，其中有厂党委委员6人，厂革委会委员9人，厂工会委员5人，党员53人。<sup>①</sup>

长春市向全市264个大、中、小学派出工宣队1522人，由工宣队员任校领导班子一把手的学校为70.4%。<sup>②</sup>

有些县镇产业工人很少，连手工业社的木匠、铁匠也派为工宣队员。黑龙江省兰西县三中只得到3名工宣队员，都是县农机厂工人。队长是一个老工人，任校党支部副书记，分管上山下乡、教师思想工作、听课。一个队员是念过3年书的司机，主要工作是听课，每学期听课80节以上，每周平均4节。<sup>③</sup>

工宣队的全盛时代，是驻校初期领导“斗批改”的头一年多时间。随着学校秩序的稳定，校党组织的恢复，工宣队渐显多余。各学校悄悄流行起一种说法：工宣队搞大联合、三结合、清队整党有几手，现在搞教育，工宣队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尤其在1970年7月庐山会议批陈整风以后，突出宣传党的“一元化领导”，“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更进入大调整，大批老干部复职，不仅工宣队的作用

① 《管好教育革命是工人阶级的责任》，载上海市《教育实践》1975年第3期。

② 见《吉林省教育大事记》，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

③ 《历史重任担在肩》，载《黑龙江教育》1974年第1期。

降低，连“三支两军”的部队也大大减弱了其政治影响。工宣队不仅在政治领导上要让权于党组织，而且由于不懂行，在强调抓教育业务的大潮中，感到难以在学校存身。

各地悄悄减少工宣队人数。1972年1月长春市对工宣队进行调整，将全市工宣队原有的1522人减去386人，每所中、小学工宣队人数由3~11人，减为3~5人。<sup>①</sup>

据1973年10月352所高校统计，工宣队人数从1971年7月的12804人（校均约37人）减为4892人（校均约14人）。减员幅度为61.8%。其中1/4的高校已无工宣队。<sup>②</sup>工宣队不仅人数减少，而且其作用也明显降低。

黑龙江省兰西县教育界不少人认为“党支部成立了，工宣队是‘工闲队’了”，对工宣队“长期留下来”、“永远领导学校”，发生了怀疑。<sup>③</sup>

大连工学院1972年12月开全院课程建设规划会不再吸收工宣队参加。（后在“反复辟回潮”中被攻为“教授治校的复辟会议”）工宣队被支去“抓后勤，管杂事”。<sup>④</sup>

湖南津市镇教育界也议论纷纷：“学校党组织建立了，教育革命上路了，工宣队可以收兵回营了”，“现在抓业务，工宣队沾不上边了”。<sup>⑤</sup>

北大、清华亦有说法：“宣传队不懂业务，在学校无事可

① 见《吉林省教育大事记》第275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973年7月条。

③ 兰西县委：《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载《黑龙江教育》1974年第1期。

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容否定》，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4期。

⑤ 《工人阶级要永远领导学校》，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4期。



做”。<sup>①</sup> 清华大学“少数知识分子旧病复发，漠视工人阶级的领导”，认为工宣队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工宣队员不过是“象征性的过渡人物”，“大事不找工宣队商量，尽把一些繁琐事务和扯皮的问题推给工宣队员处理”。<sup>②</sup> 辽宁大学1972年底批林极左时，有人说工宣队“野鸡占了凤凰窝”，“只能占领礼堂，不能占领课堂”。<sup>③</sup> 其实工宣队中的许多生产工人，只是奉命在学校“扛活”，并无多少政治功利上的考虑。因而，他们也乐于“抓后勤，管杂事”而烦于整日开会、发言、抓“阶级斗争”，与教师们也相安无事，甚至成为好朋友。总之，1972年以后，许多学校的工宣队形同虚设。

但也有少数工宣队领导怀有政治上的打算，不是被动地而是比较积极地执行了“左”的方针政策，不自觉地当了极左势力的工具。如果说驻校早期的清队，整党建党，是大势所逼，所有工宣队都不得不投入，那么在“文革”退潮的“九·一三事件”以后，工宣队员们渐感倦怠了，而在1973年的反“复辟回潮”，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就只有少数人卖劲了。不管是积极的还是不积极的，工宣队这一组织的特殊使命，决定了它不可能抵制而是必须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配合这些旨在维护“文革”错误路线的运动。

反“复辟回潮”中，撤、调、减工宣队成为一条罪状，所以有些地方又扩张工宣队、贫宣队的人数。如批林批孔中，几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的消息报导，载《北京日报》1974年3月31日。

② 《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把教育阵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1期。

③ 赵英才：《掺进来的“砂子”要有棱有角》，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5、6合期。

无工业的小小黑龙江克山县城，就将工宣队扩大到总共 52 人，进驻 15 所中小学，中学平均 4 人，小学 3 人。<sup>①</sup> 又如湖南津市镇工宣队总人员由 25 增为 37 人。<sup>②</sup> 北京市 17 所高校增派 400 名工宣队员。<sup>③</sup>

清华大学于 1973 年 10 月由工、军宣队领导人迟群发起三个月“反右倾复辟的运动”。

沈阳 122 中学工宣队也是一个“左”的典型，在 1973 年冬反“复辟回潮”中，把一个积极抓教学的班打成“黑线复辟典型”，6 次找该班班主任谈话，召开家长会“帮他把关定向”，要他向全校教师谈教训。又由这个班上联校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的“复辟”言行，进行批判。

工宣队这些做法曾受到校领导抵制，批评说“这是小题大做”，“这是整群众，会挫伤老师积极性”。教师中也纷纷怀疑，说该班主任在压力下检查“太愚蠢了”，区教育局也扣发市教育局关于“解剖三年五班”的《简报》，派人来校“秘密核定”，主持公道。

工宣队负责人认为自己是“反潮流”，“你扣压《简报》，搞‘秘密核定’，我们就把它公布于众，用铁的事实把你顶回去；你批评我们讲‘向资产阶级右倾复辟势力应战’是‘乱提口号’，我们就普遍宣传，各年级都讲”，“你说‘现在不是大字报运动’，我们就当场批判，并且深入发动……”工宣队负责人带头写大字报，开批判大会，深入揭批。揭发一个干部在欢送某届工宣队回厂时，“含沙射影地讲了一段扫帚扫灰尘的话”，又

① 《克山县充实加强工宣队》，载《黑龙江教育》1974 年第 5、6 合期。

② 《工人阶级要永远领导学校》，载《湖南教育》1974 年第 4 期。

③ 北京市 17 所高校增派工宣队的消息报导，载《光明日报》1974 年 6 月 16 日。

对新工宣队“刁难”。所谓“刁难”，不过是向工宣队征求学校当时急待解决的五个问题的办法：毕业生下放问题，招生数字太大，学生太乱，学校体制不适当，教师数量不够。工宣队把棘手的具体问题推回去，要他对每个问题提三个解决方案，供全校讨论。工宣队则只“把握大方向”。此工宣队长就此成为“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先进典型，频频在报刊发表文章。<sup>①</sup>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由于迟迟未能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工宣队仍滞留学校，但人数锐减。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分管教育，谈到要解决工宣队问题。党的十一大开过不久，11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宣布工人宣传队完成了特定条件下的特殊任务，可以撤出学校。但农村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还要保留，应该坚持不脱产。<sup>②</sup>事实上，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比工宣队更早地失去实际作用。

### 三、贫管会状况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的建立，根据的是毛泽东关于工人宣传队的同一条指示：“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一般公社一级原公办的中、小学派驻贫下中农宣传队，在队一级的原民办中、小学，则由大队班子，或专门设立的贫管会、贫管小组管理。

农村中、小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一度活跃，外出串连，参与公社、大队夺权斗争，复课时麻烦不甚大。贫下中农进驻

① 《工宣队的历史使命》，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5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977年11月条。

后，清队、整党中整了一部分教师、干部。随着学校工作转向教学，贫管会的作用日益降低，大都转向管理学校的农场和后勤，组织和帮教师生的劳动。

广东紫金县 40 万人口，5 万多中小學生，300 多所中小學校，共派出貧宣隊 1200 餘人，校均 4 人。<sup>①</sup>江西貴溪縣上清公社五七中學（公辦中心中學），由公社輪流抽調臨近大隊幹部和民兵幹部幾人組成貧宣隊進駐，貧宣隊負責人任校革委會副主任。到後來只剩一個大隊幹部駐校，拿學校臨時補貼，形如調入學校工作的幹部，負責後勤事務和校辦工廠農場。上清公社小學（公辦中心小學）到後來也只是一名貧下中農駐校，拿學校補貼，幫學校組織勞動。<sup>②</sup>黑龍江省克東縣新農公社林河大隊有大隊辦的中小學一個，小隊辦的小學 6 個。大隊中小學設貧下中農管校委員會 9 人，每半月一次例會研究校務。平日由管委會主任一人過問學校事務。各小隊小學設貧下中農管校小組 5 人，也是半月一次例會。後來都流於形式。<sup>③</sup>

駐校貧下中農大都安心管後勤和勞動，並不干涉教學，與教師還算處得融洽。只有極個別地方的貧管會包攬學校教學事務，積極執行“左”的政策。

如批林批孔運動中樹起的一個典型——河北省威縣辛店大隊貧管會，曾被當時遲群控制的國務院科教組接到 9 省中小學教育革命經驗匯報會上發言。辛店學校由 3 個大隊聯辦，設有“戴帽子”初中部，共有學生 489 名，教師 21 名（11 名系民办教師）。該校貧管會 7 人，1 個初中程度，6 個文盲。平日只 3 個

① 廣東紫金縣調查，載《教育革命參考資料》1973 年第 12 期。

② 系筆者實地調查材料。

③ 《牢固占領農村教育陣地》，載《黑龍江教育》1974 年第 5、6 合期。

人驻校，记队上工分，周六周日回队劳动。

1972年教育调整，调动了全国师生教学积极性，各地纷纷组织统考。威县的各个学校也兴高采烈地大抓教学、复习迎考。可是辛店学校不为所动，“照样办三场，养猪、挖鱼池”，予以抵制。统考后，某校数学考得好，受到表扬。辛店学校贫管会“很不服气，就让几个学生去调查，看这个学校走的什么路线”，摸清了“这个学校一年多没有办厂，关门办学，把每个数学公式都背成顺口溜”。1973年4月，地区在沙河开会推广辛店经验，有两个县教育局公开反对，说：“照这样，学校还有法办吗？我们才把老师、学生的劲儿弄上来！”辛店贫管会当场反击：“从孔夫子一直考，考到文化大革命前，考出社会主义了吗？中国革命是考出来的吗？……为什么上高中非要考不可呢？”

1974年，贫管会首先写大字报发动学校批林批孔，要学生学黄帅。这时正好有一个教师管教侄儿，打了他。农村打老婆打儿子无人管，这次因为侄儿是学生，打了学生，结果“全校都哄啦”，“全校大字报也刷得满院满墙”。这位教师压力很大，找贫管会认错，说是“一时的粗鲁”。鼓动事态的贫管会正巴不得小事闹大，斥他：“你不是一时粗鲁，而是长期以来世界观问题的暴露。”这位教师被迫写了“师道尊严十大罪状”，去班上向全体学生认错。在鼓动之下，四年级学生唐敬奎给他外祖父门上贴大字报《这个心你别操了》，批外祖父鼓励他好好读书的一番话。“你好好上学吧，将来找个工作，当个官，挣个钱，也孝敬孝敬俺”，这番话是老人的旧意识，孙子却挂上林彪孔老二来批。老人生气：“好家伙，我供你吃，供你穿，还没长翅儿，就要吃我啊？”另一个学生周春梅的父亲，为生活所迫，酿了点

酒到外县卖，女儿也贴大字报揭批。这个贫下中农斥女儿：“好，你是革命的，革命的学校管饭呀，我这里不管饭。你说我走的道儿不对，你还来我家干么呀？”这个贫管会不仅在学校制造混乱，还把混乱扩大到村里。

这个贫管会还搞了一些教改花样，只是哗众取宠，并无实用价值。如“三结合备课”，让教师与不识字的贫下中农集体备课，先让教师讲备课方案，贫下中农把关审批。“老师讲‘合并同类项’，A、B、C、D……等，一个老贫农一听这些话就说，你光说学儿话，你说说俺老百姓的话，俺也明白明白，什么叫‘合并同类项’？老师说，譬如咱家吃完饭了，剩下的窝窝与窝窝倒在一个筐子里，山药与山药倒在一个筐子里，这就叫合并同类项……我们一琢磨这个事儿，说：‘不行，因为俺们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的时候，有一条‘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你这窝窝、山药怎么转变学生的思想？’这些外行指教内行说：“如咱向棉站送棉花，东辛店也送，西辛店也送，送了去都倒在一起，叫不叫合并同类项？你用这个例子讲，不比窝窝、山药强！”

又如“改革考试”，贫管会认为“一到出题，老师和学生就成了敌对关系了……不行，要让学生出题”。布置每班分成5~6个出题小组，每个人出一门课的卷子，出的题要符合三条标准：（1）“有利于转变师生的思想”；（2）有利于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3）有利于检查教与学的问题。足足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各科题目才出来，考试搞了十六七天。

其中，中学综合题是画学校和村里的照明线路图。这就逼得学生在教室坐两个小时做不了，天天往外跑，天天搞调查，一场考试搞了多日。这就叫开门考试。至于学生跑出去干别的、

互相抄袭，就无人管了。

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试卷，是让学生带中共十大文件去社员家念。让贫下中农评定成绩。

四年级的语文试卷是记做一件好事，五天才交卷。“这一考就在课堂坐不住了，学生去贫下中农家里又担水，又扫院子”。

一、二年级的语文试卷是把本队四类分子和贫下中农名单写出来。“这题一出，二年级100多名小孩都上队里去了，有问他爸爸的，有问他娘的，有问大队支部的，村里也忙得不行……四类分子很害怕……又搞运动了？”

一年级算术试卷出二题：（1）数数队里有多少大、小榆树和杨树；（2）数数猪场有多少大、小白猪和黑猪。目的是“使他们从小就知道，数从实践中来，算术是为实践服务的。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扎下了唯物论反映论的红根”。

据文章称，凡“活动分子”都学得好，而“在屋里背书本的，都不行”。“活动分子”不喜欢读书，熟悉外界是一原因，文章也承认他们有“编凑”的。既敢瞎编数字，当然也就敢抄袭了。<sup>①</sup>

能力这么强的贫管会十分罕见，10年中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农民中，能主动迎合“四人帮”政治需要的人毕竟极少。

#### 四、解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问题的种种措施

教师是学校的主要劳动力和基本群众，他们掌握本部门的专业知识技巧，是学校进行教育活动不可少的依靠力量。这正

<sup>①</sup> 《顶得住站得牢管得好》、《说说俺们是怎样领导农村学校批林批孔的》，分别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2期、第5期。

如工厂进行生产活动必须依赖工人一样，不能笼统说“工人统治工厂”，只能说工厂离不开工人。工厂、学校由谁统治，应看是谁掌握生产资料、经费和管理权。教师从来没有统治过学校，以前他们受雇于地主、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脑力劳动交换工资。现在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像工人一样为共和国劳动。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期，他们还受到压抑和打击，如何能“统治学校”呢？一些教育家曾提出过“教育独立”、“教授治校”以抵御政治的干预，但这只是一些想法，并未真正实现过。

那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之说，究竟所指何义？根据“文化大革命”大字报的指控，归纳其大意，无非是说教育部门的共产党干部按照教育客观规律办事，依靠广大教师办学，这就是所谓实行了“阶级投降主义”。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称“纪要”）的表述，除去另外的政治用意（意在永远打倒刘少奇），其含义也可印证上说。“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进了大学，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变得同工农兵格格不入。”被培养成同老师一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那么，摧垮了这些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学的“走资派”的统治之后，应该如何建立所谓“无产阶级在学校的领导权”呢？

他们不得不面对教师——学校的基本劳动群众这一重大问题。新中国教师虽有先进落后之分，但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人



为地将他们划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部分是不通的。“文革”中又进一步把他们基本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发生了一个矛盾：不可不用与不可信用。一方面是不可不用——十年“教育革命”反复提出这一问题：“要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培养新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sup>①</sup>另一方面是不可信用——“纪要”说“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还比较有力量，他们就竭力使学校成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

由于对广大知识分子、对广大教师定性错了，“教育革命”陷于不少克服的矛盾之中。为了克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矛盾”，采取了形形色色的措施反复折腾教师队伍。

#### 1. 在批判改造中使用

“纪要”提出对大多数教师，要“防止只使用不改造和只讲改造不敢使用的两种倾向”，对有问题而非右派分子或反革命分的教师则“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

改造教师的形式，有下放劳动改造，这后面再说；这里说说在使用中批判改造。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主要是依靠深入到班的工宣队和学生。如北京大学就经常向学生灌输“阶级意识”：“你们这些工农兵上学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就是这帮臭老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领着学校。现在你们虽然进了大学，但他们是不甘心的，他们时刻梦想着复辟，你们也随时可

<sup>①</sup> 清华大学党委：《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载《人民日报》1975年12月26日。

能被赶出校门。”<sup>①</sup>挑动他们“不忘‘上管改’的阶级责任”，“警惕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过去”，把教师的“底细”向学员散布，组织他们“评教评学”。“评教评学”不是学术争鸣，而是百般挑剔，扣政治帽子。北京大学一个教师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条件和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明明符合马克思原意，却诬他造马克思的谣：“马克思决不会讲工人会有人身自由，也决不会讲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中包含着工人延续后代以及学习的费用，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给资本家脸上贴金。”强迫他检讨。<sup>②</sup>

自然科学教学又怎样呢？1970年秋，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被“恩准”给化学系高分子专业试招的新生上课。由于学生都是只有初中、小学程度的工人，大教授上的只是中学化学课，讲的是溶液一课。该教授明明看到下面埋伏有“个别冷笑的面容”，当学生问什么叫“饱和”时，他还是放开地发挥他的上课艺术，风趣地比喻说：“比如吃饺子吧，吃20个，在肚子里；吃30个，就上了食管；吃40个，就到嘴巴了，再吃就装不下了，这就是饱和了。”说到这里，“他夸张地打了个饱嗝，引起一阵笑语喧哗”。他觉得“重新拿起讲义，走上讲台，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一讲就忘了畏惧，不怕“可能动辄得咎”了。很快大字报出来了，“傅鹰宣扬低级趣味”，“资产阶级教授不突出政治”。一个领导心怀叵测，探问他“你对现在的新型教育制度有何意见”？他虽知圈套却忍不住直抒己见：“你们这样的搞法，反正发展不了基础科学，培养不出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人家不

① 李湘等：《清算“四人帮”破坏师生关系的罪行》，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1期。

② 北京大学理论组：《评“上、管、改”》，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2期。

是要听什么“发展科学”，而是要看你如何暴露“阶级本性”。大教授上初中课才一周，即以不称职被赶下讲台。<sup>①</sup>

中学小学的情况呢？上海普陀区一中学英语教师，教国际音标 [ai] 时，被工人师傅发现“突出了一个‘我’字，如‘我有脚踏车’，‘我有收音机’等”，批评说：“这反映了这位教师为学语言而学语言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想。”上海 86 中一语文老教师讲《捕蛇者说》一课，把“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解释为“享受免服劳役，免于纳税的好处，已经有三代了”。工人师傅认为把“免于纳税”解释成“享受……好处”是开脱剥削阶级罪恶。上《孔乙己》一课的教师，把“不会营生”讲解成孔乙己不会做生意，不会过生活。工人师傅认为“完全歪曲了鲁迅先生揭露封建科举制，批判孔孟之道的主题”，“这种没有阶级分析、脱离当前现实阶级斗争，不联系批林批孔，咬文嚼字的解释，是‘智育第一’的表现”。不仅向这位教师“指出讲解上的错误”，还向他“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帮他挖思想、政治上的根源，使“这位教师认识到，语文学科能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与教师的世界观分不开的。他表示，今后一定要认真接受再教育，刻苦改造世界观”。上海一小学教师为了让学生区分“贫”与“贪”字，说“贫”字由“分”和“贝”构成，“分了贝就贫了”。学生贴她大字报，质问：劳动人民贫，是因为钱被分光了吗？抽掉了阶级剥削！<sup>②</sup>

湖南湘潭雁坪公社赤卫学校的一语文教师上语法课，例句“我们同学在学校里茁壮成长”刚在黑板写出，学生小谭就站起

① 胡小钉：《哪怕它风雨雷电》，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11期。

② 《工人师傅上讲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56、57、62页。

来说不对，是“三脱离”流毒，应改为“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这个好向教师“开炮”的学生，被认为优点突出，该评三好学生。<sup>①</sup>

江苏如皋万新小学陈老师讲《寓言二则》中的《学弈》时，学生一阵交头接耳说话之后，纷纷发问：“那个人光坐在教室里，只听弈秋一个人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关门读书，脱离实际，我们怎么能学（他）？”“我们要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解放军学习”，“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不但学文，还要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结果该教师“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sup>②</sup>

自1971年后，山西昔阳每年寒假在农村整党时，同时进行贫下中农“评议教师思想改造”。每年农忙假，县社集训教师，搞路线教育，以“四大”方式揭盖子。教师处于“等挨整”状态。<sup>③</sup>

教师就在这种动辄被批判为“旧病复发”的状态中工作，这就是所谓“在批判改造中使用”。

## 2. “掺砂”——三结合办法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派进工农兵“掺砂子”，加以改造。“纪要”提出实行“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工农兵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要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吸收工农兵参加教学活动，主要是就地聘请”。

其实早在1969年6月上海提出的《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

① 《从“小谭该不该评三好学生”说开去》，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2期。

② 陈恒健：《做小学生的“小学生”》，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2期。

③ 昔阳县委：《加强党的领导，依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载《山西日报》1974年8月30日。

和1970年第8期《红旗》发表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即提出此议。1970年7月17日教育部军管小组提交的《关于教育革命情况的报告》称“有些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一批以工农为主体的教师队伍”，列举江西1969年抽调10万工农兵充实学校，福建福安县成立650个工农兵讲师团，计9000人。1970年9月22日《光明日报》以《改造学校教育阵地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为题介绍北京香厂路小学1968年11月聘建一支37人的工农兵讲师团，“把讲课权夺过来”，“改变了知识分子独占讲台的现象”，“改变教师队伍成分”。1973年7月27日《人民日报》报导了上海徐汇工人讲师团消息，提出“让工农兵讲师永远占领社会主义学校的讲台”。

工农兵中确实有可以担当教师的人材，但在选聘中不是突出文化条件而是政治条件。聘来的工农兵经一定时间的训练学习，尤其是向原有教师学习，也可以胜任教学。但实际上却把他们作为“骨干力量”——不是有力地辅助而是不恰当地干涉原有教师的教学。工农兵拥有较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但缺乏教学经验和从事教育所必备的一定的知识技术训练，把他们作为“三结合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而不是辅助力量，这是不妥的。这种做法，突出地表现出不信任原有教师，也表现出轻视书本知识而片面突出实践经验。除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选聘工农兵教师也由于此时出现师资紧缺。师资短缺，“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存在，此时又由于一批教师被打倒，一批教师被下放劳动改造，还有一批教师由于“政治条件不宜”而调离教学岗位，兼之停课几年而无新的师范生来源，而中小学教育规模又有所扩大，这是工农兵教师出现的实际原因。有些学习上进的工农兵因此而在后来正式转为教师。从这个权宜之计的意

义上来说，又未可简单加以否定。

具体实行中，有的地方由学校自聘工农兵作“兼职教师”，有的地方由政府组织“工农兵讲师团”，加以集中训练，分派到各学校。

据 1973 年统计，全国中小学聘工农兵讲师总计 42 万余人，为解决师资不足，民办教师增至 280 万余人。<sup>①</sup>

江苏无锡市于 1969 年 5 月 7 日选派第一批工人教师进学校，当时全市敲锣打鼓，市委首长亲自将大红花别在工人教师胸前，大大张扬此事的政治意义，说“你们是代表整个工人阶级上讲台的”。<sup>②</sup>

上海师大和普陀区于 1969 年 5 月合办外语红师班。1970 年底红师班分配 12 人去上海师大作英语工人讲师，其中上棉三厂孟师傅已经 42 岁，在大学讲台坚持 8 年。<sup>③</sup>

上海徐汇区革委会教育组有组织地选聘、训练工农兵讲师团队伍，自 1969 年 8 月办第一期红师班，到 1975 年已培养出 1641 名工农兵讲师。后来发展为教师红专学院，设有工人讲师辅导小组，由 4 名水平较高的工人讲师和 3 名教学辅导员（实际是老教师）组成，负责对工人讲师进行短期培训，先讲政治，后讲语文、数学、外语、工业基础知识 4 门文化课。派进学校的工人讲师，由工厂抽调，兼职为主，少数转为专职，另特聘领导干部和有特长的工农兵做特约讲师。组织形式，设有区工人讲师团、在校工人讲师、学工基地工人讲师三级。区工人讲

① 钟晓：《中小学教育革命取得新进展》，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 年第 11 期。

②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报导组：《我们登上讲台之后》，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 年第 4 期。

③ 《工人阶级能够占领大学阵地》，载《文汇报》1974 年 6 月 4 日。

师团成立于1972年5月，有30余人，去各校巡回示范上课，以提高在校工人讲师为目的。在校工人讲师只是兼职，定期去学校上课。学工基地工人讲师在原单位，专门负责实践课。每个工人讲师在一学期中只承担一二个章节或二三节课的教学，不单纯作教师使用，每周脱产备课一天。<sup>①</sup>

上海郊区一个公社更为超前，早在1968年夏即组织工农兵讲师团220多人，另又设贫下中农政治辅导员168人，竟为全公社教师数量的两倍之多。恐是有名无实。<sup>②</sup>

山西昔阳县到1974年夏，聘工农兵兼职教师3110人。又给全县中小学一班配一个贫下中农政治辅导员。<sup>③</sup>

上海五七中学1968年11月即聘请工人讲师。先后聘过42人，讲过政治、语文、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数学、革命文艺、外语等课。工人讲师李师傅在红师班从ABC学起，仅学了3个月，即成英语讲师，称以此“粉碎了‘外语教学神秘’的谬论”。吴师傅讲物理，不讲任何物理概念符号，只从工厂搬来旧电动机，边拆边讲。上棉一厂工人斯师傅年近四十，被抽去参加普陀区工人外语讲师团。她说“过去从未接触英语，只有一个字母‘X’在厂里医务室见到过”。<sup>④</sup>令搞原子弹的去烧锅炉，派烧锅炉的上讲台，并认为这是“革命”。后世人会觉得这个“革命”过于浪漫过于戏剧化。

有不少工人讲师还是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以教好书为务。

---

① 参见《工人师傅上讲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页。

② 《贫下中农掌握农村教育大权的时刻来到了》，载《文汇报》1968年9月12日。

③ 昔阳县委：《加强党的领导，依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载《山西日报》1974年8月30日。

④ 参见《工人师傅上讲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80页。

如上海烽火铸造厂工人，茶陵中学讲师汪师傅就不“左”，听取教师意见，管教差生，借电表、电动机、水泵来配合教师，踏踏实实教给学生实践知识。<sup>①</sup>

但也有些工人讲师受极左思想影响。上海五七中学经3个月培训的英语工人讲师的做法是：“教英语不能只教语法、语音，而更重要的是教无产阶级政治”，“看到有些英语教师在上课时，像过去一样照书本念，不搞革命大批判。一了解，原来有的教师认为现在新教材讲的都是政治，上课就是突出政治。这表明‘智育第一’流毒还在作怪。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同革命师生一起，在英语课中开展革命大批判。我们批判了什么‘外语特殊论’，什么‘洋、名、古’的一套黑货，指出这就是‘智育第一’，所要达到的就是‘变权先变人，变人先变心’的罪恶目的”。在教英语毛主席语录课时，要学生“查一查坏儿歌在学生中间的流毒。顿时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很多同学联系自己，开展对坏儿歌的批判”。<sup>②</sup>茶陵中学教师把游标卡尺作为量具知识来讲，工人讲师批评不对，编写《游标卡尺思想教育提纲》，“还编了一首反映新旧社会游标卡尺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歌谣”。后来讲照明电路，却把学生拉到松江县城东公社的老贫农家中进行访贫问苦，大搞关于电灯的“忆苦思甜”。<sup>③</sup>

上海师大二附中请过近百工人讲师，先后给学生上了8000多节课。上语文课《孔乙己》，教师说孔乙己是“被侮辱、遭不

① 参见《工人师傅上讲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0~93页。

② 工人教师李剑心：《教学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载《文汇报》1970年4月25日。

③ 参见《工人师傅上讲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页。



幸的可怜角色，说鲁迅对他抱有同情心”，工人讲师说不对，孔乙己是“孔家店的忠实信徒”。这还算是水平的工人讲师，与教师作学术商榷。上海另一个中学的工人讲师开始时认为自己“现在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怎么能去上语文课”？便请教语文教师。这位教师若不回答，便是“摆架子”；回答了，又可能被视为“知识分子不虚心”。他也不多说，只客观地讲了三条：一要逻辑性强，二要系统性强，三要表达能力强。果然他就犯下错误。工人讲师“仔细一分析，不对，这三条所谓的标准，就是没有无产阶级政治标准；离开了无产阶级政治，这三个方面越强，所散布的封、资、修毒素就越多”。于是针锋相对提出“上课要有工人阶级的特色”三条：“政治性强、理论联系实际强，转变学生思想强”。并按这三条让章师傅上古文节选《秦始皇本纪》一课。但章师傅不懂古文，先令教师给同学解释课文一遍，然后由这位工人讲师作“政治性强”的示范。他“联系教育战线实际，指出有人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8年，就是妄图复辟倒退……‘师古’与‘师今’之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争，这种斗争秦始皇时代有，两千年后的今天有，今后还会有”。<sup>①</sup>工人讲师并无特别政治用心，不过受极左政治愚弄而已。极左政治运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借工人、贫下中农的嘴巴来说貌似代表他们利益而实藏祸心的话。

农村学校的贫下中农讲师团多数地方只是做做样子，并未坚持下来。其原因一是农民文化水平太低，二是农民不似工人有国家工资，得由队集体贴工分，侵占农民利益。但是，对于

<sup>①</sup> 参见《工人师傅上讲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61页。

不是搞政治花架子而是实在办教育的事情，农民还是支持的，如民办教师（赤脚教师）的报酬，他们还是愿意负担。至于极少精心扶植的典型，是搞政治而不是搞教育。

湖南汨罗县画眉大队于1970年组织了一支15人的讲师团，其中有社队干部、电站农工、贫下中农、复员军人、农业技术人员、赤脚医生各色人物，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识字不多”。据“经验”文章说，就此事曾发生过“一场大辩论”（虽不可信，姑妄听之吧），“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说‘泥脚子称圣人，不懂诗书蛮缠经’”。老支书回答说：“千百年来，讲台被剥削阶级知识分子霸占着，他们把课堂变成染缸，为地主资产阶级培养奴才；今天我们泥腿子就是要反这个千百年来潮流，占领讲台，改造课堂。”讲师团每月一次读书会，不是学文化，而是学“阶级斗争论述，查阶级斗争动向”，认识到“世界上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我们天天在从事革命和生产的实践，传授社会主义的知识最有发言权”。4年中讲师团上阶级教育课、语文、数学、理化、农业基础课等320节。语文课讲村史家史，数学课讲“算盘上的阶级斗争”，物理讲“农业机械化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sup>①</sup>

由于工农兵讲师只能上“阶级斗争”课和生产劳动课，仅少数人能勉强上文化课，实际上并未发挥“纪要”所规定的“骨干作用”。许多学校一开始就未认真执行聘兼职教师的规定，多半只做做形式。而到1972年抓教学质量时，那些执行较好的学校也垮了下来。

如湖南澧县东溪中学，“请兼职教师的制度没有很好坚持”，

<sup>①</sup> 《“泥腿子”站讲台好得很》，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7期。

在学生批评压力之下，才“急急忙忙地从制度上规定要请兼职教师”。但请来之后，“有的教师对兼职教师上课不放心，站在一旁，指指点点；有的事先不和兼职教师认真备课，把学生带出去一交，自己不闻不问；还有的在同兼职教师备课时，连正确的意见也不敢发表”。<sup>①</sup>

江苏无锡市“有的工人讲师开始教主课，后来被调教副课，最后要分配去食堂洗碗刷锅”。有个“能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人讲师“被一些人以‘业务不过硬’为名，不明不白地调走了”。批林批孔时市委来调查，“专门发了文件，制止‘调动风’”。<sup>②</sup>

上海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自1968年以来，工人讲师团是两聘两散。1972年批“左”时，对工人讲师团的议论多起来：“只能忆苦思甜，上文化课不行。”有的教师以“教学进度完不成”，谢绝安排工人讲师上课。有的教师听工人讲师的课总是说“好、好、好”，不愿提具体意见，工人讲师要来听课则婉言谢绝：“没啥好听”，“我这堂上的复习课”。张师傅讲《杠杆原理》一课，把全班拉到大操场，叫学生搬大石，再撬，上课闹哄哄。教师认为这不是训练抽象思维的手法，课后对学生书面测验，成绩果然不好，背后议论“工人讲师上课是一听就懂，一考就忘”。批林批孔中，对此进行大批判，“使教师弄清了两种不同的质量观”，“用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考核方法去检查无产阶级新的教学质量是不行的”。<sup>③</sup>

上海五七中学的教师1972年上半年也议论工人讲师上课

① 东溪中学党支部：《抓教育革命要抓思想革命》，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7期。

② 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报道组：《我们登上讲台之后》，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4期。

③ 《工人师傅上讲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36页。

“不系统、不严密、不科学、不正规”，“搞开门办学是以干代学”，“中国五七中学开门办学最早，工人讲师最多，知识质量最低”。批林批孔中搞“质量大辩论”，工人讲师批评说：“什么系统性、科学性、严密性，我们工人阶级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性、革命性、思想性！”<sup>①</sup>

大学也出现同样情况，清华大学就有人“公开反对聘请工人教师，认为工人教师是‘包袱’”。<sup>②</sup>

上海师大也有人认为工人讲师“只会上忆苦思甜课”，还有人“不放心”，工人上一节课，他“补”一节课。校方也以“不属师大编制”不发给工人讲师书刊资料，不让在学校看病。<sup>③</sup>

对工厂来说，抽调工人作工宣队、工人讲师亦是一种负担。上海烽火铸造厂是一家只有150名职工的小厂，1968年奉上级指示派出15名工宣队员，占正式工人的百分之十几。1970年徐汇区教育组和茶陵中学又要求派工人讲师，即觉是“额外负担”，说“厂小人多，已经派出了工宣队，再派讲师就没有人搞生产”。后来通过“讨论批判会”统一认识，认识到“教育革命搞不好，工厂生产再多也无用，国要变色”，结果又抽出7名生产骨干作讲师，3名工人作不脱产讲师。领导班子5人抽出2人专管工宣队和工人讲师团，专管学生来厂学工活动。该厂工人讲师几年来到78所中小学和3所大学上课700节。<sup>④</sup>

### 3. 劳动改造·工教对换·取消教师

① 《工人师傅上讲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23页。

② 《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把教育阵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1期。

③ 《工人阶级能够占领大学阵地》，载《文汇报》1974年6月4日。

④ 《工人师傅上讲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94页。

把教师撤下教学岗位去劳动改造的形式有多种：有分散下放农村劳动，全家插队，一干多年的；有集体到五七干校劳动的，有的是单人去，有的是全家端；有的在校工作而分期分批轮流去学工、学农基地劳动，去校办工厂农场劳动。1969年6月发布的《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即规定教师每年劳动不得少于两个月。上海纺织工学院机械系在教师中试行“三三制”：一些教师开门教学，一些教师下厂调研搞技术革新，一些教师下五七干校劳动。全系165名教师，到1973年中已有86.7%下过干校。这期间学生从31人增为210人，专业从1个增为3个，工作十分紧张，还坚持要教师劳动。<sup>①</sup>被安排去劳动的，往往是被认为“有问题”的，劳动改造成为一种政治惩罚，如清华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就将“犯错误”的干部教师放去校农场劳动，接受监督。还有一些学校，劳动成为主课，教师也上劳动课。大寨学校就有个规定，教师人人要过“扁担关”，春季担肥上山半个月，秋季挑担下山一个半月。<sup>②</sup>

教师在体力劳动中有一些变化，但很难说是“阶级改造”。广东“教育革命”样板县屯昌县一个中学的邓老师写体会说，以前“散步时还要格外打扮一番，穿好衣服，挽起袖头，露出手表，才敢走出校门。现在光着脚板，卷起裤腿，担着粪桶过大街也不成问题。饭后不是散步了，而是到甘蔗地里去走走看看，松松土，抓抓虫，不去就感到不舒服”。<sup>③</sup>这似乎有田园诗的味道了。

“工教对换”这个提法，提得不多但实际做得很多。“纪要”

① 《在教师队伍中试行“三三”制》，载《解放日报》1973年11月16日。

② 钱光培：《从大寨的几条“规矩”谈起》，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8期。

③ 邓镇郁：《我在劳动磨炼中的变化》，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5年第1期。

提出的聘工农兵教师（主要指兼职）就是“工教对换”的一种形式（教师下厂劳动），另还提出“要从工厂、农村、部队选调一批工农兵和同工农兵结合较好的革命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这是“工教对换”的另一种形式。如果说“聘工农兵教师为骨干，建立三结合教师队伍”是“掺砂”，那么选调教师则可说是“换血”。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教师被打倒、停用、下放的多，急需补员，但由于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错误，竟将此视为“换血”的机会，选调的教师不仅不需师范培养且无任何文化条件要求，只需“工农兵”身份，这就大大降低教师队伍的文化素质。选调的教师与兼职的教师不同，是“铁饭碗”，开了这个口子，一批没有“铁饭碗”的城乡青年进入教师队伍，尤其是乡村民办教师队伍中进了许多有关系而无文墨的人，他们转正比真有水平的民办教师还快。上海郊区一个公社走在全国前头，1967年8月各大队即接管学校，不久进行清队，竟更换原教师队伍的40%，以上年四清积极分子80多人和贫下中农子女60多人补入。<sup>①</sup>城市进的教师大多是转行的工人和技术员。如无锡市到1973年底共有600多人调入学校，占全部教师总数20%，这些新进的人中有97人担任校、学科、年级的领导。<sup>②</sup>

天津市教育局在1974年11期《教育革命通讯》发表的《改革城市中学教育的初步探讨》中，又提出“工教对换”的第三种形式，让教师下厂顶班劳动，工人讲师进校顶岗上课。1975年第8期《教育革命通讯》发表《山西省阳城县试行教师与贫下中农定期对流》，介绍该县阳城、白桑、田厂店、河北、驾岭

<sup>①</sup> 《贫下中农掌握农村教育大权的时刻来到了》，载《文汇报》1968年9月12日。

<sup>②</sup> 无锡市教育革命的消息报导，载《人民日报》1974年2月10日。

等公社让农民教书、教师种地，每期3~12个月，当时已有76个教师下队，56个农民进校。

“取消教师”的理由很充分，“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做起来却很难，在实践中行不通，所以“教育革命”中无人敢提出、敢实行。但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军宣队负责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谢静宜。她偏敢力排众议，不怕讥为杜威信徒，在北京一个中学试验取消教师、学生自治。但一直未见经验出来，可知是失败了。到底是中学娃娃，“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自己解放自己”，却不能在“教育革命”中“自己管自己”、“自己教懂自己”。<sup>①</sup>

## 第二节 开门办学的新教学体制—— 两个突出一个削弱

### 一、“三结合”之称名实不符

“纪要”提出“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这并非新的发明，“文化大革命”前就提出过，国外已经这样做了。教育同生产、同科研结合起来，符合现代工业社会、现代教育的客观要求。问题是如何结合，在什么基础上结合。“文化大革命”前，从1958年起教育部门就对此进行过探

<sup>①</sup> 批判谢静宜搞“学生自治”的文章，载《光明日报》1977年2月22日。

索，但失败多而成功少。“大跃进”中学校的生产劳动以改造知识分子、突出阶级斗争为目的，而且搞得过多，结果不是与教学结合而是脱离教学、冲击教学。科研活动也以出政治成果、政治样板为目的，流于浮夸，也未能与教学有机结合。1958年的探索成绩是将单项教学改为教学、生产劳动、科研三项并行，缺点是三者未能有机结合，因而降低了教学质量。1961年进行教育调整，提出学校“以教学为主”的原则，这是总结经验得出的合乎教育客观规律的认识。但在“以教学为主”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生产劳动、科研三者的结合，也只是一个粗浅的认识，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如何具体结合，如何从各类学校的实际出发，仍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课题。不能靠搞运动解决，更不能以改造知识分子和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去推动。

在“教育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开门办学新教学体制，恰恰没有做到教学、生产劳动、科研的三结合。有的时期有的学校是以生产劳动为主，搞阶级斗争为主（配合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改造知识分子），脱离和削弱了文化教学。至于科研，开展了一些群众性的低层次科研，成果十分有限，而且科研人员心有余悸，实际上是以劳动改造为主。

开门办学新体制是批判旧教学体制而产生的，看它批判什么就知它要建立什么。

它批判旧学校搞“三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学校的教学活动以教师为指挥、以课堂为组织形式、以书本为基础，正如工厂的生产以厂长为指挥、以车间为组织形式、以设备原料为基础一样，完全合乎客观规律，不以阶级为转移，一反必乱。新体制强调以工农为师以取代教师中心地位，强调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以取代课堂中心地位，强调学习实践经



验以取代书本中心地位。这样的结果必然完全取消学校教育，所以新体制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它通过反复对“三中心”进行大批判，反复宣传和进行开门办学，倒确实大大削弱了教师、课堂、书本的作用，即削弱了文化教学。

它批判旧学校搞“老三段”，即教学活动按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先打基础，然后充实专业基础，最后学习专业的三段教育法。这被认为是“关门教书”，“关门打基础”，是“理论脱离实际”，是“培养书呆子的方法”。新体制强调一开始就看见庄稼、机器，先实践后学，边干边学。这种教育不是正规学校教育，而是落后的农业父子相传、手工业师徒相授的教育。反对“老三段”教育法，是为了削弱文化理论教育乃至取消文化理论教育，是为了强化手工型的生产劳动教育，这种教育完全无需三段打基础。这实际是从现代教育向原始教育倒退，以原始的生产教育来改造现代的学校教育。之所以发生这种教育思潮，除了有意无视知识分子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作用外（在“两弹”试制成功的报导上都不提科学家的作用），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落后的国情及经济连续衰退多年（1959年到1976年）所限，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所学不能应用到手工型的劳动中去，以致“学校教的一套ABC脱离实际，在工厂农村用不上的论调”十分流行。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则完全不同，30年代出现工业高涨，对知识技术人材十分渴求，以致斯大林提出“技术决定一切”、“（技术）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

它批判旧学校“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大众。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之下，学校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也不可能自行其是地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突出政治”已经严重冲击教学工作的情况

下仍说学校脱离政治，其结果只会大大削弱文化教育而突出“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学校从1958年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方针以来，也一直坚持了组织师生参加劳动。当然，这与工农生产劳动有区别，因为学校是教育机关而非生产企业。指责学校“脱离生产劳动”，正是以工厂、生产队标准来看待学校。学校办成了工厂、生产队，岂不是取消了学校吗？“教育革命”中虽没取消学校，但大大削弱了学校的文化教育功能，突出了“以生产劳动为基本课”。学校里只有师生，确实脱离工农。“教育革命”在这方面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问题在如何看“脱离工农”，其性质是阶级隔阂，还是行业分工隔阂？知识分子与工农及其他行业的劳动者加强交往、互相学习，双方都有益。但如果认为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存在“改造与反改造”的“阶级斗争”，则是荒谬的，其结果不是有利于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平等结合和劳动者内部团结，而是挑拨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蓄意制造矛盾和敌对。对学校“脱离工农”的指责正是这样，伤害了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感情。

它给教师用心教书、学生努力学习捏造“个人奋斗”、“知识私有”、“智育第一”、“天才教学”、“读书做官”、“分数挂帅”、“考试专政”、“洋奴哲学”等罪名而痛加批判，其结果仍是削弱文化教育，而突出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

所以，我们很难承认新教学体制做到了“教学、生产劳动、科研三结合”。新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突出阶级斗争，突出生产劳动，而削弱文化教育，其对应相关的特征也就是“转变思想首位”、“实践经验惟一”而鄙薄书本理论知识。其主要做法是“开门办学”，故名之为新教学体制。

## 二、突出“阶级斗争主课”

新教学体制把“阶级斗争”课放在首位。这与过去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有联系，但不是相等。比如新时期将经济建设作为最大的政治，为政治服务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而当时突出的政治，是“阶级斗争”。学校的“阶级斗争”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为此杜撰出“占领与反占领”、“改造与反改造”、“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1939年7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写的《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的“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一句话，被作为60~70年代一切大中小学的工作方针。毛泽东这句话是在特殊的年代（革命战争年代）为特殊的学校（军政干部训练学校）、特殊的培训对象（资产阶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特殊的培训任务（将很少接触马克思主义而熟知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迅速训练成革命军政干部）所规定的办学方针，显然不适用于和平建设时期的普通学校。但是“教育革命”中，却公开否定“学校是传授文化知识的场所”（批凯洛夫时提出的），认为学校这一“知识分子成堆”且不断产生新知识分子的地方，应把“转变思想”即改造知识分子放在首位。

为了实现“转变思想”的办学方针，当时反复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应首先办成政治大学、劳动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就是专业”、“铁锹就是专业”。“阶级斗争”是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修的主课，这门主课不仅仅是在课堂学政治理论，更重要的是参加群众政治运动。

学生所学政治理论，所参加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每年都不同。1968年下半年，上海闸北区第三中心小学的安排是：

(1) 工农兵讲师团每两周轮流上 5 课：毛主席著作讲用课、忆苦思甜课、现实阶级斗争课、大批判课、斗私批修课。(2) 5 个与该校挂钩的工厂派出工人政治辅导员指导红小兵，并组织红小兵参加每一次的全厂对敌斗争会。(3) 校外聘退休工人担任毛泽东思想辅导员，管理放学以后的小学生。<sup>①</sup>

1970 年 2 月，上海五四中学开展整党建党、清队复查、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三项运动，发动师生大揭教学领域“阶级斗争盖子”，贴出 4000 多张大字报和 300 多期大批判专栏，开了 300 多次大批判会。重点搞“学生中的腐蚀与反腐蚀斗争”，“教师中的改造与反改造斗争”。批判教师中“只认代数方程，不认阶级敌人”，“花草树木封资修，三大革命脑后丢”，“只教单词句子，不教兴无灭资”。<sup>②</sup>

1970 年 7 月 17 日教育部军管小组教育革命调查组向国务院呈交的《关于教育革命的情况的报告》，则围绕备战要求学校“思想教育时刻准备打仗，以学为主科科突出打仗，兼学别样样样围绕打仗，组织建制事事适应打仗”。<sup>③</sup>

1974 年上海铁路五小组组织师生大批《三字经》，一个月写出 800 余篇批注批判稿，近百首批判儿歌，开了 18 次广播批判会。四年级两个班找出一本 1964 年版的小学一年级上册语文课本，大批《孔融让梨》是“忠孝仁义的骗人鬼话”，批“头悬梁、锥刺股”、“如囊萤，如映雪”是“宣扬‘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谬

① 《工人阶级领导城市小学教育革命的情况》，收入专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万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②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载《文汇报》1970 年 6 月 17 日。

③ 苏渭昌：《中国教育通史》卷 6，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论”。<sup>①</sup>

1975年，广东屯昌小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规定师生每天学一小时，每周学两个晚上一个下午。<sup>②</sup>

1976年初，上海二中动员师生大反“右倾翻案风”，开了150多次辩论会，写出《有资产阶级存在，就要批判“智育第一”》等5000多篇大批判文章。<sup>③</sup>

山西大寨学校是县办中小学，大寨大队规定该校小学高年级以上学生，一律参加大队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学习“阶级斗争主课”。<sup>④</sup>

学生从小学一年级起，年复一年学理论、突出政治、参加运动、搞“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转变思想”，最后只记得“打倒自己的个人主义”是不变的，“打倒的敌人”则年年变：刘少奇、林彪、孔老二、搞右倾翻案的人……

不仅政治课、“阶级斗争”课要“转变学生思想”，就是文化课也要贯穿这一首要任务。因为“教学的过程，就是认识的过程，而人的认识无不带上阶级的烙印。所以教学的过程就是两种思想斗争的过程，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sup>⑤</sup>

### 三、突出生产劳动课

生产劳动课的实际排位，在阶级斗争课之后，文化课之前。

① 《从小粗知一点马列主义，敢于批判孔老二》，载《文汇报》1974年8月3日。

② 广东省教育局调查组：《屯昌县教育革命在前进》，载《新教育》1975年第5期。

③ 《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载《文汇报》1976年1月24日。

④ 钱光培：《从大寨的几条“规矩”谈起》，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8期。

⑤ 《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教育学〉》，载《红旗》1970年第2期。

师生长时间参加脱离教学的生产劳动，虽也创造了一定物质财富，得到了锻炼，增长了实践经验，但由于生产劳动的目的不在经济效益和创造物质财富，而在改造人、“转变思想”，并且与文化学习相脱离、相对立，所以未能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有机结合，反而耽误了一代人的教育。

一篇强调生产劳动政治意义的评论，攻击教育工作、教师生活和教学秩序是“一杯茶，一支烟，关在屋里写教案，上课照着书本念，课外散步闲聊天”，“而这种教学秩序可以说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修正主义，培训着资产阶级精神贵族”。<sup>①</sup> 似乎文化教学课就是“修正主义土壤”，而生产劳动可以铲除这土壤。所以一味地多安排劳动，把教育机关变成了生产单位，学校的文化教育功能大大削弱了。劳动的安排有这么几种方式。

#### 1. 厂、校、社挂钩，办“学工”、“学农”基地

如天津市 245 所中学分别与 600 多个工厂、200 多个大队挂钩。大的学校，一校挂几个厂；大的工厂，一厂挂几个学校。每个学校都在挂钩的厂、队分别建立学工、学农基地，让学生定期去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sup>②</sup>

学工学农劳动的时间安排，因地因时有不同。“左”的地方，“左”的样板，运动期间，劳动就多起来。下面所举多是极端的例子，并非所有全国的大中小学、所有“教育革命”10年中都是如此。如清华大学有的班级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

<sup>①</sup> 《铲除学校修正主义土壤的根本措施——再论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载《新教育》1975年第5期。

<sup>②</sup> 天津市教育局教育革命组：《改革城市中学教育的初步探讨》，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11期。

全年业务学习只有 8 周，不到总周数的 20%，其余全被阶级斗争上课和劳动实践课占去。<sup>①</sup>

昆明工学院在 1972 年以后、1973 年下半年“反复辟”以前，把学文的时间定为 71.4%，其余学工学农学军。<sup>②</sup>把学生在校时间的 3/10 用于劳动，这比例仍然高了，但这已算比较清醒的学校。

北京 31 中 1970 年以前，安排劳动和政治活动过多，1971 年上半年批陈整风以后开始纠正，到下半年林彪事件后则不安排学工学农时间，21 周全上文化课。但随即受到批评，以后每年 8 周学工学农学军，占总周数的 1/5，比较恰当。<sup>③</sup>这仅是“反复辟”之前的数据，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极可能又有变动。

而且，除去学工学农学军基地劳动之外，还有校办厂、场的劳动和临时劳动任务。江苏海安中学即如此，他们规定的学工学农学军也是全年 8 周，但学文却达不到 32 周。而且，学文也常常不在教室上课，是拉起队伍去“大课堂”。<sup>④</sup>

上海中国五七中学校长时间稳定在文化课 70%、学工学农学军 30% 的比例上，中学生在 4 年只有 2.8 学年用于文化学习。这么几千年龄小而不齐（从 11 岁到十五六岁）的学生，长达 1.2 学年的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殊难安排。“在开门办学中，

① 教育部大批判组：《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载《人民教育》1977 年第 1 期（10 月·复刊号）。

② 田有：《坚决执行〈五七指示〉，坚持开门办学》，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 年第 4 期。

③ 北京第 31 中学党支部：《坚持提高文化课质量的正确方法》，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 年第 6 期。

④ 《面向农村改革中学教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3 页。

由于在安排上无目的、无计划，造成各学科之间，各班级之间教学进度参差不齐的现象，出现教学内容、时间安排上的反复与冲突”。<sup>①</sup>

十几、二十几个班级的教学，按每班6门课，就是100多门课的教学安排，与每个班分别安排的学工学农活动经常发生冲突，学生到外面半个月、一个月回来，收心不住，教室坐不住，很难管理。至于出去学工学农，就更难组织了，等于大放鸭。华中工学院附中高中25班学生在1973年10月“反潮流反复辟”时贴出的大字报，就指责学校没有实现“学工学农”的思想教育目的。“关于开门办学，我们学工、学农的活动也搞了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的收获都不算大，有的干脆流于形式。学工就只是拿榔头，学农就只是提锄头把……另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好玩”。<sup>②</sup> 拔高吹大“学工学农”的政治意义（反修呀，新人呀），确有一部分学生相信，所以当他们看到“崇高的政治目的”与学工学农劳动的乱糟糟的反差，就认为是学校的责任而贴大字报了。另一部分本来就不愿读书的学生，则当作是郊游“好玩”了。

一个班一个班频繁地下基地，也干扰了工厂的生产。上海师大二附中由于所在长风区厂小，一校挂钩8个厂，带过学生的生产工人多达600多人，比教师总数多几倍。如华丰钢铁厂张师傅，从70届起，到1976年初已带过17批学生，35人次。一

① 上海中国五七中学调查报告：《坚持按照〈五七指示〉办学》，载《教育实践》1976年第5期。

② 刘亚平、毛沙：《我们的一点看法》，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1期。



学生生活作风出问题，半年中他家访 130 余次。<sup>①</sup> 这种热心工人较少，更多工人是不堪其烦。如上海烽火铸造厂是 150 人的小翻砂厂，场地小，设备差，劳动强度高，易出事故。学生来后，出现不少矛盾，妨碍生产，工人议论：“学生不听话，帮倒忙，影响生产，不如叫他们回去”。<sup>②</sup> 上海五七中学与上海棉纺第四机械配件厂挂钩，工人就觉得“工厂是搞生产的，教育革命是学校的事情”，“我们工人一双手，生产任务忙到头，看到 XY 就发愁，何必厂校来挂钩”。学生来厂乱动，工人更烦，说“小爷叔难弄，事体做的不多，麻烦增添不少”，“来学工我们欢迎，不过来的人要个子高一点，力气大一点，事情可以多做一点”。工人自发的朴素的意见，被政治帽子压住了。他们被告知“增添许多麻烦……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这个大‘麻烦’”，如果不“帮助他们转变思想”，“学校出‘废品’，党要变修，国要变色”。<sup>③</sup>

## 2. 校办厂场

学校办工厂、办农场早已有之，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即有校办工厂，主要作工科实验用。1958 年经提倡，大规模搞起来，全国所有大中小学均办工厂、农场。先是作为勤工俭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解决一部分办学经费，后来主要作为学生劳动锻炼、改造思想的政治教育基地。改革开放以后，学校仍沿袭过去传统办工厂、农场，但主要意义在于创收以补办学经费不足，学生也不再参加校办厂场的义务劳动。

① 上海师范大学二附中党支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学工》，载《教育实践》1976 年第 5 期。

② 《工人师傅上讲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94 页。

③ 《管好教育革命是工人阶级的责任》，载《教育实践》1975 年第 3 期。

所以严格说来，校办厂场不能算“文革”的“新生事物”。但“文革”时期的校办厂场，也有自己的特别之处，这就是在某些地区、某一段时期内，学校的生产劳动喧宾夺主，已取代“以学为主”的地位了。

当然，校办厂场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创造了一定物资财富，增加了教育经费，其科研成果甚至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比如广东吴川县塘掇公社上杭小学1973年办生物防治站，繁殖寄生蜂1050万尾、杀螟杆菌42斤，支援大队，生物防治区达79%，比药剂防治区增产10%。同年搞“甘蔗上山”试验田20亩，使一向因田少而不种甘蔗的上杭大队，也在山地开荒种甘蔗250亩。<sup>①</sup>

但是，凡校办厂场生产成果大的地方，往往把学生当作劳动力使用，使他们荒废了学业，几乎把学校办成了工厂、农场。如广东屯昌县全县中、小学办农场有田12564亩，中学生人均8分田，小学生人均4分田，竟超过江浙许多地方的农民人均占田量。其中甘蔗田6763亩，年产3万吨。劳动时间安排：平时每周一天半（学生在校6天，占1/4），双周再加上星期日劳动一天（占用休息日1/2）；每天还有“来来回回”、“星星点点”的“爱农劳动”活动；每学期另有农忙半个月以上的集中劳动和临时组织的“大会战”。要求学生像贫下中农“两个6点（早6点出工晚6点收工），中午不休息，晚上加一班”。要求教师“既是教师，又是生产队长”。学校“既是学校，又是生产队”。选“像生产队长一样的人去当校长”。“教育局成了农业局、甘蔗

<sup>①</sup> 吴川县上杭小学：《小学也能搞科学实验》，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4年第6期。

局”。上级检查学校，“不进课堂，只看农场”。弄得“教师不像教师的样子”，“学生成了种甘蔗的土技术员”。农民说“现在种甘蔗，我们农村比不上学校”。这种做法受到一些校长教师的抵制，这些人“你叫他搞教育革命，他也可以在那儿装腔作势地搞一下；但如果有人叫他诉教育革命的苦，他也可以把教育革命说得一团漆黑”。这些人被撤职了。发动群众批判所谓“教师留恋旧一套”，“午睡散步两件宝，知识分子少不了”，宣称“以学为主不是以书本、课堂为主，那是‘智育第一’，三脱离老路”，“生产劳动是个宝，改造思想少不了。旧知识分子文房四宝：笔、纸、墨、砚，现在劳动四宝：锄头、扁担、粪筐、砍刀”。<sup>①</sup> 屯昌县这个“教育革命”典型影响广东全省。1977年高考，广东一个地区应届生2.6万人，只有1.4万敢应试，结果初选上线仅9人，录取6人而已。2.6万高中毕业生，只有6人符合进大学的文化要求，应当说这是教育的大失败，其损失足以抵消学生劳动创造的物质价值。

到1972年，辽宁全省学校办厂办场共3.7万个。勤工俭学收入5064万元，相当教育经费的9.8%。<sup>②</sup>

到1974年，黑龙江全省学校共办1400多个工厂，11600多个农场，1300个林场，300多个畜牧场，150多个果园，68个养鱼池。其中泰来县平洋中学办了一个农机厂，农场有地550亩。宾县经建公社头道中小学17名教师，300名学生，造出70多

① 陈玉益：《学校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5年第2、3合期；广东教育局调查组：《屯昌改革在前进》，载《新教育》1975年第5期；岑枫：《“屯昌教育革命经验”应当否定》，载《新教育》1978年第9期。

② 钟晓：《中小学教育革命取得新进展》，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1期。

亩。木兰县红星公社松滨小学，仅有7个教师、131名7~12岁的小学生，种地35亩，以致当地群众批评“小学生种地是瞎扯”。于是发动大批判，说这是“阶级敌人”的攻击。<sup>①</sup>

各地都有不满学校大办厂场、尽让学生劳动的议论。江苏铜山县大黄中学就有人说“农村学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天天接触贫下中农，随时随地参加生产实践，他们缺的是文化知识”。<sup>②</sup>云南富民县罗免公社马场小学让年幼的小学生去开荒，当地干部、家长非议说“学生到学校种地不如回家务农”，“有的家长一到学校劳动时间就不让学生上学”。<sup>③</sup>

校办厂场有两种指导思想存在，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一种是专以体力劳动来“转变学生思想”，“改造教师资产阶级世界观”，凡这样做的地方，都十分“左”，想当政治样板，师生的对立情绪也大，因而大批判也多，劳动的成果也少，几无经济效益，师生的劳动被政治表演浪费掉了。这种欲作典型的学校不多，更多的学校带有务实的目的。江苏泰兴县张湾中学就“有人希望通过校办厂（场），多赚些钱，搞好学校的物质条件”，并且按市场原则主张停办无价值的920农药厂，改办有销路的玻璃厂、砂轮厂，取消挂钩厂队的劳动，只办厂抓钱。<sup>④</sup>这种思路，与以前勤工俭学和新时期校办企业创收是一脉相通的。虽也受批评，但抓物质生产比抓教育、智育保险多了，有了成绩可以改写事实，贴上“政治意义”而上报呢。

① 薛工田：《坚持开门办学，反对复辟倒退》，载《黑龙江教育》1974年第4期。

② 《面向农村改革中学教育》，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页。

③ 云南省富民县马场小学：《坚持开门办学，促进山区教育普及》，收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好》，云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④ 江苏泰兴县调查组：《开门办学道路宽广》，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4期。

山西模范县昔阳也不例外，也看重经济。全县学校办厂 176 个，办农场面积 3970 亩。1973 年全县勤工俭学收入 10 万余元（经济效益仍是低下的），相当于全县教育经费的 16.7%，超过学生应缴学杂费总数。98% 的学校全免学杂费，60% 的学校免书、文具费和部分医疗费。<sup>①</sup>

广东崖县崖城公社水南第一小学，农场有田 20 亩，种有水稻、甘蔗、高粱、玉米、番薯、橡胶、胡椒、香蕉、椰子、菠萝、荔枝、蔬菜，还养鱼 3000 尾。四年级以上小学生每周劳动两个下午，定期参加双抢、开荒造田、农田基本建设。低年级参加小秋收，做好事。一年级语文课本是《农业学大寨》，四年级讲乡土教材《甘蔗花有性杂交育种》、《甘蔗高产栽培》、《水稻良种培育》。实际成了农业职业小学，半工半读，太低龄化了。不过，该校实现大部分经费自给，农民子女入学率达 98%。<sup>②</sup>

到 1971 年，吉林省学校有校办工厂 1619 个，年产值 5037 万元，接近教育经费的 10%，部分地解决了学校办公费、学生学费和书本费。<sup>③</sup> 该省以怀德为勤工俭学的模范县。该县双城堡公社中学有一千多学生，自 1970 年起，一年开荒 600 亩，4 年共收粮 26.6 万斤。造林 340 亩，种树 80 万株，收菜 22 万斤，总值 7.8 万元。除教师工资之外，做到办公、取暖、维修校舍、购设备、学生伙食五自给。1970 年范家屯一中办厂一个，有 21 台机床，生产 1511M 型织布机踏盘，供本省 40 多家纺织厂用。有

① 昔阳县委：《加强党的领导，依靠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载《山西日报》1974 年 8 月 30 日。

② 广东崖县水南第一小学：《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早期结合》，载《新教育》1975 年第 6 期。

③ 《吉林省教育大事记》，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1971 年条目。

35名工人，另外每天安排一批学生学工，前后达7000人次。学生有4000人学会翻砂，2100人学会钳工，1550人学会冲磨。工厂收入解决了学校办公、维修、购设备。秦家屯公社丰源大队小学仅有13名教师，201个小学生，办了三场。小农场开地两晌7亩，年收粮万斤。小工厂修农具230件。小饲养场每年出仔猪450头，肉猪7~8头，年收入2万元，自建了校舍。<sup>①</sup>

上述数据，根据笔者的采访调查和经验推测：一是校办工厂产值和农场田亩数有较大水分，二是校办农场的田亩多系行政命令无偿调拨的农村社队的土地，其产出效益大大低于农民经营；三是校办工厂和校办农场都雇有工人和农工，生产以他们为主，学生劳力为辅。

上述学校的师生劳动创造了经济价值，其意义不能抹煞。问题一是不该让小学生过多过早去从事生产性劳动，二是普通中学也不该让学生靠劳动实现经费自给，这不利学生身体和学习（当然职业、技工、半工半读学校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培养目标不一样）。教育应主要靠国家和社会投资，青少年在转变为社会劳动力之前应该是消费教育而不是产出价值。

### 3. 临时任务劳动

临时任务劳动，任何时代都可能向学校学生提出，只要社会有此紧急需要。同时，要求学生参加校园的和社会的公益劳动，也一向如此。但“教育革命”中，常组织“转变学生思想”和“改造教师世界观”的“左”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各种突击性劳动。如广东屯昌县竟每年组织一次全县高中师生参加

<sup>①</sup> 吉林怀德县教育局：《勤工俭学发展教育事业》，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农业学大寨大会战”，随意命令停课，把师生拉上工地。开始也是有人抵抗的，县委常委班子9人就有5人反对，说不能随便打乱学校教学计划。但主要领导人不认为这是正常工作分歧，认作是“阶级斗争”，“实质上是开门办学还是关门读书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种教育思想斗争”，不在常委中开会讨论而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发动下面的公社书记展开大批判，说“怕打乱教学计划，就是怕打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结果把全县高中师生拉出去，1971年重建东岭水库，1972年修新昌水库，1973年开教育坡，1974年在雷公滩开荒造大寨田。<sup>①</sup>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反映了当时一般领导对学校师生参加劳动的看法。这种参加当地工程劳动、修建校舍劳动、临时搬运是比较经常性的劳动。

#### 四、削弱“主学”文化课

“五七指示”说：“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但在“教育革命”实际中，顺序却被颠倒过来：“批判资产阶级”即“阶级斗争上课”是最重要的，“学工学农学军”即“生产劳动课”是第二主要的；而作为“主学”的文化课倒是最不重要的。谁提倡努力学文化，就批谁“智育第一”、“知识私有”、“读书做官”、“文化至上”。前引某领导公开歪曲“五七指示”，说“以学为主不等于以书本、课堂为主”，就是一例。上海市二中自1974年批林批孔到1975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水浒》运动，一年多时间竟5次批判“智育第一”，说“认清了什么时候批判‘智

<sup>①</sup> 陈玉益：《学校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5年第2、3合期。

育第一’，什么时候教育革命就前进”，而“放松批判‘智育第一’……教育革命的胜利就得不到巩固，有人就会出来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sup>①</sup>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校长、教师都形成共识：“文化课不抓没错误，抓倒要犯错误。”<sup>②</sup>“以学为主”遂成空话，只能是运动为主、劳动为主了。为防止文化课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为防止学校学文化会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工农，因而对文化课教学实行了最大最彻底的“革命”——走出学校，开门教学。

### 1. 开门教学

开门教学也使学生接触了一些社会实际，但总的效果是荒废了学生的学业。如北京师范大学1974年5~7月，200名教师领600名学员去工厂、农村、军营开门办学；1975年3月派出1500人，分散到北京9个区县的100多个生产队和厂矿开门办学。后来的总结是“只开门，不办学”，“造成了教师业务荒疏，学生不刻苦学习”。<sup>③</sup>

开门办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请进来”，一种是“走出去”。

先说“请进来”。前面已讲过①选调工农兵充实改造教师队伍；②聘请工农兵讲师和兼职教师上政治课及文化课；另外还有③临时请老工人、老贫农作政治报告和上实践课。上海中国五七中学从1968年到1973年，5年中先后请了棉纺机械厂、曹行公社、徐汇区清洁站、永嘉街道等单位的工农兵25人作固定教师、42人作临时教师，讲政治、写作、针灸推拿、制药、木

① 《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载《文汇报》1976年1月24日。

② 高歌：《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载《教育实践》1975年第3期。

③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74年7月条目。



工、缝纫、电机等。<sup>①</sup>广东龙川县老隆公社五七小学二年级教《白毛女》一课，请贫农老大娘到课堂讲解成语“牛马不如”。<sup>②</sup>“请进来”占用课时不多，也能给学生带来一些实践知识，但由于强调其政治意义而往往安排不当，对正常教学带来一些冲击。由教师和老贫农合上，把算术课上成政治课。由于教师精心设计和主持，算是成功一例，课堂未乱。

关于“走出去”。本来古今学习都强调静心聚神、收视反听、独处沉思，这是符合教育学习规律的。因此才有了课堂和教室。“教育革命”要打破这种学习规律，让学生“走出去”。于是组织大队学生外出活动，学生年小又无军队纪律性，交通行路和组织管理占去大量时间，而收获很小，而且“出而心野，归而神散”，对学校秩序和教学破坏殊烈。1973年上半年上海中国五七中学竟组织学生到67个单位搞了91次开门实践活动，造成“今天这个班级出去，明天那个班级出去；今天这个教师要调课，明天那个教师要调课，上上下下，进进出出”，一团混乱。后来不得不减少开门办学次数，规定一个班一个学期只出去两周时间。<sup>③</sup>

至于开门教学的效果，由于主观上不是从学习知识出发，而是从“以实践经验贬书本理论”的政治目的出发，而客观上生产单位并非教育机关，并不具备起码的教学条件、合格的教师和基本教学经验，所以开门教学多数成为“热闹闹、乱糟糟，大呼隆，大糊涂，进进出出，谈谈笑笑”。如广东一个中学教几何制图课不在教室讲，却把学生全拉到公社发电厂现场教学，

① 《坚持开门办学的正确方向》，载《文汇报》1973年9月26日。

② 《开门教学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4年第3期。

③ 《坚持开门办学的正确方向》，载《文汇报》1973年9月26日。

40多人挤满电机房，围着一台小机器，多数人看不到，“结果有的学生逛街去了，白白地浪费时间”。<sup>①</sup>

文化课的各科都搞“开门教学”。本来语文选用的教材都是政治性的、思想性的，都是“文以载道”的，课堂上既可讲清“道”，又可讲清“文”。但是当时认为，关起门来，以课堂、教师、书本为中心上课可能会以“文”害“道”，所以不管需要不需要，把学生一放，“走出去”，到实践现场“上大课”。广东增城县三江公社溪头小学的戴帽子初二班是如此“改革语文教学”的：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洒满阳光的宽广道路》两课，领学生“走出去”访知识青年黄秀如，大家“一起批判了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习《五指山上大寨花》一课，又“走出去”参观西水生产队的农田。学习《首次上阵》一课，“走出去”找到妇女队长姚转娣讲斗争事迹。上《收租院解说词》一课，“走出去”叫老贫农忆苦。学生不趴课桌，不握笔管学语文。<sup>②</sup>广东龙川县老隆公社五七小学的戴帽子初二班上鲁迅的《文学与出汗》一课，组织学生和贫下中农开批判“人性论”的大会，一贫农讲课，说我是贫农哥是富农，借粮不给，可见没有亲情只有阶级情。初一上《小小山村换新天》，“走出去”，到隆南生产队去参观。<sup>③</sup>

上海一所小学批判过去上政治理论课是刘少奇的“闭门修养”，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一课，“走出去”到木材厂，听工人讲“我国造第一块人造纤维板的（路线）斗争过程”。批判过去文化课是凯洛夫“密封罐头式”的“三脱

① 邓镇郁：《我在劳动磨炼中的变化》，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5年第1期。

② 《队校挂钩改革语文教学》，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4年第2期。

③ 《开门办学，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4年第2期。

离”，竟把算术的四则运算一课拉到菜场上，请营业员讲新旧社会对比。<sup>①</sup>

广东博罗县城镇四小教二年级“米、分米、厘米的认识”一课，方案哗众取宠而效果少慢差费：①转变思想放首位，让学生走出去到工农兵战斗岗位去学习阶级斗争觉悟；②学习毛主席“认识从实践始”，批林彪“天才论”，批孔老二“生而知之”，教育学生“如果不走出去学习‘米尺’的知识和用途，我们今天会不会用‘米尺’量出小农场生产的甘蔗和书桌等有多长？”③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商店、部队医院调查工人用什么量墙基，农民用什么量土方，售货员阿姨用什么量布。<sup>②</sup>

上海宝山刘行中学高二数学“幂函数”中“极值”一节，本来比较抽象，需课堂上多讲，却“走出去”参观生产队的氨水池，测量求容积，然后提问如何以最少材料造最大池。这完全可凭学生生活经验在课堂上解决，或者画图纯粹进行数学抽象。结果现场农民也无法帮学生建立“极值”概念，只得回来在课堂讲。讲后又耍学生“走出去”再看氨水池。这纯粹为“开门”而“开门”。<sup>③</sup>

开门办学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增加经费开支、干扰生产，尤其是批林批孔中开门办学声浪愈大，以致国务院科教组不得不于1974年9月29日与财政部发出联合通知。通知要求：①本地区就近安排；②能在校内安排的，就不要给挂钩单位增加困难；③纠正借开门办学名义游山玩水。

## 2. 取消考试、开卷考试、开门考试

① 《一所坚持开门办学的小学》，载《解放日报》1973年12月12日。

② 《算术课要实行开门教学》，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4年第2期。

③ 《按照农村三大革命运动需要改革教育》，载《文汇报》1974年12月23日。

“教育革命”初一度取消考试，学生呼万岁，到头坑了自己。大批判文章攻击考试尤烈，称“考试是资产阶级对工农子女专政”，“分数线是对工农子女的封锁线”。这是“阶级斗争”逻辑的滥用，照这个逻辑也可以反过来说“取消考试和评分是对工农子女的坑害，诱使他们不学文化”。

后来恢复了大大降低要求甚或全无要求的考试，但仍讳忌“考试”之名，改称“文化考查”，或称“开门考试”、“开卷考试”。这种开门考试、开卷考试大都预先多日出题，可以抄书，可以讨论，可以互抄，教师提供答案任抄，等于取消考试。

1972年，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五七中学在调整教育时曾恢复考试，高一语文考试出了有一定难度的题，还宣布纪律：不准看书，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两人同出解便，不准超过时间。学生当场就起哄，说不符合毛主席教导。教师批评学生胡闹，宣布扣带头闹事者10分。学生便贴大字报，迫使校长批评教师。不久高一考化学，教师出题后把每题答案报出，让学生照抄。接着高二考政治，教师提前公布试题：《用毛主席〈实践论〉的基本观点批判林彪唯心论的“天才论”》。这次开卷考试又有“特色”，教师不仅让学生翻书，还辅导启发，讲解《实践论》基本观点，介绍有关资料，结果写出来的答案全班一个样。评分也有“特色”，师生同开批判会，学生上台讲，师生共同评分，“把试场变成大批判战场”。<sup>①</sup>

广东韶关市一中初三把学生拉到柴油机厂金工车间搞“开门考试”，出的题是：“运用识图、列方程、解应用题的知识，自选零件，自编题目，自画图纸，自己分析计算”，然后“交工

<sup>①</sup> 《考试问题上的反复说明了什么？》，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4年第6期。

人师傅鉴定，最后师生共同评分”。结果有的学生连一道简单的题也编不出，而编出题的根本不用下工厂。<sup>①</sup>

开门考试的花样很多，可参看上节“贫管会状况”所述河北威县辛店学校的情况，大多突出政治性、实践性，而失去检查文化学习的意义。又如湖南临澧县一中高二由师生共同讨论语文考试的改革办法，决定开门考试：学生“写一篇批林批孔文章，开到工农兵中去参加批林批孔战斗”。成绩由“工农兵群众和教师、学生三结合评定”。

步骤是“两出两进”：教师先讲孔子是什么人，然后带学生“走出去”作社会调查；回来查抄报刊大批判文章，教师再讲写批判文章的知识。写好文章后“又分组到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并请工农兵对同学们的批判发言，作出评论”。

他们在总结中认为“开门考试”，是贯彻了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的指示，是理论联系实际，改变了学生思想感情，“有的学生对孔老二恨不起来，这次通过和工农兵一道批判——越批对孔老二越恨”。

这个“开门考试”，只是开门而并非考试。开门只是驱使学生去作运动工具而已。<sup>②</sup>

### 3. 突出政治性与实用性的课程与教材

“文化大革命”之初，首先将中小学政治、语文、历史课停掉，改上毛主席著作和语录。1968年中小学复课以后，中央教育部不存在，全国没有统一的教育行政领导，各地自行其是。

① 韶关市一中教学改革组：《在开门办学中改革旧的考试制度》，载《教育革命参考资料》1974年第6期。

② 《一次语文考试的启示》，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6期。

课程与教材的特点是“五花八门，一年一变”，下面所举是比较统一的、存在较长时期的课程。

数学与物理删减后插入工业基础知识课中，主要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

化学与生物删减后插入农业基础知识课中，主要讲四大作物（粮、棉、油、麻）。

语文、音乐、美术合并为革命文艺课。

政治、历史、语文合并为毛泽东思想课。

外语，先是被取消，1972年以后只有部分地方的部分学校恢复外语课教学。

体育，改为军体课，以军训代替体育。球类、田径、体操一度取消，口令也以毛主席语录代替“一、二、三、四”。

本来中学的十多门学科，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接受中等教育所必备的知识结构而安排的科学体系，现在砍得只剩4门课，实际只有两门：工农业生产与政治及为其服务的文艺宣传。

至于大学，开始时要不要办文科都成为问题。陈伯达就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设置曾说过“中国人还学什么中国语言？这门课我看可以取消”。“我看历史系一点用也没有”。“文科要不要可以考虑”。<sup>①</sup>后来恢复了文科，则是按“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任务”来安排课程的，基本上是一门阶级斗争课。理工科是按生产上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来安排课程，基本上是一门生产斗争课。

突出政治、突出生产实践，取消基础理论、取消基本知识，是一切大、中、小学“改革”课程、“改革教材”的共同点。具

<sup>①</sup> 季啸风：《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回顾》，载《人民教育》1979年第6期。

体方案则一个地方一个纲，不同学校不同样。而且，不同时间也不同样，总趋势是“斗批改”初期狂热乱改，各自标新立异，“斗批改”中后期发生“逆转”，“左”渐降温，走向务实，“渐趋统一”。到1972年则大部“复旧”，“教育革命”被悄悄否定，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重新独立分设。但在“反复旧”、“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斗批改”初期的一些花样又重新搬出来表演了一阵子。

如广东屯昌县把1972年以来中学已经恢复的12门传统学科又精简为政文（政治语文）、数理、农化（农业知识和化学）、军体4门“公共课”，再加设农田、三机一泵、红医3门“专业课”。<sup>①</sup>连平县中信中学则把“公共课”去掉数理，减为3门，“专业课”则开出4门：农村文化、农村数学、农村测绘、畜牧水产。他们列举政治与语文重新合科的理由是：①文科要引导学生学习马列，如果把语文作为“学知识的工具（学科）”，就会“贩卖资产阶级的政治”；②文科要开门教学，上政治、语文课都下去，时间安排上有冲突，而其参观的内容几乎是相同的，都是批资批修，不如合一；③两门教材的内容往往相重复，都选了相同的毛主席文章和大批判文章。<sup>②</sup>

至于教材，整个10年“教育革命”几乎年年变动，文科尤烈。如前所述1966年6月，中小学政治、语文历史教科书停用，改上毛主席著作。1971年在教科书中清除林彪“突出政治”的内容。1973年3月18日国务院科教组发通知，将毛泽东复李庆霖的信、李信、张铁生答卷、编者按编入中学课本。11月6日

① 广东省教育局调查组：《屯昌教育革命在前进》，载《新教育》1975年第5期。

② 《中信中学政文合科情况调查》，载《新教育》1975年第6期。

科教组按江青7月12日批《三字经》的批示发出通知，检查大、中、小学教材，一要反映“文化大革命”成果和批林批孔的要求，二要将《论语》、《神童诗》、《三字经》、《女儿经》节选批注编入中小学课文。<sup>①</sup>又允许中学自编自选教材，所以实际上没有统一的教材。中学文科教材虽不统一却都无特色（工农业课本有地方生产特色），千篇一律突出政治、突出运动。广东连平县中信中学1975年的政文课教材内容是这样的：①总共49课，马恩列毛文章计30篇，其余19课又分为三部分；②时文，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论文，报刊大批判文；③转变学生思想的文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迹；④鲁迅文章、法家文章、儒家等“反面教材”批判。<sup>②</sup>

中学理科教材的所谓“改革”，一是把应用题用政治术语表述，诸如“地主收贫下中农租谷若干”，“民兵行军速度若干”之类；二是删除取消“难而无用”的公式定理。

大学理科教材由于面向初中程度的工农兵学员，删繁就简，删高就低，程度大大降低。实际上自然科学理论体系并无阶级性，当时却提出“要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旧学科教材体系”，要求把高等数学“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公式”，“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让“高等数学又回到我们劳动人民手中”。清华大学教师早在1965年讲微分积分时就举钳工锉圆实例加以说明，这时却胡吹什么“工人一把大锉就捅破了微积分的窗户纸”。所谓“突出政治性”、批“洋奴哲学”，只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973年11月条目。

② 《中信中学政文合科情况调查》，载《新教育》1975年第6期。



不过是把牛顿定律改为“运动定律”，不提牛顿—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之类而已。<sup>①</sup>

大学工科教材则打破理论性，突出实用性。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对旧房建专业的教材体系进行了剖析，它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践，违反认识规律，课程多，分科细”，“强调本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于是1969年9月开始，把原《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测量学》、《建筑材料》、《建筑构造》、《建筑施工》5门，合并成《房屋建筑工程基本知识》一门。总量为1000课时的教学减为课堂250课时完成，另搞250课时生产实践。强调在于中学，重复前人“从个别到一般”的摸索过程，把前人通过多少代人实践总结出来的科学体系，拆个鸡零狗碎，从头“实践认识”。<sup>②</sup>华中工学院机械一系的机械原理教研组、机械零件教研组与机械二系的锻压教研组拼合为一个教材编写组，1971年6月将原《曲柄压力机》、《机械原理》、《机械零件》3门教材，合并为一门《曲柄压力机》，220课时减为150课时。当时就有教师认为“削弱了基础知识，是实用主义的表现”，并预言“寿命不长，要不了多久时间，还会恢复原来3门课的”。编写组自身也感到“拿不准”，但是让大家学了“学制要缩短”，“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教导以后，只好表示“这条路子走得对”。<sup>③</sup>

① 清华大学理论组：《一个修正主义的教育纲领》，载《人民教育》1975年第6期。

② 《文汇报》1973年3月23日。

③ 华中工学院：《以批修整风为纲，进一步学习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7期。

### 第三节 文化平均主义的新学制<sup>①</sup>

“教育革命”新学制的最大“革命”，就是“革”去了高考招生制度。正如当时文章众口一词所说：“七·二一指示”拦腰斩断了“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阶梯，打碎了“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的“精神贵族梦”，实现了“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取消了对工农兵子女的“考试专政”和“分数线封锁”，因考试和分数而造成的“不平等”就废除了，从此学生没有学业优差的区别，学习上的竞争消灭了，学习不再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而是轻松的游戏。可是，平均主义虽对于学习上的懒惰者是公平的，但对勤奋者却并不公平。缺乏学习条件的人可以不必经严格的考试筛选而上大学，固然是一种平等；但大学招生数少于“文化大革命”前，并非人人不考而可上，考试的竞争就蜕变为关系和权势的竞争，另一种不平等又悄然出现了。这是发出“七·二一指示”、终生为消灭不平等而奋斗的伟人所始料不及的。当着社会经济条件还没发展到普及大学教育的时候，企图在现阶段就“缩小”和消灭差别，把将来历史阶段的任务（“人人是大学生”、“人人当艺术家”之类）提前实现，只能沦为空想而有害现实。

新学制以“推荐上大学”为核心，把以前普通中学的二元教育变为一元教育，充分体现了文化平均主义的特色。以前中

<sup>①</sup> 杜楠：《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一书首次使用“文化平均主义”概念。

学的二元教育是：思想教育鼓励上山下乡，文化教育鼓励升学。这体现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这个口号，提出“一颗红心一种准备——上山下乡”。上大学是不该想的事，越是“大学迷”越不能让读大学，只有不想上大学而要永远扎根农村的人才够上大学的条件。到新时期“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再次复活，说明它是有生命力的。因为这个口号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三大差别”的现实，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理论也反映了这种国情。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学生人才，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又不能满足人人上大学，所以必须有两种教育制度的分流，通过小学分流，初中分流，高中分流，少数人读大学，多数人分流到劳动准备学校（职业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农业学校）和直接劳动岗位。

新学制脱离国情，不仅不允许两种教育制度，也不允许普通中学的二元教育。它建立起单纯的一种教育制度——普通中小学学制，实行单纯的一元教育——思想劳动教育。这样，全国中等教育只有普通中学这一种类型，全部普通中学又都办成政治—劳动学校这一种模式。

### 一、单一结构的中等教育

1905年新政废除了科举制，传统的一元的士大夫教育结束了。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首先是大学文理工医农师的分科，后来中等教育也多元分化。不仅有中等专科学校、中等师范、高中附设师范班、职业班，还有半工半读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出现。1915年黄炎培赴美考察职业教育工读学校，回来大力介绍、大力引进，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推进中国职业教育，办了不少职业学校，

实行工读结合、半工半读。到 1925 年，全国已有职业学校 167 所。<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包办一切，教育也走向大一统，中等教育渐趋于全日制的普通中学一元结构，而职业教育萎缩了，主要由厂矿企业自己培训学徒。1954 年和 1957 年相继出现大批初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就业升学问题，暴露了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缺陷。1958 年对此进行反思，提出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以节约教育经费用于扩大办学规模，扩办的学校主要是职业性的、半工（农）半读的农业中学、工业中学、手工业中学、劳动大学。刘少奇对此进行理论概括，提出社会主义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一是全日制的普通大中小学，一是半工半读的中小学，前者主要培养建设人才，后者主要培养工农劳动力。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教育工作指示，提出“多种形式办学”。其含义一是纠正国家包办教育，允许民办、群众办、企事业单位办学；二是纠正中等教育单一结构，允许多种类型学校并存，此时尚未提“职业教育”一词，但 1958 年出现的大量农业中学、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劳动学校都具有职业学校性质。但由于搞“教育大跃进”，一哄而起，绝大多数农中、红专学校和劳动大学都在困难时期垮掉。辩证地看，以“多种形式办学”来改变单一结构的中等教育，其方向是对的，而且在教育理论上重大收获，这就是刘少奇的两重教育制度理论。

由于“教育大跃进”的失败，导致“多种形式办学”的失败，中等教育的单一结构没有改变，尤其城市青少年都挤在全日制中小学读书，升学就业问题，再次发生紧张。国家采取的

<sup>①</sup> (美) 吉·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65 页。

对策，一是扩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是再次提出职业教育问题。1963年10月18日周恩来召集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和各行业部委联席会，第一次提出就中小学职业教育问题进行讨论，发动工交、财贸、厂矿有步骤地创办职业学校。1964年各省都创办了一批城市各类职业学校，大多实行半工半读。这年七八月间，刘少奇再次宣传两种教育制度理论，由此掀起了“文革”前夕大办半工半读学校的高潮。这次办学高潮比较谨慎，没有像“大跃进”中那样一哄而起。缺点是宣传上有浓厚的“左”的色彩，拔高半工半读的政治意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防止出“精神贵族”等等）；而资金、师资投入不足，学生入校单纯进行体力劳动，很少学到技术文化，又无职业出路，以致再次复办的农中招生困难。

“文化大革命”一起，“两种教育制度理论”首当其冲，被批为资本主义双轨制的翻版。其实资本主义双轨制比起中世纪一元制的教会、贵族教育是一个进步，它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提出的要求，它给予劳动者教育和技术训练，甚至强迫义务教育、强迫脱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大差别的存在，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现代生产与原始农业并存），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甚，两种教育制度和双轨制都不过是这个社会存在的反映，有相似处并不奇怪。

批两种教育制度造成严重后果，不仅改变中等教育单一结构的努力又一次被打断，而且这个结构发展得更加单一、更加畸形、更加不合理。1964年以来再次兴办的半工半读性质的职业学校、农业学校、工读学校、技工学校、劳动学校被说成是“资本主义训练奴仆的歧视劳动人民的学校”，大多停办或转为普通中学（不合格硬转）。而普通中学又被说成“培养大学迷和

精神贵族”的学校，被改造成以学政治、搞劳动为主的政治学校、劳动学校。全国的中等学校趋于一个模式，大删大砍以前的中学课程，只培养一种劳动者——“立志上山下乡的新一代农民”。

这大大降低了中学的文化要求，也大大降低了办学条件（师资可滥、设备可无、经费可欠），各地由此一哄而起，中学膨胀，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后来更不切实际提出“城市普及10年教育，农村普及7年教育”。<sup>①</sup>由于师范学院停办几年，无师资来源，膨胀起来的学校只好“小学教师教中学，工人农民教小学”，“小学毕业教小学”，“中学毕业教中学”。贵州省小学骨干教师几年中全部调入中学，小学教师合格率由1965年的70%下降到30%。<sup>②</sup>广东省小学教师调入中学的达8万人之多。<sup>③</sup>

膨胀中学，停办职教，“教育革命”中形成一种极为畸形的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1976年普通中学在校生为5836.6万人，其中高中段1483.6万人，而中专、技工、农中、职中等类学校在校生与高中生之比仅为1.16%。而1965年底，全国高中段在校生273.1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130.8万人，仅占47.9%；而中专54.7万人，技工学校10.1万人，农业高中职业高中77.5万人，合计142.3万人，占52.1%。1965年底全国初中段在校生1169.1万人，其中普通初中803万人，占68.7%；而农业初中、职业初中、初级师范等各类职业学校366.1万人，

① 《关于1974年教育事业计划（草案）的通知》。

② 《中国教育年鉴》地方卷（1949~1984），第1053页。

③ 《中国教育年鉴》地方卷（1949~1984），第906页。

占 31.3%。<sup>①</sup>

高中本来具有大学预科性质，“教育革命”斩断了高中与大学的连续性，高中即失去特定的培养任务，其数目却如此膨胀，真是一大怪事。这是大批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理论、大搞文化平均主义带来的恶果。这种极其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以平均主义的文化要求，教出只有一种模式的“新型劳动者”，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多方面多样化的需要。

1972年后，中等师范和中专学校渐渐恢复，但招的不是应届初中毕业生，而是像大学一样选拔工农兵学员，数量又少，对于改善中等教育单一结构作用不大。

## 二、自发转向职业劳动教育的普通中学

如上所说，当时普通中学既不培养通晓文、理各种一般知识的大学后备生源，又不针对社会各行各业劳动需求培养职业技术劳动力，只教育学生“反修防修，将来上山下乡务农”。这种以政治为主的教育，不能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所以当时学校普遍出现两种务实的倾向，一是悄悄恢复正规化文化教育，一是公开实行职业劳动教育。前一种倾向一直循环在“运动之中受批、运动过后复萌”状态，后一种倾向则基本受到鼓励。因为它在政治上与学工学农的要求一致，又纠正了前一时期务虚倾向：只追求轰轰烈烈的政治意义，而实际上学工学农无组织无要求无实效。这种自发开设职业劳动教育的趋向，是断了与大学教育接轨的普通中学的一种务实选择，又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也能为广大学生和家長接受，而以历史眼光看，它上承

<sup>①</sup> 《中国教育年鉴》总卷（1949~1981），第172页。

民国时期和共和国 17 年时期正在发育成长的职业教育，下启新时期蓬勃发展遍地开花的职业教育。所以笔者认为应予适当的肯定性评价。下面收集了部分中学的情况。

江苏扬州地区从 1970 年开始在中学试开农村机电课，到 1974 年共有 348 个中学开设了农村机电课，占中学总数的 71.3%，并准备一刀切，全面铺开。当时有争议，有些中学认为普通中学属于基础教育，应给学生打文化基础。这些意见是对的，但没有顾及高中段的职教分流。而一刀切、全面铺开职教，又取消了普通高中的存在，二者皆有片面性。但在“教育革命”中，普通高中名存实亡，而中等职业教育名实俱无的情况下，以“学工学农”为政治外衣，发展起依附在普通中学的职业教育，毕竟是一种务实的努力。1974 年，扬州鲁迅中学开设三机一泵、农村会计、针灸等职业课。大丰县三圩中学同年开设农机、农技、会计、卫生四员训练班，113 名毕业班学生可分选一门专业学习。东台县时埝公社五七中学自 1969 年起，先后开设过机电、农校、兽医、赤脚医生等等 10 个专业培训班，大体保持两个普通班、两个专业班。该公社 80 个生产队已有三机一泵；全社猪 24 万头，牛 700 头，只有兽医 5 人，不敷其用，专业班的开办适合了当地需要。苏州第九中学开专业课 6 门：会计测量、机电、农业化学、木工、气象、卫生，每人可选一门。办成“普高不像普高，技校不像技校”。<sup>①</sup>

上海南市区 27 所中学到 1974 年，共举办拖拉机、柴油机、脱粒机、收割机、水泵、农田、四大作物栽培、土记者、测量、

① 《面向农村改革中学教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58～66 页、第 80 页、第 86～92 页、第 109～116 页、第 118～119 页。



饲养、会计、赤脚医生、针灸、中草药、兽医等 20 个专业短训班，办了 1040 期，参加人次 26400 余，人均 2~3 期。方法是集中培训 5~7 天，然后下生产队边学边实践。据称有 5800 多学生学会开拖拉机。<sup>①</sup>

上海崇明民本中学自办 3 个工场，又与 10 多个工厂、20 多个生产队挂钩办专业技术班，1974 年至 1975 年，两年办班 66 期。计有气象、农具修理、农田、生物防治、医疗卫生、畜牧兽医、农机等专业，培养拖拉机手 150 余人、电工 254 人、机修工 36 人、卫生员 47 人、兽医 9 人。<sup>②</sup>

上海金山县张堰公社秦山大队五七学校自 1971 年 5 月起，办拖拉机、土电工、卫生员、土记者训练班。山阳公社华新大队五七学校、南汇县下沙中学、川沙县古路中学与张江中学也在高中附设专业班，学生或一周一天，或一半时间学专业。<sup>③</sup>

北京密云县二中高中附设农技、机电、红医、写作 4 个专业班，每个高中生必须以 1/3 学时学习某一门专业。顺义县平谷庄中学高中附设政治、农技、卫生、兽医、机电 5 个专业班，高中生以一年时间中的一半学时学一门专业。<sup>④</sup>

山西阳城一中在高中开设农技、水电、机械、蚕桑、果树、医卫、兽医、文艺等专业课，每班只学一门，每周 3~5 课时。<sup>⑤</sup>

湖南临湘县一所中学在高中附设理论、机电、植保 3 个专

① 《中学开门办学的一个新经验》，载《学习与批判》1975 年第 3 期。

② 崇明民本中学党支部：《开门办学就是好》，载《教育实践》1976 年第 2 期。

③ 《上海市郊县部分中学举办专业培训班》，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 年第 10 期。

④ 《北京市中学教育革命的新篇章》，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 年第 10 期。

⑤ 山西阳城一中党支部：《中学开设专业课好》，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 年第 10 期。

业班，高中生以1/4学时学专业。<sup>①</sup>

江西自1958年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坚持每县一所，等次相当职业初中和职业高中，至“文化大革命”没有大起大落，比较稳健。虽也受“阶级斗争”政治影响，但始终以职业劳动训练为主课，半工半读，毕业生或有分配或有所安排，算是别具一格。

### 三、废除重点学校制度

办重点学校，意在集中有限的财力和有限的优秀师资，办好示范性的教育和培养拔尖人材。1953年毛泽东指示要办重点中学。1959年周恩来在二届人大报告中说“应当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教育部陆续确定了一批全国大、中、小学重点学校，各省各地也都仿照确定省地重点学校。1961年教育部党组召开全国重点高校工作会议。1962年12月教育部发出办好一批重点学校的通知，说明办重点学校积累经验、示范一般的意义。到“文化大革命”前，重点大、中、小学遍布全国，重点学校体系已经形成。这一体系呈小宝塔结构：一般学校为底座，筛选出的优生进入初级重点学校（县、区级），优中之优进入中级重点学校（地、市级），尖子生进入高级重点学校（省级国家级），少数尖子学校成为塔顶。

重点学校对开展教育竞争，提高教育质量，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由于国力有限，优秀师资有限，优先照顾重点学校的政策，势必减少对一般学校的投资，

<sup>①</sup> 《一所农村中学的新变革》，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11期。

削弱一般学校师资力量。优质生源集中到重点学校，往往导致对一般学校的忽视，导致教育面向少数人而忽视大多数。因而“文化大革命”批判“小宝塔”并非空穴来风。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使用的武器是文化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错误理论，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差别说成是“阶级分化”，批判“小宝塔”是培养少数“精神贵族”，培养学习尖子是培养“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划分重点学校是办“贵族教育”，搞“天才教育”，重新“对劳动人民子女实行文化专政”，从而根本否定高质量教育存在的意义，根本否定社会有意识培养高精尖人才的必要性。

这一声势浩大的批判，对一批办得卓有成效、声名远播的重点学校打击非常之大。这些名牌学校的富有教育管理经验的专家（学校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和富有教学才华的名教师，惨遭迫害，折磨致病伤残死者不少，队伍失散，设备仪器破坏，多年积累而成的经验、校风、传统，扫地以尽。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是一所重点小学，创办于1909年，位于西单手帕胡同，前身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两等小学堂，有悠久的良好的教育传统。“文化大革命”期间该校办“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展览，拿出示众的竟是拔尖学生“笔迹工整的作文”和“全年无错题的算术本”。<sup>①</sup>

此后取消重点学校，调走骨干，撤消优待政策，按社区就近招生，名牌学校变得毫无特色，消失在大量新办的普通社区学校之中。“小宝塔”结构的学校体系，改造成“水平面”结构，取消了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竞争择校考试，学生一

<sup>①</sup> 杨帆：《共和国的第三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律就近入学，在学校里也禁止划分重点班，废止留级，实现了平均主义的机会平等。

#### 四、盲目缩短大中小学的学制

学制即学校教育制度的总称，广义的学制包括办学体制、教育行政体制、学校体制、教学体制、考试评分制度、升学升留级制度、奖惩制度、后勤体制等。狭义的学制仅指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的规定及其培养任务、入学对象、学习年限。社会教育系统（今称成人教育），放在“群众业余教育”小节讲，这儿只说普通学校教育系统。如上所述，由于大批“两种教育制度”，职业技工类学校急剧萎缩，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结构单一化了，基本变成清一色的大、中、小学校体系。

大学、中学的培养目标只有政治上的笼统要求，没有各别的要求。中学原来的培养任务是两个：劳动后备军；大学后备军。现在取消后一个，只剩前一个。各类大学都不提具体培养目标，师范不提培养师资，医科院校不提培养医生，各类大学都要“办成政治大学”，培养“与工农兵划等号的劳动者”。目标不明，任务不明，造成办学思想的混乱。

最突出的“改革”是缩短学制。“文化大革命”初期激烈批判原来的学制过长。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大学学生致毛主席的信，是集大成的代表作，给当时学制列举十大罪状。说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共17年读书，占去人生最宝贵时间17年，脱离三大革命运动17年，最后必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如果缩短一半学制，学校可以多进一倍工农子女。立论的中心是“读书害人”，多读、长读，为害愈甚。1969年，刚刚复课的中、小学即草率地、一刀切地改变了学制。

原小学4-2分段实行几十年，基本适应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建国后的十几年里，国家没有力量普及小学教育，因而小学分段，先普及4年制的初小，尤其适合了农村的需要。“文化大革命”前虽然几次欲学苏联普及小学5年一贯制，终因师资缺乏及众多农村人口无力读完高小而未果。“教育革命”中由于大幅度降低办学经费，降低师资水平，降低学费，将大多数农村初小升级为完全小学，从而变实行几十年的小学分段6年制为5年一贯制。其结果是小学教育质量大大下降，一部分教学内容转到初中一年级上。新时期后，大多地方仍承袭小学5年制，有的地方一度恢复小学6年制，后又放弃。新时期实行小学5年一贯制，条件比1969年成熟：（1）城市儿童学前教育普及了，在幼儿园阶段已学习过去一年级的算数和识字；（2）农村人口已有经济能力读完高小；（3）师资质量大大提高，初级小学升为完小的条件具备了。

原中学3-3分段6年制，一砍而为2-2分段4年制，与小学5年连为9年一贯制。高中毕业才16岁，实际读书9年，与过去初中毕业相当。过早进入社会，过少读书，9年之中又伴以大量政治运动和劳动，根本学不完高中课程。有论者对此评论说：“学制长短，受多种因素制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修业年限的问题。学制既受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状况的制约。另外，还要看到，学制还受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人的生理发育、成长这一自然规律看，五六岁至十六七岁正是儿童接受与储存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与全面接受德智体教育的最佳时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世界各国的学制虽类型多样，历经改革，但中小学学制一般都在10~12年之间，中小学生在学年龄一般都固定在

6~18岁之间，同时又都适应人的身心发展阶段性，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个主要阶段，中学又多分为初、高中阶段。所以‘文化大革命’中，那种9年一贯制的试验、改革，以及搞4-4制的主张，违背青少年身心的发展规律，缺乏科学根据，纯属随意的主观幻想。”<sup>①</sup>

大学由原来的4年、5年、6年制，改为2年或3年制，相当于过去的专科。入学对象由高中毕业生改为相当于初中文化即可，如此招进的大学生不得不在大学补习中学课程。可以说，“教育革命”10年没有培养一个本科生。研究生制度则废除了。

学生的学习组织形式，也一度由级、班、组改成营、连、排、班军事编伍。

由于缩短中小学学制，降低办学经费，降低师资水平，降低学费，扩大中、小学数目，“文化大革命”中中小学就读率大大提高，形式上实现了全国普及小学教育、大部地方普及初中教育。但这只是低质量的普及，靠牺牲质量，求得数量。新时期不得不对农村村小、队办初中和公社高中进行整顿。质量的提高也牺牲了一些数量，小学数由1976年的1044300所减到1979年的923500所，在校生也由150055000人减为146629000人。<sup>②</sup> 学龄童的入学率由1977年的95%减为1979年的93%；中学数由1976年的192152所减为1981年的106718所，在校生由1976年的58365000人，经1977年的高峰（67799000人），减至1981年的48595600人。其中高中生由14836000人减为7114980

<sup>①</sup> 苏渭昌：《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卷8，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sup>②</sup> 《中国百科年鉴》（1980卷），第568页；《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71页。

人，减少一半多，数目惊人。<sup>①</sup>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学学制由4年改回到6年，公社高中基本上撤销而改为初中。而大学则不同于中、小学，在新时期，高等教育无论规模数量和质量都同时迅猛发展。

### 五、大学分散到农村办学

现代大学于11世纪出现在欧洲，产生于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几百年来，大学一般都依附中心城市或其近地，凭借城市的经济、文化、交通、信息条件，同时也以人文资源反哺城市。“文化大革命”出现一种思潮，认为城市现代文明是“资产阶级罪恶的产物”，城市较优裕的物质条件是“修正主义大染缸”，乡村的艰苦环境和落后体力劳动才是纯洁的、革命的。要“改造旧大学”，就要把知识分子从城里高墙深院轰出去。大连工学院工宣队的文章说“高大的楼房，知名的教授，大量的图书，贵重的仪器，优美的校园，舒适的生活”的大学美景，“掩盖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sup>②</sup>“斗批改”阶段各地都掀起一个把大学分散到农村去办的浪潮。许多大学，校园被占，教师端家，往农村一迁再迁，资料设备图书丢失毁弃，比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向内地的大搬迁还乱。

农业大学首当其冲。毛泽东早在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即说过：“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

① 《中国百科年鉴》（1980卷），第535页，（1982卷），第568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3卷，第134页。

② 邵维忠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容否定》，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4期。

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当时党中央还未将此视为“最高指示”，加之“大跃进”狂热迅即熄火，此事未办。前苏联赫鲁晓夫在同一时期却鲁莽行事，一通命令，全苏所有农学院纷纷搬家农村，可不久又搬了回来，可见行不通。“文化大革命”又将10年前旧议提出来，写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势在必行。北京农业大学先是奉令迁往陕北，后又迁去河北农村。江西农学院干脆被撤销。还有的是搬迁、分散、撤销三部曲。当时，全国52所农业院校，到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以后，撤销17所，搬迁23所（共迁45次），有的连迁4~5次，有的分几处。

校无定址，人无定居，教无定所，人心搬散，校产丢失。福建农学院原在福州近郊梅峰，有农林牧渔综合实验基地千多亩，有寄生蜂、甘蔗、黄麻等专业。1969年搬迁闽北山区，作物单一，土壤成分不同，实验得不出准确数据。这里没有寄生蜂、甘蔗、黄麻，亚热带作物长不了，闽省八大果只能栽活一种。加之农村电压不稳，精密仪器无法投入使用。<sup>①</sup>

沈阳农学院1952年建校，办在沈阳郊区清东陵，是农业部所属8所农业重点院校之一。“文革”前培养7000多名毕业生，他们中的多数成为农业生产、科研、教育战线上的骨干。该校的教育科研设施建设甚为可观，有实验室120个，温室群5000平方米，图书馆藏书40万册，有占地万亩的农、林、牧、果、蔬机械化综合实验农场，有占地百亩、培植400余种树木的植物园。沈阳农学院的“教育革命”，首先在办学地点上“革”。当时抵制搬迁的议论说“东陵距城20里，也算农村，办学地点不

<sup>①</sup> 《整顿和发展高等农村教育刻不容缓》，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12期。



是路线问题，路线对，哪儿办都可以；投资一千多万元，校舍13万平方，还有大量引进的外国植物，丢了可惜”。但省革委会几纸命令下后，学校便5年迁4次，从沈阳到辽北，从辽北到辽西，又从辽西搬回辽北。当时说“搬迁就是革命”，“分散就是路线”。将一个完整的农学院，时而一分为五，时而一分为八。1973年又决定撤销，令工厂占用校舍。<sup>①</sup>（该校1978年4月在原地恢复。）

医学院校也根据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医学教育要改革……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迁往农村办校。如江西医学院与江西中医学院合并为江西医科大学，搬迁到吉安县青原山公社。<sup>②</sup>

其他院校也是“越办越向下”。北京迁往外地的大学计15所。江西大学理科部分与江西工学院合并为江西理工科大学，迁往武宁县新城公社，后又再迁景德镇。江西大学文科部分与江西师范学院合并为江西井冈山大学，迁往井冈山拿山公社。<sup>③</sup>西安外语学院原在陕北富县办有农场，1968年10月该校工宣队在富县牛武川选址办五七外语干校，继而提出全校“走抗大道路”，办“窑洞大学”，于1969年底将全院迁来，分散在几十里的山沟各处。1970年3月，招进首批工农兵学员200余人，步行360里上山。从“一无教室二无宿舍”开始，修窑搭床，以木板为课桌，办起俄语短训班。这一年不到的学习班，不学外语，而以阶级斗争为主课，拉练到抗大原址参观；学生人人开荒，

① 《又一朵教育革命的鲜花》，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第28页；沈阳农学院的批判文章，载《光明日报》1978年4月29日第2版。

② 《中国教育年鉴》地方卷（1949—1984），第669页。

③ 同上。

参加种、管、收生产全过程。当年，迟群在科教组的助手发现，亲自蹲点，写出《“窑大”育新人》农村办外语学院经验。林彪事件后调整教育，许多人对办“窑洞大学”搞生产质疑：“开门办学路很宽，为啥偏去牛武川？”“病多路远产量低，劳民伤财不合算。”1972年该校恢复全面招生，经批准于次年迁回西安。“窑洞大学”改作干部、教师轮流劳动的农场。下半年又一个反复，搞起“反复辟”运动，1974年升级为批林批孔，该校又被迫搬回陕北。科教组的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特发表《“窑洞大学”的新生》以示支持。搞不了教学，就搞“粮油菜肉四自给”，“这总比在西安吃闲饭好”。提出开2600亩荒、产40万斤粮的“大生产运动”，77级英语专业学生在“窑大”8个月中，劳动时间长达43%，不搞教学，只编造“经验”。所谓“在劳动中学外语新教学法”，是“上山一句话，下山一句话”，“一天开2.9亩地，记5个单词”。所谓“社会调查教学法”，即学生搞社会调查，教师将部分调查材料译成外语，然后作为教材上课。这些全是花架子而无实效。<sup>①</sup>1977年西安外语学院终于回到原址办学，结束了“分散农村办学”的反复折腾。

除办学地点的“革命”之外，还有大学的撤并和院系专业的撤并。综合大学的基础理论专业按“理向工靠”的实用逻辑，生物系分散插入农学院的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治专业及医学院的中草药专业，物理系分散插入冶金学院的金属学、电子器件专业。工科大学以产品定专业，越划越细。文科大学有的把经济、哲学、历史合并为政治学专业，有的把经济、法律、历

<sup>①</sup> 西安外国语学院：《“窑洞大学”的新生》，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5期；西安外国语学院：《“窑洞大学”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11期。

史、马列原理并入哲学系。大学是“教育革命”中改得最混乱的，小学相对好一些，识字、算数的教学，还能为“实践经验惟一”论者所容忍。

## 六、政治夜校模式的群众业余教育

建国后作了很大努力扶植工农业余文化教育，建立起一个从扫盲班、识字组、业余小学到业余初中、业余中专、职工夜大的庞大的社会教育体系。群众文化教育虽在某些时候（如1958年大跃进中）存在一些急于求成、一哄而起、脱离实际、强迫命令等缺点，但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许多不识字的工农，通过业余学习获得了文化翻身。

“教育革命”10年中，群众业余教育机构没有受到普通学校那么大的摧残，规模上还有所发展。初等业余教育在学人数由1965年的823.7万人猛增至1976年的15782.3万人，1985年回落到833.8万人。中等业余教育由1965年的854万人降至1976年的325.2万人，1985年回升至478.5万人。1976年的低数目是统计方法问题，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部分劳动大学、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只能算中等业余教育却统计为高等业余教育，因而业余高教数目就大——学校数为46810所，在学人数为262.85万。而新时期“五大”、自学考试发展之快，有目共睹，但到1985年，成人高校也才1216所，在校生172.5万人。1976年的统计数显然出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浮夸，不过也应承认这一时期群众业余教育规模发展了。但是由于办学方针以“阶级斗争”政治教育为主，劳动技术教育次之，而完全忽视文化教育，因而没有发挥应有的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作用，不能与“文革”前17年比，更不能与新时期比。有关工厂的“七·

“二·一”大学和某些地方的五七大学、五七学校、劳动学校（这些学校的长班应属青少年职业教育，短训班才是群众业余教育、成人教育）的情况，后面有专节论列，此处从略。这里谈谈其他形式的群众教育，最普遍的当属“政治夜校”这种类型。

各地农村以生产大队或小队为单位自办“政治夜校”，天津郊区的小靳庄和山西昔阳大寨大队所办最为典型。这类学校并非固定的业余教育组织形式，实际是行政领导临时组织的政治学习和政治会议及集体文化娱乐活动。主要学政治理论，配合运动学文件、写稿子、发言，学唱样板戏，排演宣传节目，编批判性的儿歌、顺口溜。这种政治夜校实际只能算政治教育而非业余文化教育，但是由于农民文化程度低，在这种活动中也顺便获得了一些识字机会和文化信息。政治夜校各地名称不一，不同时间里名称也不一，办班也没有连续性，往往是“运动来了兴起，运动过后无踪”，“上级检查时有，检查过后即停”，“统计时有，实际中无”。翻检当时报刊，从报导中看似乎办得轰轰烈烈，而多数地方实际是冷冷清清。就是一些模范地区，也多是搞政治花架子，实效很低。

城市举办的工人及各行业的业余学校，也多具有“政治夜校”的性质，突出政治，突出运动，而很少以技术文化教育为主。

当然，“教育革命”10年中也办了一些培训实用技术的讲习班、夜校和函授、电视教学。其中有规模的应算上海为十几万上海下放知识青年举办的知青函授教学，上海的高校教师为下乡的知识青年编写了文化知识函授课本和农村实用劳动技术函授课本。课目有文、农、哲、数、理、化、生、外，有农电、农机、农医、农技、会计、气象、畜牧、作物、水利、土壤等。

他们还利用知识青年返沪度春节的时机，组织面授。当然授课中掺杂了大量批孔评法的内容，但毕竟为中断学业过早、又求知若渴的知识青年传授了一些文化科技知识，这是务实而有些成效的一面。至于“四人帮”以此企图达到拉拢知青的政治目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

## 第四章

# “教育革命”的种种“新生事物”

“文革”初期许诺给人们的“新世界”并未出现，“新生事物”倒出了不少，大多植根于革命臆想和长官意志，多数旋生旋灭，少量靠权力支撑维持下来。这些“新生事物”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培养一种臆想的“共产主义新人”。

这种“新人”，靠“斗私批修”和“在自身中寻找过错”能产生出来吗？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是不表示赞同的。他们说：“这些无产者的不懈的宣传，他们每天彼此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充分证明：他们本身是多么不愿再做‘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

愿人们再做‘旧人’。只有当他们和桑乔一起‘在自身中寻找过错’的时候，他们才会依然是‘旧人’；但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

要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带有旧痕迹、不平等、三大差别的“旧环境”，靠什么呢？

靠“继续革命”、靠“阶级斗争”、靠“斗私批修”吗？当时的回答是：是。这些“新生事物”没一件关乎经济建设。这里讲的只是与教育有关的部分“新生事物”。“上山下乡”这一最大最关教育之事没收入，此题决非一节文字可胜述，故阙。

## 第一节 工农兵大学生

### 一、工农兵大学生招收概况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停止招生以来，到1970年底大学停办已经4年半。其间毛泽东“七·二一指示”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办不办遂成疑问。7天后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又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不过当时动乱中不具备办学条件，此后又足足拖了两年，才有了办大学的消息。

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陷于停办状态的全国大学，开始积极筹备招生。此前仅有个别学校试招过学员。如1969年，同济大

学招了一个老工人班；复旦大学试招了理科学生 523 人<sup>①</sup>；大连工学院办了机械制造专业和无机物专业试验班，招 52 名工人学员，学制 2 年。

请示报告将毛泽东“七·二一指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具体化了。报告提出的学生条件是：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复员军人、青年干部。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同年 10 月 15 日国务院电告各地，参照上述报告执行。

1970 年 7 月至年底，部分大学试招收了“文革”以后的首届大学生，总共 41870 人，1971 年初入学，称 70 级工农兵学员，而始业于 1971 年春季。自后，皆以招生年份名级而次年入学。1971 年仍由部分大学试招 42400 人。1972 年更多大学恢复招生，招生数增至 133553 人。1973 年招 15 万人，并提出进行文化考查以保证新学员具备初中以上文化。1974 年招 16.5 万人，但指责 1973 年“沿袭旧高考的办法”，提出文化考查只能用调查访问座谈讨论方式进行，同时可适当招收少量剥削阶级子女和“可教育好子女”。1975 年招 19.1 万人，并指示招生工作执行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关于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1976 年招收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21.7 万人，数目最多，与恢复高考首届大学生计划招生数 21.1 万人持平（77 级实际入学人数经 1978 年春扩招 6.2 万人达 27.3 万人）。至此，工农兵学员共招 7 届，总计 94 万人，占建国以来毕业大学生数的 21.4%。

<sup>①</sup> 《喜看今日工农兵大学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126 页。



这一批学员是世界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学生，除了部分干部子女和文化素质较高者，其中多数普通工农子女本来是与高等教育无缘的。以前在考试竞争、分数选择的机制下，“书香门第”占了先天的优势。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社会分工与历史遗留造成的社会不公。高考制度的废除的确使几十万世代代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子女（不到适龄青年的1%），得以解脱“文化压迫”，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也可以说是某一种社会公正。正如当时一首《景颇姑娘上大学》诗所云：

口弦弹得百鸟争鸣/山歌唤来满天彩云/木玎进京上大学/山  
山寨寨都欢腾

老支书送木玎/迎着朝阳出山林/一程山路一席话/句句话儿  
重千斤：

“木玎，路上山高水又远/你千万莫要迷路径！”

木玎点头微微笑/一字一字吐出唇：

“出山哪怕路艰险/我心里有颗北斗星！”

这首诗配画刊于《人民日报》1973年元旦号，描绘了山里姑娘“文化翻身”的喜悦。

但这种“社会公正”是以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为条件的。其一，因为废除了文化考试，入学者大多不具备接受高等教育的文化基础，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完成大学学业。中国是穷国，又是教育大国，文教经费和文化资源极其有限，投入与产出之间，差距如此之大，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浪费。其二，牺牲了一代人中最有文化潜力、最堪造就的佼佼者，剥夺他们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误其青春，这是另一种不公正。其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民族文化素质下降，人才断层，时机丧失。其三，推荐

制的理想境界与实践中的不正之风反差极大，新制度很快变质变味，成为某些权势者谋私的工具。败坏社会风气，招致大众不满，以致反“走后门”几成1974年运动的一个主题。

无论如何，94万工农兵学员个人是幸运的，在国家民族、文化教育蒙受巨大灾难之时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其中一些佼佼者又能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接受文化科学知识启蒙，在文化断裂时代成为文化传薪接火人。随着新时期到来，他们虽是“教育革命”的产儿，却在政治上较早与“文化大革命”决裂。他们羞于“工农兵大学生”这一烙有特殊时代印记的称呼，要求向正规国民教育体系认同。1980年4月12日，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大会上总结说：工农兵大学生主流是好的，学习上的问题责任在“四人帮”，不在他们身上。但应看到自己的弱点，政治上、业务上今后都要补课。“工农兵学员”这顶帽子是“四人帮”安上的，要求摘除是当然的。他宣布以后不再用“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自后参照国民教育体系大学专科层次，给他们定为大专学历。<sup>①</sup>

## 二、工农兵学员的文化学习状况

学生的学习生活是动态的、多方面的、复杂的，统计数和归纳很难反映。这里使用了较多个案材料。工农兵学员中许多人能珍视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尤其在1971年下半年、1972年、1973年上半年，学习空气较浓，许多原工农兵大学生回忆说这个时期读了不少书。但也有不少人限于原有文化基础，或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尤其当运动来时头脑发热，并未能完成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980年4月条。

起码的大学学业。如北京钢铁学院有些学员“一有空就打扑克，胡聊天，闹分裂，讲义气”，“忘了上管改的阶级责任”，说宿舍“是我的自由小天地”。<sup>①</sup>

山东招远徐学金回忆说，1975年进师院学习，一次上课在煤炉上烤干粮吃，受了教师批评，认为臭老九批评“工农兵”是“黑线专政”，顶得全班不安宁。“我学习不认真，作业不爱做，自己学的是政治文学专业，结果两年多没交一篇作文，文化考核经常不参加”。<sup>②</sup>

清华大学电力系1971年1月首届发电专业班“有些学员学习不刻苦，屁股坐不住，上课迟到早退，作业潦草马虎”。陈嘉瑞老师工作负责，对少数学员作业马虎提出尖锐批评：“我们为你着急，而你自己却不急，对得起谁？”学员中有不同反响，不少人竟说“陈老师翘尾巴了，应当帮陈老师捺捺尾巴”。“石家庄热电厂锅炉工万建中，由于文化基础差，学习有困难，他一度悲观起来，连作业也不做不交了”。有6年工龄的工人学员王玉珍，教师问她：“什么地方不懂？”她说都不懂，连补课都不知从何补起，“因此一度悲观起来，认为自己不是上大学的材料，太笨了，甚至想回厂去”。<sup>③</sup>

同济大学路桥系桥梁与道路专业的学生，1973年下半年学习《圬工拱桥》课程时，认为“教材中有些内容脱离生产实际”，竟“写出200多张尖锐泼辣的大字报，对教材进行逐章逐

① 袁侃：《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宿舍阵地》，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7期。

② 徐学金：《暂把“两年”时间夺回来》，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1期。

③ 清华大学电力系政工组：《红旗指路，志在高峰》，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期。

节的剖析”<sup>①</sup>。教师不教不忍，欲教无奈。

上海第二医学院 1974 年 1 月期末考试时，基础部化学教研组提出一份考试方案征求学员意见。学员针对其中一个条款“考试时不准交头接耳，要按时交卷”开火了，说“这是复旧”，是“分数挂帅”。教师辩解：“要分数有什么不好？要反映成绩，总得有个分数啊！即使是篮球比赛也要记分，也要比胜负。”学员们反驳：“你们这样考法会冲掉无产阶级政治，是在搞智育第一。”教师说“学习本来是艰苦的劳动，必要的压力还是要的”。学员总结说“问题的实质是不信任学员，对学员搞管卡压”。学员越说越激动，以致“四五十名学员挤了一屋子，一个考试方案讨论会成为对旧考试制度的批判会”。教师听取意见后拿出第二个方案，把条款修改为“要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交头接耳”。学员仍有批评：“实际上还是不信任学员，还是分数挂帅。”最后的方案是：教师由监考变助考，考场由教室搬到实验室，师生共同出题、命题，帮助考生在考场“掌握考试的内容”。<sup>②</sup>教师在考场帮助学生做试题，便取消了平时的学习任务。学习没有一点压力，便是“无产阶级教育方法”吗？极左思潮误人——至于此！

也有不少学生暗中学习，不贴大字报，业务拔尖，但他们是受压抑的人。当时上海师大“教学没计划，学生毕业不考核成绩；教师布置 10 道题目就是‘智育第一’抬头，上课连讲两个小时就被指责为‘满堂灌’”，“学生看业务书，不得不在上面放一本《红旗》以掩人耳目，搞得许多爱学习的学生像罪人——

<sup>①</sup> 《上海市首届工农兵大学生胜利毕业》，载《人民日报》1974 年 4 月 30 日。

<sup>②</sup> 《记上海第二医学院基础部的一次化学考试》，载《文汇报》1974 年 3 月 20 日。

样，抬不起头”。<sup>①</sup>

清华大学电力系学员王锡平，来自西柏坡大队，当过小学教师，学习刻苦，成绩好，但自1971年9月评论党团员小组会上，众人批她“个人奋斗”，“她想不通，哭了，产生了不敢钻业务的想法”。<sup>②</sup>

### 三、生产劳动与专业实践

贬低理论，片面强调实践，是“教育革命”的突出特点。而理工科学员的专业实践又往往与生产劳动混为一体，不强调学员参加生产劳动必须与所学专业对口，而强调教学配合生产，在干中学。

同济大学到1973年止，挂钩厂120余个，各系师生“大约有1/3的时间在工厂、工地直接参加实践活动”。该校五七公社“三年级老工人班学员，虽然入学前大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进入大学后，他们狠批‘天才论’，努力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进步很快”。<sup>③</sup>这些老学员并不缺实践经验，缺的是科学文化知识，靠批所谓“天才论”，就能自发产生知识么？

中山医学院1971年初入学的268名学员，下乡开门教学时间占40%。只实用地教学生诊治35种代表性疾病，如接生、结扎手术、割阑尾炎、疝修补和膀胱开刀取石手术等。<sup>④</sup>动手能力

① 上海师范大学大批判组：《一股阴风几排恶浪》，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6期。

② 清华大学电力系政工组：《红旗指路，志在高峰》，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期。

③ 《同济大学工农兵学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主力军作用》，载《文汇报》1974年3月28日。

④ 《中山医学院1973级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生质量调查》，载《光明日报》1974年3月12日。

较强，但是基础理论的先天不足，使他们脱离了教师指导便无所适从，也限制了他们日后的发展。

上海师大数学系上基础课微积分时，学生还闹不懂微积分是什么，就大学《反杜林论》中“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一知半解拿了“(微积分)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这句话，去批判“车床旁边出不了微积分，榔头底下哪有无穷大，微积分是无法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开门办学的”。大搞开门教学，仅1971年就下乡下厂三次。在上海压缩机厂，结合螺杆铣刀设计来进行微积分教学，结果是抽象与具体找不到结合点，越讲学生越糊涂，“花费时间多了一些，影响了教学进度”。一些好心的教师想：“下厂搞课题无非是为了联系实际，我在课堂上多讲几个实际例题也一样能达到目的嘛。”1972年抓紧了课堂教学，没下厂，结果1973年下半年挨大字报批判了，说这是“微积分教学中一场前进与倒退的斗争”。<sup>①</sup>

辽宁铁岭农学院可以张铁生为例，他学兽医三年，在校时间前后不到一年，微生物课没上，生理解剖学没学完，几门专业理论没学通，却到处作报告宣传他如何“在实践中学到真本领”。1976年2月10日他在太原湖滨会堂作报告说他用掏结法治好两匹结症马，小马“用了10来分钟时间”，大马则“不到5分钟，结块就捏碎了，肠管就通了……噼里啪啦排了不少屁，正式宣告这次路线斗争胜利了”，并捏称贫下中农称赞他“还是自己的大学生哟”！实情是：大马他掏不到结，是在场老师替他掏出结块。掏小马时手被夹住，进退不得，又是老师帮助。他

<sup>①</sup> 《在微积分教学中一场前进与倒退的斗争》，载《解放日报》1974年2月20日。

还撰文自吹“敢闯新路”，创造从马屁股开刀缝合直肠的“手术奇迹”。实情是第二天马死了，骡子保住性命却后肢麻痹残废了。基础理论明明重要却诬其没用，蛮干盲动明明失败却自吹胜利。

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系赴天津开门办学小分队，名曰办学，实际从事与专业实践不相干的生产劳动。安排在钳工班的一个小组“干了几天安心了，说钻孔、打毛刺没啥技术，学不到知识，产生了乱跑厂子的现象”。学生想了解全面生产知识，结果却被抓了典型——“瞧不起平凡劳动”。讨论会上提出生产劳动中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学技术练力气”，一条是“转变思想”。<sup>①</sup>当时的结论是：凡是利于学习进步的动机都属于“资产阶级”，甘于无所作为才是“转变思想”、“改造自己”。

#### 四、政治活动与专业实践

文科学生的专业实践，就是配合政治运动，“结合战斗任务教学”。华中师院中文系从1974年10月到1976年12月，连同政治课在内，上课时间不足总课时的45%，其余时间都花在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上。<sup>②</sup>北京大学1973年3、4月停课下乡批林整风，让全体师生赴京郊5县29社260多个大队宣讲中央文件，听众24万人次，办展览200多个。<sup>③</sup>

复旦大学哲学系开到农村去学哲学，“有个小组到市郊川沙

① 清华大学赴津小分队：《开门办学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载《光明日报》1974年1月27日。

② 方银旺：《“四人帮”是工农兵学员的死敌》，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1期。

③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以批林整风为纲发挥文科的战斗作用》，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8、9合期。

县向阳三队调查学习，开始很少听到贫下中农讲哲学名词，有人就泄气，以为这里没啥哲学好学”。为了解决开门办学的认识问题，便让学生坐下来整顿，大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哲学”，大讲“工农兵是哲学真正主人”。这一类似是而非的命题，产生于1958年把专家与群众对立起来的“左”倾思潮，一方面贬低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劳动成果，另一方面假“工农兵”之名把哲学庸俗化。结果，弄得学生一知半解，只能模仿1958年、1964年的所谓“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肤浅实用文风，写什么《织布不用梭》、《种菜、卖菜和吃菜》、《僵猪变好猪的启示》。把哲学名词当标签，生硬地往种菜、养猪上贴，说开始只看到“僵猪”有“僵”的一面，看不到“不僵”的一面，看不到“僵猪与好猪之间的矛盾、对立”是“可变的、可转化的”，贫下中农通过学哲学、用哲学之后认识到僵猪好猪互为转化的道理，于是养出了好猪云云。<sup>①</sup>

### 五、“上管改”状况

1970年春，试招的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表示一种搞好“教育革命”的决心和热情，但并未形成制度。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旧学校”和知识分子的批判贬低，自1968年夏以来突出宣传工人的自发的领导作用（不是通常列宁主义所说的工人阶级通过其政党实施领导），在这么一种政治气氛中，工人学员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

1971年春大学复办，第一批正式的工农兵学员跨进了校门。

<sup>①</sup> 复旦大学哲学系：《结合社会调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载《教学革命通讯》1973年第8、9合期。



“上管改”便从一个口号变成了一项实际措施，不仅报刊大量宣传，还写进了《全国教育会议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上管改”是基于对“旧大学”的两个估计（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提出的。张春桥说：工农兵上学是进了“豺狼虎豹之口”，要“自己管理自己”，不然，“就要被吃掉”。迟群说：“要注意把学生工作做好，利用这股力量，别让人家弄过去整你。”<sup>①</sup>各种贬低指责学校教育的材料、文章都津津有味地引述一句编造的俗语：工农子弟进了洋学校“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证明学生读了书便发生“阶级质变”，背叛了父母的阶级。

这样，便捏造出“革命学生”与所谓“资产阶级学校”的“阶级对立”。其实，这个虚构的“阶级斗争”理论早在“文革”头几年就贯彻到学校，挑拨与分裂师生的关系，封学生为“革命力量”、“先锋小将”，唆使他们造“资产阶级势力”教师的反、砸烂“旧教育制度”，煽动起一场残酷斗争，并将动乱引向社会。这些年轻无知学生，狂热到将老师的批评诬为“迫害”，将关心视作“毒害”，尽情诋毁、糟蹋传给自己知识的学校与教师。可在他们的利用价值使用完之后，也作为“旧学校培养出来的臭知识分子”赶去农村改造了。他们在吞嚼苦果的漫长岁月里才忆起母校令人神往的读书时光和园丁育花的苦辛，然而已经晚了。

大学虽然经过“文革”风雨涤荡、经过4年半关门批判改造、经过工人阶级进驻占领、学员又是经过层层选拔的红色苗

<sup>①</sup> 山东省文教办公室：《一个反党乱校的口号——评“上、管、改”》，载《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8日3版。

子，却仍然被视为“修正主义染缸”，“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旧知识分子势力盘根错节的世袭领地”。这无非指责教师虽经几年打击，知识仍掌握在他们手里。

“上管改”，主要针对教师及其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学生进校读书，不强调向教师学习，却鼓动他们管教师、改造教师，这比教育史上出现过的“学生自治”、“取消教师”的无政府主义更极端。甚至公开教唆学生“闹他个天翻地覆”，“把现在大学搞得越不像样，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学知识就会从‘上管改’的战斗岗位上退下来”，“知识到手，人被夺走”，“即使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也可以打99分”<sup>①</sup>。

在部分大学，“上管改”由一个宣传口号、一种偏激思潮发展成为一种体制。比如朝阳农学院为了避免“学生受奴化”、为了“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在学院一级建立“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委员会”，各系建“工农兵学员‘上管改’领导小组”，各级学员负责人参加同级党组织的领导。在宣传上、制度上确定学生“管”、“改”教师的地位。据称这样一来，“使学校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sup>②</sup>

教与学，是学校工作最基本的内容，在这一对矛盾中，教总是居于主导的、主动的支配的地位，这就决定了教师对学生的管教地位。人为颠倒这种关系，只能导致师生关系不顺，甚至造成紧张。所以在实际学习生活中，在很多大学、很多时间里（除了政治运动期间，在一般正常教学时间），传统师生关系

<sup>①</sup> 山东文教办公室批判组：《一个乱校反党的口号——评“上、管、改”》，载《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8日。

<sup>②</sup> 朝阳农学院党委：《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载《人民日报》1976年2月14日。

总是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批林批孔中起劲批“师道尊严”，即针对此）。每次强调“上管改”，都造成对学校秩序的破坏和师生关系的分裂。大连工学院领导为了便利教师管理学生，明确对学生说：“工农兵学员‘上管改’，首先是上好（大学），管大学首先是管自己，改造大学首先是改造自己。”

### 六、工农兵学员教育质量评估

工农兵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偏低。如沈阳医学院1970年底所招新生461人，平均只受过8年中小学教育。<sup>①</sup>又如清华大学1970年所招新生2300人中，大寨会计赵素恒只上过三年小学。<sup>②</sup>1972年5月，据北京11个高校的调查，在校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初中以上为20%，初中为60%，小学为20%。<sup>③</sup>可见大部分人只读过初中3年，再加上大学3年，时间上只相当“文革”前的3年制小中专。不少大学不得不拿出半年时间补习初高中课程。开门办学、政治活动、生产劳动又占去1/3至一半时间，用于学习大学教材的时间不多。这样，工农兵学员除了少数佼佼者，大多未达到大学水平（据教育部估计，达大专水平者不足20%）。

1977年，上海市革委会科技组对当年分配到上海科技系统的工农兵学员进行了一次业务考核。考试前打了招呼，给了充足的复习时间。考题都是中学学过的基础知识。考试结果，只少数人较好，多数不理想。数学不及格率为68%，物理为70%，化学为76%。有少数人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基本知识一题也答

① 《又红又专的新一代》，载《光明日报》1973年7月9日。

② 《工农兵学员不愧为一支反修防修的生力军》，载《人民日报》1974年4月19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972年5月条目。

不来，交了白卷。<sup>①</sup>

当然也有少数强的，据国家科委调查，工农兵学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较强的占10%~15%。据统计，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首三届硕士研究生中75%出自工农兵大学生。<sup>②</sup>

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文革”时期就教育质量发生的争论。自1972年以来，“教育质量下降”、“一代不如一代”、“现在不如文革前”的社会传言很盛。“四人帮”开动宣传机器，大讲“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大批“今不如昔”的“历史倒退观”，请出“法后王”的先秦法家、“厚今薄古”的秦始皇、“今定胜昔”的柳宗元、“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来帮忙，论证一个抽象的、绝对化的命题——现在总是比过去好。社会虽不断进化，但不能避免某一种退化，历史总是进步，却也会出现暂时的倒退。无论怎么鼓噪抽象的“今定胜昔”，也改变不了现实的“今不如昔”。于是发明出“两种标准”、“两种质量观”理论，据说“无产阶级质量观”主要看政治觉悟、看实践劳动。这样，就可列出大量事实，证明教育质量提高了。

但是，所列种种，终嫌没有回答实质问题：文化质量。经广泛搜寻，总算在几十万工农兵大学生中找到了“一份颇有创见的答卷”。

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于1974年5月隆重推出大连海运学院无线电导航专业731班学生赵兵的化学期末考核答卷。编者按说“这份答卷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而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产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丰硕成

① 卞古：《文化考试很有必要》，载《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3日。

② 赵荣：《一个特殊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果。它生动地证明了‘七·二一指示’的无比正确，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大学教育质量低、‘今不如昔’的论调”。

未经考试，以白卷入学，在大学又取消了“旧的考试方法”，或采取走过场的所谓“考核”方法，所教学的内容用赵兵自己的话来说，是“过去在中学学习时也学过化学，如今还是学习这些知识”<sup>①</sup>。用赵兵的化学教师的话来说，是“1972年初，在我第一次担任文化大革命后化学课教学任务的一段时间里，也曾认为现在教的课程内容不那么广了，理论也不那么深了，因此教起来劲头不大”<sup>②</sup>。如此生源，如此教学考试，质量可想而知。因而赵兵答卷是相当突出，也是相当少见的。但以一份仅仅相对于工农兵大学生自己来说是突出、少见的答案，来证明教学质量高于“文化大革命”前，显然缺乏说服力。

赵兵所在学校的考核方法有这么3种：（1）做一份综合性习题作业；（2）写一份学习总结；（3）作业也不用做，只“自己复习”。化学教师根据学生一致建议，采取写总结一法，并出了8道纯粹化学知识题供写总结时参考。赵兵答卷却撇开化学而大谈哲学，共谈四点：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外因是变化条件、内因是变化依据，矛盾双方互为前提、互相转化。这份化学答卷不过是“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文章的翻版，简单地用哲学术语贴在业务问题上而已。而且所谈化学，仅及初中程度。赵兵的老师奉命表态说：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教了10多年的化学课所没有遇见过的”，“这份答卷说明了工农

① 赵兵：《我的化学期末总结是怎样写出来的》，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6期。

② 大连海运学院化学老师吴学思：《一份难以用分数评定的答卷》，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6期。

兵学员能够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来统帅业务学习”，“我只能说他们学习质量很好！”<sup>①</sup>

代表文科最高水平的，要算北京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所作的政治抒情长诗《理想之歌》。模仿“文革”前贺敬之所作的《雷锋之歌》，由于作者系老三届高中生，有相当的文字和思想功底，仿作成功。但是此作产生于林彪事件后的“文革”退潮时期和令人厌烦的批林批孔中，虽有漂亮的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和炸药味，革命底气却是虚了，政治激情也假了，显得调门高、口气大、文词空、感情矫。

1979年国务院发出279号文件，让工农兵大学生参加评职称业务考核，此后大多数人都脱产1~2年回炉补习或进修，统一考试中大都达到中等成绩。

## 第二节 “结合典型产品教学”与 “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在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曾提出“真刀真枪设计”等做法，后在实行中暴露出不少问题，所以1961年以后渐被弃置。“文革”中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发挥1958年做法，抢先于1967年提出“结合典型工程教学”。后来复旦大学又提出文科“结合战斗任务教学”。1958年时文科虽无此提法，但已有此做法，“文革”中则大张旗鼓与“结合典型产品”对举，并由大学文科

<sup>①</sup> 大连海运学院化学老师吴学思：《一份难以用分数评定的答卷》，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6期。

蔓延到中学的语文、历史、政治教学中。

这种教学法，如果作为专业课联系实际的一个教学环节、一种形式、一种教学手段，来辅助课堂教学并无不可，但绝对化起来，作为教学的惟一的普遍的模式，则完全违背学科系统性和人类认识规律。它反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主张先干后学，边干边学，干啥学啥，不干不学。中国革命史上曾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干中学”的经验，这是由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特殊环境决定的，并非一切战争的规律（中外军人一般先习武、教阵、学兵法），更不是一切专业学习的规律。盲目照搬，是一种狭隘经验主义。“干啥学啥，不干不学”则与实用主义的“从做中学”一脉相承。

这种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混合物被宣扬为“改革旧教育制度的突破口”，是“惟一有效的方法”。果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把传统教学的系统性三段教学法打乱了，把传统学科划分、专业划分、教研室划分的教学组织形式打破了，把正常教学秩序打没了，学校陷于一片混乱。其做法是首先猛批符合教学规律的“老三段”，再打破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然后搞“边干边学”。

### 一、“打破老三段，火烧三层楼”

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理论是塔基，基础越深越广越牢。专业基础是塔座，塔座越高越大，专业的塔顶才能耸立在一定高度上。文科也有自己的三层楼，一切学科都不例外。教学便按照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段进行。

三段式教学符合学科理论的内在联系和系统性。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的内部逻辑结构。这种结构就是层层递进，每一层次

与下一层次的关系，都是基础与专业的关系。基础课是关于基本运动规律的知识、理论，专业课是以基础课阐明的一般规律为理论基础，向某一特殊领域发展，研究更为特殊的运动规律。

三段式教学也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照顾学习的连贯性、系统性。学生没有学习微积分，怎能直接学微分方程？没学习思想史，怎么能批儒评法？

三段式教学把基础理论放在第一段，高度重视理论知识的作用。理论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述，凝结着人类的劳动和智慧，轻视它是愚蠢的。学校教育的任务，就是使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以较短时间继承前人的认识成果。主要是通过书本概念和经济便捷的实验，没有必要“事事直接经验”，再从头重复前人的实践过程。

“文革”中却批判三段教学法是“关门打基础，脱离实践，从理论到理论”。贬斥理论是“空洞无用的大杂烩”，“一大堆书本破烂”，“资产阶级的繁琐哲学”，教出的人是“脱离实际，食洋不化、四体不勤、十分无用的书呆子”。因而，要“打破”、“火烧”，要“开门实践——实践——实践”。

## 二、打破传统教学组织形式

首先是“彻底改革旧教材理论脱离实际状况”，将各门学科的内容拆散，围绕“典型工程”，按施工的顺序加以编排。完全不顾学科理论的系统性、连续性，严密的科学被拆装得支离破碎。

如同济大学工民建专业的几门力学基础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被拆散分别放入《房屋结构基本构件》等4门专业课中，内在联系被割裂，必要内容被删除，概念不清，难易颠



例，学生不易理解，甚至如堕五里雾中。

接下来，便将按各学科性质划分的、传统设置的教研室，全部取消，另建一种按“综合性、大循环原则”组织的教研室（俗称“包乘组”）。“包乘组”把各门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杂凑成一个班子，负责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教学。“这样，使得教师的教学任务经常变动，方向无法肯定。不少基础课教师舍其所长，用其所短，物理教师去教数学，力学教师去搞测量……绝大部分教师忙于跑工程、工地、搞联系、推销等事务，有的手中积了几年的工程无法收尾，造成师资力量的很大浪费。教师无法致力于本学科的钻研与提高，教学资料与教学经验也无法积累”。把各专一科的教师变成“缺啥补啥”的万金油了，而同学科的专业教师，又无法同室相互切磋砥砺，以提高教学科研水平。<sup>①</sup>

### 三、“边干边学”

基础理论的系统学习被取消，在干“典型产品”、“典型工程”、“战斗任务”的过程中，“碰到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完整系统的理论被拆得支离破碎，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能学到零碎的片面的知识。

武汉大学分析化学专业学生，“一进校就去结合某些化学样品分析，学习专业课，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搞了一段便学不下去。学光谱分析没有学过物理，学络合分析没有学过有机化学，在补物理和化学时又不会计算，只得再回过头来补数学基础。直到毕业时，还有不少学员对分析化学的基础理论、

<sup>①</sup> 同济大学党委：《实用主义教育的“模式图”》，载《人民教育》1977年第2期。

基础概念模糊不清。他们可以按照操作规程分析样品，但是讲不出道理来，得出的结果准确性差；个别的甚至对普通的分子式、化学价、平衡方程式也搞不清楚。学员们气愤地说：‘缺什么补什么，补来补去时间过，肚子里还是没有货’；‘火烧三层楼，把我们烧成了断胳膊少腿的知识残废’”<sup>①</sup>。

同济大学“五七公社”最早在1967年试办一个老工人班，作为“结合典型工程教学”的试点。理由是老工人学员特点是实践丰富理论低，所以边搞工程设计边结合理论教学。后来却把这一特殊性，说成对大学教育具“普遍意义”，绝对化起来。

这班学员每周三天到工地劳动，一天政治学习，半天学外语、体育，专业学习只有一天半时间。这一天半还要分出时间补学初等数学，剩下无几用于学建筑基础知识。仅学一学期，“学员连起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计算技能都没有很好掌握”，便叫学员搞“典型工程”设计。学员无从下手，只好照教师的示范图胡抄一气，按公式乱套，茫然不知其所以。教师“结合典型工程教学”时，只能照“典型工程”实用处讲，不管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的系统性、连贯性及由浅入深原则，不讲不行，讲又讲不清，囫圇吞枣，无法消化，浪费时间，误人子弟。

又如该校工民建专业学员，三年学习期要做3~4个“典型工程”设计、1~2次施工管理实习，还有经常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所占的时间是总学时的2/3。这样一来，基础理论教学时数一减再减。这里以高等数学和力学2门基础理论课为例，对照如下表：

<sup>①</sup> 武汉大学教务处：《评“火烧三层楼”》，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1期。

	“文革”前的 1965 级		工农兵学员的 1971 级	
	学时	占在校 5 年总学时比例	学时	占在校 3 年总学时比例
高等数学	705	11.9%	162	3.7%
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631	10.7%	115	2.6%

如此以实践代替理论学习，“以下代学”，结果是取消了高等教育。<sup>①</sup>

#### 四、政治需要出“经验”

远在批陈整风之后，周恩来指示周培源“提倡一下基础理论”之前，教育界已经有加强基础理论教学的呼声了，1971年7月产生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也不得不写上反映这一呼声的条文。

本来同济大学1967年搞的“结合典型工程教学”是失败的，后来都不好意思吹嘘其“教育改革经验”。但到1972年，为了压制这种呼声，上海方面布置座谈会，要同济大学“五七公社”总结“结合典型工程教学”经验，写出政治文章。不久，在上海6月高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前三天，又专门叮嘱不搞普通班的经验，只总结1967年老工人学员班“结合典型工程教学”经验，把特殊情况总结成“有普遍意义”，把破坏基础理论教学总结成“推动基础理论教学”。

1972年11月19日，上海市委召集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领导

<sup>①</sup> 同济大学党委：《实用主义教育的“模式图”》，载《人民教育》1977年第2期。

人开会，说：“有些人讲基础理论差，有些党员也这样讲，周培源的文章也去同意，有人说是有点来头的，有什么来头？无非是总理讲的，你们也可以写文章。”次年7月20日，又以准备全国理工科教育改革座谈会材料为名，指令同济大学写吹嘘“结合典型工程教学”、反击“基础理论风”的文章《大力扶植新生事物》。1975年4~5月同济大学又写了《办好社会主义工科大学》，再次鼓吹“结合典型工程教学”，以反“复辟回潮”。可是时值全国整顿，没敢发出，直到1975年末“反击右倾翻案风”，才由新华社作为一枚政治炮弹打出。

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任意造假，将同济大学“结合典型工程教学”的失败说成成功，把主观臆造的东西说成“新生事物”，把破坏说成“硕果”，把惨痛教训说成成功经验。

吉林大学著名学者唐敖庆一番话，可以作为我国教育史上几次“以干代学”的教训总结。他说大学生主要是学习前人经验的科学总结，打好知识基础，“打厚，打牢，打得厚一些”，“成为将来好用的材料”。“‘典型产品带教学’，强调‘同工厂车间对口’，这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技术工人”。“四年学制，要有三年打基础”。<sup>①</sup>

### 五、文科“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1969年9月，在复旦大学办了一个不分系科专业的“五七文科试点班”。1970年1月上海写作组的人有意导演了关于大学文科怎么办的“一场大辩论”，写成《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1970年元旦发表于《红旗》杂志，声称“革命大批判是

<sup>①</sup> 唐敖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尽快培养科技人才》，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3期。

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1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科就是要办成写作组》，说“工农兵写作组才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好样子”。当时大学尚未复办，文科的方向就已经定下。这是文科“结合战斗任务教学”的先声。这个试点班将原大学文科的专业系科分工、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培养目标统统推倒，而按“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任务”办写作组。次年又总结出一个调查报告《用革命大批判改造文科大学》，发表在1971年6月《红旗》杂志上，明确提出“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的经验，总起来说，就是以革命大批判带动教学”，后来又进一步简化为“结合战斗任务教学”。

1973年6月，在国务院科教组文科教改座谈会上，又以“五七文科试点班”和接办的中文系（还是改了回来）的做法，撰出“结合战斗任务教学”的系统经验，在1973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所载《文科要坚持以社会为工厂的道路》中公布。

这样，确实“把文科办成写作班”了，“把文科办成运动系”了，结果写出的文章只有大字报水平，一不讲理、二不讲事实、三乱打棍子，虽无学术价值，但配合政治声讨还是有用的。如以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名义发表在1972年11月25日《文汇报》上的《打什么基础理论》一文，就武断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此外没有别的基础理论。连《鲁迅及其作品》都没读全，就布置写什么“鲁迅批孔反儒”、“鲁迅批谣言诡辩”、“鲁迅论反折衷主义”、“鲁迅论反资产阶级民主派”。新闻系竟未开《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新闻史》，刚刚入学的学生就被拉去搞什么法家著作注

释。<sup>①</sup> 学生无此水平，只好由教师捉刀，包办“战斗任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拼合了一个工农兵编写组，由45名师生、加上3个工厂的14名工人、空军后勤部的2个战士组成，编一本体现儒法斗争的《古代汉语字典》。战士是当大旗摆设。工人是安在“把关定向”的位置，请他们按教师准备的材料给师生“上课”，讲“怎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注法家著作”，“关于曹操如何评价问题”，“如何分析王夫之的《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看不懂古文的学生就在教师帮助下动手编起来了。这种古汉语教学法，被吹得比“文革”前强多少倍。经验文章说“文革”前学生专用两年、每周四节，啃王力的4大本《古代汉语》，结果反而看不懂古文，工具书也不会用。而现在“搞的只是几篇文章的注释，似乎学的少了，但实际上学的是多了，深了，而且活了”，“所以我们才搞了几个月，学员们就普遍地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工具书，能阅读一般古文”。<sup>②</sup> 这还算是比较好的，除“战斗任务”之外，总算还有“学”。

北京大学文科1974年用8个多月搞“战斗任务”，办了314期批林批孔学习班，8000余人参加。让学生到校外宣讲批林批孔，听众60多万人；学生写出大批判稿几千篇。1973级哲学专业学生还没开中国哲学史，古文也看不懂，便“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个月竟写出几十篇“研究法家著作”的论文。中文系专业“结合编《柳宗元文选》战斗任务”教学，无根据地说编“三个月就超过了过去（‘文化大革命’前）学生一年多的时间所达到的水平”（阅读古文查资料的能

<sup>①</sup> 折复丹：《破坏文科教育革命的一面黑旗》，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1期。

<sup>②</sup>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门办学必须立足于改革》，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

力)。又根据这个不可靠的“事实”，总结原因：过去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而现在是“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sup>①</sup>“结合战斗任务教学”是反对系统地学习基础知识，而主张现炒现卖、干啥学啥的实用主义。

### 第三节 七·二一大学与五七学校

#### 一、七·二一大学开办概况

七·二一大学与五七学校的名称，源于毛泽东的两个教育批示。“文革”中这类学校的意义被随意地夸大，突出宣传其政治性、“革命”性，以致模糊了这类学校的性质。1971年春夏的全国教育大会，曾有人提出明确这类学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应将其纳入中外现代教育史上早已有之的厂办教育，社会教育、群众教育、成人教育、业余教育之列，不与正规普通教育性质相混。但是这个正确意见被斥为“攻击新生事物”，硬说七·二一大学是“文革”中才可能诞生的新型学校，有意制造混乱，以便把七·二一大学的某些做法拿来攻击、非难正规大学。正如后来周荣鑫所批评的，把七·二一大学经验绝对化，到处生搬硬套推行。

“七·二一指示”源起于1968年7月关于上海机床厂的一个假调查报告。该报告无根据地编造说该厂技术人员中毕业于大

<sup>①</sup>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深入批林批孔，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载《光明日报》1974年9月27日。

专院校的 350 人，比从工人中提拔的 250 人“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搜寻一些孤证和不实之词，蓄意贬低前者，而对后者成绩随意夸大。如举例说留苏副博士曹婉倩读书 20 多年，工作无成就，而一个 14 岁当学徒的工人技术员设计的平面磨床“填补空白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而“事实上，这位工人技术员设计的平面磨床，其轴承恰恰是采用曹婉倩试验所获得的成果，而这个平面磨床，既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也并非什么‘填补空白点’”。<sup>①</sup> 报告根据上述虚构的、按政治需要加以歪曲的材料，下结论说大学生技术员“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而工人技术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当的框框”，便“出现了一个飞跃”。报告又根据上述虚构的结论，提出“教育革命的方向”：（1）大学生一毕业就当干部不合理，应当先当普通工人农民。改造“合格”后，根据实际生产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技术工作不算“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2）“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3）“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4）“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

<sup>①</sup> 《上海机床厂党委决定彻底否定“文革”产物〈七·二一调查报告〉》，载《光明日报》1984年4月14日。



名利思想”，“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加以“改造和提高”。<sup>①</sup>

这篇报告苦心经营材料，迎合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很快于7月21日作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经1966~1968年的“文革”风暴打击，中小学动荡不宁，大学停办裁撤，社会教育停顿消散，各类教育急剧萎缩。就在教育一片萧条之中，1968年9月，一所以七·二一命名的厂办大学首先在上海机床厂建立。它的建立，掀起了一场政治宣传浪潮。次年又以更大的声势纪念了“七·二一指示”和七·二一大学的周年。这所大学首期招52人，学习3年，毕业回车间劳动。1971年7月又招第二期98人。全国各地或仿办七·二一大学，或将恢复的厂办学校、职工学校、成人学校都更名为七·二一大学。到1972年全国共办七·二一大学68所，有学生4000多人。1973年发展到122所，学生6000多人。1974年，由于配合批林批孔运动的政治需要，大量发展，达383所，学生达2.3万人。1975年竟翻10多倍，达5228所，学生为25.1万人。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更加盲目发展，共办33374所，比1974年增近百倍，学生达148.5万人，为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1976年在校大学生为50.6万人）。<sup>②</sup>

<sup>①</sup>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载《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

<sup>②</sup> 《中国教育年鉴》总卷（1949~1981），第594页。

应当指出，1975年、1976年两年新办的3万多所七·二一大学，大多是虚假的统计数字，许多地方的所谓大学，只是一个决议，一个计划，或只是挂了一块招牌，经费、教师、教室还无着落，学生亦未进校，只是一所“四无”学校。类似1958年“教育大跃进”时的“运动学校”，是配合政治运动虚报浮夸的产物，“运动来时起劲吹，运动过后一风吹”。这一点在上海特别明显。1968年办第一所，1969年办12所，1970年办36所，此后几乎停滞。可到1974年批林批孔，几乎翻5番达173所，进入1975年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3月达244所，4月达302所，5月达368所。<sup>①</sup>

## 二、七·二一大学学习状况

七·二一大学办学体制，是面向本厂、本系统职工招生，毕业回车间。有的实行半工半读，如哈尔滨第一工具厂的工人大学，就是3天在车间上班，3天在校学习。有的是全脱产但不脱离劳动，规定了定期回车间劳动的时间。“在学校几年之中，就要不脱离生产实践，做到‘手上不减油泥味，耳边不断机器声’”。办学宗旨是“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马克思列宁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作为主要教材，把工人大学首先办成政治大学”。<sup>②</sup>培养目标，据上海机床厂党委发表在1974年7月22日《解放日报》上纪念“七·二一指示”6周年的文章说：“我们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社会主义觉悟”。“一个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掌握

<sup>①</sup> 《天翻地覆慨而慷》，载《教育实践》1975年第2期。

<sup>②</sup> 《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重要阵地》，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7期。

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但是真正能够……坚持革命，坚持前进，就不那么容易了”。“工人技术人员的队伍不仅应该是一支技术骨干队伍，而且应该是一支不脱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这样看来，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就不那么明确了，比“七·二一指示”原意有了增加，在“培养技术人员”之外又加上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学校性质也由工人技术学校向“政治大学”看齐。政治学习和生产劳动成主课，业务课就很少了。

本来工人学员学习热情是高的。但像大中小学一样，一读书，就要受“政治”干扰。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工人学员王上法，上学时34岁，有18年工龄，上课时“只顾记笔记，生怕漏掉教员讲的每一句话，可是下课复习时，连自己的笔记也看不懂了”。可是没有人来帮他打文化基础，却让他去学毛主席哲学“开窍”。老工人徐学德，外语“语音发不准，单词记不住”，不是帮他勤学苦练，却让他去批什么“天才史观”，说批批“心里就亮堂了”。<sup>①</sup>第二期学员中一个老工人认定是来学技术的，“一进校门就钻进了业务书堆里”，“并且感到学校政治学习、生产劳动的时间太多了”，就做他的“思想工作”，搞“革命大批判”，使他认识到“陷进了旧教育的圈套，走上了死啃书本、脱离实际的邪路”。<sup>②</sup>1972年开始抓教学质量，也影响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工人学员决心“要拿出水平来”，“争这口气”，搞了一次教学考试，第三期开学又在全校号召使全体学员“能担任总体设计的比例达50%”。不久被批为“放松政治，埋头技

① 陈世梁：《前进在毛主席指引的光辉大道上》，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7期。

② 《七·二一道路放光芒》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第45页。

术，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sup>①</sup>

北京锻压机床厂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政治上过了“三关”（群众、车间、党委三层挑选），已无问题，“上大学主要是补业务”。于是就对他们搞“转变思想”教育，针对他们“暴露出重业务、轻政治，重理论、轻实践的错误思想”，大批“知识私有”、“智育第一”、“读书做官”，共写批判文章 800 多篇，办大批判专栏 100 多期，开批判会 40 多次。<sup>②</sup>

天津大沽化工厂 1969 年 7 月办七·二一大学，干部、教师、工人学员都认为学校是工厂办的，学员是工人，政治红，懂生产，缺的只是技术理论，上学是为了解决“专”。于是教学“铺底子”、“打基础”，几门课齐头并进开快车，形成学习热潮。可不久就挨大字报批判，说关门读死书，与旧大学有什么区别，说“知识到手，思想变修”。结果是知识未到手，先批“知识私有”，不讲技术讲家史，把方向“扭到把转变学员思想放在首位”。<sup>③</sup>

大连第二机床厂 1969 年 8 月办七·二一大学，工人学员怀着“根红苗正出身好”，“背着麻袋捞干货”的殷切心情来学知识。学校就“从工人学员进校门那天起，抓转变思想”，批“知识私有”，每周开 6 节政治课，还规定晚上要参加政治夜校，与车间工人一起参加政治学习。<sup>④</sup>

本来工厂办学提高工人技术文化是好的，但指导思想是“左”的——强调工厂办学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占领上层

① 《七·二一道路放光芒》，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9～49 页。

② 《七·二一道路放光芒》，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2 页。

③ 《七·二一道路放光芒》，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7～88 页。

④ 《七·二一道路放光芒》，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10 页。

建筑”，“造就一代新人”。志不在“学”而在“政”，所以时时停课去参加运动。上海机床厂工人学员不满地质问：“又停课了？”回答是：“不是停课，是上‘上课’。”说学校即使办在工厂，也还有个“开门与关门”，“三结合与三脱离的斗争”，“每一步都要斗争”，要“打破老三段”，“打破三中心”，“打破正规化、系统性”（实是打破教学规律），工人开进学校“掺沙子”，七·二一大学虽办在工厂工人中，办在“砂窝”里，也“不能说保险哪”。<sup>①</sup>

这样，“技术无用”、“读书无用”也就对工人学员产生极大消极影响，许多人冷却了学习热情，说“业务知识多学点、少学点没关系，反正毕业以后拿榔头柄”；“学习中怕艰苦，一遇困难就想打退堂鼓”。<sup>②</sup>“既然叫我回去当工人，那三年书不是白读了？当个普通劳动者谁不会当啊，我原来就是工人，何必到学校来学三年！”<sup>③</sup>

业务学习中学理论打基础少，参加劳动多。北京锻压机床厂第一届工人学员入学才4个月，许多基本常识都没学，就要求“结合生产实践”测绘500吨压铸机进行教学。学员提出疑问：“我们只学了一点数学和制图知识，能承担这样大型设备的测绘吗？”“这不是闹着玩，一台设备几十万，如果搞坏了怎么交账？”但支部硬让拆装蛮干一个月。因为支部认为：关在教室里学还是结合生产学，“是关系到新型大学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把教学方法安排问题上升为阶级斗争）。布置大家先学《实践论》，狠批林彪“天才论”，后来又把大家轰出教室，搞了

① 《七·二一道路放光芒》，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第19页。

② 《七·二一道路放光芒》，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第45页。

③ 《七·二一道路放光芒》，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第39页。

两个多月的专用机床（5台）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学员认为这种劳动和我们锻压专业不对口，是单纯的劳动，甚至说‘像这种干法还不如把书发给我回家学算了’”。支部不听学员意见，认为这是“旧教育思想的一种反映”，“实质上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的一种单纯业务观点”。<sup>①</sup>

以上还算是办得认真，抓得实在的学校，有许多只是大呼隆、大放鸭、一阵风的运动学校。七·二一大学远未达到厂办成人大学水平。

### 三、五七学校概况

“文革”中的社会教育、业余教育、成人教育，在城市工厂一般都归入七·二一大学，而在地、县农村的名目就比较多了，其中以五七学校命名的为多。办学体制也更多样复杂。有地、县、社、队、农场各级地方办的，也有部门及企业办的。有两三年学制的，有半年几个月的，还有一周、十天的短训班。有标为五七大学的，有仅称五七学校的。有少数正式分配的，有不分配但招工优先的，有不分配但安排临时工作的，有回社队拿工分但从事医、教、电、财务、广播工作的。在名称上各地叫法不统一，江西统一叫共产主义大学（分散在全省各地市各县的共产主义大学性质也不一样，有的是中学，有的是农业中学，有的是技工学校或职业培训班，少数才是成人学校）。其余有的叫农业大学，有的叫劳动大学，有的叫庄户大学，有的叫农校，有的叫抗大某某（如抗大医校），有的叫五七教育网、五七大学。这些，统归属为五七学校，一并叙述。

① 《七·二一道路放光芒》，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第68~70页。

“文革”中以“五七”冠名的学校非常之多，这里应区别以五七作名称的其他性质的学校。比如，那时各地普通中学都纷纷改名为五七中学。又如五七干校，只是劳动改造“犯有错误”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农场，并非学校。当时的五七学校现在可以定义为专指社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技工学校性质、职业培训性质的学校。这也并非“文革”中才诞生的教育形式，所以不是什么“新型学校”。要说“新”，也就是新在大反教育传统、新在极端的“左”。

还应该指出，“劳动大学”、“五七大学”、“农业大学”之类的名称很不准确。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例：仅省办共大总校一所是大专性质，各地市办的，有的是中专性质，或某一期或某一班次是中专，其余是职业学校或技工学校性质。县办的基本是农职中学性质。但全省近百所共大名称一样，都称大学，区别仅在总校与分校之分。省办的叫江西共大总校，地、县办的叫江西共大某某（地、县名）分校。

到1976年全国五七大学（包括共大）7449所，在校生92.28万人（长班576801人，短训班346002人），平均每校90多人。有五七学校9550所，在校生88.19万人（长班411881人，短训班170033人），平均每校60名学生。这仅是从其自称的校名分类，如前所述，号称大学的基本也不是大学。如7449所五七大学，地市办的仅99所，仅为总数的1/75，县办的为1901所，不及总数的1/3，剩下5405所皆为社队所办。<sup>①</sup>许多社队并不具办学条件（经费、校舍、师资、学生来源、学生素质皆有问題）。所以有许多五七学校是有名无实，又有许多只存在于运

<sup>①</sup> 教育部编：《1976年全国教育统计资料》。

动中的极短时间里。因而统计数并未真实反映当时群众教育、业余教育情况（有的农村地方，把社员晚上记工议事、念报纸、读文件之类例会，甚至田头休息学语录，都变换名目重复上报，一个活动可以多次分别报为政治夜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批判会、批林批孔学习班、农业大学等等。学员表就是全队社员数，不管到会不到会，老人还是婴儿。当时干部的政绩就在这些数字上）。

这里只能挑选一些相对来说办得认真、办得实在的五七学校考察一下。这种学校数量很少，一般是省、地的样板学校，经费上、领导力量上都有保证。但就是这种学校在性质、任务、培养目标、管理体制上也不明确，甚至很混乱。

河南新蔡县涧头公社程庄农业劳动大学，是怎样一所学校呢？教育部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这么描述：“来到这所学校参观的人，转了半天还没看到校舍在哪里”。“（贫下中农）回答说‘如果实在要挂牌子，只能挂到公社党委大门口’，这是真的，因为这所大学没有固定的校舍，整个公社就是它的校址。在校的学生有一千多人，可是教师更多，公社五万多贫下中农都是老师”。学校的前身，是1966年初程庄社教工作组一声令下办起的农业中学。1966年3月学校尚没落实教室和宿舍，首批48名学生就被“接到贫下中农家里（实际就是在自己家）”，“办起了自己的学校”。后来是否办下去了？材料上不说了。中间这段空白——空空到1975年，为赶运动形势，公社接手重办，一下子招收1100多个学员，设农学、种子、财会、机电、医学、畜牧6个专业。学制两年，安排如下：第一年上“农业学大寨劳动基础课”，即在程庄大队下地劳动；第二年上半年上政治课，每个学生下到一生产队任政治工作员，边干边学政治；最后



一个半年才是专业学习时间。没有教室、宿舍，学生吃住分散在程庄大队贫下中农家里，美其名为“与贫下中农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资产阶级。没有师资，解决办法是“千人学生万人管”、“劳大学生教劳大”。生源，全公社农民，包括干部、教师分批去学习。自称是“一所社、校合一的政治学校、专业学校，同时也是五七干校”。<sup>①</sup>

程庄学校声称9年培养出1700名毕业生，而1975年一年即收1100多人，由此可见这个学校显然是时停时办、大起大落的。而所谓大学，其实是集中插队劳动，违背学生意愿和教育规律办学，随运动而兴，是命令主义的产物。1975年重办，6月就出经验、上报纸。1958年河南大办“红专大学”，大多是“运动学校”、“纸上经验学校”，有名无实却又实在扰民的学校，至此又重复出现这种浮夸虚热错误。

山西祁县北谷丰五七学校是一所队办学校，用以解决回乡和插队知识青年的再学习。1968年12月大队作出“大队办农校，贫下中农掌文权”的决定，组织43个回乡知识青年开荒建校。实际是办农场，或曰场校一体。学生既是学员又是社员，劳动在校、记工在校，回队分配。学员劳动创收留作办校经费，而学员的劳动收入则由队里支付。这实际是队集体出资办校，加重农民负担，因而这种穷教育是难以持续长久的。学校种350亩地，90亩果林，35亩苗圃，人均10多亩，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学习只能是业余的。学校设两种班，普通班与专业班。普通班开政治、语文、数学、军体4门，专业班分农水、林果、机电3科。学制虽定两年，却允许随进随出。6年共毕业101

<sup>①</sup> 《程庄农业劳动大学纪实》，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7期。

人，学生小学、初中、高中皆有。师资如何解决呢？语文、数学由大队“赤脚教师”包，政治由大队支部包，其余专业教师请社员中稍有所长者当“工农兵兼职教师”，再者学员互教即“兵教兵”。教学原则是“实践第一”，“学生在测量沙丘碱滩、起高垫低中学数学，在铺沙改碱中学土壤学”。透过这虚灵的抒情诗句般的描述，可知实行的是“劳动即学习”。当时即有社员群众批评“挂着学校的牌子，哄着几十个孩子，办学是假，种地是真”，“孩子上农校还是捣土坷垃，不如干脆回家拽牛尾巴”。<sup>①</sup>

从古今中外教育史看，教育是一种社会投入，经济条件是办学基础。历史上孔子学派、柏拉图学院、宋以降的书院、义学都是有经费保证的教育团体。苏区边区的红大、抗大虽曰自力更生，劳动建校，也只是节约办学经费，并非不要投入。“文革”前的共大标示“不要国家一分钱”，实际有地方财政投入，还占用社、场人力物力财产房地。“五七指示”赞赏耕读、工读一类融农工军商政学一体的教育团体，着眼点在培养“新人”，未考虑自给不自给之类的经济因素。而经济条件却是决定教育、学校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所熟知的五四前后出现的工读团、新村一类教育团体，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为动力，但无经济基础，所以一个一个都垮了。“文革”中为贯彻“五七指示”而办的“新型学校”则是以权力命令为动力，但也逃脱不了经济规律的支配，当挪用的国家经费和强迫命令占用的社队财物接济不上时，这类学校也就随之垮了。

吉林前郭蒙古族自治县“五七大学”与“五七教育网”经

<sup>①</sup> 《队办队用好》，载《山西日报》1975年2月10日。

验，初见于1973年11期《教育革命通讯》时，言其“努力实现不要国家一分钱”。该校1970年5月7日开办，3年招生1563人，1973年有在校生300人，10个专业，17个教师。许多专事生产的农场、林场、垦殖场尚且不能自给，一个边读书边劳动的团体如何能不要一分钱投资呢？不能不疑其“经验”有假。果然，1974年5月号《教育革命通讯》有文章介绍县委如何“做工作”办学时，不小心透露了个中秘密。原来是向教育局挤占普通教育经费，向畜牧局要兼职教师和经费。教师借来，工资开在原单位。教室、宿舍也占用其他单位和社队的。这也算“不要国家一分钱”？该县畜牧局曾根据“文革”前办耕读高中和畜牧兽医培训班“黄了”的历史经验教训，怀疑五七大学也不具备办学条件。结果这被当作“路线斗争”的反面教材了。许多地方办五七大学的重要经验，就是用革命大批判，对付“反面观点”和“右”的“修”的一套。结果违背教学规律的蛮干得以施展，许多“新生事物”、“新鲜经验”就这样制造出来。然后写材料时又吹大、变形。

辽宁朝阳地区的五七大学教育网就是一个吹的典型。朝阳农大竟把1969年底原沈阳农学院下放教师插队劳动，当作农业大学的开办。说这是“开门办学”的开始。把教师个人文化活动，如在农村教过政治夜校（读报）、介绍过农业技术、教唱过样板戏、代过中小学课，说成是朝阳农学院在农村办学（此时朝阳尚未开办呢）。其实到1970年11月教师集中开会讨论办学事宜时，老师们还在怀疑能不能办学，说：“下来一无校舍，二无设备，接受再教育可以，办学可不行。”材料上却吹早已办学了：“农大师生斗志昂，露天野地当课堂，送教上门全靠走，大学办在腿肚子上”，“要什么专业，我们就办什么专业，学制要

长就长，要短就短”。1970年底领导班子参观大寨回来说：“大寨真是一所最好的农业大学，我们就应当把农学院办成大寨这样子。”1971年末，奉省委指示，朝阳地、县两级都办五七农大，公社办五七农中，大队办科学实验队，联成“五七教育网”。后来朝阳大学各系又与朝阳地区各对口局合并，系主任与局长合署办公，搞成政校合一。吹说“朝阳地区有多大，学校就有多大。全区300万人民都是我们的老师……全区3万平方公里土地、山水、林田就是我们教学、科研的广阔天地”。所有300万人民既是教师又是学生，3万平方公里土地既是行政区域又是学校，岂不是取消了学校？<sup>①</sup>

当然，除了虚而不实的“运动学校”和一批“政治样板”学校，也有办得比较实在的学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创办于1958年，60年代始终坚持下来，没有“运动过后一风吹”，没有大起大落，又有一定经济基础，“文革”中继续开办，亦未随政治吹嘘而大哄大起，一仍原有规模，为农村和县社两级培养了不少人才（农机手、民办教师、乡村干部、会计、赤脚医生、电工），也搞了一些农业科学试验。如宜黄共大分校师生在推广糖化饲料养猪时，发现用920、固氮菌作曲种虽好，但不能自制；而用中曲、庆曲，要花钱费粮。后来张老师从农民中了解到辣蓼草可以驱蛔虫健胃和制酒曲发酵，使用这种野草晒干、砸碎拌糖、加水，试验22次，发酵成功。<sup>②</sup>

河南潢川县于1967年1月办抗大医校。基于一个良好愿望：全区40万农村人口，仅有医生207人，平均每万人口不足5名

① 徐明：《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学而奋斗》，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1期。

② 宜黄县教育组：《井冈山下新一代》，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5期。

医生，农民缺医少药。该县条件不足，却还是办起了虽不正规但可救急、聊胜于无的医校。第一期招64人，大多是高小、初中生，作短期单科培训（眼科），使他们学会矫正内翻倒睫技术，部分人学会斜视矫正术。90天为2500人矫正，治病1.6万人次。该校也不可避免受到“文革”政治运动的影响，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在“师生中开展大讲家史，忆苦思甜活动”，批刘批林批孔；实行半日劳动制，参加建桥梁、校舍、水库劳动，还开田300亩。学员“思想不通”，说“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劳动的”，“我们来自农村，脚上的泥巴还没干，不要再劳动”。后来劳动减为总时数的15%。

限于师资、生源文化素质、经费、设备等条件，潢川抗大医校对学制、教学内容方法进行了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学制定为：普训班一年，培养大队赤脚医生（卫生员）。妇幼卫生班40天，培养接生妇。针灸短训班7天，培养业余土郎中。课程把普通医校30门删并为8门。“贫下中农为抗大医校提出了教学大纲：‘可别光讲空头理论，农村有啥病，你们就给学生教会防治啥病’”。一讲常见病，不讲稀有病。二讲“望、闻、问、切”，不讲放射、超声波、生化检查常识。三讲土方法“一根针、一把草、一双手”。从这些条款看，是相当“实用主义”的，但它是从办“穷教育”的实际出发的，不是从“阶级斗争”、“左”倾政治出发的瞎折腾，所以应当予以适当的肯定。<sup>①</sup>

<sup>①</sup> 河南潢川县委：《走抗大道路学朝农经验坚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载《医学教育要改革》，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版。

## 第四节 “朝阳农学院经验”—— 向政训班与生产队看齐

### 一、朝阳农学院概况

朝阳农学院是从沈阳农学院分出的一部分。1958年8月1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过一句话：“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文革”中根据毛泽东10年前一句并非深思熟虑的话，把农业院校折腾得七零八散。1969年底辽宁省委决定将沈阳农学院分拆几块，本部迁铁岭地区，后易名辽宁农学院，另一部农田水利专业迁朝阳地区。说“迁”，由于校舍、实验田无法迁，仪器设备也未带，实际只是迁去60多个教师职工，一锅端，到农村插队劳动。后来的朝阳农学院经验材料，都说这是迁校农村的第一步，笔者看却更像是下放教师。决定如军令，催逼教师立刻离城，年也不让在城里过，腊月25日，一竿子下到北四家子公社插队落户。这些在社队劳动改造的教师，帮生产队念念报纸、教唱样板戏、代讲几节中小学的课，后来大吹这是“开门办学”。其实当时大学尚未复办，并未招生，沈阳农学院已分拆不复存在，朝阳农学院也未出世（朝阳农学院定下校名是1974年12月的事），那些只是下放知识分子在农村的个人文化活动。

1970年5月朝阳地委令这批教师与地区农科所、水利农业中专合并，称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后才改名辽宁农学院朝

阳分院)。但直到1970年秋冬,各大学才奉令开始筹备招生。当时下放在朝阳的党员教师才开会讨论在朝阳农村办学。多数教师认为不具办学条件:无校舍,无设备,在农村办“科教基点”是别出花样。会议开不下去,几个领导跑去大寨参观,回来说农学院可以办成大寨大队的样子。结果办了分散在各地的“科教基点”,主要向农民介绍科技知识,并非办大学。后来把这次办学讨论说成是“农业大学从城里搬到农村”的“一场深刻思想斗争”,是“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

1971年奉省委指示开始正式办农学院,招三年制的专业班。1971年末,省委又指示朝阳地委,将各县的“科教基点”改办五七农大,各公社办五七中学,与朝阳农学院并无隶属关系了。朝阳农学院本部设在距朝阳镇几十里地的两处山沟,盖房子30余间,造田60亩(据称1972年产粮6万斤,1973年产16万斤,1974年产24万斤)。至1975年有教职工320人,在校生1200人。陆续设了农学、果林、畜牧兽医、农田水利、水工建设、陆地水文6个专业。到1975年春毕业三年制学生167人,参加短期培训的农民近万人。<sup>①</sup>

## 二、对朝阳农学院的政治宣传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宣传朝阳农学院的文章,题为《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宣传规格不

<sup>①</sup> “朝阳农学院经验”调查文章,载《光明日报》1977年10月23日及《人民日报》1978年2月22日第2版;《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大而奋斗》,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1期;《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载《红旗》1975年第5期。

高，政治主旨不明，当时并未引人注目。

事隔一年，到1974年底，经过反潮流、反“复辟回潮”、批林批孔几大回合斗争，极左势力已明确了利用教育问题作政治进攻的战略，作打击的方向、目标、部位，遂决定推出“朝阳农学院经验”作政治炮弹打人。这样，对朝阳农学院的宣传便陡然升级。并无什么办学成功经验的朝阳农学院，便根据上级需要，一篇一篇、大块大块出“经验”了。

1974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农大毕业当农民好》，这是对朝阳农学院的第一篇调查报导。12月21日至28日，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从此拉开大规模宣传的序幕。到1976年10月止，共发稿150多篇（其中《人民日报》27篇），拍电影9部（《新型农大》、《宣战》等）。1975年4月2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推广辽宁朝阳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学朝农活动在全国进一步铺开。

1974年底现场会最主要最突出的主题，就是把朝农经验规定为——“搬下来”。其实所谓“革命性的搬迁”，当初不过是沈阳农学院水利专业60多个教师来朝阳地区农村插队落户而已。后来为了突出“搬迁”，便把此事宣传成“搬下来”，“分散办学”的开始。会上大谈“要把搬迁问题贯彻始终”，“搬不搬下去是前进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为什么如此渲染“搬下来”？原来，周恩来曾批准过从北京迁去陕北的一所农业大学，迁回河北。突出“搬迁”，就是暗攻此事。迟群曾参与此事，写于1973年1月13日的搬迁请示报告正是他主持起草的，并由他修改呈报，上有他的亲笔文字：“这样做对其他搬迁院校不致有较大的不良影响”，“对发展华北地区的农业，将会比较



好地作出贡献”。而现场会上，当华北农大的领导再三声明搬迁经周总理批准时，殊不知迟群等人正是冲此而来。迟群不顾一年多之前他自己也参预其事，在会上大加挞伐：“从陕北搬回来，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毛远新说：“华北农大从陕北搬回涿县……这是走回头路，是回潮！”<sup>①</sup>

朝农经验一出世就参与政治阴谋，并因此而成为政治样板学校。

在现场会前，连朝阳农学院的校名也还没确定下来。所谓经验，更有不少是捏造出来的。如写《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一文时，朝农书记随手将科研成果填为23项，有人提出没有那么多，又随手改为22项。而实际成果不过两三项。现场会上，把一个被本地群众称为“扒瞎”的人，树为批“四定一奖”的英雄。一个在当地有“大吹”之名的王大学，会迎合政治需要编造事迹，吹说进了大学学习使棉桃长得茶碗大。其实这个建平县万寿公社的52岁老贫农，只不过参加了当地的“分段学习班”的群众培训，但他却“逢人就讲自己上大学的体会，每次开会都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他不识多少字，但对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体会很深，对旧的教育制度非常痛恨”，常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50多岁的人，文化又低，哪能上大学！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于是便封他“王大学”，赞他念书念出了“无产阶级的感情”，派他到处作报告，大批大颂，事迹多次上报。可惜老贫农并未成为真大学生，

<sup>①</sup> “朝阳农学院经验”调查文章，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22日第2版，及《光明日报》1977年10月23日。

倒做了别人的政治工具。<sup>①</sup>

为了抬高朝农的政治地位，江青亲自为该校选送学生。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派 14 人的代表团赴朝农取经，说“我们是怀着当年到延安上抗大的心情来到朝农的”。朝农一把手受宠若惊，说“人家都把我们比作延安了，我们自己还不理解这里的深刻含义”。

### 三、集“左”之大成的“经验”

朝阳农学院自 1971 年始办，到 1974 年底也才 4 年办学历史，并无多少成功的办学经验，也不比别的学校高明。但自 1974 年 12 月召开现场会，成为“政治样板学校”之后，便产生出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有的是根据政治需要捏造的或虚夸的，有的是失败的折腾，却反而说成“成功的经验”，特点是集 1958 年“教育大革命”以来极左做法之大成，并上升为系统的极左教育理论。

#### 1. “办成政治大学”

毛远新提出“朝阳农学院首先办成政治大学，朝阳农学院拿出办政治大学方案”；“首先办成政治大学，其次办成劳动大学，最后办成农业大学”。朝阳农学院党委提出“旧农大搞‘智育第一’，新农大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政治大学”是针对文化专业学习提出的。据称：（1）办成“纯业务大学”，就不能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而变成“资产阶级复辟工具”。（2）不把“转变思想”放首位，阶级斗争作主课，学生就会“被资产阶级拉过去”，培养的人“必须首先懂得阶级斗争

<sup>①</sup> “朝阳农学院经验”调查文章，载《人民日报》1978 年 2 月 22 日第 2 版，及《光明日报》1977 年 11 月 29 日。

和路线斗争”。<sup>①</sup> 秦怀文的文章说，“我们的专业千差万别，但是，归根到底，首先要上的是阶级斗争的专业”；“上了大学，即使学的技术能上月球，而人的思想却趴下了，这样的教育再‘高’，也是无产阶级所不需要的”。<sup>②</sup>

“办成政治大学”的含义，一是以政治为主课，二是学校工作配合政治运动，三是培养“搞阶级斗争”的学生。为此规定学生每年一个月下社队参加政治运动。<sup>③</sup> 此处仅举一例，以见一斑。如为了“有力地配合批林批孔运动”，朝农帮助 80 万人口的朝阳县培训理论辅导员 1116 名，建立理论学习小组 3946 个，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员 26100 人，占全县劳动力 1/10。<sup>④</sup>

## 2. “办成农场”

“文革”中全国学校普遍执行所谓“教育、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教学新体制。有的学校，实际是贯彻“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而朝农明确三者关系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还提出以“学大寨为基础课”。学生一入学就种高粱，“不学土壤学，不学栽培学”。本来农学系有田 150 亩，果林系有树 2700 棵，畜牧兽医系有猪场、兽医院、配种站，已经实现学校、生产队、科研所三合一。但学校的劳动不算劳动，还要学员一年参加两次大会战，仅 1976 年一年劳动达 120 天。农学系 76 届学生 3 年在校 976 天，上专业课只 283 天，年均 94 天，仅占总时间的 1/5。畜牧兽医等系，原沈阳农学院的学制是 4~5 年，现减为

① “朝阳农学院经验”调查文章，载《辽宁日报》1977 年 10 月 17 日；《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载《人民日报》1976 年 2 月 14 日。

② 《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大学教育》，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 年第 2 期。

③ 《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大而奋斗》，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 年第 1 期。

④ 《又一朵教育革命的鲜花》，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25 页。

2~3年，课程由30~40门，减为8~10门。如此多的半工半读劳动，经济效益却并不大。朝农自吹自给“双百万”（粮百万斤，经费百万元）。事实上办校财政拨款，从1970年的38万元增至1976年的211万元。这还未计入挤占地方其它部门尤其中小学普通教育的经费、房产、田亩、人力、物力。<sup>①</sup>

### 3. “大学就是大家来学”

1958年“教育大跃进”搞群众办学、搞群众运动办学，实际是命令主义瞎指挥，搞乱了办学体制，降低了教育质量。看似遍地大学，实是浮夸虚冒，劳民伤财。“大学就是大家来学”，承袭并发展了1958年的“左”的冒进错误。

朝农党委提出“旧农大是少数人享受教育特权的‘小宝塔’，新农大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使广大群众都有机会受教育”<sup>②</sup>。教育发展水平受经济条件制约，是一条客观规律。要使多数人享受高等教育，靠发展生产力。朝农却想用降低教育质量和平均主义的做法，来实现“大家上大学”。实际并未做到“大家上学”，而“所上的学”，也并非大学，只是乱哄哄的短期训练班（几天至几周几月）。

朝阳地委书记吹“大学要大家来办，大家能来上大学，要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全区有多大，朝农就有多大，全区有多少人，朝农就有多少学生”；“地、县办大学，公社也办大学”。组成以朝农为中心的“教育网”，“上至99（岁），下到刚

① “朝阳农学院经验”调查文章，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22日第2版，及《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0日第2版，载《辽宁日报》1977年10月17日；《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载《人民日报》1976年2月14日；《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大而奋斗》，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1期；《又一朵教育革命的新花》，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第124页。

② 《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载《人民日报》1976年2月14日。

会走，人人都在组织之中，人人都在学习之中”。1971年各县开始办五七农大，后来各公社也办。1975年底，全区194个公社办151个大学，其中89个公社将中学空出办大学，而中学放至大队；62个公社直接将中学改名为大学。这种公社大学，实际是中学和公社党政企事业机关的合并。如北票县一公社将公社中学、社直属企事业单位、大队、生产队并为一个“综合五七大学”，下属10个厂（场）、10个站、125个分校。这些“大学”，一无教材，二缺教师，只叫学生“开门办学”。建平县一个公社“大学”，把300多学生分散到7个山头，每个专业系种地300~400亩，天天干活，一学期只上半个月课。

1972年朝阳县办五七大学，头两年就耗费县财政52万元。把该县原有的一些学校、机关（农业局、卫生局、商业局）所属单位和一些工厂，强拼硬凑为一所五七大学，按行业性质划为农业、农机、师范、卫生、财贸5个分校<sup>①</sup>。教职工就是原先企事业单位的人，并仍属原单位编制、拿原单位工资。朝阳地区则与朝阳农学院本部各系合并，合署办公，学员参与领导，局领导过问学校事务。这就是所谓“政校合一”、按行政层级层层办学的“五七大学教育网”<sup>②</sup>。实际这种“政校合一”，不过是政府以学校名义发布几个命令，做几件办学办班的事而已，政还是政，校则并不存在，或只存在于指示、文件、会议、材料和口头上。正如朝阳地委负责人向参观者介绍的那样：“要问朝农有多大，你就看我们朝阳地区有多大，要问朝农有多少老师，你就看我们地区有多少个贫下中农”。这岂不是在糊弄人！

① 《又一朵教育革命的新花》，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第9页。

② “朝阳农学院经验”调查文章，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22日第2版，载《光明日报》1977年11月29日第2版，载《辽宁日报》1977年10月17日。

地、县、社“五七教育网”，号称“几年（实际1972年始办至1974年底，只两年多）培养10万农业技术骨干”。事实远非如此，仅朝阳县就自称3年培养10918人。其中1~3年学习班20个，培养910人；流动班57期，培养6118人；函授3890人。<sup>①</sup>据1977年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和1978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调查揭露，朝农本部所说培养农业科技人才1.6万，其中1万多只是看过朝农流动展览的人，几千人只是参加过几天短训班，而真正在校学了3年的只不过几百人。可见其统计方法的奥妙。

“大家上大学”，后果严重。大学只是虚架子，师资、设备、经费、生源素质，无一具备办大学的条件。而普通中小学教育却遭殃了，1976年仅中学改大学一项，占用普通中小学教育经费50余万元、教师880多人、教室841个。还毁坏校舍483间、桌凳3.7万套。北票一个公社大学提出口号：“不守那个空壳廊（教室），一年不进小课堂”。该校竟被誉为“没教室、没教师、没教材的三无新型学校”。<sup>②</sup>

#### 4. “社来社去”与“划等号”

“社来社去”并非朝农新创。“文化大革命”以前，江西创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突出了这一条分配原则。这是鉴于计划体制对大中专毕业生实行统招统配的弊端实行的一个新办法。6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受挫，中学毕业生就业机会比“一五”计划时期大大减少，而教育事业却比50年代在规模上大大发展了，国家没有这么多职业岗位来安排学生。所以农村中学毕业

<sup>①</sup> 《又一朵教育革命的新花》，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第125页。

<sup>②</sup> “朝阳农学院经验”调查文章，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25日第2版。

生的去向，只能是回乡；而城市中學生，也被動員一部分上山下鄉。1958年以後，一些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學校，如江西共大、各省的農業中學，由於所需投資極少，便因陋就簡興辦起來，用以擴大中等教育及職業教育。這些學校面向農村培養人才，它的畢業生只能有一個出路：“社來社去”或“城來社去”。

應當指出，“文革”前在宣傳上只突出這種分配方法的政治意義，為其披上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說這是“一場革命”，是“縮小城鄉差別”、“知識分子革命化”的光輝道路。儘管如此，當時並未頭腦發熱一刀切，未強令所有學校都如此“革命”一下，就連江西共大也未一律實行。共大總校和部分分校，及有的學校的第一屆或某一班次的畢業學生，仍然是按大專或中專分配了工作。

朝農為了把“社來社去”說成是自己獨創的“嶄新事物”，一邊在實際做法上將其極端化、絕對化，一邊在宣傳上將這些極左做法系統化、理論化。無限拔高“社來社去”的“革命”意義，說“學校要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就必須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堅持學生不但從工農中來，而且回到工農中去”，“農業大學培養新農民是向資產階級法權挑戰”，“我們招生，把立志當一輩子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新農民，作為錄取新生的主要標準”。招生標準就一個：願當農民“思想通了的，態度堅決的，就可以入學”，“學校要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決不能單純地理解成為提高生產力服務。重要的問題是培養的學生願不願回到工農中去”。

朝農以自己“社來社去”的絕對化做法，去否定其他大學為訓練各方面人材而特有的培養目標。如攻擊沈陽農學院“培

养‘红色农学家’之类”，“仍然鼓吹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一套，结果只能使工农子弟仍然朝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路上走”。编造说沈农毕业的7000大学生“农村不愿呆，农活干不了”，“旧大学培养的学生轻视工农，轻视农村，轻视体力劳动。培养这样的学生，只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鼓吹通过不培养知识分子的方法，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说“社来社去培养新农民”，就“拆毁了通过读书爬上特权阶层的阶梯”，为“消灭三大差别搭上了桥梁”。对这一套“左”货，1972年初就有人批判：“学校培养‘社来社去’的农民，大大超越了农村的现实需要，是极左路线的产物”。<sup>①</sup>

1975年教育部长周荣鑫也予以批评：“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大学一律实行社来社去，“根本脱离实际，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sup>②</sup>后来，他又在1975年10月20日召开的铁道部人事局教育座谈会上批评“把社来社去推广到各地区各类院校行不通”，“有一个师范学院不敢提培养师资，而提培养农民”。<sup>③</sup>

可是朝农反诬这些正确的批评，是要“永远保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应当永远由少数特权者垄断文化科学”<sup>④</sup>。宣称“社来社去当农民”是“由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转变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场革命，是把学校由资产阶级专政工具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一场严重斗争”。<sup>⑤</sup>

① 《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大而奋斗》，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1期；《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载《红旗》1975年第1期。

② 《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载《人民日报》1976年2月14日。

③ 《教育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载《教育研究》1979年第1期。

④ 《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载《人民日报》1976年2月14日。

⑤ 《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大而奋斗》，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1期。



朝农这一套绝对化的做法，经常与国家实际需要发生矛盾。如1973年省下达水利专业系一个任务，面向全省招收、培养一批急需的县级水利技术干部。因为这与极左意识形态相冲突，教育计划上上下下几个月，到1974年开学还定不下来。此时正好批林批孔开始了，大批17年“读书做官论”，大批孔子“学而优则仕”，借贫下中农之口说：“谁要说它（社来社去）不好，叫他到我们这儿来辩论”。硬是不顾国家经济建设和水利事业的需要，把培养任务改变了。还在水利专业班物色了一个入学前本是水利系统职工的贾惠珍，反复做她“思想工作”，强迫她声明放弃国家职工编制去当农民，做“决心和‘学而优则仕’彻底决裂”的典型。<sup>①</sup>

事实上朝农也并未做到毕业生“社来社去”。从1971年正式招收三年制长班学员，到1975年，共毕业167人。据1975年12月9日《光明日报》一篇调查，也只验出“当农民”的是125人。125人中在朝阳当地做县、公社农业技术干部的，留朝农本校当教师的，本来是拿国家工资的，为了宣传需要而改令他们拿“工分”。这125人中，当社员的仅6人，当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的21人，当公社、大队技术员的77人，当县级机关技术员的3人，当教师的18人。1975年5月《红旗》杂志就朝农“社来社去”发表《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说“那种认为大学生回到工农中去就将妨碍科学文化发展的观点，是轻视农民，轻视实践，是恩格斯早已批判过的杜林那种妄图把拉车夫与建筑师的职业永久化的资产阶级观点，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科学文化阵地的垄断”。恩格斯并没有主张立即取消拉车夫与

<sup>①</sup> 《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大而奋斗》，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1期。

建筑师的职业分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人为取消脑体分工，只会制造混乱，其结果不是跃进到共产主义，而是倒退到原始社会。

把“社来社去”这么一种适用于农业职业教育的培养与分配方法，推行到所有高校，予以绝对化普遍化，发展成为所谓“划等号”（大学生=农民），实在是把无知当革命。篡改了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也就动摇了否定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培养目标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和出发点，师范教育不提培养师资而吹培养农民，对教学的冲击是可想而知。不仅农学院和师范学院受冲击，理工医文各类院校都受冲击。如沈阳医学院就提出“我们学院首先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大学，其次才是医学院”，并对照朝农“社来社去”，检查自己培养医生是错了，错在毕业生大多分到县以上医院，而没有去农村当农民或拿工分的赤脚医生。<sup>①</sup>

至于指责“旧学校”培养的学生不愿下农村，也是片面的。“新学校”不教文化、专搞“转变思想”教出的学生也不愿下农村，就是不识字的农民也不愿呆在农村而向往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一个“思想问题”，这是三大差别的现实存在及其影响。缩小三大差别靠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用“思想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教育青年立志务农”的方法来解决三大差别，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 5. 三上三下

“文革”中所有学校都实行“开门办学”的新教学体制，朝

<sup>①</sup> 《学朝农、迈大步，为无产阶级专政作贡献》，载《医学教育要改革》，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版。

农做得更彻底一些，并另取名为“三上三下”，“四上四下”，“几上几下”。农学系的三年学习安排如下：一年级在校半工半读；二年级实行“四上四下”（年初下生产队订生产计划，春季下队播种，入伏下队田间管理，秋季下队收割），总计7个月在校半工半读，5个月下农村劳动；三年级又是“三上三下”（内容同上），总计5个月在校半工半读，7个月下农村劳动。

短期班如棉花班，也是这样“三上三下”分段教学：播种前先来学校学播种、施肥、浸种，然后回去生产；苗长出来，又回学校学田间管理、除虫、打药、整枝，再回去生产。上列农活都是农民的基本把式，用得着来学吗？生产大忙中又如何有空闲来领受“分段教学”呢？<sup>①</sup>

“三上三下”、“开门办学”，是联系实际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以农事生产为序而不是以教学工作为序，学生分散在农村生活，频繁上下进出，人散心散，不便管理也不易集中精力学习。典型的例子，如“朝农有个学生，在校期间经常回生产队，搞政治夜校，组织科学实验队，参加生产劳动，科学种田，取得很大成果。结果还在二年级上学的时候，大队就选他当党支部副书记”。<sup>②</sup> 学生经常往家跑，插手当地的政务和管理，还走马上任官职，他究竟还算不算学生？个个学生都这样随意“上上下下”经常跑回生产队（家），学校怎么管理？有没有校规校纪？可朝农却大夸这种“几上几下”是“同三大革命运动息息相通”，是“冲破学校小天地”“打乱旧教学秩序”，而攻击

① 《又一朵教育革命的新花》，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

② 秦怀文：《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大学教育》，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2期。

“旧农大高楼深院，与世隔绝”。<sup>①</sup>

#### 6. “对着干”

“与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是1974年12月学习朝农现场会上提出来的，把这作为朝农办学“成功”的一条经验。这个口号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论、“17年教育黑线专政”论更“左”、更错。前两个论点只是对17年教育的错误估计，没有提出全盘扬弃。而“对着干”是绝对化的，在哲学上是形而上学的。列宁主张继承人类积累的全部知识的总和，毛泽东也说过批判继承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而朝农党委1975年5月在《红旗》发表《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文章，说：“封建社会几千年，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形成的这一整套教育制度、方针和方法，从招生、考试到分配，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方式，都体现着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志，都是为造就剥削阶级的精神贵族和奴仆服务的。它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手段。继承它、沿袭它，就意味着继续在教育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文章指责“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一伙在教育方面提出学校应当‘基本照旧’”。不仅否定几千年教育遗产，连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也加以否定。这就是“对着干”的由来。

以朝农党委名义发表在1976年2月14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对“对着干”作了具体阐发。这篇题为《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我们是在哪些重大问题上坚决同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的文章，共列举了10个问题。

<sup>①</sup> 《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大而奋斗》，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1期；《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载《人民日报》1976年2月14日。

“一、旧农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新农大就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一是指知识分子在学校的“数量优势”和起业务作用，并非指知识分子居领导地位，二是指派去的“党领导被资产阶级化掉，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这实际指学校党领导“左”得不够，只是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方针，而不是实行“全面专政”。因而该文提出要搞清“在上层建筑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理论”。那么“对着干”的做法，就是要抛弃过去17年党领导学校的方式，而所谓“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实际就是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

“二、旧农大集中办在城市里，新农大分散办在农村”（参看“大学分散农村办学”）。

“三、旧农大大搞‘学而优则仕’，新农大实行‘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参看“‘社来社去’与‘划等号’”）。

“四、旧农大大搞‘智育第一’，新农大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参看“办成政治大学”）。

“五、旧农大极力标榜正规化，新农大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参看“办成农场”）。

“六、旧农大搞‘三中心’、‘老三段’，新农大建立以科研、生产带动教学的‘三结合’新体制”（参看“开门办学的新教学体制”）。

“七、旧农大高楼深院，与世隔绝，新农大坚持同三大革命运动息息相通”（参看“三上三下”）。

“八、旧农大是少数人享受教育特权的‘小宝塔’，新农大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使广大群众都有机会受教育”（参看

“大学就是大家来学”）。

“九、旧农大只让学生受奴化，新农大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参看“‘上管改’状况”）。

“十、旧农大教师脱离工农，新农大坚持教师同工农结合，努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其实“旧农大”教师还是努力结合工农的，广大知识分子对工农还是有感情的。至于少数知识分子的一些小毛病，并不导致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根本利益冲突。再说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团结互助、互教、互学，并不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更不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脱离工农”的指斥，只不过是打人的棍子。“新农大”是如何“坚持教师同工农结合的”呢？排斥、压制、贬损教师和别有用心地捧高“大老粗”，制造二者的矛盾与分裂，捏造与煽动二者之间的“阶级斗争”，造成一方压另一方，把这叫做“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他们用心险恶地宣扬：“那些自命为懂教育的人（指教师），不注意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往往成为革命的对立面，而在教育革命中表现最坚决、最勇敢、最富有创造性的则是那些深受剥削阶级的文化专政之苦、连学校门也进不了的‘大老粗’。”要教师检查“是否同工人、贫下中农一样痛恨封、资、修的旧教育”，高唱“大老粗上大学——管大学——用大学”。<sup>①</sup> 声称“工人、贫下中农成为教育革命的主力军，打破了知识分子对教育阵地独霸的一统天下”。<sup>②</sup> 原来，“教育革命”就是煽动“大老粗”去“恨”、“打”、“管”知识分子，这种“结合”方式，怎么能“建立起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

① 《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大学教育》，载《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2期。

② 朝阳农学院党委：《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载《红旗》1975年第5期。

队伍”呢？

## 第五节 其他“新生事物”综述

### 一、下放农村公办小学教师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山东省嘉祥县两位小学教师《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革命群众来信”。这个建议荒谬地主张把所有农村小学公办教师及其子女下放回原籍，取消工资、取消商品粮，回原籍农村生产队吃工分粮，“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这个经济上打击教师、政治上把教师置于农民监督之下的建议，投合极左势力，因而被编者按吹为革命“新生事物”、“教育革命的方向”，开动宣传机器予以鼓吹，开辟专栏热烈讨论，一直持续了近200期。建议的出发点是：17年教育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育大权不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而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为此，不惜向广大在艰苦条件下勤勤恳恳辛苦工作的农村小学教师身上大泼污水，诬蔑他们与社员之间“有一条沟”，“总是格格不入”，“轻视贫下中农，不能很好为贫下中农服务”。说只有把他们下放回原籍才“有利于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才是这些教师“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这种“再教育”和“改造”，实际上成为政治迫害。一部分出身不好的教师放回原籍后，当作地富分子一样受群众监督改造。其他出身的教师，也被用扣发工资、停供口粮、取消公费医疗、限期离校的手段赶回原籍，被原籍群众视作特别的改造对象。

许多教师回原籍后，住房、口粮、子女均无法安排，找不到安身之所，工分也不给记。教师一边教学一边同社员一样分粮、分菜、推磨压碾、养猪积肥、种自留地等。

山东省首当其冲，被赶回原籍的教师计4万之众，占当时山东农村公办教师总数的33%。而嘉祥县全部一千余名农村公办教师三天之内被统统赶走。这严重破坏了学校管理体制，造成教育系统的大混乱。师资分布不平衡更突出了，文化基础差的地区尤其惨，多年支援这些地区的公办教师骨干几乎跑光，许多学校因此关门。而一些文化基础好的地区，教师一下子大增，如高密县仅康庄一个大队就增加教师70人。教师太多的地区，安排不下，让教师回队劳动，造成人才浪费。

山东的做法虽未在全国推行，但不少地方确实乱了一阵。河北就搞全省试点，竟将几十万农村小学公办教师下放回原籍大队，取消工资改记工分，取消商品粮改吃农村粮。这次下放，人数众多，规模浩大，影响极坏。<sup>①</sup>

1969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农村教师工资可实行民办公助》，介绍吉林东丰县南屯基公社把万兴小学下放万兴大队办，教师工资改为工分制，另由国家补贴一部分。5月12日又发表该省梨树县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正式提出把原公办农村中小学改为民办公助，教师工资改为工分加补贴。这样，就把嘉祥县两名小学教师的建议升级为一个县的教育大纲，进一步号召全国仿效，以降低农村教师本来就低微的生活待遇。当时，认为农村教师生活不应优于贫下中农。将公办学校转给社队办，政治上似乎是抬高贫下中农地位，而经济上实在是加

<sup>①</sup> 《中国教育年鉴》地方卷（1949-1984），第124页。



重了贫下中农负担。

1972年教育调整，各地都大批安排下放教师重回学校。山东也部分纠正了嘉祥县的极端做法。1974年批林批孔，姚文元派人先后三次到嘉祥县，追查为什么停止执行《建议》，为什么把下放教师收回，为什么不发展《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作者之一入党，这些人责备嘉祥县委“扼杀新生事物”，“压制新生力量”，面斥“你们嘉祥县的问题严重”，“严重得通到天上去了，姚文元直接过问”。<sup>①</sup>

“下放农村公办小学”的讨论专栏，后来又加入城市中小学如何办的讨论，在《人民日报》上一直延续到1976年8月26日，一共出了197期。这场讨论的结果，是使农村民办教师的数量，由1965年占农村小学教师总数的43.5%上升到1975年的59.1%<sup>②</sup>。数量十分庞大，1973年民办教师为280余万人，工农兵兼职教师42万人。<sup>③</sup>新时期后，足足花了20多年时间，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预计到本世纪末，才能将这批人全部转为公办教师。

## 二、城市中小学下放工厂、街道办

《人民日报》推出“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讨论之后半个月，1968年12月2日又开展“城市中、小学如何办”的讨论，各地读者纷纷致信提出由工厂、街道接办。此后，许多城市搞“定厂办校”，一些社区中学转为厂办中学，另一些中小

① 揭发姚文元插手嘉祥县“侯王建议”的文章，载《光明日报》1978年10月21日第3版。

② 《中国教育年鉴》总卷（1949~1981），第84页。

③ 《中小学教育革命取得新进展》，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1期。

学则改为由街道办事处领导。1969年1月27日,《红旗》第2期发表兰州市五中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的经验,变全日制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1969年6月沈阳市大办“抗大”式街道小学,校舍绝大部分阴暗潮湿不合规格,请来的教师也不合要求<sup>①</sup>。如同下放农村公办小学一样,政治上的考虑,是把知识分子置于工厂和街道劳动人民管理之下,废除或削弱过去由教育行政部门的内行领导教育的权力;而经济上是想让企业、社会分担教育经费,以扩大普及中小学教育。以削弱教育的方式,普及低质量的教育。

### 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

同济大学“五七公社”,是“教育革命”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新生事物”,前后达11年之久,是张春桥、姚文元抓的“教育革命”样板。

建工系与建筑系,原是以建筑为主的上海同济大学的两个基础骨干系科,主要培养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学、城市规划、建筑组织和管理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1967年11月张春桥、姚文元抓“教育革命”试点,将这两个系合并,办“五七公社”。“公社”把学校、施工队、设计院捏合成一体,组成一个“既是学校,也是施工单位,又是设计部门”的所谓“三结合办学新体制”,作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样板。

原来的系与教研室被取消,70%以上干部被撤换。许多教师、甚至年过70的老弱多病的教授被编入施工队班组,跟班劳动,当“建筑野战军”。两系259名教师,受打击迫害的有92

<sup>①</sup> 《中国教育年鉴》地方卷(1949~1984),第251页。

人。这个“公社”的教学方法，就是被称为工科院校“惟一有效的结合典型工程（产品）进行教学”。削弱减少基础理论教学时间，打破基础理论系统性、循序性而配合工程教学，用什么学什么。

这就使得学员所学基础知识甚少，不能适应专业工作需要。“五七公社”首届 181 名毕业生中，到 1977 年止，能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的只有 67 人，占 37%。其余 114 人，改做技术管理和行政工作。

1975 年底，姚文元亲笔修改的《办好社会主义工科大学——同济大学“五七公社”三结合办学的调整》一文，称“五七公社”为办好社会主义工科大学，取得了初步的但又是重要的经验。实际是对工科教育造成极大破坏（参看“结合典型产品教学”）。

1978 年 8 月经教育部同意、上海市委批准，同济大学撤消“五七公社”，恢复了原来建工系和建筑系的建制和名称，并分别恢复和更新了城市规划、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学、工程设计优化和管理自动化等 9 个专业。同时另外复设了规划建筑设计院。对尚在校的 75 届、76 届工农兵学员，施以加强基础教育的补课措施。<sup>①</sup>

#### 四、中学“结合典型产品与战斗任务教学”

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主要是传授基本工具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教育革命”却强调“事事直接经验”，大批“黑板上开机器，试管里种黄瓜”。殊不知人掌握的“多数的知

<sup>①</sup> 同济大学党委批判“五七公社”的文章，载《人民日报》1978 年 8 月 10 日。

识，都是间接的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实践论》）。地理课无法领学生去非洲，而数学课却可以下厂。数学课中的三章《划圆弧线》、《立体图形》、《识图》，本来完全可以在课堂出示模型教具，但上海中国五七中学却照搬大学“结合典型产品”教学，把学生领去工厂，找了个电磁滑差的“典型产品”来教学。<sup>①</sup>

淮海中学搞“理工科教育改革”，是上海的“教育革命”样板。该校先是以修理直流电动机为“典型任务”，结合物理的电学、力学教学。后来化学、电子、数学都“‘自寻出路’，各有各的典型产品，结果力量分散，教学也显得零乱”。最后，“抓住录音机这只综合性的产品带动整个理工课程”。不过，这样教学也还是零乱。请看他们是如何“结合录音机”这只“典型产品”教学的：（1）结合录音机零件的电镀要用水，引出分子、原子、氢氧、离子概念。（2）结合录音机传动带，讲机械力学。（3）结合电磁头、磁带，讲电学。（4）结合整流、滤波、稳压、升压，讲电子。（5）结合画线路图，讲数学。这样，把中学数、理、化各个自成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绞成一团。围绕“产品”，而不是围绕由浅入深的认知规律提出概念，使学生莫名其妙，只得到一些零零碎碎、杂乱无章的印象。这种“实践”教学法，对中学教学的破坏比大学更甚。<sup>②</sup>

文科课程“结合战斗任务教学”，可以上海 61 中为例。该校 76 届一班由语文政治教师领着搞评法批儒，分成几个小组去市图书馆查资料。自带干粮，从早 7 点干到晚 8 点，用 3 周时间

① 《上海中国五七中学调查报告》，载上海《教育实践》1976 年第 5 期。

② 参见上海《教育实践》1976 年第 8、9 合期，第 54 页。

查完《荀子集注》、《韩非浅解》、《临川文集》、《论语》、《孟子正义》等30多部古书，查阅《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7种报刊，摘出儒、法教育思想言论近千条，编成“四对照”（马列毛、法家、林彪、儒家）。<sup>①</sup>这完全是模仿大学文科的做法，不顾中学生的认知特点，不讲教育规律。

以上只是少数样板中学推出的“经验”，多数中学是无法做到“结合典型产品和战斗任务教学”的，因为学生文化基础太低，对这种教学法根本领受不了。

---

<sup>①</sup> 《敢向圣经开刀，要把圣人批倒》，载《文汇报》1974年8月2日。

---

---

## 第五章 围绕“教育革命”的两次斗争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对“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局的走势有一段准确的概括。“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同时，也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次历史转机，使得有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而把整个中国导向正常的发展轨道。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在当时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去抓住这个历史转机，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方向发展。可惜由于毛泽东未能充分领悟林彪事件的教训，继续

迷误和坚持左倾路线，而使这一历史转机被丧失”。在这一时期，围绕着坚持还是纠正“文革”的错误，展开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教育革命”问题成为这个时期斗争的一个焦点。

## 第一节 1972年教育的调整与复苏

### 一、周恩来发动教育调整

所谓历史转机，即在于“文革”及其利益集团遭受了空前的政治危机，阵势破裂，漏洞百出，党心民心所向，已发生利于结束“文革”的变化。人心厌斗，“人心思旧”，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复旧回潮”现象，这是任何政治强力也无法改变的趋势，这是上层进行调整的社会思想基础，又是调整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复旧”心理没有因尔后的几次批判运动而逆转，成为最后否定“文革”的群众思想基础。

上述特点，在教育界尤其明显。“教育革命”悖于常理的极端做法，靠政治批判推行和维持。“九·一三事件”后进行调整，即暗中向“文革”前回归，明里还是做出“教育革命”的样子。本来，可能如同1961年调整那样，在肯定“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纠“左”，重现1962年的生机。但极左势力出于政治利益和政治斗争的需要，不允许“复旧”，不允许纠“教育革命”之偏，从而使调整半途而废。

周恩来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主持了1972年至1973年中的政治调整。这次调整的实质是局部纠正“文革”之“左”，恢复“文革”前的一些合理做法。当时公开的提法是“落实政策”，即回归到以前的政策上去。后来“四人帮”攻之为“复旧”、

“复辟”，也算道出了实质所在。其中，教育政策的调整占有重要地位。

周恩来发动的教育调整主要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进行。但此前的一年里已经有所动作了。这是因为1970年中国政局发生了一件也是与林彪有关的大事。这一年8月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一直行时的林彪集团突遭严重挫败。会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愿发动了长达一年多的“批陈整风”，继续清算和不断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周恩来受毛泽东重托，主持了批判陈伯达和林彪党羽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的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他的地位大大加强了。他利用“批陈整风”时机，努力着手解决“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就在这年7月，周恩来指示成立国务院科学教育组，李四光任组长（1971年4月29日病逝后由刘西尧继任），刘西尧、迟群任副组长，立即开始办公，把科学教育工作统管起来。这样，“文革”中被砸烂、瘫痪4年之久的教育行政领导机关重新建立起来了。

他又开始清理极左思潮对文化教育的破坏。9月17日，他对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要懂水有源树有根”，“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sup>①</sup>

11月6日至20日，根据毛泽东6月的有关指示，周恩来又专门抽出5个夜晚，与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大学外语系师生座谈外语教育，以示重视。他指示“学外语要天天练”，“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可以增到两三个小时”，要保证学习时间。还批评了“突出政治”的生硬做法。他说：“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

<sup>①</sup> 以下多处引语分见《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471页。



本，只有政治语汇，没有生活语汇，实在不适用。”“北大英语教材有一个问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吗？’这个问题局限性太大，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他还强调了文化知识，说要读地理、历史、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懂很多知识。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接见出版会议小组领导成员，批判了文化禁锢。他说：“现在书店里中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否定一切，不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想的影响？”“《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普列汉诺夫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好的著作。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

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图整顿“文革”以来教育界的混乱。虽然会议为“四人帮”所把持，压制多数代表的不同意见，在会议纪要中写进了恶名昭著的“两个估计”，但由于会议是在“批陈整风”的大政治背景下进行，代表们敢于发表纠“左”纠乱的不同意见。如周培源批陈伯达时就说爱因斯坦不能批<sup>①</sup>。又如西安交通大学的张国强当面向迟群质询毛主席肯定过高教60条的问题，迟只好耍赖说毛主席根本没看过。该校陈明焰又在会上提出：毛主席春节讲话说过“现在的教育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

<sup>①</sup> 上海市教育局批判组：《“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前前后后》，载《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4日。

对”，并肯定过高教60条，会议对此装聋作哑。西藏民族学院书记汤化陶说西藏6个代表有5个不同意“两个估计”，党委还作了正式决定，认为正确路线在本校占主导地位。<sup>①</sup>会上争论激烈，以致会期长达3个半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都作过意在纠“左”的指示。

周恩来在7月6日和29日，会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成员及教育、出版等7个专业会议的代表时说“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用他惯有的方式表示了不同意“黑线专政”论。

毛泽东的夏季指示也是温和的：（1）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小部分人。（2）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3）高教60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吗？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吗？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sup>②</sup>

迟群等人虽没敢向大会传达这些指示，但会议纪要中还是有所反映，不得不写上一些比“文革”初期的批判温和得多的词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立即把握住这一历史转机，在主持清查“林陈反党集团”、批林整风的同时，更加大张旗鼓地纠“左”清乱，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从

① 陕西座谈会：“四人帮”是破坏教育革命的极右派，载《人民日报》1977年12月7日。

② 教育部大批判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载《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毛泽东指示系从迟群笔记本上查获。

1971年秋到1972年秋，先后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清理各个领域的极左思潮。

教育界的调整走在最前头。1972年5月1日中央下达《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在新的招生制度试行仅两年之后，以权威的中央文件的形式巧妙地抨击了“群众推荐制”这一“文革”“新生事物”。文件揭露了这种推荐制无法克服的致命弊病：少数人可用来营私舞弊，手法有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私送名额等等。

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再次巧妙地抨击了“推荐上大学”的荒唐。文件揭露：据北京11所高校调查统计，学员中初中以上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60%，小学程度的20%。所以不得不另加半年“文化补习时间”，补初中数理化。

这是出手很高的两着棋，极左势力被击痛而又发作不出来，一直隐忍到1974年批林批孔才报一箭之仇，大骂文化补习班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是“黑线回潮”，1975年悍然下令不准再办。这是因为文化补习班虽然对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学员本人有益，但对“新生事物”却是根扎眼的刺。

5月10日至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综合大学、外语学院教育革命座谈会，批判林彪从右从“左”两方面破坏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加强基础理论教学（会议总结到9月25日才印发）。

7月2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杨觉察林彪事件后中国的变化，善意地建议从小培养基础科学人材，进入大学后一边学习，一边劳动，以培养一批年龄较轻的科学工作者。杨参观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希望提倡一

下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7月14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杨时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又对在座的周培源说：“提倡一下基础理论”，“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sup>①</sup>

周培源回去后遵嘱办理，并立即致信周恩来，对加强基础理论和教育提出三点建议。周恩来即于7月23日作了批示并为此写信给郭沫若、刘西尧、迟群、谢静宜等：“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此后又多次指示“现在强调实践，对理论提倡不够”。9月11日就二机部401所一部18位同志来信建议加强高能物理研究，又给张文裕、朱光亚写信：“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将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随后根据周恩来建议召开了全国科技会议，提出加强科学研究，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口号。张春桥横插一杠说“会议大方向有问题”，“右倾回潮”。周恩来进行斗争，坚持不能在会议纪要写入“黑线专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科技领域的工作。

根据周恩来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草拟了一个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上报。周恩来11月8日批示：“将北大、清华两个加强基础科学学习的文件，好好按你们两个大学各自的特点改写一下，再通过教职员和新老学生认真讨论后，然后由科教组审核上报。”北大据此又进一步调查研究，制

<sup>①</sup> 周培源：《“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载《人民日报》1977年1月13日。

订规划交群众讨论，得到师生热烈拥护。1973年3月学校提出《关于理科加速培养科学研究人材和加强理论研究报告的报告》。可不久运动又起，这报告所提要求根本无法实现。<sup>①</sup>

10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裔李政道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敏锐地把握住时机，借题发挥，把久已酝酿在心的想法，不动声色，水到渠成，淡然出之。他说：“现在的教育革命还在试验阶段，可以从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生中选拔好的，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sup>②</sup>

这一番话在1972年说出，真可谓空谷足音。这是“文革”以来对捧上了天的推荐制的惟一一次修正。周恩来深知其分量，所以很小心很策略地只扒一个缺口：大多数人还是劳动，只对少数有发展前途的给予特殊政策。但周恩来这个设想终因与“七·二一指示”相抵触而未能实现，不过它公开表露了高层领导、人民群众对推荐制的不满，而在1977年又成为邓小平作恢复高考决策的最有力最权威的依据。

从7月起，《人民日报》连续报导各地整顿教学秩序、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教师陆续回到教学岗位的消息。8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天津教育局革委会文章《切实加强党对教学领域革命的领导》，说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干扰，教学质量下降，领导产生“抓政治保险，抓教学危险”的顾虑。强调加强基本知识教学、基本训练。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春教

① 周培源：《“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载《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3日。

②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474页。

育局文章《充分发挥教师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周培源，江苏宜兴人，1902年生，留美理论物理学家。1929年归国后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科协副主席、主席、九三学社副主席、中科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文章对周恩来“提倡一下理论”的指示，作出系统的、合情合理的阐述。文章说，“理与工，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文章针对“教育革命”中借口“理论联系实际”而片面强调劳动实践，强调“结合典型产品教学”，用充分事实说明：有的学科暂不能联系实际，暂无应用、实用意义，但各学科间存在普遍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急需专业；理科专业宜按学科而不宜按产品分科，批驳“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削弱理科的倾向。他的文章激起各高校强烈反响。“四人帮”后来称此文刮起“基础风”、“复辟风”，授意《文汇报》连续发文“商榷”。

此事自此纠缠不休。1973年7月18日、19日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会见杨振宁时，仍由周培源陪同，毛泽东亲口表示支持加强基础理论。<sup>①</sup>1974年杨振宁再次来华，重提1972年建议，毛泽东于5月30日接见时，又一次明确表示对该建议是赞成的。在场的张春桥不知所措，后诬称“毛主席接见时的谈话，记录记错了”。<sup>②</sup>

1972年底，借着中国外交旋风的推动，“文革”以来的首批

① 《实用主义教育的“模式图”》，载《人民教育》1977年第2期。

② 《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载《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

留学生西飞，16人赴英，20人赴法。1972年开始向外国引进成套设备和新技术，到1973年从国外引进总共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后又追加至51.4亿美元），其中有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等。

接着，1973年创刊的科教组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发表《要重视基础课教学的改革》。文章说，从1958年到现在，作为基础理论的物理课经历了取消、恢复、再取消、再恢复的“两上两下”，“两下”说明此课存在问题，“两上”说明此课还是需要的。华中工学院为此举办“基础课改革学习班”。该班注意了基础课的系统性，批了天才论、“成名成家”，但微分积分的牛顿—莱布尼茨公式还是用了原名，因恩格斯讲过“整个讲来，它们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完成的，而不是他们发现的”。这个刊物后来为迟群一伙所控制，但在1975年一小段时间里又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北京大学在这一年还拟订了招收研究生计划，但未及实施。<sup>①</sup>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进行招生文化考查，以保证学生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6月7日，科教组又发出《关于北京外语学院1973年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提出选拔少量应届高中毕业生直入该院学习，并对推荐进来的工农兵学员进行政审和文化补充考核。这是调整教育政策的两个重要文件，初步贯彻了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对推动全国教育界的纠“左”拨乱，起了巨大的作用。

## 二、教育悄悄复苏

思想高压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到1966年达到顶峰。可是

<sup>①</sup> 批判“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载《光明日报》1978年3月31日。

1971年9月13日的一声爆炸，把狂热的人们震醒，把思想高压炸开一道裂缝。人们开始怀疑、腹非、传言、私议了。如迟群文章就记了几条“黑话”：“没有证明新的比旧的好，还要照旧的办”，“总有一天，一切都得改回来”。<sup>①</sup>对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教育革命经验”，人们嘲为“白开水一杯”。<sup>②</sup>清华、北大流传一句不满推荐制的牢骚话：“工农兵中选拔学生，书香门第断了书香。”<sup>③</sup>湖南湘潭二中一老教师公开写对联吐怨气：“看吵吵嚷嚷如同闹市，愿生生世世莫当教员。”<sup>④</sup>辽宁大学一位教师在“斗批改”头两年曾被评为“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典型，而在1972年批判林彪极左路线时，当众声明，他过去的“讲用”是受了林彪路线的影响，不是出于本意，宣布收回。<sup>⑤</sup>湖南平江一位农民公然办起私塾，印古书，开讲《论语》，说“圣贤言语句句真，闭门读他二三春，不求功名与富贵，也算知书识礼人”。<sup>⑥</sup>广东信宜中学清理理科教材中过滥的政治内容。如初二机电课本“日光灯”一节，离开物理知识大讲政治，说旧社会工人在高温下吹灯管，一日10多个小时，吸入大量荧光粉、水银蒸气，生病被踢出工厂，现在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十分幸福等等。<sup>⑦</sup>

几年来的教学质量成为社会议论诟病的中心，普遍的看法

- 
- ① 《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成果》，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2期。
- ② 《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成果》，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1期。
- ③ 《清华、北大批林批孔运动蓬勃深入发展》，载《北京日报》1974年3月31日。
- ④ 《破除清规戒律，坚持批林批孔》，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3期。
- ⑤ 赵英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5期。
- ⑥ 平江县教育局、湖南师范学院院刊室：《与贫下中农一道，狠批林彪、孔老二》，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3期。
- ⑦ 广东师范学院：《深入批修整风促进教育革命》，载《教育参考资料》1973年第6期。



是“现在的中学生不如文革前的小学生”。据国务院科教组 1973 年 5 月 21 日就科教战线批林整风形势所作的一个总结反映：群众“思想混乱”，“攻击教育革命形势是乱、糟、低”，认为“斗批改过头”，“教育质量降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sup>①</sup>

《红旗》杂志 1973 年第 12 期发表《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对此无可奈何地说：这些同志“实质是认为这几年教育战线搞得还不如文化大革命前好，对解放后 17 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这个基本事实，还缺少应有的认识，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重大变化怀疑动摇”。文章打棍子还有些横劲，讲道理则底气不足，只有—些陈词滥腔，诸如“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将新与旧，今与昔作具体的历史的对比”呀，“离开无产阶级政治标准，离开又红又专、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片面地去谈什么‘教育质量’”呀，大谈“不同阶级有不同标准”，却闭口不提事实。

正是在这种有利于调整教育的社会舆论与气氛中，调整大得人心，顺利进行，教育界开始出现—些新的景象。

### 1. 文化考查旋风

—个小小决定，比几十篇社论作用大。1973 年春，国务院批转的招生文件，在比出身、比关系、比门路、比劳动之外，加上—个比文化。顿时在校园里刮起了—股文化气息的清风。

1973 年 7 月大学招生进行文化考核的消息传到辽宁丹东六中，教师兴奋异常，“格外忙碌起来，有的挤时间给回城准备高考的知青补习功课；有的教研组按照知青来信要求，编印了厚厚的高考参考资料。—些教师还对学生进行考大学的‘学习动员’。有的教师高兴地说：‘照这样子下去，这书才有个教头哪！’”不久张铁生的信发表了，“立即在教师中引起强烈反响”，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1973 年 5 月条。

大多数教师纷纷指责“张铁生的信是瓢冷水，把刚刚焕发出来的教学热情全给浇了下去”！“连上大学都不重视考分，那中学还有什么教头？”“大学录取了张铁生这样的人，那质量怎么保证？卫星还能上天吗？”支持张铁生信的只是少数。<sup>①</sup>湖南华容一中教师也说“张铁生的信是个人主义的产物，会把青年学生引向不认真读书的邪路”<sup>②</sup>。

辽宁营口市七中杨老师听说这次大学招生以学分为主了，即向学生劝学：“我想将来你们毕业了，再有升学的机会是以考试为主，那你不好好读书可就后悔了。”他又向社会作宣传，后来他回顾说：“有一个下乡青年回城了，我总认为他学习好，下乡可惜，是念大学这块料。于是马上把国务院关于大学招生的文件念给他听，希望他能上大学。”<sup>③</sup>

## 2. 重整学校秩序

1968年复课以后，由于原有规章制度批掉了，学生乱惯了，又没有学习方面的要求，学校的秩序仅靠政治强制维持，教师难以恢复有效的学习管理。上海黄陵中学有个典型事例很说明问题。1969年秋，该校派责任心很强的王老师去教乱班初一（3）班。王老师到任后给同学讲为革命而学习的道理，最后说“要坚决制止无政府主义”。全班同学竟串通起来，集体作证，向工宣队诬告“老师讲反动话，说要坚决支持无政府主义”。这班孩子竟用“文革”斗争手法对付老师。

1971年以后，各地开始整顿学校混乱的秩序。如辽宁旅大市西岗区育红小学班主任为整治班风，制订了5条要求：①早自习要肃静；②打上课铃后要坐好；③课堂要注意听讲，不搞

① 《张铁生的信促进了教育革命》，载《人民日报》1974年1月7日。

② 《党支部一定要抓大事》，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1期。

③ 《师生携手、共同战斗》，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3期。

小动作：④下课不准疯打闹；⑤排队要快、静、齐。这5条“写在小黑板上，挂在教室前面，让学生天天看到，堂堂做到。每周一评，做到的插上一面小红旗，谁的红旗多，谁就是好学生”。1974年这个教师受批判：“5条维护的是师道尊严，保证的是智育第一，照此要求下去，培养的只能是一批死读书，读死书，站着像根棍，坐着像个佛，唯唯诺诺，不跑不跳，不说不笑的小木偶”，“是旧学校在新形势下的复活”<sup>①</sup>。结果，学校又乱了。

### 3. 抓文化学习

这一时期，各地学校开始重视抓文化教学。如1973年初，沈阳122中派名牌学校毕业的业务尖子刘国材出任6年级（5）班班主任，他在“领导默许之下背着工宣队”，挑高分学生、拒低分学生，又收了十多个教工孩子组建尖子班。他狠抓教学，向学生宣传“学生老老实实念书才是正业，现在就是要纠不务正业的偏”，“思想可以飞跃，可文化知识高低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生就得压，就得考，你不压他就淘”，“考试，刺激一下，记得就扎实”。他向学生介绍学外语经验“天天讲，天天背，当你记的比忘的多了，就算有收获”。针对有的学生讨厌数学，鼓励说“数学的特点是高度的抽象”，“是练脑袋的”。他用重法治无政府主义，对学生严厉管理，说“巴掌是冷的，可心肠是热的”。

后来批判他的材料说“他把学生束缚在小课堂里死读书，死记硬背。用满堂灌、勤考试、多留作业等办法来压学生”，“为了把所谓‘智育’搞上去，他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把每天的课外活动和每周两个早晨的政治学习时间，都用作文化课自习。学校发动向雷锋学习，他以‘我们班都学’为名，不

<sup>①</sup> 《用什么标准衡量学生？》，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4期。

组织学雷锋小组”。他以学习不好，反对年级组长表扬一个爬上顶棚清扫厕所的学生，拒收考试成绩不好的同学入团入红卫兵。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个狠抓文化学习的班，被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智育第一回潮的典型”<sup>①</sup>。

1972年秋，湖南平江九中的语文教师讲课越来越放得开，讲《赤壁之战》一课，为吸引学生“大讲‘舌战群儒’、‘草船借箭’的故事”。后被指责为“大肆宣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唯心主义思想”。<sup>②</sup>

福建龙海县江东农场教师“开始还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搞社会调查，结合教学讲‘三史’”，轰轰烈烈实践一阵子后，“就感到走出去花时间，费力气，怕完不成教学任务”，还是老路违背不了，又“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讲名词，抄重点，背课文”。<sup>③</sup>

北京大学653分校教师深感几年吵吵嚷嚷教育革命下来，“文献也看不懂了，专业方向也定不下来”，“大学毕业后，又是‘四清’，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几年，外文忘光了，业务荒废了。有的甚至哀叹自己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激烈的动荡中白白度过了，称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逍遥于运动之外、钻业务抠外文的人为‘明智派’，大有悔不当初之慨”。<sup>④</sup>

湖南省委领导人1972年3~4月在贯彻中央关于普及教育指示的群众办学现场会上，大抓“提高教学质量的典型”，交流“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1972年9月在贯彻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精神的座谈会上，作报告批评这几年教育革命“政治代业务”、

① 《击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1、2合期。

② 《坚持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夺取教育革命的新胜利》，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1期。

③ 陈永红：《要向旧观念开战》，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1期。

④ 北京大学331教研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1期。

“学生基础知识很差，后进面大”，学生“只晓得在作业本上写‘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现在的学生是大学的牌子，中专的水平，小学的底子”<sup>①</sup>。

1972年6月，办学现场会的10篇经验交流材料收入题为《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小册子。这些文章说，在极左路线影响之下，“劳动多、学习少，教学质量不高”，教师“不敢抓智育”、“上课时政治道理讲得多，文化知识教得少”，学生“一不会写，二不会算”，“中学毕业生不顶个中学生用”。“学生学习成绩差，已经不仅是学校的教育问题，而且是影响到各方面关系的政治问题”。后来批判小册子“在掩人耳目的说法下为过去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批判用的是老一套说教，说这是因为“路线不同”，“培养目标根本不同”，“教学内容根本不同”，“教学方法根本不同”。<sup>②</sup>

《湖南教育》试刊第一期（1972年10月）刊出《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批判与继承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批评新教材对旧教材“不作具体分析”、“抹杀文化遗产的阶级内容，混淆精华与糟粕的界限”、“全盘否定、荡涤、横扫、抛弃”了过去文化。

1972年10月大连工学院召开院领导会，认为现在“学员数理化的文化程度差”，“教师书读少了”，要求各系“订出规划，各就各位”，“争取三到五年在教育革命各个方面赶上或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11月13日在各系教育组负责人会上正式提出“着重抓现有学生的教育质量和以培养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水平为中心的教研室建设规划”。12月开全院规划会议，会议认为：实验班开门办学“进进出出”，“不正规，没水平”，

① 《紧密联系实际、狠批“克己复礼”、痛击教育战线右倾复辟思潮》，《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艺术标本》，均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5期。

② 《革命成果不容否定，教学质量不容诬蔑》，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6期。

要重估该班所谓“缩短学制、精简课程、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的经验；工农兵学员质量差、水平低，决定“72级学员关门上‘预科’，学制再三延长，以便‘预’到高中程度”；撤回去工厂办学的教师和设备；教师的问题不在世界观而在“书读少了，外文水平低了，技术资料看少了”，提出用“老教师，老教材，老办法”对青年教师“开师资班、外文班”。这次会议没有吸收一个工宣队员参加。后来被工宣队负责人批为：少数专家关门订“轻政治重业务、轻实践重理论、轻专业重基础”的规划，是“教授治校的复辟会议”。会议决定统统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说这次会议压得“政工干部去寻求‘业务归宿’，而少数专家、教授翘尾巴”。<sup>①</sup>

由于大批“分数挂帅”、“分数专政”、“考试以学生为敌”，学校只好不考，或走过场地“考查”一下，造成学习大锅饭，学生学不学、教师教不教一个样。

为改变这种局面，各地教育行政纷纷以统考作为推动教学质量的手段。1972年的恢复考试带动了教育全局，振作了师生的学习精神和学习积极性。

1972年，黑龙江克东县新农公社林河小学为迎接公社统一考试，减少学工学农时间，增加课堂教学时间，“让学生整天在教室里背公式，写笔记。”<sup>②</sup>同年夏，该省集贤县永安公社组织大会考，密封考题，串班监堂，考分排名在全公社教师大会上公布。各学校纷纷增作业、加课时、搞小考、压缩学工学农时间，教学气象一新。下半年，又兴冲冲来一次全社冬季大会考。<sup>③</sup>

华中工学院附中兴起“追求一百分的现象”，“考试前搞到

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容否定》，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4期。

② 《桦树占领农村阵地》，载《黑龙江教育》1974年第5、6合期。

③ 《管方向，抓大事》，载《黑龙江教育》1974年第5、6合期。

晚上十一二点还不睡觉，早上五点钟就爬起来，无形中形成一股潮流”，“某一阶段谁的成绩好，有的老师就说‘看某某的思想提高了，学习也就上来了’”，“学校还特地把一大叠一百分的卷子放在二楼橱窗里，供大家‘欣赏’，无形中就等于号召大家去争一百分”。<sup>①</sup>

广东茂名一中就“教学质量”问题或明或暗争论了5年，有的教师坚持说：不高考，便造成“中学无动力，大学无质量”。<sup>②</sup>

1972年4月，吉林永吉县举办数学教学研究会，搞公开课教学。评议会上多数人赞扬“这节课成功，这回教育革命有了新路子”，少数人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路子”，“三脱离的旧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训练）。这年10月永吉七中的一位领导刚开会回来，就“被教师们团团围住了”，大家七嘴八舌：“县里来人说，今年大学要从学校招生”，“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也要统考，各学校还要评比”，“别的学校已经提前两周停课复习了，咱们再不动，考垮了，先进学校的牌子可要砸了”。可是该领导与教师们思想感情大不相同。他想，“宁可在统考中打零分，决不能在路线上偏半分”。<sup>③</sup>

作为一种个人行为，暗中偷偷学习则从来也没停止过。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两届大学生，这几十万人中的大多数几乎都有“地下读书”的经历。正是这样，才使他们没有因为10年劳动而荒废了学业。即使是工农兵学员，也有不少人在持续批判“智育第一回潮”的恶劣气氛中，或公然无忌地或遮遮掩掩地贪婪读书。

① 《我们的一点看法》，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1期。

② 《从路线斗争看“教学质量”的争论》，载《人民日报》1974年4月14日。

③ 《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11期。

其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裘锡圭，可算是个“地下读书”的典型。“文革”派斗正激烈时，他就悄然隐入书海。同屋住了个后来进了梁效写作组的人，当他面不敢看书。周六下午那人回家住，于是从周六下午到周一一大早，成为他驰骋书山的大好时机。“手不停披，提要钩玄，连续作战，日不交睫”。“文革”头几年就写成《古文字考释集》37篇，计20万字。1970年到1971年下放在南昌鲤鱼洲北大干校劳动两年，许多人看不到读书前途也不敢公然读书招人注目，而改行学木匠、中医。他表面上劳动干活不让人，获“裘大力”外号，背地里也只看一本书，并不多读。这却是一本耐读、以一当百的大书——《新华字典》，他从头到尾背下来。<sup>①</sup>

#### 4. 调减生产劳动课

这一时期大多地方减少学生劳动时间，削减学校农场、停办学校部分工厂。如广东新圩中学的小农场有地近百亩，1972年受上级整顿，通知将农场土地全部拨给生产队。校长思想不通，怀揣《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进行辩护，受到严厉批评：“你是种田的校长还是教书的校长？搞那么多土地，学生还用读书吗？”最后削减一半土地。<sup>②</sup>

湖南湘潭二中教师议论说“开门办学是热一阵子，到头来还得搬老法子”，“校办农场是骑虎难下，谁要就送给谁”<sup>③</sup>。

湖南华容县一中自有三场（农场、林场、养猪场）、二厂（农机厂、砖厂）、一室（中草药室），还与5个工厂、7个生产队挂钩劳动。林场有杉树3万株，猪场有猪250头。对此，教师议论纷纷，说“开门办学搞多了，知识质量下降了”，“现在的

① 骏征：《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6期。

② 《执行毛主席教育路线风吹浪打不回头》，载《新教育》1976年第10期。

③ 《破除清规戒律，坚持批林批孔》，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3期。



中学生不如以前的小学生”，“收了粮食，削弱了文化，这是舍本求末”。<sup>①</sup> 1972年上半年上级派人来校“检查该校教学质量”。据说是“搞突然袭击，出偏题、难题整学生。有个学生组，数学成绩共有9.8分。有的人便大造舆论，说什么华容一中学工学农搞多了，教学质量下降了”。<sup>②</sup>

湖南南县一中在批林彪极左思潮时，批了开门办学，认为“开门办学降低了教学质量”，不少人主张“甩农场、丢工厂、保课堂”<sup>③</sup>。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师对组织去外面学习所谓“教劳结合”经验反感，说：“结合生产劳动搞教育改革，那还不容易，这是廉价的教育改革”<sup>④</sup>。

辽宁丹东六中停办了部分校办工厂，大大增加作业分量，以分数评选优秀学生和班级<sup>⑤</sup>。

总之，这一时期各地学校普遍调减劳动时间，加强了教学。

## 第二节 教育事业再度陷于动乱

### 一、从批陈批林到批林批孔的转折

林彪败亡后，全党的头等大事是清查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

① 《党支部一定要抓大事》，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1期。

② 《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批林批孔》，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4期。

③ 南县一中党支部：《在反回潮斗争中坚持开门办学》，载《湖南教育》1974年第4期。

④ 《警惕旧病复发》，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2期。

⑤ 《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载《辽宁教育》1974年第3期。

和帮派体系，接下来自然要对林彪从思想上政治上批倒批臭。由于林彪自1960年主持军队以来搞的全是“突出政治”、“精神万能”、个人崇拜等极左的一套，因而批“左”是顺理成章的、大势所趋的、符合党心民意的。周恩来顺应这个大势，担当起清理极左危害的历史任务。他在各个领域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极左破坏的努力，引起江青集团的极大不安，他们只准揭批林彪的阴谋活动，而竭力捂住他们与林彪搭档干的坏事及维护他们的共同思想基础——极左思潮。因而到1972年9月下旬，批“左”与反批“左”的斗争表面化了。

江青集团首先选择了教育界作发难的阵地，第一件事是围攻周培源。周文《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背景和内容前面已述，此文1972年10月6日发表于《光明日报》。文章本是当年5月间应《人民日报》之约而写，参加该报“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专栏讨论的。此文有大胆的新鲜见解，报社把握不准，便邀请部分正在参加“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的代表征求意见，文章得到肯定。姚文元却不想刊登此文，借口这些代表不是这方面专家，指令向上海征求“权威的意见”。于是《人民日报》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召开座谈会，尽管上海有所布置，找部分人“统一口径”，文章还是被基本认同。姚文元为拖延发表，在8月15日给《人民日报》社下一批示：“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当《人民日报》有人认为可发表时，姚文元又打电话到报社：“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下令把文章转给《光明日报》。

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不久，“上海即有人拐弯抹角找北大同志调查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秘密打听周培源的文章是

不是总理要他写的”？<sup>①</sup>张春桥即授意《文汇报》行动。这家报纸便冒用一些教师和学员的名义发表不点名的批判文章：《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基础理论》等。说“基础理论一向被资产阶级学者吹得神乎其神”，“这是旧教育遗留下来的一种偏见，必须抛弃”，只能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础理论”。此事当时还是不引人注目的一场笔墨官司，后来运动一起，周文便被定为刮“基础风”，“复辟风”的首恶。作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开批判会，校负责人话锋直指作者“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有人就大作文章，翘尾巴了”，“资产阶级权威打着共产党员的旗号写文章向无产阶级进攻，这是阶级斗争信号”。由于群众抵制，北京大学的批判没能搞起来。<sup>②</sup>周培源文章的面世固然与周恩来的提倡基础理论有关，但由于周文确实不是周恩来授意写的，其发表也与周恩来无直接关系，而张、姚也未公开出面，只是隐于《文汇报》后面，所以此次虽是双方首次交火，而高层领导却未交手。

此后江青集团又挑起几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斗争的焦点是：周恩来要纠“左”，江青等人要批右。毛泽东终于在12月17日借王若水的信，正式表态：“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迅速传达全党全国。自此，中国大致完成了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1973年元旦《人民日报》、《解

① 周培源：《“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载《人民日报》1977年1月13日。

② 同上。

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规定这个实质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此后各报刊大张旗鼓地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如国务院科教组刚刚创刊的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1972年试刊一期），立即转向，在1973年2月号推出秦怀文的重头文章，集中攻击“有人批什么‘空头政治’，结果就产生了对政治工作的取消主义倾向、把一些会议、学习、大批判都看成是搞‘空头政治’”，批什么“精神万能论”，“理论无用论”，“技术无用论”。“甚至有的人说，对刘少奇不恨，而对步刘后尘的另一个同类骗子却‘恨得很’”，“这种人所恨的不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是恨文化大革命，恨伟大的群众运动”，“他们不是要批极左，而是要批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中的许多新生事物都当作是极左思潮”。<sup>①</sup>

这样，周恩来主持的两年之久的纠“左”，遂被迫中断。

在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中共十大会议上，政治报告和王洪文的修改党章报告均突然提到“反潮流革命精神”，九大党章的总纲部分增加一句“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十大文件中凡遇有“反潮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原则”一句均以粗体字排出，按当时规格应是毛泽东原话，但皆未着出处，不知是以往讲过的旧话还是最新指示。查《人民日报》，“反潮流”之说最初出自一篇不甚引人注目的文章。此文是在转载《辽宁日报》“张铁生答卷”6天后，于8月16日在第三版发表，署名杨浦，文题为《反潮流精神——赞〈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文章中“最‘发人深思’的是什么呢？这就

<sup>①</sup> 秦怀文（迟群化名）：《牢牢掌握批修整风的大方向》，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2期。

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要有反潮流的精神”一句，是一个新鲜的说法，“反潮流”三字让人联想起“文革”初的“造反有理”，什么人敢再提这久已避忌的敏感字眼呢？杨浦笔名不属后来的笔名五大系统，很少出现，《光明日报》曾远在1966年2月17日第四版刊过杨浦的一篇小文《梅花欢喜漫天雪》。尽管这一“语录”出处可疑，十大后报刊却予以突出的宣传。《红旗》9月、12月都在刊头“毛主席语录栏”中刊出。

此后引发一个“反潮流”运动，参加者主要是九大前后被打下去的冷藏多年的前造反派，还有以张铁生、黄帅为榜样的中小學生。几个月后这个运动汇入批林批孔运动之中，并严格规定“反潮流”不是一般地反压制、反迫害，而只能反所谓“复旧回潮”、“复辟回潮”。

两个“回潮”并用，最初出自1973年下半年的文艺批判中。《文汇报》10月发起“批黑画”，指控一批中国画在情趣上是“文艺黑线”的复活，甚或隐寓了对“文革”的不满。

批判孔子比“反潮流”稍早些，但在1974年前，只采取了学术批判的形式来影射现实，而未形成“联系实际”的群众批判运动。批孔起于毛泽东批发长期持反孔见解的广东中山大学哲学史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封建奴隶制的思想家》。此文发表于8月7日的《人民日报》。因不久即召开十大，此文虽醒目，却反响不十分大。十大后，因集中宣传十大，批孔一时也还排不上号。

可到了9月中旬，报刊上开始突地起了一个批孔高潮。先是迟群一伙控制的国务院科教组，于8月24日电各省科教组转告各高校：据毛主席5月关于抓政治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的指示精神，“在深入批林整风过程中组织力量开展对孔子的批判，对《红楼梦》的研究等，发挥文科

的作用，促进文科的教育改革”。<sup>①</sup>又于9月8日到11日召开全国教育系统98人批孔座谈会，请杨荣国作《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丘反动思想的影响》报告。迟群提出把批孔作为贯彻十大、批林的大事来抓。接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笔名在9月15日《学习与批判》创刊号发表《论尊儒反法》，全国报刊立即转载。这是从提法上“批孔”发展到“评法批儒”的开始，从此在批孔的同时大捧法家。

康生也不惜老迈之躯，直接组织中央党校唐晓文班子写出《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文，发于9月27日《人民日报》。孔子的教育思想，尤其其他的“有教无类”的博大精神，为历代进步人士所肯定。批孔的人们在这个客观事实面前遇到不小的障碍。于是唐晓文挖空心思以奴隶交不起“束脩”，论证“有教无类”的“欺骗性”。以前的“官学”，只施于贵族，孔子的“私学”及于庶人，这是一大进步。资产阶级宣扬“博爱”、“全民教育”，虽未做到，于中世纪等级教育也是一个历史进步。起劲地批“有教无类”、“全民教育”，只不过因为这些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反照出现实中人为推行“阶级教育”的荒谬。唐晓文为了批倒“有教无类”，竟不顾历代公认的含义（如东汉马融《论语古注集笺》卷15注“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南北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8注“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将“有”、“无”对举的“有”，错训为“囿”、“域”；将“教”与“海”硬作阶级区分，无根据地说“海”才是教育，而“教”是“强制教练奴隶”；将“类”附会为氏族；将全句话强解为“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唐晓文就这样把“等级教育”强加给主张“打破等级界限”收学生的孔老夫子，并且横蛮地认为“有教无类”、“全民教育”比“有教有类”、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73年8月条。

“等级教育”还坏。孔子对教育贡献最大，此文颠倒是非最甚。

10月，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网罗一批秀才，组成梁效班子，请出大儒冯友兰先生为顾问，在批“尊儒反法”中出了一批重磅文章，奠定了梁效在思想与理论界的特殊地位。梁效正是临世于批孔，又发迹于批孔。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元旦献词》。社论把“维护文化大革命”、“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批判尊儒反法思想”列为1974年的三项主要任务，提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已经转向的“批林整风”，就与学术影射式的“批孔”、“批儒评法”最后联结起来，“反潮流”群众运动也一并纳入，终于汇成1974年的批林批孔大潮。虽然1972年底扭转了批林整风纠“左”的大方向，1973年上半年转向批林批右，下半年又同时发动了思想理论层面的批孔、批儒评法和政治斗争层面的反潮流、反复辟回潮，但实际工作中仍在纠正“文革”中的极左破坏，纠“左”惯性、人心思旧成为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这从充塞当时报刊的斥“九斤老太”的文字中，可见一斑。“九斤老太”是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一个守旧人物，怀旧、恶新、贬斥新生事物，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四人帮”以之讽喻厌恶“文革”“新生事物”的人民，用简单的历史比附为自己壮胆。无奈“九斤老太”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复旧”成了潮流，这就是为什么不惜发动一场规模和烈度仅次于“文革”初造反运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原因。

运动分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报刊的大批判、街头和各机关厂矿的大字报批判，一是“联系实际”的反潮流运动。

2月，同时批判新编晋剧《三上桃峰》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影片《中国》，为运动大造声势。

4月，把“蜗牛事件”搬上报纸，大批所谓“洋奴哲学”、

“爬行主义”。半年后，又制造“风庆轮事件”，从10月12日起，再次在报上挾伐“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8月，为声援日趋低沉的学校“反潮流”运动，又发动对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

与报刊大批判相呼应的是各地各单位的“联系实际批林批孔”，也即是“反潮流”的群众运动。运动先起于学校，反乱了学校的教学秩序，随后引向社会，结果又造成局部地区的动乱。这些地区又起山头，打内战，串连上访，停工停产，交通阻塞，组织瘫痪。致使生产停滞下降，1974年钢产量下滑16.3%，全年工业总产值仅增0.3%，财政赤字7.7亿元。

## 二、张铁生答卷（1973. 7. 19）

如前所述，自1970年试行高校招生推荐制以来，发生了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走后门、生源文化偏低等严重问题。周恩来1972年7月以后，几次提出选拔中学生直升大学的意见。1973年4月，国务院又批转了高校招生进行文化考查的决定。这本来只是在肯定“教育革命”方针前提下，努力减少损失的一项修补性的措施，岂知刚刚在纠“左”与批右之争中占了上风的极左派，异常敏感，马上拿住了这个靶子，做起文章来了。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即入京，与京城两校策划应对。他们认为这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准备好“辽宁拿出点材料来”。毛远新在一次会议上说：这是“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有人要“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走回头路，否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对台戏”。他回辽宁后表示：“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这是引蛇出洞的经典策略，说得明明白白的“阳谋”，但是下面的人们并不明白真相。于是，辽宁也刮起了文化考查之风。



考罢即开招生考试座谈会。7月10日，锦州市招生办公室汇报了兴城县有个生产队长在答卷背面写信的新鲜事。毛远新大感兴趣，即调阅，感觉此信可以起到“文革”初“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作用，是政治大反攻的突破口，当即拍板直接见报，以求轰动效应。

这样，一家地方报纸，未经批准，竟发表矛头直指国务院的类似大字报的东西。

被人选作石头打人的人，即后来名声大噪的张铁生。他原名刘铁芳，生父曾在兴城县城经营粮油坊。他中学毕业后下放农村劳动，被选为生产队长。这一年，也同许多下放知识青年一样，怀着上大学的急切愿望参加了招生文化考查。

6月28日下午，开卷考语文。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他只得了38分。次日上午考数学，他得了61分。下午理、化合卷考试，他睡过头，跳窗而入。这次考得一败涂地，只答对6个化学小题，共得6分。4科3门总计105分，平均35分。考题并非偏、难、怪。如化学考“硫磺是单质还是化合物”。数学考：指挥部命令某民兵排在两小时内到距他们15公里的某阵地，求行军速度最小不能少于多少？考场老师对他也是关心的、鼓励的，安慰他“这样简单的题，怎么也能及格”。

可他预感成绩将落后人后，第一次考试时便把预先准备好的求情书抄在试卷背面。这信果然奏效，使他多得了一次机会。7月5日县招生办公室通知，让他补考一次。结果，他考得“成绩还算不错”。他这次又在语文试卷上写了一篇评论：《大学门，向谁开？》。<sup>①</sup>

<sup>①</sup> 《白卷的政治骗局与“四人帮”的篡权阴谋》，载《光明日报》1976年11月30日；《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载《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重视文化考试，确保新生质量》，载《光明日报》1977年11月2日。

张铁生的信表白自己在农村“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恳求“各级领导”照顾他上大学的“自幼的理想”，同时断言别人是“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为个人努力”的“大学迷”。后来又发表文章说：（大学迷）“他们把升大学当作离开农村的跳板，经过几个月的专心抠书，有可能答满分，但他们为的是个人奋斗，个人前途，不是为革命深造”，“培养这样的大学生，只能是使人民失望的废料”。<sup>①</sup>这也算是一封流露真情真性的个人信件，本也没什么。但是由于适合了政治的需要，便于7月19日在《辽宁日报》头版隆重推出。信被作了5处删改，配发了进行政治拔高的编者按，称张铁生对“修正主义考试”交了一份“白卷”，而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科教组的几个人立即配合，作报告，发简报，说有人要“复旧”，要“反攻倒算”。张春桥也走到前台，说“这样搞是复辟，把我们寄予希望的人卡了”。《人民日报》于8月10日全文转载。《文汇报》最先于8月2日转载，并同时发起“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的讨论。《红旗》杂志、《教育革命通讯》等报刊也纷纷围绕文化考查发表批判文章，说：这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文化考查“可能把一些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公而忘私的、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排斥在大学门外，把广大知识青年引向闭门读书、轻视劳动、同工农相脱离的邪道上去”，“其性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挑战，是对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照这样搞法，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希望”。<sup>②</sup>《人民日报》不久发表杨浦文章，首次提出“反潮流”。几个月后，“反

① 《发扬反潮流精神，当革命的促进派》，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10期。

② 《大学招生制度的根本变革》，载《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第7期。

潮流”成为一场群众运动。

但是，张铁生的“答卷”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发表半个月內，《人民日报》就收到批判稿、抗议书、不同意见的来信两千多封。其中河北永清县后宾公社小刘庄大队的回乡知识青年董金铄致《红旗》杂志的两封信，是具代表性的。两信分别写于8月15日和25日，概括起来有3点：（1）张信说“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可见考题不难。不检讨自己5年来连“两天”文化也不学，是不是政治冲击了业务、红与专不统一？（2）别人在劳动中不忘文化学习，为什么就成了“大学迷”？（3）以劳动成绩作资本要求上大学，上不了就“苦闷”，而不愿留在农村当生产队长，能树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吗？

文章抓住极左派形而上学的悖论：爱读书想上学的必不爱劳动，革命青年必爱劳动爱农村不想上学。树张铁生这样的人物就出漏洞：他如果像信中表白，就应扎根农村而不该钻研上学，自己想上学就没资格反别人上学的潮流。“文革”初，青年们曾热烈拥护过砸烂、解散、取消大学，误信那是“修正主义温床”、“精神贵族土壤”。现在他们宁愿上“修正主义温床”，而不愿在农村“革命”了。

### 三、考教授事件（1973. 12. 30）

张铁生以白卷上大学，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对，仅《辽宁日报》就收到两千多封反对信。毛远新在辽宁抓的一个点——沈阳医学院，为了压制反对之声，以开会为名，把基础部38名教授、讲师召到第四教室，拿出事先策划好的考题，突然袭击考了一下。由于长期没有接触数理化公式，确实使一部分教师答不上来。学院马上让这些教师谈“认识”、说“感想”，直到他们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毛远新听到汇报后大

为欣赏，指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考教授之风，便在辽宁各高校首先刮了起来。

1974年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表扬说：“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北京的考教授，是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科教组组织的。1973年12月30日上午召集会议策划，接着在清华大学出试卷。所用数、理、化试题从本年高校招生文化考查卷子上选出，未出文科方面试题。印好考卷，已是下午5点钟。立即调集20辆小车，同时分赴17所院校，实施“突然袭击”。通知各教授时诡称开座谈会，他们认真带上笔记本赴会，没想到是一出白丁戏鸿儒恶作剧。考官们称：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经常滥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吗？一些年事已高的老先生当即拒绝答题，如北师大知名历史教授白寿彝就拂袖而去。还有的在卷上书写反对意见，说：不要考试就是“不要知识”，“对于将来人类科学进步上是有阻碍的”，“将被世界上其他各国远远地抛在后面”。<sup>①</sup>

北京市参加考试的正、副教授共613名，及格者53名，占8.6%；不及格者360名，占57.4%；拒做交白卷者200人，占34%。总平均为20分，其中一个学校6个教授得了6分，人均1分。这一下“白卷英雄”的赞成者们抓住了“把柄”，断言：文化考查“是检验不出一个人的真正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撇开一个人所实践的东西，考谁都不行”，“用这样的试题考工农兵完全是刁难和阻碍工农兵入学”！

此后，上海、天津也学做了一遍。事后科教组又是开座谈会、又是发简报，所办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还发表《考教授有感》，奚落老先生高傲低能。江青、迟群、谢静宜在1月

<sup>①</sup> 揭穿考教授事件真相的文章，载《光明日报》1978年4月28日第2版。

25日动员大会上，津津有味地描述他们如何捉弄知识分子，洋洋得意地声称“破除了迷信”。后来，还将他们这一戏弄知识的“杰作”搬上银幕，这部未及面世即受历史审判的影片名称为《反击》。<sup>①</sup>

用中学数理化试题考张铁生这类毕业不算太久而又欲入深造的知识青年，难以说是“阻碍”。用以考已经埋头纯专业领域几十年的老先生，则不能不说是“刁难”了。要求老教练与投考体校的年轻人比跑比跳，岂不荒唐？文化考查确实难以检验一个人的政治水平、业务能力和实践经验，但这三项之外还有一项，它关系以后大学学习能否完成。它就是中学文化基础问题。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实践表明，正是由于废弃了必要的文化考试，很大一部分仅及小学、初中程度的人先于大批高中生进入大学，而他们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在大学补习中学课程。一方面，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被白白浪费，而另一方面，大批有才华的青年耽误了青春。

10年“教育革命”的昂贵代价，仅仅换来一个常识：大学不考不行。

70年代中叶，正是世界新科技革命大潮风起云涌之际，中国却以“考教授”来羞辱知识分子、证明白卷流氓“有实践经验”和“有政治水平”。报刊上也津津有味地颂扬“法家皇帝”刘邦便溺儒冠，却倒屣以迎高阳酒徒的故事。为搞臭国务院关于文化考查的决定，这些人也有些迹近无赖了。没文化的整有文化的，不过是有理说不清，虽有文化但仇视文化的整尊重文化的，却有一套歪理。

<sup>①</sup> 《考教授有感》，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2期。

#### 四、清华园的三个月运动（1973. 10）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随批林整风运动对极左错误的揭批，清华大学的议论日多。如对江青的“文攻武卫”，对迟迟不解放干部，对“两个估计”，对高校招生推荐问题，对教学质量问题等等，颇有非议。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迟群连续在1972年、1973年的暑假前，布置学生搜集社会上对上述问题的议论看法，准备炮弹，酝酿反击。

1973年8月，张铁生的答卷开了“反潮流”的头炮。迟群、谢静宜紧跟着在清华大学发动了三个月的“反复辟、反回潮”运动（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10月16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迟群在动员报告中说要揪出“一百、二百、三百个右派”，把“复辟回潮”归纳为7方面的问题。

当时主管教学的副书记贯彻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曾开了6个研究班，加强基础理论教学，此时受到攻击。其中一个催化研究班的学员，利用运动搞“四大”之机，反过来向迟群开炮，贴出大学报《第八个是领导》和《从动员报告谈起》，说“揭露矛盾要先揭露领导的矛盾”而不是整群众。立即有许多大字报响应。迟群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忙布置人连夜覆盖大字报。之后，大追后台，将副书记和另两个负责人打成“复辟代表人物”，大小会轮番批斗，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

11月28日又召开“点名站起来批斗会”。此后，以“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的罪名，立案审查64人，点名批判403人。把一名党委副书记、一名常委、一名教育改革负责人打成“复辟势力代表”，批斗、撤职，说“不是作不作党员的问题，而是戴不戴帽子的问题”。

电力系燃气轮教研组有些教师对教学质量和“两个估计”

有议论，该教研组竟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党支部被打成“国民党支部”。对这个只有30多人的教研组，开进60多个人来搞运动，批判追查。

水利系老教授张光斗1973年夏由于眼病，没有看清一名工人师傅，没打招呼，就被诬为“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对张的刁难，一直持续到1976年。这一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北京密云水库大坝破坏，张接受加固大坝设计任务。他发现学员设计有误，花了五六天时间帮助修改。迟群知道后，说“工农兵学员是设计的主人，教师无权干预”，又对张光斗进行批斗。

1972年至1973年度稍稍加强基础理论学习的教学计划，被诬为“复辟的产物”。刚刚有一点安定的学校，又一次折腾起来。一年级学员的半年文化补习被取消了，统统轰出校园去“开门办学”。1974年2月刚入学的新生，打发他们出去整整“开门办学”一年，致使这些学员上业务课的时间，缩短为总学时数的45%，有的专业只占20%。学校又遭受一次破坏，全校58个实验室，除6个较好外都受到损坏，有21个要完全重建。科研人员下降到教师数的10%，而“文革”前占30%。<sup>①</sup>

迟群在“三个月运动”中的两个报告，经修改后以秦怀文的署名，分别发表在《教育革命通讯》1973年12月号 and 1974年1月号上，题目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是两篇动员全国教育界“反复辟”、“反潮流”的文章。1974年4月北京一个剧团，奉江青命令，以清华的“反复辟回潮”运动为背景，创作独幕话剧《前哨阵地》，公演多场。

<sup>①</sup> 揭露清华大学“反复辟”运动的文章，载《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日；袁丁：《打着“反复辟”旗号搞复辟的大毒草》，载《人民教育》1977年第3期。

### 五、刘丽华谈话（1973. 11. 21）

刘丽华出生于黑龙江省肇州县一个贫农家庭，念了6年小学，种了8年田，是1970年12月被推荐入学的首届工农兵学员，时年22岁。她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后，以学员身份被选为校委委员兼中文系团总支副书记。

她阶级意识很强，牢记：“我家祖祖辈辈，连个中学生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才有机会上大学”，“是受阶级的委托，来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她深感“七·二一指示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平时想的尽是“旧大学我们贫下中农子女是‘进不来，变过去，赶出去’”和“社会主义的大学怎么防止复辟”。因而，她很多精力花在“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上：“经常开会，找人谈话”，“社会工作我从来不推，政治活动我积极参加，看到不良倾向就要批评，遇到不符合原则的事就提意见。”

在极左思想的坑害下，她不知道上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反而怕被“‘智育第一’毒害”，“给变过去”，所以对书本对知识对老师都很警惕，结果“后来完成学习任务就感到有点困难了”。比如，古汉语老师为了摸清楚学生的基础，先发了一篇初中课本中的古文，让大家翻译，讲明不计分数。她交了白卷。又有一次，老师辅导《高祖本纪》，她竟一点儿听不明白，反而“责问教师怎么一会儿高祖，一会儿刘邦，究竟指谁？闹了笑话”，因而不免受到同学们的讪笑，说她“只会写批判稿、发言稿，不会写大文章”，“豪言壮语一大套，业务知识不知道”。

本来这件事的性质，只是一个基础差的学生遇到学习上的压力而已。这压力也不是坏事，它可以转化为学习上的动力。但是，极左思想的歪理却搅得这个贫农的女儿分不清是非，竟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自己学习上的困境。她认为这是资产阶



级“用考试和分数来卡我们”，“因为我不知道汉高祖就是刘邦，受到一些人的歧视”，“这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风气有时给人的压力是很大的，使你很孤立。一种潜移默化的势力叫人发闷”。

因而她的态度，不是决心在学习上加倍努力赶上，而是在心里认定这是“刘少奇、林彪一伙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是“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流毒”，所以不是变得虚心一些，而是迁怒于那些学习用功的同学。因而她与大家的关系不是很融洽，而大家在做毕业鉴定时，也很不客气地给她提上“没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缺乏自知之明”等等。加上“毕业生留校的问题上”也不如意，使她“这些日子想了很多，好多夜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思想斗争很激烈，想给市委领导写信，又想当面和××同志（指主管教育的头）谈谈”，最后她在分配回黑龙江的前一天，对上海市有关部门，作了一次言辞激烈的谈话。

从谈话看，她的怨气集中在学校重用了学习好的同学而轻视了她这样“阶级觉悟高”的人。她在谈话中回顾自己受讥笑，“而另外一些经常跑图书馆，埋头钻业务，对政治和大批判不感兴趣的人，却得到赞赏。无形中造成了这样的一股风气：业务‘好’的同学，一俊遮百丑，吃得开，响当当；业务上一时跟不上的，抬不起头来”。对毕业生留校问题，她的指责符合当时政治气候。她说：“领导上想留的，不少是那些只是业务上拔尖的，顺从老师的，不大贴大字报的，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的人不够条件”，“领导还背着同学，由少数几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凭印象商定。留什么人，不留什么人，不让工农兵学员知道，也不发动群众讨论。我们要问，你们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什么？究竟是政治第一，还是业务第一？”

在做毕业鉴定时，她倒确是受了委屈。按当时极左标准，

她业务虽差，但“政治好”，就算是“又红又专”了。可是却被同学们鉴定为“没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而另一个同学，不愿担任社会工作，专门埋头业务，确实看了不少书。在这个同学的鉴定上却写着：学习认真刻苦，能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她质问：“这样做，究竟要把学生引到什么方向上去？”

当时是1973年9月，张铁生的答卷已经发表并造成了轰动。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景贤也想找个“反潮流”的典型，见了这份谈话记录，如获至宝，顾不上核实，也不征求基层意见，大笔一挥，批示：“读了此件，很受教育，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作斗争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建议将此件加按语印发各高校，请革命师生员工认真讨论。”

可是，讨论在上海师大遭到抵制，群众反映冷淡，大字报寥寥无几。徐景贤知道后，亲临师大，召开座谈会，运动群众。他说：“这次就是借贵方一块宝地，一个同志的谈话，把资产阶级势力再扫一扫。”在谈话见报前，他透露：“最近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准备现在就发表”，“可能四届人大要开……你们不要到那时大字报没有了，要准备一些专题”。

根据张春桥“把文章做大”、“把讨论搬上报”的意图，《刘丽华谈话》于11月21日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发表前，徐景贤亲笔对原稿删改增补，如加上“最近看了张铁生写的一封信，很受启发和鼓舞，我想了很多”，以示南北呼应配合之意。一些当事人反映见报稿多有不符事实之处，徐景贤坚持“要保留材料的尖锐性”，“再去掉就没有棱角了”。<sup>①</sup>

<sup>①</sup> 《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载《文汇报》1973年11月21日及《解放日报》1973年11月21日；上海师范大学批判组：《一股阴风几排恶浪》，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6期。

这场讨论持续3个多月，先后发文170余篇，声势不小。“做大”一个小人物的文章，出于一个大的政治需要，这就是要证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纵观中外历史，教育常常与政治隔一段距离，较少直接卷入政争。像这样政治斗争以教育为阵地，是多年来“政治冲击一切”、渗透一切的恶果。这就造成教育是非黑白完全决定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以致发生常识错乱、法无定规、教师难教、学生难学了。

### 六、黄帅来信和日记（1973. 12. 12）

黄帅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2）班学生，当时12岁。她在1973年9月的3篇日记中，对老师在纪律管理上的工作方式方法问题提出批评。当时的日记，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是上交老师看的。黄帅即以日记形式向老师提意见，批老师课堂上的失言，如“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说老师上课不该坐椅子，并宣告今后还要提意见。老师认为是挑剔，采取了整的办法，包括全班点名、板报批评。老师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师生关系顿时紧张起来。黄帅不肯屈服，开始连续向报纸、刊物投书，计有《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北京少年》等。

《北京日报》收到写于10月21日的第一封信后，转给了海淀区。不久又收到第二封信，便派人去学校调查，收集了黄帅的日记。日记从4月23日写到11月5日，共140篇。9月4日以前的日记，所反映的师生关系是融洽的。表现与班主任闹矛盾的日记有11篇，其中不少是检查自己方面原因的。报纸只刊用了6篇，其中10月19日的日记全文900字，只摘了140字。登出来的只是一个日记选编，突出了教师的不近情理。11月，《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在报社

内刊登出。

谢静宜看到后，大感兴趣，后来她在清华大学考教授的考场上曾对《北京日报》的记者说：“我们找这样的典型，找了一年多都没有找出来。”她即于12月4日令《北京日报》公开发表。次日下午4点40分，在清华工字厅，她与迟群一起接见了黄帅。她对这个小學生说：“你反映的问题不是你和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迟群说：“当前教育战线存在着坚持复旧还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方向问题，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问题。”又说：“你敢于提意见，敢于反潮流，我们支持你！北京市委会支持你！国务院会支持你！”以这么大的名义，支持一个小學生反老师，硬把一般师生关系问题，夸大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用意就在于把“小题做大”，煽动学生“反潮流”。

黄帅的班主任看到发表在12月12日《北京日报》上的信和日记，很想不通。当日晚上，谢静宜把他接到清华谈话。这一番话道出他们的政治目的。“我们从来不认为你小×是不好的。你平时不错嘛！”“报纸上登你和黄帅的问题，不是为了解决你们两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教育战线的问题。你们两个人的事，没有必要登到我们党的报纸上去。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你小×不值得登报！你这点问题，在我们学校不算什么！”“你要站在路线上看问题，斗争的矛头不是对着你的。”安抚这个小人物，是让他安心下来当政治棋盘上的一粒子儿。

可是，这位大人物转身就变了腔，在打给该校负责人的电话中交待：“你们党支部要有棱角，对×老师不要太手软了。”这当然不是有意玩弄×老师，而是为了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戏演得更像一些。

果然，黄帅一上报，“师道尊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的严重形势，就这么制造出来了。于是全国“反潮流”。

此事还有余波。当时黄帅收到上千封劝告她的信，其中一封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 团政治处 3 个知识青年以王亚卓的名义写的。他们是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干事邢卓。他们以过来人大哥的口气劝导小女孩正确对待老师，尊敬爱护老师，不同意“反潮流”上纲上线的做法。这封信代表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看法：“臭老九”何来“师道尊严”？师生关系不是阶级敌对关系。这封信以正确的态度调解师生矛盾，这就揭露了制造师生分裂的人在搞政治阴谋。所以这么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大人物们也不得不重视起来。

黄帅的父亲将信复写两份直寄迟群，迟在信上批示：“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革反革命的命”，“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不久大人捉刀而以黄帅名义回复的《一个小学生的公开信》制作出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立即审看。江于 1974 年 2 月 9 日批示：“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姚同意立即发表，又特意批注不发王亚卓的信。

2 月 11 日，《人民日报》在“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的通栏标题下，发表公开信。公开信反诬王亚卓“把师生引向分裂”。其后一个多月，中央、省级报纸发表近百篇批判文章。公开信广播的次日，工作组开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 团，作出“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团政治处被停止工作、整顿思想一月。师部宣传科干事对公开信稍示不满，即被通报。政治处秘书在《人民日报》来人调查时说了几句实话，被批判 20 多次。4 月 5 日，3 个写信人被放去艰苦地方“劳动改造”。其中邢卓 9 月获准回保定探家时，才知母、妹二人受刺激病故。

但是王亚卓信件得到人民的支持。19 团中心学校部分教师在京探亲时听到广播，即找北京教育局要求同小学生辩论，还

到报社提不同意见。连队战士也贴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不坚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亚卓不放？”19团还收到全国各地的支持信180多封。“四人帮”垮台后，王亚卓获平反。<sup>①</sup>

### 七、马振抚中学事件（1974. 1. 25）

1972年以来，教育界积极整顿学校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抓紧学习，恢复考试检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据后来的指控材料（多有夸大不实之词，仅供参考）说：“撤走了工宣队，取消了贫管会，辞退了工农兼职教师，改掉了校办工厂、农场，脱掉了校队挂钩，关起门来埋头于课堂教学”，考试搞“AB卷”，“背靠背”，“张玉勤所在班一学期语文考了9次，数学大小考多达18次”，“学生迟到一次，罚挑大粪3担。学生答不出难题，就叫在黑板上写上‘羞耻’二字，还要站到讲台上‘亮相’”。

该校于1973年7月10日下午，举行了英语闭卷考试。初中二年级学生张玉勤在期中考试除音乐、体育、劳动外，其他课全不及格，这次英语考试又答题不出，便在考卷反面写上一首打油诗：

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学外国文/不学 ABCD/还埋葬帝修反

此持抄自报上一学生写的批判“读书无用”论的文章，她把反面举证正面接受下来，为拒学英语自辩。（后来报上竟称此为“表示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11日上午监考教师交卷子于班主任杨天成，杨即找她谈话，进行批评教育。杨老师的工作方式方法也有些欠妥，如语带讽

<sup>①</sup>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载《北京日报》1973年12月12日；《一出反党乱教的几剧》，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3期；《揭穿“王亚卓事件”冤案》，载《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4日；批判文章又见1978年5月21日第2版。

刺挖苦，说“我当老师的教出了一个‘伟大诗人’，感到荣幸，那你可以成为老师了，我就可以当你的学生”，“我给你指出两条路：一是向全班同学作检查；二是在考卷上写上‘伟大诗人张玉勤，马振抚公社付岗人’，贴在墙报上，让全校同学讨论”。

女孩精神上接受不了，拒不在班上检讨，当晚也没吃饭，哭了一夜。可惜，班主任和学校负责人罗长奇没能了解到这一切，仍在当晚的班主任会议上决定：明日一早召开初中全体学生大会进行批评。

12日大会按预定计划进行，罗长奇在会上表扬了表现好的学生和集体，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张玉勤。张拒绝参加大会。吃早饭时她称病，让同学代为请假，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学校，在距学校5华里的水库投水自尽。

在张失踪期间，学校报告了公社，积极寻找，于14日晨在水库桥下发现遗体。情况并非后来材料所说“置之不理”、“凶神恶煞”，其家人闹到学校，公社、派出所出面平息，学校也给予补助。唐河县委、南阳地委多次调查处理，并向省教育厅提出报告，省也及时上报了国务院科教组。

事情平息半年后，1974年1月，江青在《人民日报》内参中看到此事，即派前去浙江21军防化连送材料的迟群、谢静宜顺道再调查。两人于19日至21日绕道唐河，不打招呼、不说来意、不报姓名，调查不到一天，开了一个学生、家长、教师座谈会。会上，社办工厂工人涂纪岑说自己孩子破坏校规、偷英语试卷，检讨没教育好孩子。迟、谢二人当即说：“你讲得不对！你的孩子做得对，做得好，敢于拿考卷，就是敢于反潮流！”“他偷的是旧教育制度，应当造反！”当场封这孩子为“反潮流闯将”，让家长参加“马振抚公社批林批孔报告团”，到地、县去做报告。

两人回京4天后，即在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抓住

此事大加声讨。1月26日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将马振抚误作马振扶),31日以中央名义发出,将此事定性为:“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称马振抚中学“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复活旧的教育制度‘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一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惊人地步”,要“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王洪文说“要判重刑”,江青说“要向全国控诉”。

河南被迫重新处理此事,于2月逮捕罗长奇、杨天成,1975年9月判刑两年。从1月26日起,省委、地委、县委在马振抚公社举办大型学习班。三级负责人都在会上检查“思想不敏感,见事迟,行动慢”。学习班层层揪“罗、杨式人物”,批斗280余名教师、干部。马振抚中学被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全面复辟的典型”,“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对贫下中农有刻骨仇恨”,“对学生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马振抚中学事件推动全国学校大批大揭所谓“复辟回潮”,学校秩序大大恶化。如四川省就发生30多起类似的案子,涉及50多名热爱教育、忠于职守的教师。其中武胜县中学班主任陈祥光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刑7年。1978年后,这些教师才陆续平反<sup>①</sup>。

### 八、永乐中学事件(1974.3)

这也是旧事重提、小题大做的一个典型。事情发生于1971年北京石景山区永乐中学。有个初中一年级学生表现较差,老

<sup>①</sup> 《愤怒的控诉有力的回击》,载《教育革命通讯》1974年第4期;涂纪岑:《揭发“四人帮”对俺孩子的毒害》,载《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0日;批判文章载《人民日报》1978年9月18日。



师派了5个班干部到他家进行帮助。在家长做了忆苦思甜报告后，学生干部告诉该同学打碎学校玻璃之事，请家长协助教育。家长即行打骂，孩子外逃跳楼，致脚踝骨折。此事学校已妥善处理并向教育局汇报过。不料3年后批林批孔运动中，该校一名王姓教师产生了新的认识，上书说这个学生是被“修正主义路线逼迫跳楼”。

此信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马上受到重视。3月12日，江青作出批示并讲话，认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坏典型”，“北京市已有几个学校实行法西斯主义，让坏人专了学生的政，打、骂、死、活听之，是社会主义中国？还是国民党的台湾？”

迟群即以国务院科教组名义电告全国各地科教组，编发《教育革命简报》下达。谢静宜亲临永乐中学抓点，于3月18日召开全校大会，书记、主任不准上台，教师集中列于台前，宣布“夺权改革”。4月22日又召开全市中小学万人大会，批判永乐中学的“复辟”。该校书记被迫贴出长篇检讨，而后被处理去他校看图书馆。学校支部改组。

为了论证这个学校是“复辟典型”，谢静宜不惜颠倒是非，竟说学生打破玻璃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抗”，是“对师道尊严的惩罚”，是“对修正主义的惩罚”，是“革命行动”，同18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不多久，这个学校玻璃被砸660多块，桌椅损坏300多套，学生不买书、不带书、不念书，全校大乱。<sup>①</sup>

### 九、批判湘剧《园丁之歌》事件（1974. 8）

《园丁之歌》是一出新编的40多分钟的轻松活泼小戏。它

<sup>①</sup> 北京永乐中学党支部：《揭开所谓“北京永乐中学事件”的真相》，载《人民教育》1977年第3期。

创作于1972年绝非偶然。其时“文革”风暴扫过不久，作品尽作毒草铲除，作家无非牛鬼蛇神，花不发于严冬，笔皆封于牛棚，文苑一片肃杀。然而，另一个文艺景观却十分突出，这就是工农兵业余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的演出活跃繁盛。它上承“文革”前夕“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下厂下乡运动，中经“红卫兵战斗文艺”发扬光大，历久不衰。作品大多为大歌大颂毛主席及学唱学演样板戏。突如其来的林彪“自我爆炸”事件，给了“文革”以来的颂神造神运动一个大冲击。此后群众性文艺演出也多多少少改变了单一化的大歌大颂，各地十分频繁的文艺调演、文艺汇报演出中也出现了一些带有生活气息的新作品。《园丁之歌》正是出现于1972年湖南省文艺调演中的一出小戏。以其主题、人物、情节冲突的设置迥异于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而一新耳目。该戏将一号人物的座位给了尚有“臭老九”之嫌的教师，这正是对1972年调整教育、批判“读书无用”论的回应，这也是它后来遭受劫难的原因。（湖南省1972年3月、4月、9月连续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批判“教育革命”中的极左做法，强调提高教育质量。）

应该说《园丁之歌》对现实生活向的反应是敏锐的，艺术创作上也是敢冒险的，所以抢了个风气之先，宣泄了久蓄于人心的腹非之言，因而当时在湖南反响强烈。于是在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的支持下，于1973年拍成彩色电影送审。

7月28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片，立即嗅出异味。江说：“‘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更大，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

影片虽未立遭公开批判，但公开发行已不可能了。当时“反击”的突破口，选了辽宁张铁生答卷，此剧作炸弹暂留手中，待时一年。

到1974年夏，批林批孔运动已有些不妙，毛泽东在7月17

日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搞“四人帮”。这个时候突然掀起文艺批判风暴，意在为已出现虎头蛇尾败相的批林批孔运动打气添油。7月19日，文化组发出批判《园丁之歌》通知。8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初澜的《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接着各报刊纷纷跟上，共发批判文章近百篇。主要论点是：①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比作园丁不对，园丁是党；②鼓吹“智育第一”、“文化至上”；③以教师为中心，取代了工宣队的地位，是“复辟旧教育路线”；④台词“没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唱赞歌”，革命重担就是由文化不多的奴隶们、工人们、农民们承担的。

其中有一篇妙文，不知是出于赎罪心理还是有意戏谑，出得比初澜文章还早三个月，发在《湖南教育》5月号上。该文竟把众多批判文章都承认其“有缺点”的差生陶利，捧为正面英雄人物。对他的淘顽，竟然连声喝彩道：“对于那套脱离实际、关门读书的教学制度，他坚决反对；死背‘一三得三、三九二十七’（九九表）的考试，他敢于交白卷；‘一上一、二上二’几句现成话（珠算口诀），他懒得学。这是对‘智育第一’的公开挑战。陶利这种反潮流的精神，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新气象。”这一段既像无知又似幽默的批判文字，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新气象”糟蹋够了。

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的广大教师，对这种颠倒是非的批判，无人不反感，无不为剧中循循善诱、殚精竭虑教管顽童的好老师俞英遭批而抱屈。正是批了一出戏，寒了百万教师心。此剧还有一段后话，趁此一并叙出。

1974年底在家乡养病又酷爱家乡地方戏的毛泽东，在湖南省委的悉心安排下，观看了这一出乡音乡调的小戏。老人家好像不知批判之事，竟高兴得鼓起掌来。湖南省委立即抓住这一契机，向刚刚成立的文化部反映伟大领袖亲自观赏并为之鼓掌

的事，提出将该节目继续上演和放映。病中的周恩来也马上调看影片，认为没有问题。1975年初刚上任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向部里传达了这一信息，并部署写文重评该剧，驳斥、辩诬<sup>①</sup>。

可是事情未成，“反击右倾翻案风”已到。于是大迫“谣言”，说湖南省委安排毛泽东看戏是阴谋，把周荣鑫传达毛泽东鼓掌列为罪状，斥为“搞翻案”。

### 第三节 1975年再次整顿教育

#### 一、1975年的政治转机

如前所述，1972年底的扭转批“左”、转向批右，1973年夏突如其来的“反潮流”，1974年初排山倒海般的“批林批孔”，江青集团发动了连续攻势，整病周恩来（6月1日住院），围攻邓小平（10月17日风庆轮事件），连连得手。可是自王洪文10月18日长沙告状起，局势忽起戏剧性变化，毛泽东连连阻止江青“组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工作。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10日，被十届二中全会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7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短短时间里集党、政、军诸要职于一身，这种人事安排，正是为他在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接替重病住院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准备。2月1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973年7月条；王淑秧：《推行“两个估计”与围剿〈园丁之歌〉》，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2期。

日，周恩来开会审定副总理分工，次日提出邓小平主管外事并代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予以批准。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敢批逆鳞，处一般人难有作为之地，搞出一番新局面来，这就是10个月的整顿。

由于毛泽东只能容许在肯定“文革”、肯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进行整顿，这就给邓小平搞整顿预置了障碍和陷阱。毛泽东发出的三项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后来解释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显然，他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促生产）与他的主观愿望（安定团结、经济上去）是冲突的，也即是三项指示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邓小平置身于这种矛盾之中 and 险恶的政治旋涡之中，在“文革”仍在继续进行的特殊条件下，以他的机灵的智慧，制订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指导思想（于5月29日的钢铁工业会议上首次提出），使经济工作和整顿工作得以趋顺避险开展。经过各方面的整顿，武斗平息，动乱又止，秩序好转，生产回升。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4504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较上年增480亿元，增幅11.9%。社会商品零售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9.2%。进出口贸易额达147.5亿美元，为建国以来最高年，除财政稍有赤字（收815.6亿元，支820.9亿元），本年度经济形势很好，已摆脱停滞徘徊局面，开始了新的发展。

与此同时对教育、科技、文艺政策也进行了调整，邓小平后来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明确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毛泽东也支持了这一工作，他在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说，“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并说“老九不能走”。7月初，他在同邓小平谈话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9日，邓小平即

召集6月下旬刚成立的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于光远传达毛对文艺的批评。政研室理论组即查阅1969~1975年的报刊，发现宣传“三突出”原则的18篇文章中，砍去“百花齐放”提法有19处之多。于是写成《关于报刊中宣传“双百”创作方针情况的材料》、《关于报刊上宣传“三突出”创作原则情况的材料》两文，邓小平据以对江青控制的文艺领地提出批评。他在10月4日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还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不提百花齐放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迫使文化部创作办公室于12月12日向出版机关发出《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的修改方案》。

7月14日傍晚毛泽东当面对江青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毛泽东指示很快传开。早在4月，毛就曾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尽快放人。中央据此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涉的人和极少数人外，全部在押受审者都予释放，安排工作或就养就医，结果300多名高级干部获救。5月17日毛在贺诚任职报告上批：“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上，呜呼哀哉！”进一步推动解放干部。7月2日毛又批示林默涵上书：“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促成最后三个在押的高级文艺干部出狱（周扬、夏衍、阳翰笙）。邓小平把握住这一契机，策动文艺工作者反对江青一伙的文化专制。7月18日，被江青

压制的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上书告状，经邓转毛，毛于25日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批准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同日，电影《海霞》的导演谢铁骊上书述影片被刁难情况，又是邓转交毛，毛于29日批将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日夜邓即组织政治局8个委员审看，并作出公映决定。邓小平又将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8月8日写的批评江青一伙实行文化专制的大字报送毛，毛批“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洗星海夫人钱韵铃于9月27日上书陈筹办纪念聂耳、洗星海音乐会受阻情况，邓上呈毛，毛批准举办。《李自成》作者姚雪垠10月19日上书告出版之难、鲁迅之子周海婴上书告《鲁迅全集》出书受阻，毛均作批示支持。10月16日，哲学社会科学部简报刊载部分学部委员对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良好反应，毛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广东一个简报刊出中山大学一个教授的意见“8亿人民8年看8个样板戏”，集中表达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半年多来，邓小平巧妙地组织了文艺工作者对江青集团独霸文坛的斗争，逼得他们转为守势，这是10多年来所没有过的。一时间，竟出现了短暂的文艺繁荣景象：100多部影片解禁重映；10月《长征组歌》打破阻挠隆重上演；25日起纪念聂耳、洗星海音乐会连演5天，并在沪、穗、沈、津等地相继举办，这是“文革”9年来文艺界的头一次盛会；一大批古典小说和学术名著重新出版；《人民文学》、《诗刊》、《历史研究》等几十种文艺和学术刊物复刊。当然，这只是肃杀长冬的小阳春，真正的春天并未到来。

由于整顿工作只能在三个相互矛盾的指示下进行，抓经济工作为纲与“阶级斗争为纲”，两种指导思想不可能长期并行不悖，因而10个月中发生了种种争斗。其大者有二：一是反经验

主义风波，一是评《水滸》风波。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教育的整顿。

毛泽东于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12月26日与周恩来谈话时，集中讲了他对“文革”的一些理论思考。他把社会主义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社会差别，统统归之于“资产阶级法权”；又从小生产者、工人、干部身上寻找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并将二者视为出现新生资产阶级的条件，以论证搞“文革”、搞“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他要张春桥、姚文元选编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要他们写文章阐述这个理论问题。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转述了毛泽东谈话要点。18日中央发出通知，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传达全国。22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姚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共33条。这个选本对导师们不同条件下针对具体问题说过的一些话，断章取义，并赋予绝对化的含义，作为“全面专政论”的理论依据。3月1日，姚文元在《红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文发挥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说“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还部分存在，在分配方面则占有统治地位，它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占优势，所以必须实行“全面专政”。从而掀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高潮”。

在学习运动中，张、姚等人又夹进暗箭。张春桥3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利用毛泽东1959年批在《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上的几句话“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提出：“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林彪搞经验主义”，要警惕“经验主义的危险”。姚文元在3月1日文章中公开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此后江青多次讲话要反



“经验主义”。报刊文章也开始批起“经验主义”来。这样就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引向反“经验主义”，矛头暗指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老干部。上海《解放日报》4月7日发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文，竟直接影射周恩来，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反“经验主义”在一部分地方得到了响应，有的还召开批判“经验主义”万人大会。上海一个工厂搞出“经验主义10条表现”<sup>①</sup>。

在反“经验主义”有了一定声势之后，3月底，姚文元将被他压了一个多月的新华社于2月23日向中央提出的《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请示报告》，取出来要求修改，授意夹进“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一句话，想蒙混毛泽东的批准，将反“经验主义”合法化。

一浪高一浪的反“经验主义”，引起邓小平的警觉。4月18日，他乘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本人澄清江、张、姚等人反“经验主义”的活动，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姚文元授意的反“经验主义”报告，在毛处多日，他压而未批，至此两面意见一听，心中有数，他不愿四届人大刚开过后又起争端，便于4月23日批：“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4月27日，政治局按毛指示开会，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会后，江

<sup>①</sup> 《大反经验主义的要害是篡党夺权》，载《红旗》1976年12期；《“四人帮”上演反“经验主义”丑剧的前前后后》，载《人民日报》1977年3月3日。

不服气，指使王洪文写信向毛泽东挑拨，说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讲了周恩来想说而没说出的话。<sup>①</sup>

毛泽东鉴于问题没解决，于5月3日23点召政治局委员到住处开会，周恩来抱病出席。毛一开始就承认“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实为姚文），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1974年8月患老年性白内障，失明，1975年8月经手术只眼复明），讲了经验主义我放过了”。接着就批评江青等人“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又重提江青等人批林批孔中“三箭齐发”、搞“四人帮”的错误。但总的基调是肯定江、张反刘（少奇）反林有功，至于错误则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政治局遂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开会，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毛泽东的讲话，批评江青等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发言，历数江青等人的错误：称批评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夹进批“走后门”，反“经验主义”等。政治局连续开会批江青等人，是“文革”中仅有的一次，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虚名也就此结束，尔后闲置上海数月。

周恩来也于5月4日至5日写了书面意见，就毛批江青不讨论、不守纪律、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乱送材料之意，拟了政治局工作程序和手续规则，还指出反经验主义“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周还于5月21日致信王洪文，囑转政治局

<sup>①</sup> 铁骥：《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的同志阅后上达毛泽东，信中揭发反“经验主义”是张春桥最先在3月1日总政各大单位主任会上提出。邓小平阅信后加注：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张春桥阅信后抵赖，加批：“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信转回周手中后，他于5月27日再次揭发，直接致信张本人说：“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接着细述经过，然后质询张：“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张只好认错，表示“不再改了”。<sup>①</sup>

这次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斗争，虽然较为局限，江、张也未作什么自我批评，而且连毛泽东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姚文元也批上“暂不传达”给封锁起来，甚至不许新华社同志提及。<sup>②</sup>但总算稍稍敛抑了他们的活动，以致江青在次年3月还耿耿于怀说：“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sup>③</sup>反“经验主义”风波就这样停息下来，整顿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另一场风波是评《水浒》，这是由毛泽东评论这部古代小说引发的一场批判所谓“现代投降派”的运动。

毛泽东以前就评过《水浒》，如1973年12月23日接见中央军委会议代表时说“《水浒》反贪官不反皇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获过去风闻此事，于1975年8月14日乘给毛讲读古文时，请教了对几部古典文学名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三国演义》、《红楼梦》，然后讲到《水浒》。他说：“《水浒》这部

①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

② 记者述评：《“四人帮”上演反“经验主义”丑剧的前前后后》，载《人民日报》1977年3月3日。

③ 批判江青反“经验主义”的文章，载《红旗》1976年第12期。

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些话虽是在茶间寝房同文学教师讨论文学问题说的，是不是就如有些论者所认为的，纯属私人间的学术闲聊呢？后来只是被“四人帮”利用了才搞起一场运动？看来并不这么简单。毛泽东的评论，明明有题外之话、弦外之音，如说宋江搞“修正主义”，晁盖盖于108人之外。毛读史入于其内，发人之未发，屡有一反传统的卓见，富有穿透力和启示性。评《水浒》的一段话，也如此又不止于此。毛泽东是多年置身于斗争旋涡的政治家，有丰富的政治感受和深奥的政治谋算，他早有情愫郁结于心，芦荻恰巧出了个合适的题目，如火石落薪，燃起一片烈焰。评《水浒》的一席话，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他对“文革”结局和“修正主义复辟”的极大忧虑一泻而出。

芦荻当即将谈话纪录交毛审定，毛即令张玉凤发姚文元。姚收件即窥破奥妙，知可大加利用，于3小时之内就拟出如何贯彻毛泽东评《水浒》的意见，并以信件形式当天报毛。毛泽东立即予以批准，中央随即转发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红旗》杂志于8月28日发表评论《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提出批“现代投降派”，至年底共发评《水浒》文章21篇。《人民日报》于9月4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说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接着各报刊纷纷发文响应，各地也开展起评《水浒》、揪“现代投降派”的斗争。这是几次受批、一度收敛的江青集团开始重新进攻的起点。评《水浒》运动从9月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后者的发动作好了舆论准备。

9月12日，江青在山西大寨群众大会上说话走火。17日又在大寨召集文艺界、新闻界、教育界百人集会，反攻7、8、9三个月的告状风，很不明智地捅开了评《水浒》的政治奥秘。后来，又甚为嚣张地要求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播放和印发她的讲话。她在讲话中说：“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33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批准评《水浒》，只是出于一种隐忧，是有所针对、有所警告，却不想打倒什么人，更不想兴起运动导致大乱。而江青等人却急于掀起掀“投降派”的夺权运动，并且如此拙陋地“联系现实”，授人以柄，所以当华国锋就江青要求播放、印发她讲话之事请示毛泽东时，毛的恼怒就可想而知了。他怒斥江青：“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这就暂时抑制了江青集团的攻势，使整顿工作仍延续了一小段时间。

## 二、教育的整顿

1975年的整顿在文艺领域取得很大成功，在科技和教育领域也有良好的起势，派去的干部也很得力（2月周荣鑫任教育部长，7月胡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但未及全面铺开就被打断了。文艺界虽是江青独霸的领地，但由于毛泽东本人7~10月的一系列批示干预，整顿开展较顺。可惜的是对于教育破败现状，毛泽东竟未置一言。对于治理科技界的极左破坏、振起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平乱兴废之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却留中不发，这不能不阻滞这两个领域的整顿工作。

7月，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其领导班子的报告。胡耀邦等3人奉命主持科学院工作。他针对科学院无章可依、瘫痪混乱的局面，首先抓科技政策清乱和规章制度建设，想搞出个章法取得毛泽东的批准，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这个思路抓主要矛盾，在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和胡耀邦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到9月间便形成文件。同时形成的著名文件还有《工业三十条》。这是整顿期间产生的仅有的两个行业性章法。文件虽未得到毛泽东批示，但这两个非正式文件还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他领域包括教育领域都未能形成类似文件。

《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在制订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澄清及其条款，尤其是邓小平的一些指示，对教育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汇报提纲》指出：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生产斗争所不能替代的，不能要求任何科研工作都“以工厂、农村为基地”，不宜笼统提“开门办科研”口号，要加强理论研究，不能把科研等同于“三脱离”，要开展学术交流，不能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

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尖锐批判极左思潮对科学教育的危害。他说：“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是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1000人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针对北大让一个老科学家改行教别的，他说，“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这些话通过不同途径传出，鼓舞人心。

教育的整顿，可以上溯到四届人大。1月17日四届人大一

次会议，撤消了迟群等人控制了很大实权的国务院科教组，重新恢复停止工作9年之久的教育部，任命多年从事教育领导工作的周荣鑫为教育部长（其余负责人为周宏宝、李琦、刘皓风、姚力）。这对江青集团插手教育，尤其对一心想凭功当部长的迟群，是个很大打击。迟群自1973年9月“反复辟反回潮”到1974年批林批孔，卖力甚大，立功颇多，此次不仅未入阁，且连原在科教组的位子也丢掉，顿失“革命派”风度，连连酗酒撒野。

周荣鑫（1917~1976）历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他于1975年1月接任教育部长之职，肩负整顿教育的大任。教育自“文革”以来一直是祸福莫测、吉少凶多的是非之地，一有运动，首先开刀。周荣鑫上任不到一年即被打倒，最后竟以身殉，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剧。

周荣鑫上任以后，勇于任事，敢于讲话，到处调查极左危害，召集各种汇报会、座谈会，发表批判极左教育思潮的谈话。他的讲话与“教育革命”一套针锋相对，发聋振聩。他的多次讲话虽是内部讲话（当时不可能利用报刊），但通过种种途径，在教育界广泛传播，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教师。自5月至8月，他针对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说：“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针对朝阳农学院的做法，他发问：“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农民，这样成不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上、管、改捧那么高，还要不要讲世界观改造？”针对批“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他反驳说：“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老说过

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针对“两个估计”的定论，他提出不同意见：“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知识的是‘私有’，没有知识的就会‘公有’？那就不要学校好了！”针对前年的“反复辟回潮”，他抨击说：“现在一谈学文化，有人就说什么修正主义回潮呀！1972年的翻案风啊！”“一讲就讲两个，一个是17年，一个是1972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周总理的讲话（指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他们为什么不贯彻？”“去年《教育革命通讯》上刊登的《破‘因循守旧’》那篇文章中，要搬掉一座什么‘其重无比的大山’，究竟要搬掉哪座大山？”“我们教育革命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很严重，非出问题不行。”

原科教组办的《教育革命通讯》一直控制在迟群手中，成为鼓吹极左教育思想的喉舌。但自1975年6月到10月，连续发表了一些批判极左教育思想的文章，如《全面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这些文章批判了“认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错误认识，批判了“以干代学”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提出大学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反对单纯学理论和轻视理论学习的两种倾向”，中小学要“保证上文化课的时间，打好基础”。

尤其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一文，重新拿出杜威的教育思想来批判，巧妙地影射了“教育革命”中“以干代学”



的做法。文章说杜威激烈地反传统教育，反对学校中心、课堂中心，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学校应当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缩影”，“学校必须能代替现在的生活”，“学校里的学业需与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把社会搬进学校”。这些话暗示了“开门办学”的荒唐。文章又说杜威反对“教师中心”，提出“儿童中心”，让学生“自由”、“自治”、“自主”，“教师应当放弃向导和指挥官的任务”。这些话暗示了“反师道尊严”的荒唐。文章说杜威反对“书本中心”，提出“从做中学”，只要获得“实际经验”就行，因为多数人“只有狭隘的实际冲动倾向和爱好”，而“没有获得纯粹知识的直接的社会依据”，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智力的冲动、倾向和爱好”。这些话暗示了以实践贬理论的荒唐。文章为杜威画出一幅害怕科学、仇视真理、反对学生学文化的漫画像，让人联想起现实的“教育革命”。

这些文章刺痛了极左派，“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到，《教育革命通讯》12期开专栏批判，还转载《辽宁日报》12月26日的文章《张铁生同志的一份新答卷——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这件写于11月29日的信，说第10期杂志把“教育战线上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专政谁的问题”改为“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与落后的教育的矛盾”，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兴，他们认为是“教育战线重新调整政策的红色信号”，“我们却觉得寒气逼人”，“反复要出现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将反攻倒算”。

7月，周荣鑫指示教育部编印《周总理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作为澄清极左思想的依据。后来被诬为搞“总理语录”，“反对毛主席”，“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

24日，周荣鑫向新华社记者转述王震副总理在援外工作会议上的一句话：“农学院都学朝农，我不那么赞成”，迫使报刊

一度停止宣传朝阳农学院。

8月23~30日，教育部召开京、沪、津、粤4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周荣鑫在会上多次讲话：“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在一谈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72年的‘风’啊！”“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sup>①</sup>这是周荣鑫主持教育部时规模较大的一次教育会议，讲话很快在全国传开，产生积极作用。

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就教育问题作了重要插话。他针对宣传朝阳农学院培养“与农民划等号的大学毕业生”，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钢铁学院只有中等水平，何必办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一种形式，但不是惟一形式，不能代替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sup>②</sup>

次日，邓小平又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继续谈教育问题，说“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47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4页；《新中国教育记事》，东北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574页。

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sup>①</sup>

9月，周荣鑫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传达邓小平指示，提出：“25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要培养人”，“科研工作的后继有人问题，中心是教育部门的问题。现在有个危机……不读书”。<sup>②</sup>后来风云突变，文件未及产生。

10月20日，周荣鑫在听取铁道部人事局教育座谈会汇报7所铁路高校情况时说：“两个基本估计”到现在没有解决好。有人把知识分子都简单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主席1957年讲知识分子大多数爱国，愿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人还在批“知识私有”。批判《园丁之歌》是“软刀子”、“文化至上”，这是从根本上否定学文化。现在对“以学为主”都发生了怀疑。“大学提培养二级工，要大学干什么？”“把社来社去推广到各地区各类院校行不通”，“有一个师范学院不敢说培养师资，而提培养农民”，“大学毕业后只能当工人农民，如果当干部、当技术人员就是做官，那么还要不要干部和技术员呢？”<sup>③</sup>

周荣鑫还向教育部传达上年年底毛泽东观看《园丁之歌》鼓掌之事，组织写作班子准备重评该剧，反驳初澜对该剧的指控。

整顿教育的声势，远没有达到前些时“反复辟回潮”的声势，在报刊上也得不到什么反响，但还是对实际教育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批林批孔、“反潮流”煽起的骚乱渐趋止息，教学秩序重新稳定，广大师生对“教育革命”中的一些极左口号反感日甚。早在四届人大提出“四化”建设目标之时，沈阳机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478页。

③ 周荣鑫：《教育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载《中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电学院自动化专业74届03班的7个学生反思了本校一系列极左做法，觉得与“四化”要求相去甚远。如学院提出7条学朝农“战略措施”，机械照搬“大学毕业当农民”的办学目标。打破循序渐进的“老三段”教学原则，搞“半工半读——定厂办学——毕业实践”的新三段，造成学生在校三年学不足一千课时，日均一课时。学生入学半年，只上了一个月文化课，看业务书是“智育第一”，看小人书却可以。学生要求开高等数学，学校却砍了基础部，说“学学拉计算尺，回去当个修理工就行了”，等等。他们于2月24日贴出了一张批驳“划等号”的大字报，题目是《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毛远新听了汇报说“闯劲挺大”，“敢于挑起争论”。校方秘密调查7人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经历，无辫子可抓，便在会上宣布：“问题在学生，根子在老师”，“青年学生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说的话”。反方意见以铸造专业73届02班12名学生的“大字报《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为代表，校方加按语印发全校讨论。后又铅印在《机电通讯》上，散发至许多高校、报社。毛远新又亲改按语，令省报发表。7人在如许压力之下，拒写“新认识”，他们收到几十封支持信。此事表明思想高压、思想统制正在崩溃。

正是在整顿教育的有利形势下，江青直接控制的“教育革命”基地——清华大学后院起火。该校副书记、老干部刘冰会同另两个副书记惠宪军、柳一安及政治部主任吕方正，于8月13日和10月10日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同时两次给北京市委写信并向市委教育组负责人口头汇报此事。由此展开了整顿两校的前哨战。

北大、清华两校在迟群、谢静宜于1968年率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之后，制造出许多摧残知识分子、践踏教育的“教育革命”经验，有的居然上升为一个时期的政策样板，写进中央文件下发。在“反复辟回潮”和批林批孔中，两校又是出政策、

出经验、出典型、出先锋的地方。两校是整顿教育的重点、难点，比其他行业的老大难要难治得多。因为两校曾是毛泽东的点，现在又是江青的点，迟、谢两人又都是通天人物。迟原是中央警卫 8341 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 1953 年初中毕业后在中央办公厅任机要员，两人皆由毛泽东派驻两校，后来迟当上清华党委书记，谢当上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

刘冰信件反映迟群个人主义严重，没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就酗酒大闹，光睡觉不工作，公然攻击中央领导；无组织无纪律无党的观念；作风霸道，工作草包；生活作风不正；9 月份整整一个月关门不出不工作不开会不见干部群众；谢静宜迁就袒护迟的错误。

刘冰的两封信皆由邓小平直接呈送毛泽东，这两个人只能交由毛泽东本人去处理。这样，整顿教育的斗争就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了。人们对解决迟群问题，寄予相当希望。

然而，没有想到，这两封信不仅没有解决小小一个迟群问题，而且引来清华园的一场颠倒是非的大辩论大斗争，更没有想到这不仅成为教育整顿的终结，而且引发一场席卷整个神州、扫倒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党政领导人的政治大风暴。

## 第四节 教育界又成战场

### 一、清华大学的“大辩论”

毛泽东在 1975 年内多次批示了状告江青的信，多次批评了江青，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但是，揭开整顿教育决战序幕的刘冰上书，经邓小平呈交毛后，却引起他的莫大疑虑。他后来特

别指明：刘冰上书为什么要邓转？他已怀疑自夏天以来的一系列上书是否系邓小平的组织策动。第二，两校自1968年夏以来是毛亲自抓的点，迟、谢两人也自称是毛主席的两个小兵，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毛本人蹲点的，所以后来毛也明确表白：这封信矛头是指向我本人的。第三，就是史家一致公认毛远新这个联络员所起的作用了。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病久缠，身体日衰。1975年下半年，他指定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担任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系毛泽东侄儿，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积极参与了“文革”活动，颇受毛泽东信任。由于他的这种特殊身份地位而控制了毛泽东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能对毛施加一定影响。他时时向毛输送不利于邓小平的情报。如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革。一、文革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二、批林批孔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误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11月2日，毛远新又汇报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这些话抓住了毛泽东的心病，他一直小心防范任何人出来否定“文革”。他知江青为人，所言不信，所以1974年江青托王洪文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他也没有听信，因为他知道王依附江。而这一次，毛远新确实影响了毛泽东。当然，从必然性上讲，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革”错误，而邓小平搞的整顿

是力纠“文革”错误的，矛盾在所不免，冲突是一定要发生的。

毛泽东收到刘冰8月上书后，近两个多月未表态。刘冰等人于10月13日再次上书，揭发迟群问题。迟群从18日至21日称病在家，实际指使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写反告状信，他自己口授内容。信件说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作出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攻击周荣鑫“任人唯亲，搞宗派”，他的半年总结是“翻案”，“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要把迟群“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使他这个四届人大代表“今年就变成了阶下囚，被人落井下石，被戴上形而上学这顶政治帽子”。<sup>①</sup>信于25日发出，毛泽东很快作出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11月2日毛远新汇报时，毛泽东出示刘冰信件征询意见。毛远新当即对迟群辩护，说迟“在执行主席和教育革命路线是比较坚决的，10个指头7个还是好的”。至此毛泽东正式表态：“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革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言九鼎，整顿工作即告中止，一场迅猛的运动已蓄势待发了。

运动发动的第一阶段是先在北京清华大学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同时让政治局开会讨论“文革”。11月2日当天毛远新衔命召集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宣示毛泽东意见。邓小平抗辩：“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天（指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

<sup>①</sup> 任翔：《揭发批判“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罪行》，载《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刘冰等同志的所谓“诬告信”究竟是怎么回事？》，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12期。

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见邓小平未作妥协，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文革”评价问题，批评邓。不过他还不想马上就打倒邓，他要求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基调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未作让步，回复：由我来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sup>①</sup>毛泽东遂决定停止邓的大部分工作，只让“专管外事”。邓小平自此从传媒中消失，只在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上最后一次露面。

11月3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对刘冰上书的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此批示是分阶段传达的。吴德这天只传达了批示的前三句，后面的话当时皆属绝密，后来正式决定发动运动，才在“打招呼”会议上全文传达。

清华大学即以这个党委扩大会议为起点，发动全校范围的“教育革命大辩论”运动。这个“大辩论”是全国“反击右倾翻

<sup>①</sup>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3页。



案风”的序幕，为后者造声势作舆论准备。党委扩大会扩大到1300多人参加，以辩论为名对刘冰等人进行有组织的围攻批斗。18日召开全校群众大会，先由市委书记吴德再次传达（扩大到群众）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的指示。再由迟、谢指使的15人上台作假证，对刘冰等人揭发的问题逐一“澄清”、推翻。如迟群秘书原向刘冰反映过迟的问题，现被迫翻供，原政治部副主任上台出示的迟群烧毁公家棉被后的赔偿发票是伪造的。会议把两封上书打成诬告信，并直追“后台”。刘冰被定为“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急先锋”，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组织生活，在全校批斗200余次。其余3人被斗百余次，经受喷气式、按脑袋、坐瓦片的折磨。后来他们都被发往农场，监督劳动。会后搞人人表态、个个过关。大字报铺天盖地，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周荣鑫，11月下旬又旁及主持铁路整顿的万里、主持科学院整顿的胡耀邦。12月12日，大字报直接点名批判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迟群还将周恩来部分指示编入《右倾翻案言论》小册子中，执笔者提醒说“这是周总理指示”，迟群说“不管谁说的，有错误都要批”，“引一些代表性的言论，抓住两三句话，展开分析批判，一看就知道是谁说的”。清华大学就用这种不点名整材料的方式，整了省军级以上干部47人的黑材料，扩散这类“言论摘编”小册子30余万份。这样，就由清华大学首先吹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角。此后通过组织参观、传送大字报、印发材料，把运动扩展到北京其他高校乃至全国。<sup>①</sup>

<sup>①</sup> 教育部大批判组：《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载《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本刊记者：《刘冰等同志及所谓“诬告信”究竟是怎么回事？》，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12期；苏渭昌：《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第248页；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是运动的准备阶段，“反击”运动采取正式步骤、统一部署发动，是始自11月下旬的“打招呼”会议。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指示。这个要点说刘冰等人“用造谣污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是对着毛主席的”，“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要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这个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正式宣布“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展。

接着于11月26日，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各大军区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打招呼会议开会情况，转发“要点”，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

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是报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反击”文章，是动员全国人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文章是完全从教育角度来谈“阶级斗争”的，说“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

校的旧教育制度”？

14日，中央又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报告。报告说“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江青等人利用清华大学报告，把夏季以来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中央政治局对他们的斗争，统统诬为政治谣言。

20日，中央转发一份《外交通讯》，内容是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访华人员介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张说：“现在斗争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教育怎样估计”，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17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这表明教育问题再一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

1976年1月14日，即周恩来追悼会的头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的报导，企图冲淡全国悲怀总理的气氛，同时把11月下旬打招呼会议的内容基本公开了。

2月3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毛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陈锡联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2月5日，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全党全国群众。至此，完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所要达到的目标：一是全部停止邓小平的工作，二是把清华大学的做法推向全国。

### 三、“反击”的两次升级

从2月25日开始，中央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即第二次打招呼会议。此次会议标志“反击”运

动的升级，并在党内正式命名这次运动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个文件收入毛泽东自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摘要。从毛泽东和华国锋的谈话看，运动有两个方面的升级：其一，从停止邓小平的工作发展到党内点名批邓，明确提“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但仍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与刘、林区别开来。其二，把“反击”运动从教育领域扩大到思想理论、政治经济各条战线，全面推翻1975年的整顿工作。

毛泽东在他的谈话中大大深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说：“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一些弊病看成与社会主义绝不相容的东西，不懂得要以经济发展去解决这些弊病，而幻想用不断革命、不断运动的办法去解决。所以他不能容忍邓小平抓经济建设的做法，批评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

江青利用这次会议之机，于3月2日擅自召集11省负责人开会，骂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攻击进口美国石油设备、出口原油煤炭是“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产阶级代理人”、“大汉奸”、“丢中国人的脸”。又甚不知趣的大谈吕后、武则天。毛泽东3月10日批示：“江青干涉太多，单独召开11省谈话”。

3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精神传达到县团级。对运动作了“不要成立战斗队”，“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代理人”的限制。

在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之前，报刊即把批判面从教育向各个领域扩展，会议以后则全面开花，集中攻击“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开始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和“唯生产力论”。3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坚持文艺革命，反右倾翻案风》。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2日又发表《从民主派到走资派》。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和《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2月16日，江青作了个批示，文化部即布置20部“与走资派斗”的电影创作规划。

然而，这次运动仅仅是报刊上十分热闹，人民反应出奇的冷淡。对批邓的不满和对限制悼念周恩来的不平，引发了几大城市的群众抗议运动。这是共和国历史从来没有过的，显示力量对比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暴虐20年的“左”的势力已无可挽回地显露衰相。在用武力镇压了百万群众的抗议运动之后，经毛泽东提议，政治局于4月7日晚通过两个决议。其一是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其二，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说矛盾性质由人民内部矛盾升为对抗性的。这标志“反击”运动的第二次升级，从此报刊公开点名批邓，并指控他是“中国的纳吉”。

这之后的运动在群众中是严厉追查所谓“政治谣言”，在报刊上则是不厌其烦地批所谓“三株大毒草”。这三个产生于整顿中的文件，一是1975年10月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

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是一篇未定稿；二是9月份形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18条，这是一个讨论草案；三是科学院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这是一个上报待批的文件。8月，这三份文件连同梁效等写的长篇批判文章分编为3本小册子，以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名义发至全国学习批判。两个多月里，即翻印达8130万册。

尽管报刊批判更加激烈，人民的反应却更加冷漠，干部群众只是奉命开会，奉命发言表态。对“三株大毒草”的大规模批判，竟产生了相反的政治作用，它使邓小平的主张更广为人知，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群众正是透过悖于情理的批判，逐步认识了邓小平。10月，“四人帮”垮台，批邓便再也批不下去了。

为时将近一年的“反击”运动，破坏了四届人大后稳定下来的政治局势，推翻了整顿工作中提出的正确政策，派性武斗、停工停产时有发生，致使年初全国计划会议确定的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不能完成。7月被迫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下调一些主要工业产品指标。如钢产量从2600万吨降为2400万吨，而实际只达到2046万吨，低于1971年水平。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1.7%。

#### 四、教育界的“反击”

1975年11月3日，“反击右倾翻案风”首先在清华大学搞起来之后，教育部成为最先受冲击的一个政府部门。11月8日，分管教育的张春桥责令教育部长周荣鑫检查。张说“你的那些讲话，不送给我，我也有”。教育部早有人密报周的活动。11月18日，张春桥召周再谈。周抗辩说学生不读书问题急待解决。张春桥竟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

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成为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同日，清华大学批斗刘冰等人，大字报点名批周荣鑫。

12月14日，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说7、8、9三个月谣言四起，“在教育界，尤其突出”。教育部对周荣鑫、李琦开始追查批判。将周以前传达毛泽东对《园丁之歌》的肯定，诬为“反革命政治谣言”。批判周的正确言论，如“过去搞理论——实践——理论，是违反《实践论》的，是错误的，但是反过来实践——实践——实践，也不行”等。还把一些别人说过的话栽到周身上，如教育部其他同志说的“中学物理不能只讲三机一泵”，“光学声学也应该学”。

1976年2月，张春桥指令迟群在教育部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剥夺了周荣鑫所任教育部长的职权。在周已经病重的情况下，仍强迫他每天去部里接受批斗。一个月之中，竟斗争50多次。自4月6日至12日，每天让周带氧气袋上教育部5楼，对他昼夜围攻。12日上午批斗一小时后，周即讲话困难，昏迷过去。毛泽东、华国锋曾指示全力抢救，无奈周荣鑫受摧残过甚，终于次日凌晨含冤去世，年59岁。<sup>①</sup>周荣鑫一案是教育界下部教师在“反击”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一个典型。

这次“反击”行动在中小学影响不大，但在有的高校闹得较凶，清华首当其冲。吉林大学抓了5个“右倾翻案”典型。其中一个化学研究室1975年发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sup>①</sup> 任翔：《揭发批判“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罪行》，载《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76年2月条。

搞好基础理论研究》，文章引用了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被定为“助了右倾翻案风的一臂之力”。另一个是1975年8月科学家唐敖庆建议建立一个理论科学研究所，他组织的66名科研人员在1972年到1976年完成7项研究任务，发表36篇论文、11份报告、18种译著译编，皆属无功，批为“被资产阶级利用了”，“刮基础理论风，破坏了三结合开门办科研”。<sup>①</sup>

沈阳机电学院1975年初写《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大字报的7名学生，在“反击”运动中被迫与写对立大字报《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的12人合写一张政治表态的大字报，在《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学院又令这19人停课两个半月，给他们办“爬坡学习班”，强迫他们表态去西藏当农民，当“工农兵学员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实际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该校在“反击”运动中大刮“左”风，把“大学生毕业当农民”作为办学方针，把有多少毕业生去农村作为检验学校工作的硬指标，大增政治课与劳动课，使学生在思想观念上、劳动技能上当适应农民。结果弄得这所理工院校的许多学生，“竟然没学过物理，高等数学只学了半册，外语也几乎没学什么。有些班上课时人数经常不到一半，晚自习也没有几个人看书”。<sup>②</sup>

这次“反击”，在“教育革命”理论上没有什么新发展，只是把老一套讲得更极端、更过头。“反击”的开篇大文是《红旗》杂志12月份发表的《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这是姚文元派编辑去清华、北大两校组的稿，并亲授机宜，确定首攻目

① 唐敖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尽快培养科技人才》，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3期。

② 某险峰、纪曙春：《揭穿“四人帮”一伙鼓吹所谓“划等号”的骗局》，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9期。



标是高考招生问题。高考招生问题确是教育的核心问题。用了“篡改”这么一个罪莫大焉的名目，针对谁呢？文章说毛主席“七·二一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明明是首先针对理工科大学怎么办而讲的，然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这是第一篇公开拿周恩来原话来批判的文章，这是过去批林批孔中都没有过的事。两个多月前的9月20日，周恩来进手术室时曾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他已经有预感了。两个多月后，1976年3月5日的《文汇报》删去新华社纪念雷锋稿中的周恩来题词，25日又首次不点名攻击周恩来是走资派，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文章不讲道理，硬说招收成绩好的中学生上大学，就是学校向资产阶级开门，就体现了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把“无产阶级专政主人”的工农兵排斥在大学的校门之外。文章把已经暴露大量弊病的推荐制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教育史上的革命”，“无产阶级教育的根本方向”，而中学生直接上大学就否定了“‘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从而否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否定了教劳结合，导致工农兵“重新被赶出高校的大门”，“资产阶级重新专无产阶级的政”，导致学生重新走“三脱离道路”，“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文章连学生的学习任务也否定了，说工农兵学员虽来自工农兵，还得要“与工农相结合”，“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首先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转变思想”，“开门办学”，“打破老三段”，“不迷信书本”，“就业务学习来说，也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这种毁灭教育的“方向”，为什么“不容篡改”呢？

清华大学党委发表在12月26日《人民日报》上的《在三大

革命运动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文，为论证为什么要搞“教育革命”，提出三个并不新鲜的论点：（1）“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从世界观来说基本上仍是资产阶级的”，“被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统治的旧学科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造”。（2）经层层挑选的“工农兵学员中也有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要通过他们（指教师）来培养新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经过17年社会主义改造和9年“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知识分子队伍仍是这么一个局面，只能说明“文革”失败了。以现有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历来如此，为何会是一个不可解决的“尖锐的矛盾”呢？原来矛盾在于“教育革命”的培养目标自身——所谓“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知识分子”呢？除了政治标准和劳动标准明确外，他应该具备一种什么样的“无产阶级知识结构”呢？从来也没有人说清楚过。一个人一旦学得人类现有的某一种知识，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从此加入了接受改造和再教育的行列。没有文化知识，反倒可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自己人”。按照当时盛行的观点“无产阶级知识不多，知识多的不是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因为无产阶级没掌握知识之前，他仍是无产阶级，而一旦“知识到手，人被夺走”，他就只是知识分子而非无产阶级了。许多党员教师在学习会上都曾捅开过这个矛盾：我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分子，怎么又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这种与现有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存在，连张、姚自己也不敢自认是这种“新型知识分子”。以现有知识分子去培养一种不存在的、空想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才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对现有知识分子予以否定，理想的“新型知识分子”又永远培养不出来，这才是一个“尖锐的矛盾”。现有一千多万知识分子

吃社会主义饭，为社会主义工作，就应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知识分子。另外提出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将现有一千多万知识分子视作异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是造成思想、理论、政策的大混乱。当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左右好坏的分别，但这不能成为在他们中间划分阶级的依据。划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同在工人中再行划分阶级一样荒诞。不能因为工人中出了坏人和反革命，而划出一个“资产阶级工人”。

正是这种空想的培养目标，导致办学方针、培养方法、教学内容的大混乱。清华大学列举了他们的方法：学校要不断搞“阶级斗争”、抓“转变思想”、抓“反修防修”、抓生产劳动；即使这样仍不能在校内完成培养任务，因而要“开门办学”，走出校门，“让广大工农兵直接参加培养学员”。于是，清华大学“几年来，广大师生到 100 多个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办学……广大工农兵参加了教育革命的领导和教学的主要环节”。他们就用这种“实践——实践——实践”，“不学文化”，“只当劳动力”，“进进出出大呼隆”（周荣鑫的批评语）来破除正规的教育，消解“旧学校”的教育功能，防止学生学到“有害无用的书本知识”，防止产生“精神贵族”（即知识分子）。为了不出“修正主义”，宁可只培养“没文化的劳动者”，因为无知愚昧是出不了“修正主义”的。所以学校要像工厂农场一样，只培养“与工农划等号的学生”。难怪教育部长要感慨：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

这一时期提出了“对着干”的口号，这是“文革”中“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逻辑继续。其理论根据是“文化大革命”文件中“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就是立”，“不破不立”，还有一条去了限制条件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对着干”不讲继

承，主张与“旧物”截然相反，将传统清除得一干二净，凭空建立起“无产阶级教育”。这事实上无法做到，因为任何形式的“立”，都不得不吸收旧因素。比如他们痛恨的“三中心”——教师、课堂、课本，就破不了，废不得。这就必然有所“复旧”，有所“回潮”。结果，“教育革命”10年，头4年还算有“破”有“立”，后6年则别无建树，天天只是同“复旧”、“复辟”斗，不斗则退，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斗的结果，据说是“造成修正主义不能存在，资产阶级不能存在的状态”，而实际上是教育本身也不能存在了，向着荒芜原始状态倒退。“教育革命”后期不搞教育只搞斗争，而这种盲动蛮干的“左”倾实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就是“对着干”理论了。

“革命大批判”暴肆10余年，初是刀斧铮铮，理盛气壮，所向莫不披靡。历久渐为国人识破，无非以贴阶级标签为惟一法门，信者日稀，影响日衰。所谓“与传统彻底决裂”，无非故走极端而已。大批判未能“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地造出“无产阶级新教育”，只是造出一种史所罕见的“走极端”的乱象。比如批“智育第一”，批“师道尊严”，批“读书做官”，并未出现所期的“学生为革命而学，教师为革命而教”的新气象，只是导致“学生不学，教师不教”的大混乱。不可收拾时，又倒转来批“文化工作危险”论，批“躺倒不干”，批“读书无用”论。

以误批正，导致循环折腾：胡批，碰壁，调整……

如果说打“三家村”时的大批判拥有指人为鬼的法力，那么1975年底的“批邓”，大批判已成强弩之末，走到尽头了。“批邓”未能丑化其人，反使他的合理主张为更多人所知。

---

---

## 第六章

# “教育革命”的终结与教育的 拨乱反正

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斗争，本身就是对“文革”的批判与控诉，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文革”的否定，导致对“教育革命”的重新评价。但是否定“文革”的过程却很曲折。一位资深研究者作过这样的概括：“从实际结束到公开宣布‘文革’结束（1977年8月十一大），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而从肯定‘文革’的‘辉煌胜利’到对它彻底否定（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则用了整整5年光阴。至于彻底肃清‘文革’的余毒和影响则可能需要几倍于‘文革’的时间。”<sup>①</sup>

---

<sup>①</sup>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四人帮”的垮台标志“文革”的实际结束，但“教育革命”却实际上并未结束。1977年春，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继续入学。6月召开的全国招生会议继续提出1978年的推荐上学计划。广大教师继续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教育是“文革”的重灾区，否定“教育革命”成为否定“文革”的第一个战役。发起这个战役的是复职上班才数日的邓小平。他亲自组织了这场战役的两大行动，一是推倒“两个估计”，一是恢复高考。两项举措出台，人心大顺，社会风气大变，也实际上最终宣告这一场“教育革命”的结束。

## 第一节 “教育革命”的严重后果

“文革”10年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按每百元投资应增效益推算，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4892.5亿元）。“教育革命”持续时间长达10余年，对教育的摧残（就教学设施、师资队伍的摧毁，停课停学的时间，教学质量下降等方面而言）无可估量。高校是重灾区。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将原有417所高校削为309所，减了1/4。其中并掉43所，改为工厂3所，降为中专17所，撤消45所（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名校）。仅北京一市，原有55所高校到1972年只剩18所。其中撤消18所，合并7所，外迁15所，校舍被占70万平方米。江西原有13所高校撤并为5所，一度全部搬迁农村办学，校舍被占42万平方米（为全部建筑面积的83%），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大部无存，损失达4400万元。福建原有10所高校减为3所，福建师范学院自20年代以来积累

的动、植物标本毁于一旦，3万多块国内外岩石、矿物标本用于铺路。天津大学实验室被工宣队“开仓济贫”，有20个实验室为之一空。南开大学实验室被砸坏600多平方米，设备损失70%。全国18所财经院校砍去16所，仅留辽宁、湖北两所。原有农业院校52所，裁减17所，22所农学院被占校舍86万平方米，为原有面积的1/2。全国高校校舍被占面积总计达430万平方米。

物质的损失固然难以算清，但损之更甚的是人。“文革”10年运动不断，师资队伍经“横扫牛鬼蛇神”、清队、下放三场大浩劫，损失惨重。据1980年11月5日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统计，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受迫害干部教师达14万余人。卫生部直属14所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受诬陷定罪的有500多人。全国正副教授7800人，到1977年减员为5800人，减员多为迫害致死。北京大学143名校系一级干部，定为“走资派”的130人。法律系65人，60%被审查。设劳改大院，关押260多人。全校被迫害致死40多人。上海高校立案审查人数达854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371人。上海音乐学院700多人就有254人受审查，交通大学1065人被收审，占总人数的1/3。陕西高校被立案审查者达3838人，占教师总数53.6%。中小学教师中，愈是名教师、拔尖人才、业务好手，愈受折磨。天津市内中小学教师被审查的达3756人，为总数的33%。四川中小学教师被审查者计31193人，其中致死者1822人，被开除者4866人。<sup>①</sup>

10年之中，少培养研究生10万人，少培养大学生100多万人、中专生200多万人。同时也造成知识分子和业务干部专业荒

<sup>①</sup> 《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第139页、第140页、第208页；《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8卷第205页。

疏、水平下降。国民文化素质整体滑坡，如上海职工中技术人员比重由1965年的4.8%，降为1976年的3.6%。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升为22580万人。

大、中、小学生学习质量严重下降。大学生质量评估见前，此不赘述。福建省“文革”前有“高考红旗”的美誉，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题易于以前，但全省不及格者竟高达90%，单科平均成绩85分以上者仅有0.08%。次年高考单科平均80分以上者也仅为2.25%，不及格者仍有76.7%。<sup>①</sup>北京市1977年高考考生157990人，不及格者为125693人，占80%。单科平均90分以上者仅为70人，比例是0.04%。次年高考考生86932人，不及格者为60821人，比例是70%。<sup>②</sup>

学校秩序混乱，良好的学风无存。马振抚公社中学经“反潮流”运动由治复乱，是全国中小学的一个缩影。当时教师人人自危，不敢施教管理，有一个班一学期竟连换4个班主任。教师教不成、管不了，又被骂为“消极怠工”，“撒手不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反扑”。学生无政府主义严重，动辄以找死威胁老师，“吓得教师常常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提心吊胆过日子。有一段时间，学校经常派教师看守校外的池塘，惟恐再发生意外。由于教师不敢管理和教育学生，有些班级经常听课的只有几个人”。该公社双河学校在1977年的中考时，挑选20名最好的学生“参战”，结果全军覆没。13人数学均为零分，剩下7人共得62分，人均3.1分。<sup>③</sup>辽宁的群众说闹学闹得“桌子

① 福建省教育局：《为高考红旗恢复名誉》，载《人民教育》1979年第1期。

②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③ 马振抚中学党支部：《“四人帮”给我校造成灾难性破坏》，载《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0日；《关于“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调查》，载《人民日报》1977年12月9日。



没面，凳子两半，门窗没框，房子没盖，玻璃碎片”。<sup>①</sup>

危害更为深远的是把一系列是非观念搞颠倒了，搞乱了，至今犹感“左”毒潜伏，清源不易。很长一段时间里，批“左”批的是一些外在的、肤浅的东西，诸如“打了零蛋分的恰恰是我们所要培养的接班人”，“尽管我们的学校有50多个专业，实际上就是一个专业，就是造走资派反的专业”（迟群语），诸如“一个是有社会主义觉悟，一个是劳动者，就从两头体现我们的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毛远新语），诸如“宁要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宁肯少学一点，也不要红色工程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春桥语）。实际上问题远比这严重得多。

其大者有四：（1）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专政工具”论和“为政治服务”论还是据有相当正统地位的；（2）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上，“精神贵族”论虽受了批判，还有些观点未能澄清；（3）理论与实践、书本知识与经验知识、文化知识（纯粹知识）与实用知识的关系上，那种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蒙昧主义的思想尚未深入清算；（4）20多年来，多次扰乱教育、困惑人心的文化平均主义则基本没有得到切实的批判。笔者拟在最后一章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处从略。

一个有几千年教育传统的古国，一个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多年来，教育理论上只有几个指示和一本册子。这种理论的贫困，也可谓是“教育革命”的一个不幸的后果。

<sup>①</sup> 新华社记者：《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右口号——批“同17年对着干”》，载《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5日。

## 第二节 推倒“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出自1971年4~7月产生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写在第一节中的一个估计是“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另一个估计写在第二节第四条中“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其基本内容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就有了。“五七指示”中“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句，是“两个估计”的直接来源。此后“文化大革命”的文献材料中，不断有相同意思的提法。如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中，说存在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号召“搞掉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该报1967年7月18日文章《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总后台》断言17年教育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的一套破烂”。又如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文教战线问题严重，“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文教战线上去，还有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再如1969年6月张春桥姚文元主持制订的《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说“我们这条战线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文化革命前，自始至终占着统治地位”。因而1971年“纪要”写上“两个估计”的观点，在当时已算不上什么新精神。不过，经由中共中央关于教育的正式文件加以确认，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即使如此，由于当时批林整风的反“左”气氛，还是有许多会议代表加以抵制。如清华大学的一个代表就在文件起草小组会上，说明高教60条产生的背景和毛主席曾予肯定的真相，结果被斥为“资产阶级代言人”，不让参加起草小组。王首道提出：不要把普通大学与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混在一起写，以免造成各类学校概念不清，任务不明。话没说完，辽宁代表即斥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迟群大为赞赏。为了“统一认识”，会议要求各地找出“典型材料”，即丑化教师是“专门研究苍蝇有几根胡子、蚊子翅膀上有几道纹、林黛玉为什么喜欢吃粥”的材料。广东材料不合要求，便不准发言，不登简报。上海的材料体现了“两个估计”，则发给每个代表。其一为《华东纺织工学院30名劳模上学前后的调查》，说6人“被资产阶级化掉”，12人“个人主义意志消沉”，以糟蹋劳模来证明大学是“修正主义染缸”。其二说上海1960年办大学工人班以来共招554名工人学员，90%是党团员，10%是劳模，但后来都变成“追名逐利同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人”。<sup>①</sup>

要清除极左破坏，整顿和复兴教育，“两个估计”的问题不可回避。但是，由于“两个估计”是毛泽东画过圈的，“两个凡是”仍然禁锢着人们思想，不少领导仍据此坚持“左”的思想观点，这就使教育界清除极左破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无法下手。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对教育领域极左思想的批判很不够，只是揭批一些极端事例（主要是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政治事件），集中指证“四人帮”“形左实右”，“篡党夺

<sup>①</sup> 上海教育局批判组：《“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前前后后》，载《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4日；王首道在广州大会的发言：《“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大阴谋》，载《人民日报》1977年12月3日。

权”，还谈不上实事求是地清理极左思想。当然，在粉碎“四人帮”之初只能倾全力解决更为急迫的政治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的特点和历史局限（如指控“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教育革命”等）。但应当指出，揭批这些政治阴谋事件（许多发生在教育领域）本身，实际就是对极左思想的清算，虽然当时还有些遮遮掩掩。如粉碎“四人帮”一个半月之后，11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长篇文章《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这是第一篇批判极左教育思想的文章。文章抓住张春桥训斥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时冲口而出的一个谬论“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指控这是对毛主席关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方针的篡改，是企图使劳动人民永远处于愚昧无知地位的专制愚民政策。上纲很高，但说理没能达到批“左”所要求的深度。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也具有上述特征。

1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湖南省委宣传部文章《扼杀〈园丁之歌〉也是为了篡党夺权》，为湘剧《园丁之歌》平反。11月30日又发表《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揭发“四人帮”利用张铁生的答卷制造政治骗局的真相》，批判“四人帮”反对文化考试。1977年1月13日发表周培源文章《“四人帮”破坏基础理论研究用心何在》，16日《光明日报》发表《一场围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批判“四人帮”反对文化科学知识。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23日《光明日报》发表《戳穿江青批“师道尊严”的阴谋》（澄清黄帅事件），3月2日又发表《江青迫害永乐中学的罪行》，29日《人民日报》正式为王亚卓事件平反。这一系列文章初步为知识分子伸张了正气，有助于一步一步打破教育界“左”的精神禁锢，但是，还远未能解决“两个估计”的政治枷锁。

更奇怪的是，7月30日全国各报皆头版重新发表毛泽东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即曾作为“教育革命”三大指示之一的“七·三〇指示”。与此同时，“教育革命”左倾色彩极浓、摄制于“文革”中的彩色故事片《决裂》，继续在全国上映，与揭批“四人帮”的客观历史要求极不调协。

教育界批判极左的步伐停滞了，“两个估计”成为难以逾越的关隘。再要前进一步，则有待有胆有识有力者出来叩关平壤。

这个人出来了。他选准教育作为否定“文革”全盘的第一着棋。他就是在重新发表“七·三〇指示”之时方才出山的邓小平。1977年7月底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批准恢复邓小平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副总理、总参谋长四项职务。

8月4日到8月8日，邓小平在他重新工作的第一个月初着手第一项工作——开了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小型座谈会。邀请30多个科学家和教育家参加。他大量听取实际工作者的意见，寻找证据。他早已有之的思考，获得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有力支持。他随即针对当时科教界急待解决的、广大知识分子极为关心的几个问题，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谈话，即后称“八八讲话”的著名谈话。

早在尚未恢复工作之前，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两位中央领导人（王震、邓力群）谈话时已提出他的两个思考：（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2）“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sup>①</sup>。7月21日，在为他恢复职务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就第一个思考又加阐发：“‘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1页。

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sup>①</sup>

在“八八讲话”中邓小平继续阐发他的这两个思考：讲话的第一点就是对17年教育的评价：“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这是针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第一个估计讲的，断然否定“黑线专政”论。对第二个估计（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邓小平从知识分子劳动的性质和世界观两方面予以驳斥。他说“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加辛苦”，“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现在在农业科学院种庄稼不算劳动，要到农村种庄稼才算劳动。这真是怪事……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是劳动”，“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要强调尊重教师”。

同时，他又指出，“高等院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八八讲话”还讲了科学工作与教育体制的调整、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与生活、科学与教育的后勤工作、学风等问题。比较起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还是上述的两个：推倒“两个估计”与恢复高考。但是，困难在于“两个估计”是经毛泽东画圈同意的，而高校招生推荐制也是以他的著名的“七·二一指示”为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依据的。“两个凡是”的巨大习惯势力，是压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大山。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乃至全国各方面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都在这座大山跟前停滞了前进的步伐。

“八八讲话”表明邓小平已下决心，要在教育战线部署两个政治战役，率先冲击“两个凡是”的禁锢，率先迈开思想解放的步伐。他后来回顾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一个方针政策，总会有人反对和不同意的。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开展辩论嘛！”<sup>①</sup>可见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即自请抓科学教育，是有所考虑的，是大着胆准备有人反对的。“八八讲话”中的两个思考，邓小平早在1975年搞整顿时即有，限于当时条件而未及实施。此时，他以分管科学教育的副总理身份在公开会议上讲出来，可以视作教育战线上的两大战役已经展开。

接下来的部署是邓小平指示重开一次全国招生会议。早在邓小平复职之前的6月29日已开过一次全国招生会议，会议仍沿袭“文革”推荐上学做法，没有拨乱反正的动作。邓小平果断敏行，立即予以推翻重来。这样，1977年夏季就有了主题完全不同的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是史所不多见的。这次会议长达一个半月（8月13日至9月25日），这是因为会议插入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发动了对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经过、对张春桥、姚文元等炮制“两个估计”的真相的揭发批判。事情起于《人民日报》记者穆扬，他向当时教育部负责人反映一部分与会者的不满，并要求向上反映情况。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8页。

获准后，他于9月3日邀请6名曾参加1971年全教会并拥护邓小平“八八讲话”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座谈。大家揭发了“两个估计”的真相，一致认为不推倒“两个估计”就难以把会议开好开深入。记者连夜写成内参稿，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上报。这份材料便成了邓小平手中的有力武器，两个月后公开发表时题为《“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紧接着邓小平于9月19日召见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谈话。其内容即是推倒“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两大主题，并广泛涉及撤工宣队、设重点大学、恢复本科学制、恢复职称评聘、搞好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劈头就说《人民日报》记者写的材料“很可以看看”，接着便单刀直入谈“两个估计”。他说：“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要地位，惟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

他尖锐批评教育部说：“你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



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在催促鼓励之中他又毫不含糊警告：“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9月19日谈话后来以《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这篇讲话以分管教育的最高领导人身份下达指示，言重词厉，力排“左”障，势如破竹。教育部随即行动起来，由副部长李琦牵头组织写作班子，不久写成批判“两个估计”的重头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此文公布了1971年夏季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所作温和指示（在迟群笔记本上查到），这成了对付“凡是派”的有力武器。邓小平即将该文和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恢复高考的新招生文件提交10月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这篇以教育部大批判组署名的文章在中央的支持下，又几经修改，于11月18日在《人民日报》第一、二版推出。同日还公开发表该报记者9月采写的那篇内刊材料《“两个估计”是怎样炮制出来的》。两篇大文章，威力甚大，声势颇壮。全国报刊和大、中、小学立即掀起揭批“两个估计”的高潮。

11月19日，《人民日报》又以将近两个版面发表评论员文章、各地教育厅局批判文章三篇、北京和山西揭批“两个估计”的大会发言。11月20日仍以近两版声讨“两个估计”。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师大、同济大学四校负责人和黑龙江省教育局负责人发言，报导广东、成都高校揭批消息，刊登教育工作者座谈会的控诉。编者按说：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斗争，是全国一件大事，是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组织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深受其害的干部、教师、学生，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清查、大控诉、大批

判的新高潮。从11月18日到1977年底，一个半月时间，《人民日报》平均每天发一个版的批判文字。11月29日刊出贵州省罗甸县边阳中学刘继明来信，反映该校一语文教师在选读毛泽东、陈毅诗词的同时，也选讲了杜甫的《兵车行》一诗，结果引起争论，说此诗早批过，是“战争恐怖”论，“反人民战争”等。编者按旗帜鲜明地说：教杜甫的诗竟成了问题，说明“四人帮”流毒之深。这表明批“两个估计”已大大深化肃“左”。12月9日以一个半版刊发“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真相的调查、评论和平反消息。24日再次为在“黄帅日记”事件中受害的王亚卓发平反文章。27日四届政协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讲话、副总理方毅《关于科学和教育事业情况的报告》都批判了“两个估计”。至此，在邓小平的组织策划之下，“两个估计”被一举推倒。

广大教师头上的一顶铁帽终于轰然落地，教育界人心大快，人心大顺，多年压抑为之一扫而空。在批判“两个估计”的同时，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八大精神支柱”的罪名，即“全民教育”、“天才教育”、“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一一地进行澄清，这就深化了对“左”的批判。12月20日，批判“两个估计”的斗争扩展到出版界。此后各界都挖出本系统的“两个估计”，文艺、科技、哲社、卫生、体育、工交、石油、工运、军队、公检法……批判“两个估计”的斗争推动了全国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进程，打破了批“左”停滞不前的僵局。而首先是推动了教育界自身的拨乱反正，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1977年11月中共河南南阳地委召开3万人大会为在“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中受迫害的教师、干部平反。同月，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为“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陷害的人员平反。12月，教育部、北京市委联合召开18000人大会，声讨“两个估计”罪

行，宣布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马振抚中学、北京永乐中学、景山中学等受迫害的教师、干部以及王亚卓平反。推倒“两个估计”的斗争，使全国的政治局面大为改观。

但是，限于1977年的历史条件：真理标准的讨论尚未发动，阻挡人们认识真理的“两个凡是”仍旧盛行，思想解放运动尚在酝酿之中，思想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则还有待一年以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所以在推倒“两个估计”的斗争中，用邓小平本人的话来说，是不得不“照顾了一点现实”。即不得保留一条尾巴，仍然肯定存在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仍然肯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在某些学校存在。此后，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的第三个月，1979年3月19日，才正式由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将1971年经中央签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予以撤消，算是最后完成否定“两个估计”的法定手续。

尽管如此，推倒“两个估计”的意义不可低估，它实际超出教育的范围，是一场政治战役。1977年8月刚刚开过的中共十一大，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仍然宣称要批“四人帮”的“极右实质”。而邓小平却在这同一个月，组织起这么一个战役，以教育问题为突破口，勇敢地把斗争锋芒指向了“文革”的极左实质，指向了作为“文革”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革命”的核心依据——“两个估计”，打破了“左”的政治禁区，冲破了“左”的思想禁锢，在教育领域率先进行新一轮的拨乱反正，推动了深入肃“左”的斗争。推倒“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先声，为1978年春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作了思想舆论准备。

### 第三节 1977年恢复高考

对于参加过1977年和1978年两年高考的1160万知识青年来说，恢复高考之举才等于是真正粉碎了“四人帮”，又是改革的好处提前降诸自身。在读书受累时代仍偷偷坚持读书的青年人，多数并不知有一天读书又会行时。他们只是坚信读书是一种较高雅较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可以抵御冰冻年代的消沉无望；他们也确信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文化的人。高考机会立即为他们打开一条奋发崛起的新的生路。

#### 一、恢复高考的决策经过

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在中国产生的时间并不算长，如果把它看作1905年清末新政废科举后正式兴起的新制度，到1966年才不过60年历史。它渐渐积累起不少经验也积累起不少弊病，但比较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是相当年轻的新制度。但1966年“文革”高潮中悍然宣布高考制度是“旧教育”、“旧框框”，予以废除。此后5年半，所有大学停止招生（大部分大学实际停招6年半）。1968年毛泽东发出“七·二一指示”，提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设想。当时天下大乱，还谈不上执行这个指示。又拖了两年，到1970年6月27日，中央才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大学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1970年底正式用这个“群众推荐”办法招收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整个“文革”期间，弊病丛生的“群众推荐”制，毫不动

摇地坚持了下来。

粉碎“四人帮”后，人人皆曰此制必改。不料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一仍“文革”之旧，提出继续搞“群众推荐”。不过稍稍作了一点儿改良，即除招“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外，在应届高中毕业中试招4000~10000人，不足计划招生数的2%~5%。而且试招的高中毕业生也以政治条件为选拔的主要标准。这仅仅是把“群众推荐”的对象扩大了一点，仍然遵从政治推荐的极左遗规。1977年10月复刊的《人民教育》发表《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体系，搞好教育革命》一文，即反映了这次会议的精神状态。该文撰出“高招两条腿”一词，小心翼翼论证那一点儿改良。与会代表也有敢于表示不满的，如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即发言说：大学招生如同工厂选原材料，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想读书、爱学习的人，只是提供了以权谋私、开后门的方便。但是“左”的势力是强大的。时任中共天津常委的蒋南翔请求教育部特许他在天津选拔一些高中毕业生直升大学，会上传达此议时，天津代表即发言反对，说蒋意见不代表天津市委。

太原招生会议结束后的第六天，邓小平被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一切职务，这已是7月底了。如前所述，8月4日，他召集30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开座谈会，对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关于参加座谈会的人选，他于7月29日指示教育部：“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有自然科学、有才学的教学人员”参加，与“四人帮”没有牵连。并指示：①是否废除高中毕业劳动两年才上大学的规定？②要考试。8月1日他在听取教育部汇报本年招生会议已开过时说：同意今年招生基本上还按原办法，但从明年开始就不同，明年要两条腿走路。8月4日座谈会开始，大家认为10年没出人才，

出现断档。清华大学一个教授谈到该校有的工农兵学员只有小学程度，只好在大学补习中学课程半年一年，接着就坐飞机读大学，三年就毕业了。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应当称清华中学、清华小学。5日上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邹承鲁率先批大学招生推荐制：“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上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6日会上查全性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今年就改，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现行招生制有四弊：埋没人才，不读书的占了位子；没特殊关系上不了大学，卡了工农兵；坏了社会风气，现在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影响中小学师生积极性。查的发言成了当天下午会议讨论的主题。吴文俊、王大珩、温元凯都表示同意：建议下决心改，宁可晚招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万不合格新生，浪费损失大。邓小平明确表态：现在就要办，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原定收5%应届高中毕业生，要提高比例，教育部立即执行！会议响起一片掌声，不少与会者涌出热泪。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开过了。邓小平说：再开一个，今年就恢复高考。一项关系千万知识青年命运的重大决策，就此作出。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结束时作了讲话。讲话的两大主题即是推倒“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这两项教育上的举措立即成为1977年下半年的重大政治事件，为全国人民所瞩目。这是邓小平出山的第一仗，这一仗就收复了人心党心。他在讲话中斩钉截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断然推翻太原会议保留“左”的成案。决心既下，雷厉风行，会后5天，即照邓小平意图重开一次全国招生会议。

这个会议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会

期长达一个半月，与极左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成为推翻“两个估计”与恢复高考两仗的主战场。会议期间邓小平于9月19日召见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雍文涛，尖锐批评教育部思想不解放，给予严厉催促。谈到招生问题时，他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了，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在谈了自己意见后，对极具政治敏感性的“七·二一指示”，邓小平没有简单否定，而是划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纠正执行上的绝对化、一刀切。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七二一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各省自己去搞，办法由他们自己定，毕业生不属国家统一分配范围。但是清华、北大恐怕不能这样办，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把全日制正规大学与“文革”以来新办的不正规的劳动学校区别开来，这样，就机智地解决了“七·二一指示”的难题。教育部立即向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有力推动了会议。

接下来邓小平对招生具体工作抓得极细，他亲自看招生文件草稿，亲笔修改招生对象条件。招生初稿受极左影响，政治条件规定得繁杂琐细。邓小平批评“很难懂，太繁琐”。他指示修改：“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

这样，表面看来是一个把招生条件删繁就简的技术问题，

而实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的变革。新文件突出两条：“本人政治表现”与“（文化）择优录取”。这对“文革”以前就盛行而在“文革”中恶性泛滥的唯成分论、血统论、查三代、清九族等“阶级斗争为纲”派生出来的种种极左做法，是一个大冲击、大否定。这就使得大批大批屡受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之累（其中许多属“文革”制造的冤假错案，当时尚未平反昭雪）的可堪造就的青年人才，得以突破重重极左阻力，终获报考大学机会。简明扼要的招生条件，清除了许多与考生本人政治表现和文化考试无关的种种政治审查。可以说，政治审查、人事档案制度的改革，出身成分制度的最终废除，就是始于1977和1978年的高考招生。

由于第二次招生会议迟至9月底才结束，所拟文件还有待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之后还有层层开会传达、布置部署、筹备组织等大量实际工作要做，所以决定把1977年招生工作推迟到年底进行，本拟恢复秋季入学的77级新生，也只能延至1978年春季始业。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新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文章。华国锋同意要抓好高考和批判“两个估计”，但也提了一些有所保留的意见：如批“三来三去”要注意，“社来社去”本来是必要的，要看到工农兵学员的优点，鼓励他们赶上来。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还有《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总算在当年10月12日获得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至此，施行7年之久的“群众推荐”制正式废除，恢复了文革前沿袭17年的高考制度。

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为题，以“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为副题，报导9月25日结束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消息，报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接



见与会代表。报导说，“28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对以往招生工作的评价是“实行了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大学招收的学生中工农及其子女的比例逐年增加”。报导批判“四人帮”反对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反对招生搞文化考查，致使招生“走后门”越来越严重，使招收的新生质量逐年下降。报导中公布了新的大学招生政策规定及简章内容，还有招收研究生的决定，以便全国青年迅速知道。

同版配发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社论明确提出以此力纠轻视文化知识的流弊、激发大、中、小学新学风和社会向学风气。社论追述1972年周恩来关于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的指示，说“这个办法，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大学生是平行的。今年先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定比例的大学生（初步规定约占招生总数的20%~30%）”，将来还要增加这个比例。社论强调凡符合报考条件青年“均可自愿报名，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报几个学校和学科类别”。社论提出过去28年从未提过的激动人心的口号——“广开才路！早出人才！”“在德育、体育相同的情况下，要把文化水平最优秀的选拔出来上大学”。

恢复高考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拨乱反正举措，就在“招生工作重大改革”的名义下推出。细究起来，这既是对传统高考制度的恢复，而又在招生对象和录取标准两条上进行了改革：它打破出身限制，突出“广开才路”；它废除“突出政治”极左标准，突出“择优录取”文化标准。自此，“广开才路”，“早出人才”成为80年代最流行最得人心的口号。

新政策规定：（1）招生对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读高中生成绩特别优秀的可以自己申

请报考)。这样，所有的适龄青年全部囊括其中了。(2) 报考条件。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不超过25周岁，未婚。(3) 录取方法。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区批准；考生可在报名时根据特长和爱好，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2至3个报考志愿。(4) 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考政、语、数、史地4门，理科考政、语、数、理化4门；报考外语的加试外语；省区拟题，县级组织统一考试。

第二天即10月22日，《人民日报》又头版发表教育部负责人就高考问题答记者问。他说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考在招生对象、报考条件、录取方法上都有重大改革。其一，招生对象更广泛了。“目的是为了广开才路，让更多的青年有机会报考，使国家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拔和培养人才”。招生范围拓宽到上至30周岁，下及于在读中学生。又特别为此次招20%~30%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辩护说：这是周恩来的指示，只要中小学抓紧“教育革命”，不脱离劳动，入了大学又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就可以实现教劳结合了。特别作这种申辩，反映当时“左”的习惯势力之顽固。其二，对文化条件的要求提高了。“文革”中大学招初中水平的新生，现在要求具有高中程度，以提高教学起点和教育质量，适应国家对高级专门人才的急需。其三，重视文化考试，重视文化择优，“只有这样才能鼓励青年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刻苦钻研文化科学知识，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其四，“文革”中把招生名额分到基层，造成无名额的单位无法接受报名；现在名额在省，凡符合条件的青年均可向本单位报名，由公社、厂矿、机关、学校一级根据招生条件审核，报县招办批准。其五，录取方法改变“群众推荐”旧法，先由地市

一级组织评卷，按成绩提出参加政审和体检名单。政审由公社、厂矿、机关、学校一级党组织进行，体检由县组织到指定医院统一进行。地市根据政审、成绩、体检情况提出初选名单上报省区招生委员会。这个初选名额为录取总额的2倍或稍多。省区组织招生院校对初选名单和全部材料进行审查录取，报省区招委批准后由学校签发入学通知书。

这个招生组织方法，吸收了“文革”前历年高考招生经验，奠定了新时期高校招生工作的总体格局。之后屡有小变，而大体沿用至今。

当时，人们都注意到，报导报考条件时附加了一小段虽不显眼却关系重大的文字：“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这段文字最重要的，又是括号中的一句，寥寥22个字，却激起强烈反响。始料不及的是，大龄的“文革”前高中毕业生，竟成为这次考试的主力军和主要收获。他们在高校迅速成长，对弥补青黄不接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是顺手插柳，即刻就茂林成荫。这22字确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照顾现实急需的机敏之计。前苏联卫国战争4年，动员两千万青年中断学业奔赴前线，战后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令这批大龄青年返校重续学业。只是中国中断教育的时间更长。次日，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再次提到这段文字，并特别说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指理论上钻研有成绩，实践上有科学研究或技术革新成果的，而不是指工龄长），以及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时年龄还可以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这就把头天报导中不甚明确仅以括弧加注的重要信息，单列出来，明确这就是特招66、67两届高中毕业生。

所谓历史遗留问题，是指“文革”中6届中学生被剥夺了

高考权利。1968年底，全部在校6届中学生统统毕业，大部分上山下乡，小部分进厂。这些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除66届高中、66届初中毕业生外，其余4届中学生并未修完中学课程。称他们为67届、68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只是指明应毕业的年份。这4届中学生实际所受教育分别是：初中一年、二年、高中一年、二年。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的年龄分别是：25岁、26岁、27岁、28岁、29岁、30岁。这样，除了68届初中生可以在年龄线内正常报考外，其余5届中学生全部过线。括号中22字则解决了66、67两届高中生的报考问题，次年的招生简章又规定给66、67两届高中生一次报考机会，并准许68届高中生报考。剩下66、67两届初中生，其中许多有志向学的人也以种种理由（如另有放宽至28周岁的条款等）获得报考权利。这样，就较为圆满、妥善地解决了“老三届”高、初中生的报考权利问题，基本皆大欢喜，减少了历史留给这一代人的遗憾。

所谓现实急需问题，一是适龄生源质量太低。二是大学学历人才经“文革”10年折腾而出现年龄结构上的断档。先述其一。至1977年，除上述6届中学生外，在正常报考年龄段的青年（17~24岁），全部是在“文革”10年中完成中学教育的，深受“教育革命”之害，深受运动之害（尤其“全面内战”、反潮流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三段时间），所受教育甚不完全。由于盲目缩短学制，把“文革”前小学6年、中学6年共12年完全中等教育减为小学5年、中学4年共9年，这样出来的高中毕业生其文化水平只能相当“文革”前的初中生。他们要参与高考竞争、接受高等教育，先需追补中等教育。事实上从恢复高考头三年考绩看，这些人的战绩远逊于老三届高、初中生。在这一代人文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从他们中招收不到足够数量的合格大学新生，而降低标准以求是不可取的。这样，

从1968年空校毕业的全部6届中学生中取才，就解决了生源合格率不足的问题。当然这6届中学生所受教育也不完整，后来岁月又在“革命”和劳动中蹉跎过去，大部分人已荒废学业。但其中少数有志青年，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坚持了对文化知识的追求，这些人集中在1977、1978两年投考，其总数也相当可观，这就保证了恢复高考初期的大学教育质量。

其二，大学学历人才年龄结构上空档，在新时期飞跃发展的经济、文化事业的急需之下，显得十分突出。“文革”前入学的“老五届”大学生，除66届外，其余67、68、69、70届4届大学生所受大学教育也不完整，但他们中学基础较好，自学能力较强，一般都未放弃学业。到1977年时他们的年龄分别是：31岁、32岁、33岁、34岁。而正常报考年龄为25岁以下，大学4年毕业，这中间就存在一个10年的缺口。当然，“文革”10年有90万在所谓“新型大学”度过3年幸运岁月的工农兵大学生。但是，以10年时间产出90万毕业生，年均不足10万人，数量显然不够，而且其中相当多的人实际上未达到大学毕业程度。因而，这90万人不足以弥补这一人才缺口。

所以向“文革”前6届中学生挖掘生源，不放过每一个年龄段中那些刻苦向学而又智力较优的精英分子，通过严格的考试把他们筛选出来，是一个救急之计。当然高考不可能收罗尽天下人才，但总算网罗了大部分，多多少少填补了这一缺口。

于是几个月后，中国大学里出现了一道特别风景线，年轻的大学生中涌出一个年龄偏大、养家活口的成人军团，以致师生同学、叔侄同班。年龄的劣势，转化为加倍的刻苦；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的珍视，酿成浓郁的向学之风。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是一座座研究院，涌动思想潮、知识潮，各种探讨社会问题的报告会、切磋学术的讨论会、西学讲座、油印刊物，填满课外的生活。这是学习的黄金时代，77级、78级大学生以超

常速度大面积成才、大批出成果。从这些一年级、二年级大学生手中，频频爆出轰动全国的文艺作品和学术新论。他们刚毕业就挑起大梁，成集团军地填补作家、专家、记者、学者、讲师、教授、处长、局长等各方面中年骨干的空位。不过，仍有大量空缺是他们无法填补的，由于这一代人荒废长达10年的时光，在外语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欠缺则不是那么容易弥补过来的。

## 二、12届考生同考盛况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见报，立即传遍城乡，激荡千家万户，搅动千万人心。从10月21日起，到年底“文革”以来的首次高考结束，两个月中，从通衢大邑到穷乡僻壤，举国上下，人人谈高考。“文革”中离开校门的11届总计一千多万中学毕业生，更是如闻春雷。这中间许多人已在农村结婚成家，甚或垒屋筑园，作了扎根一辈子的准备。当此广开才路之际，片刻犹豫也没有，义无反顾地从四面八方涌向新设立的各级招生委员会，从各个角落搜出尘封虫蛀的中学课本。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学习大复习在全国铺开，朗朗书声重新传出于中华大地，勃勃生机再现于校园学舍。

11月底，万众瞩目的、中断12年的高考，在全国各地陆续拉开序幕。堵塞多年的才路一开，12届学子，俊彩星驰，同赴考场。考场爆出许多趣闻，诸如师生同场，夫妻同考还有兄弟叔侄一家同试。1977年12月，全国总共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纪录，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考试。当时无法及时提供足够的优质纸张印考卷，为此中央特批动用印制《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

今日欲追寻当年盛举，遍查报章，竟发现当时媒体对此鲜有反映。从公布高考消息起到考试开始的两个月中，《人民日

报》只有三篇短文语涉恢复高考。何以持如此谨慎态度呢？《光明日报》在10月21日社论中提到“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比如，报名考试人数很多，将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年，这就带来了工作量大等问题。要正确对待这些问题，正确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些什么问题呢？有两个问题恐是顾虑中的。一是570万人报考，而计划招生数仅21万，27比1，落榜的550万人原先期望值过高，现在思想工作难做。二是成万成万人考走，势必冲击当时尚无对策的上山下乡难题。记者也一时找不准宣传报导的主题。高考所涉政治是非、理论是非都是很敏感的，高考是在没有一一澄清这些问题之前“只干不说”地干起来的。

规模盛大的首次高考结束时，《人民日报》也未组织报导。仅在12月21日刊出一篇小文，题为《高考以后》。该文首次披露高考结束，但仅有如下文字：“这次高考盛况空前，震动全国。我们高兴地看到，广大青年怀着让祖国挑选的豪情，踊跃报名，努力复习，认真考试，在很短的时间内，文化水平有显著的提高。为革命钻研文化科学知识、走又红又专道路，蔚然成风。其影响所及，被‘四人帮’败坏的一部分社会风气也为之改观。这就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遭到‘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教育领域，出现了令人喜悦的新局面”。接下来才是文章主题，全部内容是说青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要安心原工作岗位，愉快上山下乡，可以参加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函授大学、电视大学、广播大学以及各级各类业余大学的学习。12月26日再次以《高考以后》刊发一篇小报导，说北京城区和郊区的4名考生表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切听从党安排”。事实上，550万落榜青年未有任何骚乱。一则是公平的，二则明年还有机会再考，才路始终打开。

笔者所查到的最详细报导，仅见12月26日《光明日报》

(以报导青年消息见长的《中国青年报》尚未复刊)。该报以“向四化进军，广开才路的盛举”为副题，报导“今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胜利结束”。报导说考试始于11月28日，终于12月25日，历时近一个月。散设于全国各地的考场数以万计。各考场均准备充分，分设了指导专栏、小卖部、茶水站、卫生站。“今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反响。通过考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形成空前未有的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热潮。各地中小学都普遍采取措施提高教育质量，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事迹大量涌现”。还提到一个工厂的文化补习班，由30人猛增到300多人。

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在四届政协七次会议上作《关于科学和教育情况的报告》，特别提到“8月4日至8日，邓副主席邀请了30多位科学教育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亲自调查研究”之事。在报告第一部分，专辟第7条谈恢复高考情况，可以视作是一个总结，转录于下：

“高等学校新的招生制度的实行，受到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起了巨大影响。这次招生过程中，已经发现大批优秀学生，可以保证入学新生的质量。而且招生制度的改革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业余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使广大的青年都能得到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 三、招生录取情况

1978年1月份起，“文革”后的首次高考招生工作进入录取新生阶段。从1月20日开始，到5月18日为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共发报导20篇，比上年两个半月发稿明显增多。涉及舞弊、阅卷、面试、录取、入学、迎新、扩招、“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等方面面。

经过春节期间的一段沉寂,《人民日报》于1月20日发出一组文章。一篇是800字报导,说高考招生改革深得人心,受到人民群众热情支持和赞扬,招收的新生质量显著提高,不少考生达到大学一、二年级水平。北京外语学院具面试资格的考生,大大超过计划招生数。中央音乐学院计划招130余人,报考竟达17000多人。面试的几天里“琴声悠扬,歌声嘹亮,各族男女青少年身着盛装,笑逐颜开,像欢度节日一样。考试结果,达到录取标准的人数也大大超过了招生名额”。另四篇是落榜青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表态文章。配发的短评说“在德、智、体诸方面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要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优先录取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同日,《光明日报》发一短篇报导,报导浙江省临安县“在县、区、公社所在地的大街上,公布高考初选录取名单的红榜前,围着许多人兴高采烈地边看边议论。榜上有名的青年们,纷纷汇集到专设的体格检查站,进一步接受祖国的挑选。街头的广播喇叭播送着应考青年撰写的‘红心向党,听党安排’等表决心的来稿来信”。报导考后的热烈气氛全部文字仅此,以下篇幅全是落榜青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表态。这篇几百字的小文,就是当年对高考放榜后盛况的惟一一次报导。

1月21日和2月20日,《人民日报》又分别通报山西翼城县政治教师、代县教育局干部、阳曲县数学教师舞弊案和河北衡水地区故城县特大舞弊案。故城案涉及县委书记、7名常委、20名部室科局干部。1月29日又发表教育部负责人就录取工作答记者问。他通报了山东莘县古城公社教育组组长的舞弊案,说要坚决处理舞弊乱纪。又说文化考试是杜绝走后门的有力措施,新的招生制度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材。如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7名新生,人均总分317分(4门,下同),在广西录取14

人，人均总分300分以上。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26人，最低290分，最高340分。另据5月18日《人民日报》调查报告，西安交通大学共招1400多名新生，党团员占81.3%，女生占18.2%。计算数学专业40名新生，数学平均成绩79分。1966、1967两届老高中生普遍考出高水平，但该校在北京仅录取了3名数学成绩在97分以上的。据新华社3月15日电，中国科技大学录取700多人，党团员占94%，平均年龄不到19岁，数、理化二门总分人均160分。这些新生年轻，但成绩不及“老三届”。

这次高考，全国发现了不少拔尖人材。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了20名十三四岁左右的“神童”，他们大都未能参加高考，系由各地推荐，经实地面试考核招来，破例为之开少年班。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中，更是人才济济。计划招130人，该院从17000多考生中反复筛选出300多人，“这都是教师们再也舍不得淘汰，水平超过了录取标准的音乐人才”。中央为此特批该院增加招生名额。1月30日和2月3日还专场举行“中央音乐学院1977年考生汇报演出音乐会”。北京外语学院在1月6日的口试中，也发现大批人才。英语口语得5分的有93个，是录取数的一倍，5分上打“+”号的有10人<sup>①</sup>。在语文考试中也“可以看出青年中确实大有人才，涌现了一批内容健康、构思新颖、文笔优美的优秀作文。而这些好的作文，大部分是66至68届毕业生写的”<sup>②</sup>。2月19日，《人民日报》还特别发表3篇考生作文，以证明高考广开才路，发现了人才。

这次考试更多地反映了教育所受的劫难。试题不难，白卷奇多，不少考生只能在卷上写写对“四人帮”的控诉批判，而

① 王速：《不拘一格选人才》、《在生动活泼的考场上》，分别载《光明日报》1978年2月12日和7日。

② 耿竞雄：《努力提高语文教学质量》，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12日。

答不上题。体检分数线一降再降，许多地方还是找不出上线考生。广东一个地区，总分及格者竟只有3人。阅卷教师说：“不少考生不会审题，答卷观点模糊，内容空洞，层次混乱，文句不通，错别字连篇，有的甚至文不对题，语文基础知识极差……即使是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看到一些青年被糟蹋到这样地步，能无动于衷，能不十分痛心吗？”“有的考生在作文中捏造事实，矛盾百出。还有不少作文，套话连篇，一个模式，政治词语堆砌，缺乏真情实感，语言贫乏无味”，“帮八股文风流毒深广”；“有的考生连化学符号也不会写，分子式写不好，基础知识缺乏，基本概念模糊”。<sup>①</sup>

在报考资格审查和录取政审问题上，“左”的习惯势力仍十分强大。许多青年因家庭出身原因而被剥夺考试机会，或成绩优异而未能录取。《人民日报》2月18日报导轻工业部王先梅1977年12月8日上书中央领导，反映其子女因父亲历史问题被剥夺录取机会。中央领导作批示予以解决。4月26日，又报导安徽芜湖陈炳南的女儿和河南郑州二中学生竺稼因家庭出身影响入学，后经一番曲折终获录取。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强调“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5月17日又发表署名文章《斥“血统论”》，揭露：“一位知识青年报考大学，考试成绩优良，身体检查合格，只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淘汰了。理由是：‘在你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你反动老子的血液’”。批判有的人“胡说什么如果剥削阶级的第三代、第四代改变了出身，剥削阶级就越来越少，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对象了”。由于这方面的政策宣传力度不大，时间过迟，1977年的许多考绩突出而有出身问题的考生，或未被录取，或进了很

<sup>①</sup> 鲍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吴炳智：《狠批“四人帮”教好化学课》、耿竞雄：《努力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均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12日。

卷的大学。如北京35中的朱凌，1977年考试总分为337分，超过清华、北大的录取线，却落榜了。1978年考绩为408分，仍未录取。35中20名教师忿然不平，联名上书党报，10月27日《光明日报》以“这样的学生应该录取”为题予以答复。由此可见当时“左”炽之盛。

由于新学生恢复4年学制，教材、设备、师资、教学安排都要作新的准备，所以迟至2月底3月初，全国各大学才陆续开学迎新。清华、北大和上海各高校均在2月底开学，武汉大学是3月6日，中国科技大学是3月9日之前。

3月4日，新华社发消息宣布：“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胜利结束……通过考试发现大批优秀人才，目前新生正在陆续入学”。消息说“特别是在66、67届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不少被‘四人帮’埋没多年的优秀人才。有些考生不仅能做必答题，还能做附加的参考题；有的已达大学一、二年级水平；有的同时初步掌握了几门外语”。录取程序是先重点、后一般大学，但未将分数线分段。这样，大批高分大龄差出身的考生失去竞争能力，普遍出现高分低就、低分高就的情况。1978年为此对录取程序作了修改，划分分数段，杜绝因其他因素致使高分低就、低分高就。北京大学在17省市录取的395人，党团员占91%。总分320分以上的，占1/4。绝大多数总分280分以上。21岁以下的占96%。清华大学在全国录取的818人，党团员占83%。平均年龄20岁。数理化成绩大多在80分以上。消息说招考前后历时4个月。实际，后来又续了个尾巴——扩招。总共历时整整半年。

1978年2月26日下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我国科学、教育、文化战线摧毁了‘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反动谬论，激发了广大知识

分子的积极性，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接着提出了复兴教育的若干措施：要“充分发挥现有高等学校的潜力，积极扩大招生人数，加快建设新的高校”，“办好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大力发展业余教育，满足在职干部、工农兵群众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的需要。我们要建立适当的考核制度，业余学习的人们经过考核，证明达到高等学校毕业同等水平的，就应该在使用上同等对待”。“到1985年，在农村基本普及8年教育，在城市基本普及10年教育”。要求虽有些过急偏高，但倾向是积极的，报告仍使用了“教育革命”的提法。

会后，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立即于28日联合发出通知：鉴于仍有一批成绩优秀的考生未能入学，根据中央指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措施，凡能挖掘潜力的高校，都可在众多上线考生中再扩招一批新生。扩招专业应是通用专业和急需专业。可试招一批走读生。通知要求3月底办完录取，4月让扩招学员入学。<sup>①</sup>

为了推动扩招，教育部于3月初又召开电话会议，各省市主管教育的书记和文教办、教育局、招办、高校负责人参加。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讲话，称扩招是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对教育战线提出的任务，要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多招学生，要打破常规，重视吸收人才。教育制度一定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高考成绩优秀的考生不录取太可惜了。要重视66、67届高中毕业生，他们有文化基础有实践经验，经大学深造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试招走读生是扩大招生人数的一个好办法，各高校要千方百计为扩大招生名额作贡献。<sup>②</sup>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78年2月条；教育部、国家计委决定扩招大学生的消息，载《光明日报》1978年3月3日。

② 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关于扩招大学生的讲话精神，载《光明日报》1978年3月19日。

《人民日报》3月19日发表教育部负责人就扩招答记者问，再次强调：这是“落实五届人大提出的战斗任务”，“现在多招一个学生，那个时候就会多一个建设人才”。要求高校“打破常规办大学，不拘一格育人才，向前看，努力扩大招生名额”。同时又强调“要确保新生的质量，不能降低标准”，要“坚决杜绝徇私舞弊和走后门”。

增招学生，最初发生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人才容易使人注目。现在，上层的关注及于各方面人才，各地都按指令行动起来。北京市委、北京23所高校立即动员部署，扩招2400人。这些人都是成绩优秀而未录取的考生，其中一半是66、67两届高中生。北大把行政用房和会议室腾出改作教室，提高宿舍利用率以多住学员。清华大学农田水利、环保、铸造几个专业原来未招生，这次决定各招一个班<sup>①</sup>。北师大增招300多走读生，原来未招生的教育系也决定招生。北京经济学院把办公室搬到旧工棚，腾出作教室，比原计划多招80%新生。北京师院用讲大课方式解决师资不足，扩招240名走读生，又办分院扩招500多人。<sup>②</sup>上海扩招3200多人，其中上海师大扩招700多人。上海交通大学师资不够，以增加大班课解决。海运学院起运系也试招了30名走读生。<sup>③</sup>扩招新生从4月初起陆续入学。全国共扩招6.2万人，占原招生计划的1/3，大部分是考绩优秀而因家庭出身被卡的人。1977年招生总数超过“文革”时期的任何一年，达27.3万人。

① 北京市委、北京诸高校部署扩招大学生的消息，载《光明日报》1978年3月14日。

②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扩招大学生的消息，载《光明日报》1978年3月26日。

③ 上海市高校扩招大学生的消息，载《人民日报》1978年4月12日。

#### 四、恢复高考后的风波

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决策。招考工作本身经层层开会，传达、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历时4个多月，牵动570万考生和他们的单位，牵动一亿多在读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牵动全部大中小学校和教育机关，产生了强烈的社会震动，是1977年、1978年之间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已超出了教育界。此事具有尖锐的政治性，实际上涉及到路线全局、方针政策、思想政治理论上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比如，新时期的工作重心是什么，中心任务是什么，纲是什么？当时提的是“抓纲治国”，纲指“阶级斗争为纲”；但又平行提出“实现四化”。这样，实际上有两个纲、两种指导思想。两者之间的折衷调和，只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恢复高考之举，无疑是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的，这一点在回答诘难者时明明白白说出来了。1978年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时称它“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迫切愿望，体现了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5月24日，《人民日报》评述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攻击恢复高考的一股逆流时也说，“上面这些错误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离开了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离开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就不能正确理解新的招生制度”。正由于恢复高考决策实际上只服务于“四化”总任务，是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冲击和否定，大学招生问题实际上成为全面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口。教育战线的超前突进，势必引起各条战线的一系列反响，这样，两条纲、两种指导思想的交锋就在所难免了。

交锋发生在与5月全教会平行的1978年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

这次交锋的层面不算高，代表人物的政治身份则更低一些，多是一些省教育局出席会议的代表，但是提出的问题皆大是大

非、事关全局。其实远在这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之前，上年提出恢复高考决策之时，以及尔后的招生工作中，都有种种非议出现，说是“丢掉‘四人帮’的一套，又拣起刘少奇的一套”，“现在搞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教育革命，而是复旧”<sup>①</sup>。说这些话的人，多数属尚没从极左影响下解脱，也有的是既得利益者<sup>②</sup>。还有相当多的干部有抵触，甚至散布一些错误言论<sup>③</sup>。这，从根本上说是两条纲并存的产物，是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尚未开始、“文革”尚未被否定、一系列政治是非理论是非尚未澄清的产物。

正由于“阶级斗争为纲”尚未动摇，这条纲派生出来的所谓“阶级路线”，就成为诘难者手中的有力武器。他们在招生会议上提出的所有问题，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新招生制度没有执行“阶级路线”。

他们正是根据“阶级路线”理论和尚未澄清的一些“文革”极左观点，对新招生制度中两个最重要的政策规定，亦即邓小平本人亲口作出的指示，进行激烈的批评。

他们认为新制度中政审“主要是看本人表现”，是“违背了阶级路线”，是“忘了‘有成分论’是前提，然后才‘不唯成分论’”，结果造成“剥削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排斥了工农子女”。

他们认为新制度中的“择优录取”，是复活“高考指挥棒”，复活“智育第一”和“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警告：“要吸取28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恢复过去的也

① 《招生会议上一堂很有意义的讨论》，载《人民日报》1978年5月24日第2版。

② 报导河北故城县委书记已有3个女儿推荐上大学，第4女参加高考恐不及第，竟指使多人为之作弊，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20日。

③ 《招生会议上一堂很有意义的讨论》，载《人民日报》1978年5月24日第2版。



不对”；“择优，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

他们对1977年招生工作的总体评价是：“卡了贫下中农”，“丢了多数劳动人民”，“工农成分降低了”，“屁股没有坐在劳动人民一边”。质问：“‘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现在还算不算数？”警告：“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看贫下中农反你不！”<sup>①</sup>

这里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政审标准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及革命胜利初期，阶级路线当然是革命党人的一项基本政策。然而，在基本消灭阶级、进行和平建设时期，人为地虚构、寻找、制造“阶级斗争”，这是1957年以后的重大政治失误。在学校工作中突出所谓“阶级路线”，始于1963年兴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社教运动中首先提出了“重组阶级队伍”，建立贫协会，“贯彻阶级路线”，然后影响到全国。学校工作从这年下半年起，在十几岁的孩子中间推行“阶级路线”，按家庭出身划分学生的政治地位。这种唯成分论到“文革”中又进一步恶性发展，成为盛行十余年的“反动血统论”。政审纵查三代，旁搜九族，专比出身，不重表现，倒退到封建等级身份制。门阀谱谍遗风大盛，比出身“红”，比家族“纯”，有人成为专革别人命的“革命派”，有人生而为政治贱民，必须一辈子“脱胎换骨”，备受歧视，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许多政治家对此了然于胸，但要改变这种“左”的巨大习惯势力，却感到难以下手。邓小平素以勇于任事、敢决难题闻名，他手订招生新规，把原稿上“难懂”、“繁琐”的政审条条一下子去掉，定下“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

这样，“文革”以来横查纵搜、层层过筛式的政治审查制度，开始衰落，审查出身的做法渐渐废止。这一点具有突破意

<sup>①</sup> 《招生会议上一堂很有意义的讨论》，载《人民日报》1978年5月24日。

义，不仅是纠“文革”之“左”，而且直纠“文革”前之“左”。这就使得1977年招生工作冲破了“左”的樊篱，给予许多受家庭之累的青年以平等的报考机会，开始解放他们身上的政治包袱。正由于新的政审规定，许多品学兼优的知识分子子女和一般员工子女得以录取，“黑五类”子女也有不少进了大学。但正如《人民日报》5月24日述评所说，由于新的政策规定仍受到“左”的顽固抵制，许多干部仍按守“左”勿右习惯办事，仍把大批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卡在大学门外，这才是1977年招生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偏差。招生文件对出身问题仍有不小的迁就、妥协，规定在德智体相同条件下，优先录取出身好的，并设了照顾分数。

然而，全招会上的部分代表不仅认为“出身不好”的不能上大学，就是“社会关系复杂”的也不行，“有问题”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的入学比例也不能高于前几年，否则，就是“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这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子女录取比例大而来，这个比例大大高于“文革”前几年，反对派为此大惊失色。因为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臭老九”。

会议对此予以驳斥，认为这是坚持“四人帮”的“帮记政审标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是劳动者，不应该划在工农群众之外；录取少量剥削家庭子女，有利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不过，反击不够有力。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择优录取。它的实际操作是：（1）政审不追究出身（在执行中当然不少地方仍将出身等同表现），只负责验明政治和品德是否合格，这里最高标准不好掌握，但最低标准非常明确——拥护党，无大过；（2）体检只作有病无病之分，也是最低标准；（3）这样就防止了在德、体两条上大做文章，德、体两条合格，就是“德、体条件相同”，然后在这种相同条件之下突出对文化的要求，即重视考分。这就是“全面衡

量，择优录取”的实际含义。虽然它最终可能发展到“重才轻德”，但在当时却有重大的变革性意义。它打破“文革”时期的僵化公式“出身好=政治好=品德好=一切都好”；它体现了对青年公民的一视同仁，力图废止政治歧视，重造政治平等；它突出了文化择优，这符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适应了实现四化的需要。

然而，反对派却偏执地认为文化优者必政治不优。会议反驳说，这是把文化择优与政治择优对立起来，那些在文化专制主义时代坚持学习的青年，考出优异成绩，正是又红又专的表现。这样录取的新生政治质量怎样呢？会议列举24个省市统计材料，新生中党团员占71.9%，以此证明绝大多数被录取者在政治上是好的。又举证招生文件中设有对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的照顾条款以自辩，表现仍然软弱。对于“复旧”的诘难，会议援引推翻“两个估计”的思想成果，比较有力地反驳说“17年教育战线的方针、政策、方法，包括招生制度基本是正确的。那么，正确的东西，为什么不应该恢复”？“‘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反对搞四个现代化，大肆破坏教育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假革命、反革命。而我们实行招生制度等改革，为四个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服务，才是真正的教育革命”。这里仍沿袭了“教育革命”的旧提法，以后也一直并没有否定它，反映了“左”的教育理论影响仍然强大。

对第三个问题，即1977年招生工作的总体评价，会议也列举统计数，以说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实实保证了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24省市统计，1977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新生总数的97.4%。中国科技大学招738人，99%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上海交大招1058人，剥削家庭出身的只占0.6%。这些统计数把知识分子家庭列在劳动人民中当然是对的，但笼

统混提而讳言知识分子，确是虚弱的表现。攻击者正是眼睛盯住知识分子子女比例较以前高了许多这一点，而发出“得罪几千万”、“看贫下中农反你不”的威胁。

会议对诤难者拥护的推荐制，批判得较为有力。说名为推荐，实为“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四川有个公社，计划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排到了1980年，全部是干部及其亲属子女。广东乐昌县组织调查，就新招生制度访问农村，贫下中农说有个生产队，几年来上大学的没一个我们的子女，去年考了就有三个上了中专。说这种“平时不学数理化，到时全靠好爸爸”的推荐制，“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党群关系，埋没优秀青年，毁灭教育事业，人民已忍无可忍，不进行彻底改革怎么得了”。新制度“不用发布告，只是把招生方法这么一改，广大青少年就努力学习，奋发向上，流氓阿飞就大大减少了，社会风气也大变了……这哪里是什么‘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明明是招了几十万，调动了几千万”。

会议还驳斥所谓“扩大了三大差别”，说理较充分。“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三大差别，还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在招生工作中反映这个差别并不奇怪。要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四人帮’那样用倒退的办法，乃至用毁灭文化、毁灭知识的方法，只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葬送国家的前途”；“缩小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别，不能依靠拉平的办法，只有不断努力提高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才是真正关心农村教育”；“不够上大学水平的硬塞进大学，学生本人并不能真正有所收获、提高，对国家更是一种浪费”。

这次会议上的发难，实质是极左势力的一次反扑，事关拨乱反正的大局。但会议对此持十分小心的态度，只定为“错误观点”、“认识模糊”。在会议期间，由教育部负责人于5月11日

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公开讲话，对1977年招生成绩进行肯定，再次列举22省统计数据证明“新生的质量较高”（工、农、兵、革命职工占80%，党团员占74%，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子女占87%）。对于“择优录取是扩大三大差别”的诘难，反驳说“人民上大学的权利是平等的”，“历史造成的城乡教育水平的差别是客观存在，要缩小这个差别，只能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从发展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上下功夫，而不能从改变择优录取上找出路”。同时对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录取知识分子子女、重视文化择优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辩护。这篇讲话的基调仍是自辩，缺乏有力度的反击。

总之，正方在回击时困于“阶级路线”左倾习惯势力，有点理不直气不壮，说理时多方回避，遮遮掩掩，不深不透。6月号《人民教育》发了一篇《择优录取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文章，反映出这种软弱。文章只是正面强调恢复高考的好处：调动了青少年学习积极性，改变了学校风气和社会风气，从“学不学，都升学”到“一抓高考社会风气就变了”。而对于反对者提出的一连串的尖锐政治问题，都避而不答，因而显得无力。

沉寂了将近半个月之后，5月24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记者述评，对会议发难者展开再批评。《人民日报》同时配发一条新华社电讯，报导江苏省委书记在南京大学建校76周年大会上批评去年招生时散布反对言论的人是坚持“四人帮”一套，开始比较严厉了。《光明日报》的述评措词更硬了些：“某些人对我们的指责，用语毫不含糊，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态度很鲜明，甚至对向考生公布考分这样一个发扬民主、深得人心的办法，也表示反对……要说这些人也是‘心有余悸’，就不对了。应该说他们是‘心有余毒’”。“对知识分子

的看法，某些人更是鲜明地站在‘两个估计’的立场上的。他们说，高考录取的新生中知识分子的子女多了一点，没有照顾贫下中农的子女，这也是‘阶级路线的错误’”。批评升了级，但仍未从政治上理论上批透。这是由当时总的政治局势决定的。两条纲、两种指导思想的交锋尚未正面展开，在教育问题上只能是迂回和小接触。

6月，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对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的反对派又进行了继续清算。安徽省于6月5日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教育会议精神。省委三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大张旗鼓反击那股反对新招生制度的“反动社会思潮”，部署揭批在全招会上发难的省教育厅负责人，同时批判“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那股反动思潮有共鸣，极力支持、包庇省教育厅个别负责人的错误，顽固对抗省委的多次明确指示，捂盖子，保自己”的省革委会分管教育的副主任。安徽把错误定性为“反动社会思潮”，认为“省教育厅个别负责人站在林彪、‘四人帮’的立场上，在招生会议上……发动了猖狂进攻”，同“新时期的总任务”、同“党中央唱对台戏”，“胡说什么‘说智育第一不存在，是不科学的’，继续鼓吹‘两个估计’”，“他的反动观点不是孤立的，代表了社会上一股反动思潮”。7月11日，《人民日报》以《安徽省教育工作会议开得有力》为题转载会议报导。9月，《人民教育》也发表安徽省教育局理论组《评今春在招生问题上泛起的反动思潮》，对这一场风波给予了结。

然而，要真正把理说透，批倒“左”的“阶级路线”观点，还有待于整个思想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人民教育》于1979年1月发表一篇《择优录取与阶级路线》，才比较透彻地解决了这一理论是非问题。文章说，学校的阶级性质由政权性质、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决定，无须用学生出身比例来证明“择优录取”的阶级性质。学生出身比例

在现代社会不能说明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学校的工人子女比例很大，难道能改变这些学校的资产阶级性质？择优录取本身就体现了政治标准：（1）不是看出身而是看本人政治表现；（2）政治表现是基本政治立场与业务成绩的统一，而不是看空头政治。此文才最后给这一场争论画上句号，此后再不讨论招生政策了。这一政策至今沿用20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选士经验教训，也表明考试优于推荐。秦以前是贵族血缘政治，士大夫世袭为官。汉实行“举孝廉”，但推举权基本为豪右大族控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一种推荐制度，仍为权势者控制。隋唐开始创立科举考试制度，这是一个进步，打破豪门垄断，为出身庶族的才俊之士开了平等竞争之门。但唐代试卷不封，考官易于徇私，高官仍可操纵。所以唐代士子盛行“下谒行卷”，冀图得到大员赏识，增加中进士的机会。鉴于此，宋太祖进行考试改革。一是试卷糊名，二是增加一个程序——殿试。通过天子钦点门生，既表明国家对科举考试的重视，又有效地防止了大臣植树朋党。以后历朝都有改革，诸如回避制、考场隔离、劝戒士子下谒权贵等。中国的科举考试发展得相当完备，后虽随封建王朝一起没落，但其合理因素却为欧洲近代国家所吸收，发展成为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考试制度当然有许多弊病，但比推荐要公平一些，排除了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这就是它能够历久不衰的原因吧。

#### 第四节 教育的整顿与复兴

1977年10月同时发动的推倒“两个估计”与恢复高考两大举措，实际上开始了“文革”以来教育的第三次整顿。这次整

顿，史称拨乱反正。此前的一年中，清查“四人帮”利用“教育革命”搞阴谋篡权活动、清查“四人帮”在教育系统的帮派体系，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整顿，但由于当时仍肯定“文革”、肯定“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以不能有突破和大作为，只能处于“小解决、大徘徊”的局面。

邓小平7月复职，8月抓教育，经3个月的酝酿、组织、部署，10月底即打开新局面。两项决策、两个战役迅速推动教育的拨乱反正，解除了全国600万教师的政治枷锁，调动了几千万中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校开始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机。许多老教师说：这是建国以来少见的、最好的安心读书、安心教书的时代。

1978年3月和4~5月间相继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提出“振兴科学”、“振兴教育”的口号，科学和教育被摆在突出的位置上。邓小平在会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尊重教师，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全教会闭幕的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党的领导，搞好教育革命》，提出：思想整顿是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核心——“两个估计”，组织整顿是整肃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抵触新政策的人，要加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会议对“四人帮”插手教育的一系列事件进行了揭批。会议以后，各省相继于6~9月间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传达全教会精神，清查“四人帮”在本省本地的影响，清理本地“文革”中所出的极左典型、口号、经验。如辽宁清算了5件“新生事物”（朝阳农学院、吹氧会、两张大字报、“大学招生分配改革”等），山东清算了“侯王建议”，清华大学5月间召开全校大会清算“名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实为迫害知识分子”的那个著名报告。<sup>①</sup>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78年5月条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随之，教育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尊师重教、教育先行、早出人才、多出人才，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82年召开党的十二大，又第一次把教育列入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教育在整顿后步入改革开放与全面复兴的黄金时代。

整顿是清乱，复兴是恢复与发展，两者并行，没有截然分开为两个阶段。本文合而叙之，时间迄于80年代初。

### 一、恢复招考研究生

如前所述，1977年召开了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还产生了一个恢复招考研究生的文件——《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此前最后一届研究生是1965年招的，“文革”中没有再招，中断12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文件。10月20日，即公布恢复高考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头版报导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委托中国科技大学在京筹办研究生院，从今年起开始招考研究生。招生对象是：政治思想好，学习成绩优异，身体健康，30岁以下（最大不超过35岁）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成绩突出的在校大学生，以及相当大学毕业程度的工人、农民、在职科技人员、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政治和学历限制相当宽松，这就打开了一条广揽人才的路。办法是自愿报名，经过政审和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同版配发老科学家严济慈的文章《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

于是在高考大张旗鼓进行的同时，12年以来首届研究生招考工作也开始了。原定首届研究生由中科院委托中国科技大学在京筹建的研究生院开招，但这个10月中旬才仓猝宣布成立的研究生院虽鼓舞人心，却还不及成形。另一方面招考工作还处于草创阶段，也还未及规范化。然而科学院积极性非常高，招生就已经从个别考察开始了。如一个1968届高中毕业生、江苏

师院外语系在读的一年级学员于7月份致信中科院，并附论文自荐。科技大学于10月派人调查政审，并个别进行文化考试，数学已达大学毕业水平，当即录入数学系读研。北京天文台以同样方法录取了江西宁都民办教师段元星，植物所录取了福建建宁县农机厂铸工李振宇。<sup>①</sup>这种刘备访诸葛式的旧时方法，显然不适应大规模选拔人才的现代，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举国一致呼唤科学、呼唤人才、求贤若渴的热潮。11月16日方由《光明日报》刊出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的《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12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中科院招生办的招考规定，鼓励各界报考，决定报名从11月15日开始而延期到12月31日。同时扩大招生范围，不拘一格选人才，凡应届大学毕业生及在校生、相当大学学历的社会人士，不超过35岁的均可报考。招收专业共计200余种。考试定于1978年2月25~27日初试，4月底复试。考试科目为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初试由市县招生办主持，复试由中科院招生小组分赴各片协助进行。5月底发出录取通知。这样，招考方法才有了一个轮廓，后几个月又不断加以完善，最终奠定新时期招考研究生的制度。

科学院各研究机构招生积极性相当大，23日《人民日报》报导科学院又增招人数，招生专业也从200个增至302个。报考人员相当踊跃，自10月中旬以来，科学院收到报名信6500多封，其中有200多封附来科研成果和学术译著。此外还有许多推荐信，领导、老师、师傅积极荐才。11月中旬开始正式报名以来，科学院已发出35000份报考表格，仅沈阳一地报名就达3000人，北京仅报自动化研究所的就有270人，报力学所的也有200多人。报与招两方面都异常热心，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报考，有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个别录取研究生的消息，载《光明日报》1978年2月7日。

关单位不断接到来信、来电、来访，询问报考规定，要求延长报名日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老教授要求承担培养任务，越来越多的科研教育机关和学科要求招收研究生。招生单位从中科院、科技大学扩大到教育部所属一大批高校，从自然科学扩大到人文艺术，如经济学家于光远、画家吴作人、刘开渠、李可染、蒋兆和、古元、李桦都要求带研究生。这样，招考规模不断扩大，有关准备不足，时间一延再延，规定一改再改。鉴于原先的报考工作不适应新的形势，原定的考试也难以赶在1978年春季始业之前，教育部于12月召开省市招办、部分高校和部委联席会议，重新安排、统一部署招考工作。1978年1月以教育部和中科院名义发出新规定，宣布再次延长报名时间，推迟入学考试，决定将1977、1978两年的招研工作合并进行，合并报名，合并考试，合并入学，统称1978级研究生。新的报名日期是3月1日至31日，5月初试，6月复试，9月入学。中科院和各高校及各部委所研究机构招研实行统一的报名考试方法。过去已向中科院报名的仍然有效，未报名的继续报。<sup>①</sup>

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从全局出发为国家选拔研究生》，提到有的专业已于1977年在普通工人、农村民办教师、知识青年中发现了人才，试招了研究生。2月间，刚刚恢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立即招收研究生，于是人文10个学科（哲学、经济、世界经济、文学、语言、历史、考古、法学、世界宗教、民族）的近百个专业向考生开放，与中科院、教育部实行统一的报名、考试、入学方法。3月又增设新闻研究所，加招新闻类7个专业，并增招外国文学、近代史、世界史3个学

<sup>①</sup> 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延长研究生招考报名时间的新通知，载《光明日报》1978年1月23日。

科 10 个专业的研究生。<sup>①</sup>为此，社科院于 3 月 18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答考生问。至此，各科大体齐全，全国共 210 所高校、144 个研究机构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招研，计划招 8900 余人。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规模空前的。<sup>②</sup>

2 月间教育部再次开会，研究“文革”前几届大学毕业生的报考问题。3 月发出通知：放宽年龄限制到 40 周岁，64、65 级研究生因故中断学习而分配了工作的，在重报 1978 年研究生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并可缩短学习年限。<sup>③</sup>4 月初 26 个重点高校决定在港澳地区招收研究生，4 月报名，5 月在中山大学笔试一次即定。<sup>④</sup>这样，4 个月之中，各教育科研机构就招研问题陆续发出 10 来个通知，不断地拓宽取才之路，打破常规，面向社会，不受学历资历之限而唯才是举，与“文革”前基本在高等院校选拔少量研究生的做法有很大不同。这是基于 10 年动乱中鄙视知识、摧残人才，致使许多学人沉沦社会底层，受种种压制而难以进身。这一系列广开才路的举措，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各方面人士，他们踊跃报考，全国共有干部、工人、知识青年、在校大中学生、应届毕业工农兵学员 63500 多人报考，为计划招生数的 7 倍多。<sup>⑤</sup>

由于百废待举，报考人数之多又创纪录，所以此次招研工作延续时间之长也是空前的。从 1977 年 10 月开始报名（当时连报考方法也未制订出来），到 1978 年 4 月结束，报名时间就长达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增招、新招各专业研究生的消息，载《人民日报》1978 年 3 月 15 日。

② 综述招考研究生报名的消息，载《光明日报》1978 年 3 月 27 日。

③ 教育部关于 64 级、65 级研究生重考的通知，载《人民日报》1978 年 3 月 21 日。

④ 26 所重点高校向港澳地区招考研究生的决定，载《光明日报》1978 年 4 月 13 日。

⑤ 综述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的消息，见《光明日报》1978 年 8 月 27 日。

半年。初试于5月15日至17日在各地3000多个考场同时进行，到7月中旬初试判卷工作才告结束，8月至9月初办理复试。初试复试共费时4个月，至9月12日发出入学通知，10月入学，历时一整年。这反映了在教育废墟上复兴教育之艰难，也反映了当时举国上下虽手忙脚乱却热情迸发地“大干快上”搞教育。

由于10年动乱的影响，这次招考的初试成绩与“文革”前比，总体较差，考生年龄也偏大。但是，通过考试，全国也还是发现不少人才。有些单位师资潜力大，考生多，成绩也好，所以又增加招生名额1800多人。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原计划招53人，有500多人报考，且高分者众，便增招120人，实际招生达173人。<sup>①</sup>这样，1978年实招10708名研究生，加上1977年个别招生的226名，总计10934名。这是一个空前的数字。民国最高年在校研究生为424人。“文革”前17年共招研究生23393人（只毕业16397人）年均招一千多人，最高年1965年招了4645人。<sup>②</sup>

由于报考各专业的的人数极不平衡，有的专业报考人数超过计划数的几十倍、几百倍，而有的专业报考人数极少，便决定对相近专业的上线生在各招生单位之间调剂录取。这一做法后来成为惯例，一直沿用至今。

8月底教育部召开第三次研究生工作会议，有25所重点院校、7个省市教育局、中科院、社科院、计委、科委等11个部委的负责人及部分研究生导师参加。讨论培养研究生问题和下年招生工作，修订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

① 综述录取研究生工作的消息，见《光明日报》1978年11月26日。

② 苏渭昌：《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有关研究生教育章节。

案)》。决定研究生学制2、3、4年制并行，允许有条件的学校试行学分制，提前达到总分的可以先毕业，以达到早出人才的目的。可见当时思想之活跃，现在反而模式化了。<sup>①</sup>

8月27日《光明日报》就首届研究生招生工作结束发表评论《大家都来关心选拔、培养研究生》，强调选拔起点高、基础好的人，“把最优秀、最有培养前途的人选上来”，一定要讲质量，否则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讲重点，不准拔尖，决不是党的政策”。批评一些单位“本位主义在那里作怪，对报考研究生横加阻拦”。

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周扬兼任院长，当日举行开学典礼。全国共有5400多人报考社科院的106个专业，从取得复试资格的840人中录取400多人，推荐调剂到其他单位60人。14日中科院、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也举行开学典礼，录取研究生达1000多名。<sup>②</sup>

从1978年恢复招研以来，招生规模逐年扩大。1979年首次招收13名博士研究生。派遣留学生的的工作虽自1972年恢复，但是量少，而且自1972年至1978年派出的人有93.7%是学外语的。此后派出的90%以上是学科技、人文的，从1978年到1986年，9年之中，派出留学生共5万多人。而从我国首次派出留学生的1872年到1919年的50年中也才派出5万多人，而建国后的17年中总共才派出一万多人。<sup>③</sup>

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决定从1981年1月实施。此前1954

① 教育部召开第三次研究生工作会议的消息，载《光明日报》1978年8月27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的消息，载《光明日报》1978年10月7日。

③ 苏渭昌：《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有关研究生教育章节。

年至1957年，1961年至1964年曾两次起草过学位条例，但均未能实施。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批准我国首批授予学士学位的高校458所，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358个、硕士点3185个，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51个、博士点812个、博士生导师1155人。这一年共有229个单位首批授硕士8665人，1982年2月至1983年5月又有8个单位首批授博士18人。民国时期于1935年4月曾颁学位授予法，14年间只授过学士和200余名硕士，未授过博士。

## 二、1978年的大学招生高峰

1977级新生刚刚于3月间入学，扩招的尚未进校，1978年高考招生的锣鼓又敲响了。4月初，中央批转教育部关于1978年招生工作的通知。比上年有所改进：各省命题改为全国统一命题，史地、理化两门分开为4门，加考外语（没学过的免试，暂不计入总分）。同时下发《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当时全国中学教材不统一，有的地区开课不齐全，大纲既照顾大多数地区的实际教学，又反映高校对入学新生的基本文化要求，意在指导青年学生的学习，提高中学教学质量。此后，每年都编出新的高考复习大纲，对指导和提高中学教学起了有益的作用。<sup>①</sup>

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称赞“经过去年的高考，蕴藏在亿万青少年中的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要求工厂、农村社队统筹安排知识青年考生的生产与复习，批评有的地方“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阻拦考生复习功课”，表扬一些地方组织青年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集体复习，并调动教师、干部、技术员帮助辅导。

<sup>①</sup> 教育部关于1978年高考招生工作的通知，载《人民日报》1978年4月6日。

5月6日，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生产队、农场热情支持知识青年报名参加高考，不得歧视压制，要给他们提供复习便利，每天安排一定时间组织复习，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光明日报》为此于5月12日发表一条报导和一篇短评，对支持青年报考比上年给予更多的关注。但仍有不少单位自行“土政策”，如辽宁大洼县新兴农场两棵树大队知青点90多名知识青年中只有七八个人提出要报考，其中一男一女因回城护理父病和自己就医，就被队里认定在家复习，不准报名，还宣布因复习误一天工的要倒扣一天工。并故意排满农活，不让收看电视复习讲座。北京光学仪器厂支部书记给想报考的工人扣上“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的大帽子，不让报名。《人民日报》6月26日就此发表来信和短评，称此为违宪（五届人大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权）违规（国务院批发的招生文件）。这样，1978年的报考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考生人数破了上年的特高纪录，达到610万人，至今仍保持最高纪录。

5月全教会期间，同时召开了1978年招生工作会议。会议批驳了反对恢复高考的极左思潮，讨论总结了1977年招生工作，制订了1978年招生规则，又有新的改进：①报考对象进一步拓宽，对30岁的考生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上年要求有科研成果，今年仅要求“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的优秀青年”），已年跨30周岁的66、67两届高中毕业生仍可报考。②高校举办两年制的专修班，招收年过25岁的考生，以求早出人才。③全国统一命题、统一时间考试，考生多的省区可以先进行初试，考试时间定为7月20日至23日。④为发扬民主、杜绝走后门及徇私舞弊，在公布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开考生各科成绩，由县招办通知考生所在单位转告本人。考生对判卷有怀疑，可向招办提出申请，由招办负责查阅试卷。录取名单由考生单位张榜公布。⑤



打破常规选拔人才。高中生在学科竞赛中成绩优异者，经各科成绩考察、政审、体检合格，可免试保送上大学。有特殊才能者，有特殊专长和发明创造者，不受年龄、婚否限制，可向省市招办和教育局推荐，由高校单独考核，经省市招委批准，随时录取。<sup>①</sup>会议强调广开才路，不应刁难和压制青年报考，强调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要批判反动血统论。<sup>②</sup>中专招考与高考分开进行，可招初中生也可招高中生，由省市统一命题。<sup>③</sup>

6月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本年招生工作意见。6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称1977年招生是“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盛举”，强调本年招生“要十分重视考生的文化程度。科学文化知识是人类长期进行阶级斗争和对自然界斗争所积累的财富”，“高等学校招生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考试，这是理所当然”。1978年招生不划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录取比例，完全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大学生，从而彻底抛弃了“文革”中的“实践经验”录取标准。同时，按多于录取数的50%划分数线，分数分段，限定段中录取。<sup>④</sup>这是贯彻文化择优录取的重要措施，有力地纠正了1977年录取工作中徇私舞弊和政审过左造成的“低分上好大学，高分上差大学”的偏差。

7月20日，恢复高考后的全国第一次统考在高温酷暑中拉开了序幕。次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视察了北京35中考场。教育部、各省市地县领导也都深入考场，把高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sup>⑤</sup>

① 1978年招生工作会议制定的招生新规定，载《人民日报》1978年6月14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78年6月条目。

③ 1978年统一高考北京考场的消息报导，载《光明日报》1978年7月26日。

这一年共计 610 万人报考，录取 40.2 万（含后来扩招的 10.7 万），比去年猛增 13 万，是建国以来招生人数的第三个高峰。1952 年招 7.9 万，1953 年招 8.2 万，1954 年招 9.2 万，1955 年同上年，1956 年猛增一倍，达 18.6 万，是为第一个高峰年；1957 年不得不收缩，压至 10.6 万，1958 年又猛增至 26.6 万，是为第二个高峰期，1959 年持续高峰，招生 27.4 万，1960 年达高峰顶点，招 32.6 万；1961 年猛压至 16.9 万，1962 年继续压缩至 10.7 万，1963 年招 13.3 万，1964 年招 14.7 万，1965 年招 17 万，这几年保持了逐年增长。但至“文革”又下跌为零，后恢复为 4 万，至“文革”结束的 1976 年为 21 万，年均 10 万而已。1977 年招 27.6 万，1978 年招生净增 13 万，势头过猛，所以 1979 年压缩为 27 万。1979 年报考人数有所回落，但仍达 468 万，录取比例是 17.3:1，比上年严峻，上年是 15:1，1977 年是 21:1。由于上两年将以前历届高中生具竞争力的分子招净，所以 1979 年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高达 66%。这也表明动乱 10 年所积蓄的 12 届中学毕业生的升学压力，大大缓解了，此后，高考招生工作转入常轨。1977 年、1978 年两年共录取 67 万多人，这相对于历届中学毕业生的庞大数目（1200 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几百万留城者），毕竟也太少了。他们中有的人后来分流到各级各类成人业余高等教育中去，继续圆其大学梦，这也是持续 20 年的“五大”业余高教鼎盛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太少，经“文革”10 年折腾更出现大学生荒，所以整个 80 年代大学生十分抢手，真正成为“天之骄子”了。比起那时的非“白领”不干，现时的大学生倒有了失业的危机感，但决非是大学生过剩。早在 70 年代，美国高中生升大学率是 40%~50%，日本是 35%~40%，法国是 20%~25%，英国

和原西德都是 20%。<sup>①</sup> 我国到 20 世纪末还无法达到这一发展水平（尽管就报考数与录取数之比已达 25%，但由于我国远未普及高中教育，这个比例不能算数）。

1978 年各地各高校千方百计挖潜扩招，表现出大办教育的热情。天津于 8 月作出决定办大学分校，以扩大招生，增招的学生进大学分校走读。经费由地方财政解决，校舍空出部分中小学解决，师资以大学教师兼课和电视教学解决，学生毕业由地方分配使用。这样，便办起 8 所不管学生吃、住、交通的走读大学分校。这是一个应急的创举，突破以往办学的模式，它的特点是：依托老大学的设备师资，地方投资、地方培养、地方用人、走读走教。天津用这一办法扩招 9000 人。<sup>②</sup>

10 月 6~13 日，教育部在京召开 1978 年高校扩大招生座谈会，研究和推广天津办分校的扩招办法，规定把国家计划外扩招数列为地方计划，地方自筹经费，调动地方办学积极性。10 月 26 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扩招意见。12 月 4 日，教育部、国家计委联合发出 1978 年扩招计划，全国各地用此法多招学生达 107045 人。其中单北京一市就多招 16043 人。当时北京录取计划 1.1 万，而报考者高达 9.4 万，其中尚有 1.6 万名总分在 300 分以上的考生不能入学。而当年全国半数省市的录取分数线不足 300 分。为了多招学生，北京筹备 3 个月，办起大学分校 36 所，延至 1979 年 2 月正式上课，受到社会各界欢迎。但是由于发展过快，规模过大，专业设置缺乏长远规划，后来出现大起大落，到 1981 年、1982 年之间调整为 19 所分校。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分校进一步萎缩，不过它在新时期百废待举之际救一时之急，功不可没。

① 西方大学情况简介，载《光明日报》1978 年 7 月 28 日。

② 天津市人办走读大学分校的经验，载《光明日报》1978 年 11 月 28 日。

### 三、稳定与建设师资队伍

#### 1. 平反冤假错案

由于对教师队伍的错误估计，“文化大革命”对这些基本群众的摧残特别酷烈，冤案特多，人人怕当教师，队伍极不稳定。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可分三个阶段：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10月开始的否定“两个估计”之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1982年十二大，这一工作基本结束。

第一阶段主要是清查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直接插手制造的政治阴谋事件。这些事件皆涉教育，因而所涉教育界人士首先得到平反，如周荣鑫案、王亚卓案、马振抚公社中学案、永乐中学案、《园丁之歌》案等。清华大学党委于1977年5月改组，立即组织专门调查小组，听取刘冰等4人的申诉，查清当时出场作证的15个证人所作全系伪证，肯定刘冰上书合理合法，内容属实，推倒原诬陷之词，恢复名誉和工作（刘出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sup>①</sup>但是，很多案子平反并不甚彻底，而且面小，仅限于一些大案所涉人士。

推倒“两个估计”后，平反冤案的规模和时间跨度都大大扩展，特别全国教育大会以后，敦促各地揭批本地“文革”中的典型事件、复查教师积案、调整用非所学、加大老案平反深度力度。如清华大学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上溯到清队假经验，至全教会后已复查1228件个案，全部推倒。这些立案占“文革”初教师总数的20%，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170多

<sup>①</sup> 清华大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的消息报导，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3日。

人，迫害致死者几十人。<sup>①</sup>山西原平县立案 272 件，占全县教师总数的 23%，到 1978 年 3 月已复查 242 件，占总案数的 89%。<sup>②</sup>安徽调查用非所学 6000 余件，短期内拔擢 600 多人充实教师队伍。

三中全会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一批铁案陆续得以复查纠错。启动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并且由“文革”上溯到历次运动。1978 年 9 月，中央决定最后一批右派全部摘帽，同时开始复查错划并予改正。到 1981 年底，改正人数达原划右派的 98% 以上。<sup>③</sup>这其中教师所占比例极大。陕西高校系统冤假错案 3516 件在 1978 年内获平反，错划右派 1240 件于 1979 年春全部纠正。<sup>④</sup>贵州普教系统历次运动错误处理的人数占教工总数的 13%，高教系统的冤案 1235 件，到 1982 年全部改正。<sup>⑤</sup>

1979 年 7 月 20 日，正式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 40 周年，以这种特殊方式为 27 年前被捆同武训一起遭受批判的陶行知平反。此后，开始兴起一个研究陶行知、学习陶行知的热潮。人民教师的地位也开始提高。

## 2. 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后来又宣布对知

① 山西原平县落实教师政策的消息报导，载《人民日报》1978 年 8 月 14 日。

② 安徽省积极建设师资队伍的消息报导，载《人民日报》1978 年 3 月 15 日。

③ 中央决定给最后一批右派全部摘帽的消息，载《光明日报》1978 年 11 月 17 日第 1 版。

④ 《中国教育年鉴》地方卷（1949～1984），第 1050～1177 页。

⑤ 《中国教育年鉴》地方卷（1949～1984），第 437 页。

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sup>①</sup> 11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知识分子是党的依靠力量》文章，说建国已近30年了，知识分子队伍已发生结构性变化，从二三百萬旧知识分子发展到2500万人，90%是共产党培养的，70%出身劳动人民，原有的旧知识分子也进步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与工人是一样的，不占有生产资料，参加劳动，分配上领取与工人相同的工资，不再是“改造对象”了。197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建国初期所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适用了，因为20多年来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变化了，成为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是党的依靠力量。这样，就从政治上改变了知识分子一直受歧视的状况。

1978年4月教育部批准北京景山学校3名小学教师为特级教师，在全教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到1981年底，全国共提升1130名特级教师。1979年11月1日起，中小学试行班主任津贴。1980年起，首先由山西实行给中级职称教师解决夫妻分居和配偶农转非问题。同时，优先给教师提工资，向全社会宣传尊师重教，设立教师节，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教师地位。

### 3. 提高教师业务素质

“文革”动乱致使许多教师荒废了业务，又通过各种改组驱逐了学有专长的人，而吸纳大批生手，教师队伍业务水平大大下降。1977年12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到1979年，全国省、地、县三级都建立起教师培训网络。从1978年起由大学举办教师进修班、研讨班、暑期讲习班，到1982年底，教育部委托高校开办的各种班次达200多个，近万人参加，还安排8243人到重点高校进修。这以后教师赴大学

<sup>①</sup> 《中国教育年鉴》总卷（1949-1981），第63页。

作短期进修形成制度，至今愈盛。

1978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工作的意见》。“文革”中转给地方党委管辖的教师人事收回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管。师范院校毕业生应全部分进教育部门。民办教师的任用、辞退、调换须经县教育局批准。城市街道管校恢复为区教育局管。农村重建学区和中心小学。借调教师一律收回，仅山东一省被借教师就达10360名，到3月即收回8488名，占80%。

在高教方面，3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宣布开始执行1960年批准而未及实施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宣布原批职称一律有效，给予恢复。新提升教授审批权改由省市自治区掌管，报教育部备案。上海4月初即提升400多名科教人员为正、副教授。<sup>①</sup>到1981年，全国高校有13万多教师获得职称，其中教授2400名，副教授20700名，讲师116100名。后来中小学也实行了职务晋级制度。这一举措调动了教师钻研业务的积极性。

民国时期最高年份全国高校有教授6816名，副教授2514名，讲师3426名（教职员工总数为30303名，其中专任教师16940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不评职称，到1965年教授数目反而降低了，教授才3506名，副教授4382名，讲师29200名（教职员工332579名，专任教师138116名）。到1976年教职员工总数升为439839名，其中专任教师167409名，无一人有职称。1977年宣布恢复原有职称时，有教授2288名，副教授3531名，讲师27344名，均低于1965年。直到1985年才大为改观，教授4674名，副教授28600名，讲师136760名（教职员工总数升至

① 上海首次晋升一批科教人员职称的消息报导，载《人民日报》1978年4月12日。

870624名，专任教师344262名)。到1987年，教授总数才大大超过民国时期，为12507名，副教授为64466名，讲师为132554名(教职员工总数968657名，专任教师385352名)。至此，可以说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教师队伍的业务素质已发生巨大的变化<sup>①</sup>。

#### 四、建设与改革学校各项制度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体制渐被废弃，学校急需重建各项规章制度。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全国10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改变“文革”中小、中学5—2—2学制为5—3—2制，并改回秋季始业，在校中、小学生一律延长半年学习期<sup>②</sup>。九十月间，教育部又将原高教60条、中学50条、小学40条修订下发试行。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又提出恢复“文革”前的中、小学6—6制。从1977年9月到1979年12月，教育部组织200多名专家编制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和教学大纲，引进大批外国中小学教材作参考。

“文革”中盲目发展普通中学，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影响青少年劳动就业。1980年8月中央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提出：目前高中升大学比例只有4%，必须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职业中学，要发展中专、技工、业余学校、函授学校、电视大学及各种职业训练班。10月1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办职中、农中，普通高中开设职业课。中等教育结构调整就此开始，到1984年，中专业

<sup>①</sup> 苏渭昌：《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第405页。

<sup>②</sup> 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学计划的新规定，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13日。



校达 3301 所，招生 54.6 万；技工学校达 3465 所，招生 30.9 万；农中职中达 7002 所，招生 93.9 万。学校总数比 1978 年增长 49%，招生数增长 67.3%。而普通高中减至 17847 所，在校生 689.8 万，分别比 1978 年减少 63.8% 和 55.6%，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在高等教育方面，1979 年下发《关于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6 月 8 日至 29 日在武汉召开文科座谈会，重新肯定 1961 年的文科教学方针，要重视文科，要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教学为主、书本为主、课堂为主。9 月 28 日下发《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对高等学校的分科和专业结构也进行了调整，使之渐趋合理。1979 年文科学生占 8.5%，1980 年升为 8.8%，以后逐年渐长。

1978 年 10 月，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成都工学院、哈尔滨科技大学在合肥座谈会上首先宣布取消政治部，由校党委实行统一领导。这样，旨在突出政治而于“文革”前夕设置的高校政治部便普遍取消了。

1980 年 2 月 12 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13 次会议通过《中国学位条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1954 年至 1957 年适应经济文化建设高潮，曾起草过学位条例，1961 年至 1964 年的调整恢复期也起草过学位条例，但这两次均因政治运动而胎死腹中，未及实施。

## 五、恢复与增设高校

### 1. 收回被占校舍

“文革”中对高校实行“关、停、迁、并、占”的砍杀方针，到 1972 年全国高校被占校舍共 1542 万平方米。这年开始调整教育，中央发出 8 号文件，随后陆续收回校舍 473 万平方米，

仅占应收回面积的 30%。而在后来的几次运动中又被占去 100 多万平方米，到 1978 年被占面积仍达 1170 多万平方米，价值为 12 亿元，相当于 1978 年前 4 年的全部教育基建投资总和。<sup>①</sup>

为振兴教育，中央三令五申要占用单位退出。各地成立退还校舍领导小组，设置专门办事机构，清退校舍。如江西为占用单位安排搬迁费 380 万元，学校另择新址的，由占用单位出还建费 70%，省政府补 30%，省革委会招待所带头退回校舍。

### 2. 增加基本建设投资

1966 年至 1970 年，教育事业投资，占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0.5%，1975 年升为 0.9%。1978 年增为 1.29%，1983 年猛增为 4.05%。到 1981 年已增建校舍 2408 万平方米。

### 3. 恢复与增建高校

1977 年 5 月首先批准恢复西南政法学院。年底撤销五七艺术大学建制，恢复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戏曲学校等 10 多所学校。1978 年又恢复并增设第二批共 200 多所高校，其中有“文革”中被撤销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人民大学、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华北农业大学被批准从河北涿县迁回北京原址，复名北京农业大学。增建的学校中，有师范院校 77 所。

民国时期最高年份有高校 207 所，在校生 154612 人。而新中国成立后到 1965 年高校增至 434 所，在校生达 674436 人。可在“文革”中高校数日降至 1976 年的 392 所，在校生也降至 564712 人。“文革”结束后，高校转入恢复与发展时期。1977 年高校达 404 所，在校生达 62.5 万。1981 年高校达 704 所，在校生达 127.9 万。1983 年高校达 805 所，1987 年达 1063 所，在校生达 2064900 人。

<sup>①</sup> 刘西尧：《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载《人民日报》1978 年 5 月 16 日。

在发展高教事业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冒进偏差。1977年10月，教育部发出“大干快上”的通知，1978年教育部又召开直属高等学校会议，制定一个发展高教的“跃进计划”，提出到1985年发展高校1200所，在校生达280万，研究生院100所，在读生15万。这个冒进计划得到较快的发现和纠正。

## 六、复办重点学校

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重点学校，是“文革”前就采取过的一项发展教育事业的措施。1953年教育部发出《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与师范的意见》，确定全国重点中学194所，占全国中学数的4.4%。<sup>①</sup>1954年高教部提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确定6所全国重点高校。1959年3月12日又指定16所全国重点高校。1960年10月22日把重点高校增至64所。1962年12月教育部再次发出办好重点中小学的通知，重点中学增至487所，占当时中学总数的3.1%。

“文革”中指责这种集中财力人力、以点带面发展教育事业的办法，为“修正主义”办“贵族学校”的办法。于是分散力量，大搞平均主义，摧毁了许多重点学校及其积累的经验。1978年1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公布教育部办重点中小学20所的名单，同时要求省地市县各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sup>②</sup>2月1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确定和公布重点高校88所（恢复原有60所，新增28所），约占当时高校总数405所的20%。<sup>③</sup>

① 《中国教育年鉴》总卷（1949—1981），第167页。

② 教育部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方案，载《光明日报》1978年1月25日。

③ 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校的报告摘要，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2日第3版。

四五月间的全教会把抓好一批大中小重点学校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战略措施”，又提出办重点班。1981年统计，全国共建重点中学4016所，占中学总数的3.8%；重点小学5271所（未包括上海）。<sup>①</sup>办重点学校和快班的做法，在当时对打破平均主义、推动教育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至今未有良策解决。

### 七、创办大学少年班

1977年10月决定恢复高考、恢复招研，举国一片“广开才路”、“打破常规发现人才”的呼声，各地积极推荐举荐人才。江西赣南冶金学院的一个教师，推荐了14岁的智力超常学生赣州八中高二年级的宁铂。不久在全国各地发现了10多个这样的少年，中国科技大学设想开办预科班收纳这些少年。<sup>②</sup>经中科院批准后，科大派出教师在全国找到21名平均年龄14岁的“神童”，编成第一期少年班，于1978年3月入学。经半年预科学习后，编入9月入学的78级普通班就读。第二期改变个别面试方法，在各地推荐、省市初审的名单中挑出近千人，由科大组织全国性统考，初试合格后再由学校派人进行面试、口试。共招61名，平均15岁，过半是团员，工农子女占1/4。<sup>③</sup>于1978年9月入学，在少年班学习大学课程一年后，也插入78级普通班就读。第三期招生与全国高考一并进行，再复试录取，但限在7个城市招。第四期扩大了招生地区。第五期改由省市招生办推荐，科大批准后即可参加高考，取消了面试。第六期恢复面试，

① 《中国教育年鉴》总卷（1949~1981），第131、168页。

② 《中国科学院破格选拔人才》，载《人民日报》1978年2月7日。

③ 中国科技大学招收第二期少年班的消息，载《光明日报》1978年10月11日第2版。

自此形成推荐——高考——面试的招生方法。后来一些重点大学也办少年班，不少中学也针对大学的少年班办起超前班，专培养日后考大学少年班的“神童”。

据1984年统计，少年班毕业117人，考取国内外研究生者81人，年龄最小的是15岁。<sup>①</sup>

#### 八、整顿与发展各类成人教育

“文化大革命”中成人文化教育极度萎缩，而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极度膨胀。到1976年全国据报共办七二一大学33374所，是正规大学的100倍。在县以下地区办五七大学（包括共大）7449所，五七学校9550所。这些学校的规模一般很小，全国七二一大学学生才148.5万人，校均不足50人。其中90%以上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办起的“运动学校”，徒有形式，而无基础无实体。少数坚持办了多年的学校，也由于随运动随风向随宣传而办，法无定规，秩序甚乱。教学上向政训班看齐，或办成农场工厂，无质量可言。

粉碎“四人帮”后，这些运动中办起的运动学校即自行停办。到1977年，七二一大学锐减为24326所，在校生仅有24.2万人，比上年减84%。<sup>②</sup>

1977年教育部拟订《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次年3月经国务院批转。规定七二一大学为厂办大专性质的学校，全脱产的学制2~3年，半脱产的学制延长，学生毕业经考试达大专水平的，按同等学历使用对待。一般的业余技术文化学习组织和中专水平的成人学校，不要列为七二一大学。<sup>③</sup>经1978

① 中国科技大学编：《少年班研究》，1984年第2期。

② 《中国教育年鉴》总卷（1949—1981），第594页。

③ 教育部关于“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载《光明日报》1978年4月5日。

年整顿后，存留的学校还有 3477 所，在校生 10.3 万人。1979 年 9 月全国职工教育会议后，所有七二一大学均自行易名为职工大学或业余大学。

五七大学到 1976 年有在校生 92 万（长班 57.7 万，短训班 34.6 万），五七学校有在校生 58 万（长班 41 万，短训班 17 万）。7449 所五七大学属地区办的仅 99 所，属县办的 1901 所，社队办的 5405 所，可见这些学校多为社队办的短训班，是过去农村长期存在的业余教育形式的总汇，与大学名实不符。

1980 年 4 月教育部召开五七大学座谈会，讨论整顿之计。5 月发出《五七大学座谈会纪要》，对其办学性质、管理体制作出规定：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停办，有的可改成农村中学，由教育部门办的改为农业技术学校，定为中专性质。极少数改为农民技术专科学校，教育部 1984 年 4 月 26 日正式行文，承认吉林省延吉县、敦化县、扶余县、梨树县 4 所农民专科学校。<sup>①</sup>

在整顿这类学校的同时，成人教育兴起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这是由于整整一代人 10 年中荒废了学业，现逢经济建设时代重视文化重视学历，他们积极要求文化补课，提出“夺回青春”的浪漫口号。于是，“五大”教育应运而生。

首先是电视大学勃兴。1960 年北京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广播电视大学，随后上海、天津、沈阳等地也试办起面向本地的电视大学。北京这所学校到 1966 年停办时，共培养 8000 多名毕业生。1979 年 2 月，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各省市地区也接着办起电大。在校生 1981 年发展到 26 万人，1984 年达 66.3 万人，教职工也从 1981 年的 1.5 万人发展到 1984 年的 2.4 万人。到 1984 年已有毕业生 17 万人，单科结业生 40 万人。先是招公职人员，现在已经招收高中应届毕业生。

<sup>①</sup> 《中国教育年鉴》地方卷（1949～1984），第 345 页。

高等学校办函授大学和夜大学，始自1950年人民大学的财经专业，招了2500人。到1957年有函授生3.5万人，夜大生1.2万人。“文革”中一律停办，1973年后有所恢复。1980年4月教育部召开了函授、夜大工作座谈会，9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的意见》。从1981年起，函大夜大招生列入国家计划。到1986年函大在校生达41.5万人，夜大生达14.8万人。从1986年起，也开始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

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起于1980年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提出：应拟订一个办法，自学并经考试合格的人要发给证书，使青年人不再迷信大学。1981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北京先行一步试点，于1980年10月公布建立自学考试制度的决定，于1982年初公布暂行实施方案。到1985年4月已有23个专业开考，考试12次，参加考试计37万余人次，有5批毕业生计4119人。各省也开考于后，到1986年，开考70多个专业、380多个专业点，应考者740多万人，毕业本专科生11.8万多人，获一门以上单科合格证书者有200多万人。

同时，职工大学、农民大学、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等成人大学也风起云涌地办起来了。1949年，全国办起第一所成人大学，在校生124人。到1956年发展到964个（含高校函授夜大206个），学生41万人。后来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成人学校大起大落，收效不大。1982年经调整后，有成人大学1147所，到1985年发展到1215所，在校生有172.5万人。<sup>①</sup>

<sup>①</sup> 苏渭昌：《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第331、430页。

## 九、清算“左”的教育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界也深入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80年1月教育部召开教育工作会议，12月又在天津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清理“左”的教育思想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认为不仅“文革”中存在“左”的错误，17年中也存在“左”的错误，如批“白专道路”，唯成分论，强调“外行领导内行”，只讲批判不讲继承，追求高指标造成大起大落等。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教育部于1981年8月召开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毛泽东晚年在教育问题上的错误。在这种背景下，教育界开展了关于一些重要的理论是非问题的讨论。

于光远最早于《学术研究》1978年第三期上提出：“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二者不能划等号。”对于教育本质问题，早就有定论说是“阶级性”。50年代初，苏联继“语言的阶级性”问题讨论之后，又就教育的阶级性进行讨论。1952年4月《苏维埃教育学》杂志总结说：“一俟社会分解为敌对阶级时，教育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断言教育也像语言一样表现出无区别地对待各阶级，是大错特错”。由教育观点和教育机关“所实现的教育，或者包括在当代的上层建筑部分之内，或者是过去的上层建筑的因素、残余、遗迹，或者作为未来的上层建筑的胚胎、萌芽或前提”。《人民教育》于5月和7月介绍了苏联的结论，自此教育本质是上层建筑是阶级性的几乎成了不刊之论。

1979年，沉寂多年的教育思想活跃起来，讨论全面展开。有人提出教育是生产力，因为马克思说“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教师“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教育投资是生产投资等。又有人提出教育的双重属性说，说教育具上层建筑和生产力两重属性。还有人说教育的属



性不等于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传授知识”。《教育研究》杂志发文近50篇，全国80多种刊物发表数百篇文章参加讨论，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如怎样认识列宁“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句话，这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有人提出，这是被列宁已经抛弃了的一个提法，列宁在1918年起草《俄共（布）党纲草案》时曾有此提法，而俄共八大正式通过的纲领删去了这一句话。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也不是一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仅仅是把暴力镇压机关称为专政工具，而从未将文化组织列为专政工具。

最早对教育方针提出质疑的《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教育问题要来一次大讨论》一文，载于1979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该文尖锐提出，30年来扫盲没有完成，人才普遍短缺，教育的理论、方针、政策、方法有没有问题？但没有点明问题所在。11月1日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以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取代了为政治服务的口号。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肯定了周扬的提法，“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这对人们思考教育方针问题是有启发性的。1980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内刊发表《现行教育方针质疑》一文，认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方针是“左”的，20年来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好的。11月4日《文汇报》刊《关于教育方针的探讨》，该文认为1958年提出的方针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没有反映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利于以教学为中心。自后各报刊发表了几十篇讨论文章，一直延续到1990年。

此外还对教育功能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讨论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才开展起来，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教育界的延伸和果

实。这些讨论对于推进新时期教育理论的进步与繁荣，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sup>①</sup>

---

① 苏渭昌：《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第283、290页。

---

## 第七章

# “教育革命”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教育革命”搞了 11 年，中间穿插了一连串的政治阴谋，与政治斗争纠结在一起，但应当承认它确实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教育改革试验，只不过是方向错误的失败的试验。它恪守过去的农村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不正规教育经验，把现代正规教育视作“资产阶级的”。它追求“公正”的超阶段的文化平均主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视作“修正主义的”。它以狭隘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看待理论、文化科学知识，以致滑向蒙昧主义。

以上是“教育革命”思想的三个来源。“教育革命”的三个

特点是：突出教育为政治服务，突出生产劳动教育，贬低知识分子和知识。

## 第一节 关于农村军事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不正规教育经验

毛泽东 1964 年春节讲话后，《人民教育》1965 年第 4 期点名批判凯洛夫学说，说这些年教育的正规化“把我们在老解放区创造的、自己所特有的、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好传统丢掉了”。“文革”中这种指责充斥报刊，如有一位作者写道：建国初“继承老解放区革命传统，师生们参加土改、镇反、生产救灾等运动，学校办得朝气蓬勃。不久，就被刘少奇一伙的所谓‘正规化’给扼杀了。1958 年走出学校与工农相结合，大办钢铁，大办粮食，教育革命热火朝天。但是，时间不久，刘少奇一伙又以‘乱、糟、偏’为借口压下去了”。<sup>①</sup>因而“文革”中，力图向这些革命战争时代的经验回归，而谴责 17 年教育在正规化、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工作。

以前，在革命战争和农村环境的条件下，不可能实施正规教育。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打破洋教条和土教条，成功地创办了符合实情的根据地教育。在战争年代，中心任务是战争和夺取政权，而不是经济建设。就边区的经济建设而言，首先是发展农业、手工生产，而不是工业城市的大机器生产。因而对于教育的要求，一是直接为政治服务，二是与农业、手工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传授与战争、与农村生产暂时不相关的

<sup>①</sup> 《面向农村改革中等教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3~14 页。

学院知识，是脱离实际的。这种“洋教育”，是匮乏的根据地所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严酷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要求打破教条主义，打破学校教育的正规性，对教育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7日和5月27日连续发表社论：《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和《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系统地总结了20多年来革命对教育提出的特殊要求。首先，在培养目标上有不同于正规教育的要求：主要培养革命斗争干部，暂时还无力顾及经济文化建设人才。

(1) 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办学校主要造就战争和革命急需的干部，高小、初中以上的学校多办成干部训练班，以政治训练为主课。对知识分子学员，主要是“转变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生产劳动，学习工农，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工农干部学员，重点是学习政治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2) 现任干部提高重于未来干部培养。中小学普通教育向干部教育看齐，着眼点也是将青少年培养成未来的革命干部。但是由于教育经费限制，对现任干部的教育更为急切，所以干部学校优先于普通学校。

(3) 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群众教育主要是政治教育和战争、生产教育，普及识字是为了让群众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政治素质和阶级觉悟，便于政治动员。

(4) 军事、生产知识和技术教育重于文化教育。这是由战争环境、农村环境决定的。

这种培养目标与战时条件，必然要求办学形式打破正规化，灵活多样。它没有学制等级、入学资格、在学年限的限制，而设有村学、冬学、半日班、夜校、星期学校、短训班、识字组等多种形式，以便与战争和生产活动相适应。教育期短量大

(强调缩短学制)，仅抗大就训练学员 20 多万。社论还归纳了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的特殊要求。

教育的主要内容或全部内容是：如何参加游击战争和组织劳动力，如何取得最必要的文化知识、家庭生活和农村生活中所实际需要的知识。从小学到大学，应把指导战争和生产所实际需要的知识列为课程，部分地或全部地代替那些为升学考试而存在、为所谓正规化而遗留的课程。

这就是突出政治性、生产性、实践性和实用性，这是革命战争年代所必需的。早在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就提出：会说英文、懂三角微积分、会做“风啊”、“月啊”诗文就救得了中国？即使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文科人人郁根杜里舒、理科个个爱因斯坦，又何济于事？“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它自身不能转移时局”，中国急需的是“革命的人才”、“救国的学术”。<sup>①</sup>

1926 年 5 月，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农村教育方针：一是养成农民革命思想，二是增进农民农业知识技能。提出农民补习学校的课程是：三民主义、国民党史、政治常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卫生、信札、国文，要求随时讨论现代政治问题、改良风俗问题和世界大势。农民小学的课程应特别增设三民主义浅说、国耻小史、农业常识等科。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说到教育的任务：“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sup>②</sup>

<sup>①</sup> 恽代英：《再论学术与救国》，载《中国青年》第 17 期（1924 年 2 月 9 日）。

<sup>②</sup> 江西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规定“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要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能，使教育与劳动统一起来”。《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规定：“应当使学习与生产劳动及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并在课外组织儿童的劳作实习及社会工作”，“教育与工农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闭在自己的学校内”，“使得学校与附近的农场或者市墟工场发生密切的联系，有计划地领导学生参加生产劳动”。<sup>①</sup>

对于农民学校的要求是：“要把书上所写的拿来应用，要把应用放在第一位”，做到能“写墙报，写开会的记录和决议，最低限度也要学到写标语口号”，能“看《红色中国》、《红色中华报》”等政策理论宣传刊物。<sup>②</sup>

农民学校的教材是政治与文化合一的。如《工农兵三字经》识字课本，内容是“入共党，组红军，打土豪，除劣绅，废军阀，莫容情，阶级敌，一扫清”。又如算术课本第10课：“某游击队原来共有7根快枪，现在有3个白军拖枪投诚，共有几根快枪？”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教育方针，要求“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随后具体为：“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毛泽东后来又在《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说中批评了传统教育：“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这一时期教材突出抗战政治教育，语文讲抗日英雄和日军暴行，算术讲日军烧杀数，常识讲防空防毒反奸反特。1940年

①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同上。

晋察冀边区初小国语和常识共 397 课，政治性的 314 课，占 78%。<sup>①</sup> 苏中根据地群众教育明确提出“明理第一，识字第二”，教材与政治、生产密切相关，讲解各项政策。如《不告敌人一句实话》、《送情报》、《派饭》、《互助》、《当心敌人放毒》、《不给仇敌粮食》、《不用汉奸票子》。晋察冀根据地 1943 年编出《反法西斯课本》、《减租减息课本》、《拥军优抗课本》、《生产课本》、《巫婆害人精》、《妇婴卫生》等。

革命年代办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以群众运动方式进行。最早起于大革命时代的农民运动中。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办学和教育家搞的“教育普及”作了比较：“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其夜校”，“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后来苏区为“消灭文盲”，搞设卡拦路教学。搞“运动周”，“突击月”，“冲锋季”。陕甘宁边区一度“强迫动员”、“集中住宿”搞“扫盲”，1944 年 6 月 3 日，发布冬学指示纠正之。

1940 年到 1942 年前后，由于战局处于相对和平阶段，又有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根据地，学校教育中正规化的思想渐渐抬头：提出中等学校培养知识分子，延长学制到 2~4 年，加重文化课比例。“由抗日为主转而以科学为主，但这种科学也不讲边区人民所迫切需要的科学知识，而讲了很多火车轮船电气机等等”，与边区生活脱节，生搬城市一套“早起刷牙”、“饭前洗手、饭后漱口”、“爱干净的娃娃，天天都洗澡”。

这种脱离边区实际、不合战争时宜的盲目正规化做法，很快就纠正了。1944 年 4 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系统批评正规

<sup>①</sup> 刘松涛：《对编辑 7 部小学国语课本的回顾》，载《人民教育》1950 年第 10 期。



化倾向，说那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和平时期的产物、大城市的产物，不符合根据地和农村需要，是一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右倾思想”。

随着抗战结束，一度出现和平民主前景，1946年春教育正规化问题又提了出来。但不久内战爆发，正规化再度搁置，教育工作密切配合战争办短训班。

当着内战即将结束的时刻，1948年10月14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考虑到胜利后的建设任务了。华北、东北开始统一学制和加强文化课教学，中学实行正规的3-3学制，文化课占90%，政治课减到10%，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限制在每周6~8小时。由此开始了教育的第三次正规化。这一次正规化是适时的，被称为“新型正规化”；而延安时期那次称为“旧型正规化”。1949年8月，东北局发出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这是第一个明确、系统提出革命时代教育向正规化教育转变的文献。文件说短期训练的高等干部学校完成了历史任务，“今后的中心任务，已由战争、土地改革转为全力进行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需要大批具有革命思想与现代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专门人才”。文件指出训练班形式质量不高，学生入学前程度不一，学制不统一。这种教育形式可以速成干部，但不能速成专家与知识干部。因而决定把训练班形式的干校转为正规高校，确定学制，增聘教授，改进教学，充实设备，确定以课堂为主，配以课外社会活动的教学体制。东北的做法为全国教育实现正规化积累了经验。共和国建立以后以解放区教育经验为主，大量吸收旧式正规教育和苏联正规教育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教育的正规化这一巨大转变。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熟悉的東西（战争、阶级斗争）快要闲起来了，我们要学会新的、我们原来所不熟

悉的工作，这就是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毛泽东熟知陆贾说刘邦的典故：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党的中心工作即将发生巨大转折的前夕，毛泽东还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他后来变了。毛泽东晚年多次追怀几十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能忘情于那种条件下才可能产生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一块大洋过生活的艰苦奋斗精神。珍惜这一份革命遗产是对的，但是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的历史时代，必须善于学习新的东西。

经验传统是好东西，但如果陷于盲目性，就成为经验主义了。经验主义强调实际，但它恪守的是过去的实际，而恰恰脱离了现在的实际。老经验与新实际是有距离的，它曾经是结合实际，但是它脱离了发展着的现在的实际。

## 第二节 从狭隘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蒙昧主义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人民对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产生了强烈共鸣。小说细腻地刻画了一个关于精神饥饿的故事。德国法西斯为了摧毁一个囚犯的精神堤防，施行了一种特殊的刑罚：囚之斗室，不打不骂，隔绝一切文化和交往，不许见到和书写任何文字。这种精神饥饿法使囚犯几乎发疯。为了维护精神免遭崩溃，他在被提审时，冒着生命危险偷了德国军官大衣袋里的一本书。不幸的是这是一本味同嚼蜡的棋谱。他只能靠天天阅读这本棋谱来战胜孤独，填补精神饥肠，避免心理崩溃。这种专一、单调的自我对弈，使他患了象棋疯狂症。即使康复多年后，一触象棋仍然发作。

许多知识分子“文革”10年中都尝过知识饥饿的滋味。从

轻视知识、贬斥知识到“知识反动”、“知识有毒”，从狭隘经验主义到蒙昧主义，这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

### 一、近世学风一变

中国儒学自宋明以来，已失先儒实践精神。明末清初的几位思想家揭起“经世致用”的大旗，痛砭宋、明两朝亡于读经空谈。

其中以颜元（1635～1704）批判脱离实际的书本教育最为有力和激烈，对维新和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影响最大。他切责读书害人，使人成为“废人”，“若不作秀才，只废八股业耳，未为废人”，“读书者自受其祸”，而又“使生民被读书者之祸”。<sup>①</sup>“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率柔脆如妇人女子”。<sup>②</sup>他谴责朱熹教人读书，“千余年来，率天下人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为之也”。<sup>③</sup>他深叹读书人无用，“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sup>④</sup>“古今旋乾转坤，开物成务，由皇帝五霸以至秦汉唐宋明，皆非书生也”。<sup>⑤</sup>

他一反传统偏见鄙薄的“俗务贱事”，他举原始社会末期脑、体未分工时的圣贤为例，将实事实用技艺抬到至高的位置。“禹终身司空（工程），弃终身教稼，皋终身专刑，契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如仲之专治赋，冉之专足民，公西之专礼乐，而已各成其贤矣”，“圣人是肯做功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功

①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② 颜元：《习斋记余》卷一。

③ 颜元：《朱子语类评》。

④ 颜元：《四存编》“存学编”卷二。

⑤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夫的圣人”<sup>①</sup>，“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sup>②</sup>。他自己也身体力行，“耕耘收获，辨土酿粪，以及区田水利，皆有谟画”。<sup>③</sup>

他崇尚“习行”（实践），说“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sup>④</sup>，“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sup>⑤</sup>读书不能“困于纸笔”，须“浮文是戒，实行是崇”。<sup>⑥</sup>他举学医为例，责时尚重书轻行：“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sup>⑦</sup>他还为读书与实践划定比例：“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甚幸”，“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读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sup>⑧</sup>

他推崇劳动具有修养思想道德的价值。“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sup>⑨</sup>，“人心动物也，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sup>⑩</sup>，“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sup>⑪</sup>他主张“上白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劳”，“平生非力不食”，“不当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饭”，耻于“苟安白吃”。<sup>⑫</sup>

①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② 《颜先生年谱》卷上。

③ 同上。

④ 颜元：《四存编》“存学编”卷二。

⑤ 颜元：《习斋记余》卷四。

⑥ 颜元：《四存编》“存学编”卷二。

⑦ 颜元：《四存编》“存学编”卷一。

⑧ 同上。

⑨ 颜元：《颜先生年谱》卷下。

⑩ 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⑪ 同上。

⑫ 颜元：《四存编》“存人编”卷一。

颜元是第一个向两千年死读书传统挑战的人，其弟子王源称他“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sup>①</sup>梁启超称其为“思想解放的炸弹”。他开了作“实事”、践“实行”的新风，直接影响了五四以来的近世学风。但颜元贬斥书本学习和书本知识有些过头，推崇实践活动和经验知识也陷于某种片面性，后来这种狭隘经验主义因素大大发展起来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近代中国，理论思维的发展大大落后了。

五四前后，对旧式读书脱离实际的弊病猛烈批判。工学主义者说“做过‘工’的学问，实验过、应用过的学问，方是透达、纯熟、实在的真学问，能实用的活学问”<sup>②</sup>，“做学离了作工，就只知道做不出汗不费劲的纸片功夫，无论如何不会确实的，偶然得点理解，也只有供文章的消遣，很空洞、很浮泛的”。<sup>③</sup>

黄炎培最早于1913年10月在《教育杂志》第5卷10号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击中清末民初教育仍不脱死读书的弊病，应者如云。“于民国二三年间，蔚为一种思潮，流行全国”<sup>④</sup>，“实用主义的提出不能不谓我国教育上的大革命”，“自黄、庄（俞）二氏大声一提倡，全国教育观念为之一大变”。<sup>⑤</sup>黄炎培在文章中介绍西方裴斯泰洛奇等人的观点，提出“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的生活渐相接近”，“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1917年又始

① 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八。

② 《工学》第1卷3号。

③ 《工学》第1卷2号。

④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⑤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

创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组织，总结清末办实业学堂失败的教训：“非教以农工商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sup>①</sup>指出“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论生活的”，<sup>②</sup>“单靠读书，欲求得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是万万学不成的”，<sup>③</sup>“不务应用而专读书，无有是处”，“求学与习事，初非两概，以实地功夫求学，以科学方法习事”<sup>④</sup>。

陶行知批判传统教育、提倡实践实用最力。他批评旧教育“把农夫子弟变成了书呆子”，“教人看不起务农”，不会劳动只想往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田，穿衣不种棉”<sup>⑤</sup>，“不能动手试验制造，不能创造发明”，“书本的科学是洋版的八股”<sup>⑥</sup>，“先生教书死，死教书，教死书，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教出“书呆子”、“蛙书虫”、“废人”、“字纸篓”<sup>⑦</sup>。

他推崇实践实干，提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sup>⑧</sup>做“便是在劳力上劳心。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sup>⑨</sup>“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sup>⑩</sup>

① 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载《教育杂志》第9卷7号。

② 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载《教育与职业》第71期。

③ 黄炎培：《宁远心影》，载《蜀南3种》。

④ 黄炎培：《职业教育之礁》，载《教育与职业》第41期。

⑤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载《陶行知文选》，第58页。

⑥ 《陶行知全集》，第93页。

⑦ 《生活即教育》，载《陶行知文选》，第116页。

⑧ 《教做学合一》，载《陶行知文选》。

⑨ 《陶行知文选》，第95页。

⑩ 《陶行知文选》，第77页。

“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反对以书本为中心，而是“以做为中心”、“以实际生活为中心”。<sup>①</sup>他办的晓庄师范，选址在乡村。招考科目的第一科是劳动课，考试也别开生面：操作农工、土工或木工一日。培养目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置田 200 亩，山林 10 里，由学生劳作。全校一名校工，一切校务劳动由学生承担。礼堂命名犁宫，餐厅命名食力厅，图书馆命名书呆子莫来馆。陶自称挑粪校长。建立学生与农民“会朋友”制度，要学生“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不会种菜，不算学生”，“不会烧饭，不得毕业”。重视“做”的教学是对的，但是文化知识的教学是“做”取代不了的。

他推崇实践活动、经验知识。他颠倒王阳明之言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说“真知是安根在经验里的”，“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体部分”，“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便是伪知识”，“倘若对于某种知识，自己的经验上无根可找，那么无论如何勉强，也是接不活的”<sup>②</sup>，“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sup>③</sup>他提出 70 种生活能力培养，70 种“教学做合一”教科书系统，以实际生活问题为中心编教材。重视实践知识、直接经验知识是对的，但是他轻视理论知识、轻视书本学理的指导作用，轻视教师的主导性，就把教学过程退到自发的认识过程了。

他提出“生活教育”以反对传统学校教育。“生活教育”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而来；而且颠倒杜威的话为“生活即教

① 《陶行知文选》，第 113 页。

② 《陶行知文选》，第 86-88 页。

③ 《陶行知文选》，第 250 页。

育”、“社会即学校”。他解释说“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作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作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作我们的学生”，在社会生活中“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sup>①</sup>以社会生活为学校，以社会生活为师，以社会生活为教科书，本没什么错，但是以社会生活取代教育，就步入取消学校、取消教师、取消教科书的“教育消亡”论。

后来陈鹤琴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影响下，提出“活教育”理论。说书本知识是间接的，死的，“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打破学科课堂教学，采用“活动中心”教学。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对传统教育死读书的激烈批判、提倡实践实干、推崇经验知识和实用知识，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存在一些片面性，蕴含轻视学校教育、轻视教师作用、轻视理论、轻视书本知识的经验主义倾向。陶行知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当时并没有成为教育界的主流。不料几十年后，这种负面的倾向竟会发展为一股大潮。

## 二、狭隘经验主义的抬头与盛行

狭隘经验主义的特征是以实践贬理论、以经验知识贬斥书本知识。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批判了脱离中国实际、战争实际和农村实际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

<sup>①</sup> 《什么是生活教育》，载《陶行知文选》。



洋八股，强调实践经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用一致，这是他成功的地方。他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还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命题。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经验主义的倾向也存在，而在批判教条主义之后，经验主义却又渐渐发展起来了。

建国后，毛泽东经常批判教条主义，而且把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认为搞理论的人容易滑向修正主义。而对警惕经验主义，只在1959年提过一次，却并没有认真给予清理。

实际上，1958年“大跃进”中对所谓“教条主义迷信”的猛烈批判，致使以贬斥理论、贬斥书本知识、贬斥专家、不尊重科学、盲动蛮干而片面强调实践活动和经验知识为特征的狭隘经验主义流行开来。甚至提出不要怕马克思，不要迷信经典著作，不要怕专家教授，不要迷信科学。还在高校发动了“剥夺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的“拔白旗”运动，方法就是用狭隘经验主义来反专家教授的“洋教条”、“本本上的假学问”、“脱离实际的无用知识”，得出“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最有知识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的结论。后来这种“书本理论知识不算知识，实践经验（主要指会做工、会种田、会打仗）才是真正的知识”的狭隘经验主义观点盛行多年，历久不衰，对科学文化教育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狭隘经验主义恶性发展，达到了反逻辑反常识的荒诞程度。其在学校教育上的主要表现是：

(1) 把“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的基本规律，视作是“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主张用“开门实践”来取代“学校以教学为主”，即让学生大量地、直接地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开门”的结果，是几乎取消了学校；“实践”的结果，是几乎取消了教学。

(2) 把“教学以课堂组织形式为主，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基本原则，视作是“脱离社会”、“脱离

实际”的“三中心”。主张以“社会大课堂”取代小课堂、以“在实践中学本领”取代学习书本知识、以“学生自己管自己”取代向教师学习。

现代课堂教学出现于近代科技进步、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欧洲学校，代替了以往手工业师徒传授式的个别教学，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理论上确立了课堂教学的地位。它以班级为组织单位，班级以年龄和文化程度为编组，由固定的教师施行集体教学，有统一教学时间，有严格教学制度，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是科学的高效率的教学组织形式。课堂组织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它可以为各个阶级服务。打破和取消“小课堂”，只能导致向原始教育倒退。

教学要不要以书本知识为主呢？狭隘经验主义认为书本知识是“脱离实际的无用货”，只有亲身实践得来的经验才是真知。这就否定了书本知识也即间接知识的巨大作用。这是一种唯我主义的经验论：除我的直接经验之外，前人的和别人的经验、一切间接的、书本的知识都是不确的、不可信的。实际上，“人不可能事事直接经验”，“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都要经自己亲身验证是不可能的。人一生中，只能直接接触极有限的时空间的极有限的事物。所以任何个人都必须从世代积累而成的人类知识宝库中吸取间接知识。现代人所具有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间接知识，直接经验所占比例很少。而文化学习是获取这种间接知识的惟一的最便捷的途径。反对文化学习，势必向只具有经验知识的原始人倒退。

教师在传授书本知识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这是由“教”与“学”这一对矛盾中，“教”居于支配地位决定的。教师有知识，学生无知识，套用列宁的说法：知识不能自发在头脑中产生，要靠“灌输”。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意志强加于学生”，即指灌输知识。“启发式”、“填鸭式”是指“灌输”技巧的优劣

高下，不改变“灌输”的实质。启发式只是一种教学技巧，“文革”中盲目夸大启发式的作用，反对教师“灌”，难道学生能在头脑中自发产生知识？学生的主动性，是接受“灌输”的主动性。内因，也只是“灌输”成功率的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教是决定性的。被隔离人类社会的“猪娃”、“狼孩”失人教而就教于动物，无从发展人本有的学习能力，更遑论学习主动性、内因等等。

主张学生摆脱教师，也是出于狭隘经验主义的偏见。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其依据即以实践经验为“真知识”，而以书本知识为“假知识”。按此逻辑，教师当然是“最无知识的”了，学生当然也就应摆脱教师去亲践亲历、自己获取经验了。

(3) 把“先学基础理论，后学专业理论，再学专业”的学习基本规律，视作是“从理论到理论”，“完全脱离实践”的“老三段”。主张机械地按照“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原则”：先亲身实践，取得经验知识，再上升为理论。又荒谬地提出教学中的“两条认识论路线斗争”：一条是实践——理论——实践，一条是理论——理论——理论。

第一，要求教学过程去重复人类认识过程是愚蠢的主张。教育的功能就是缩短认识过程。马克思说：“再生产（指学习）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指创造）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个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sup>①</sup> 机械力学从亚里斯多德到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历两千多年才创造出来，而学校中只用几十个小时教学就使学生完全掌握。没有必要让学生去重复实践中的漫长摸索。有人

<sup>①</sup> 《剩余价值论·附录》，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7页。

归纳狭隘经验主义者的公式不是“实践——理论——实践”，而是“实践——实践——实践”，似乎没有冤枉他们。

第二，狭隘经验主义特别强调每个个体的实践体验和切身经验，而否定“类”的间接知识的普通意义。这正如恩格斯批判18世纪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时指出的：“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起源于感性的经验”，同时却提出“凡是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即不存在于理智中”的经验主义命题。恩格斯对此批评说：现代自然科学证明了“获得性的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亲自去检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如果在我们中间，例如数学公理对每个8岁的小孩都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都无须用经验来证明，那么这只是‘积累起来的遗传’的结果”。<sup>①</sup>

第三，发现真理的过程是研究的过程，传授真理的过程是叙述的过程，叙述的过程与研究的过程不同。老师在叙述科学理论及学生在学习这种理论时，经常会采用从理论到实践的顺序和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学习方式。狭隘经验主义却机械地按“实践——理论”公式，指责教师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孰先孰后的关系，斥为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其实，只要所讲是反映了客观实际的科学真理，这正是来源于实践的东西，怎么就“反对了唯物主义认识论”？有人指责《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回答说：“叙述的方法，必须在形式上同研究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式才能

<sup>①</sup> 《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4页。

够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处理一个先验的结构了。”<sup>①</sup>教师上课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叙述的方式”，但狭隘经验主义者只允许一种教学方式：在干中学，干就是学，以干代学。

第四，要求每一门学科的每一条知识或原理都同实践相结合是办不到的，也没有必要。讲历史到不了罗伯斯庇尔时代，讲地理没有必要去好望角和南极洲，把微积分搬到工厂车间“结合实际”讲课，纯属多余。同时，一些实践活动也可以在试验室进行，“试管里种黄瓜”是可以的。从这一点上说，“从书本到书本”，“理论——理论——理论”并不算罪过。

总之，“实践经验”被强调到至高无上地位，《人民日报》1973年9月22日刊登一篇批判大学招生搞文化考查的文章说：考查只能用于“了解被推荐对象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是入大学学习的必要基础”。“在农村种田、养猪、兴修水利等等……实际知识”不仅是学习有关专业的“极其重要条件”，也是“学习其他专业”的条件。局部经验，尤其是农业劳动经验，竟作为一般的、普遍意义的东西到处搬用，结果从狭隘的实际出发，倒恰恰脱离了现实的、广阔的实际。

### 三、滑向实用主义与蒙昧主义

实用主义以实用知识贬斥文化理论知识（纯粹知识）。实用主义最先起于学习马列毛原著的学习运动中，后祸及学校教育。

1966年12月16日林彪发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系统地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学风。这个“30字方针”，是张春桥等人对以前“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中的实用化、庸俗化做法总结归纳而成的。“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版。

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学理论体系，只学3~5篇文章加上一些语录，“少而精”，“走捷径”，突出一个“用”字。一时间，实用主义奇谈怪论弥漫神州大地。诸如“学理论多的，专搞理论的必然变修正主义”，“学马列多的，反马列越厉害”，“读多了书无用，只学一篇《为人民服务》就够了”，“文化越高的，越学不好，文化低的反而学得好，不会去抠空理论，马上就用”。“为问题而学，为用而学，马上见效”，“学了不见效，学了不见行动，等于白学”。

“教育革命”之初，实用主义学风正盛，语、史、地、数、理、化、生、外等必修的基础课被目为无用，一度取消，分别改为毛主席著作学习课、革命文艺课、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

大学基础理论课阐述自然界最基本规律，训练学生科学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有通用性。“文革”前清华大学喻之为“授学生以猎枪”。实用主义却废了“猎枪”，只要“干粮”，让学生“结合典型产品”学习，按已有的规范、手册进行专一产品的类比设计。这样“出成果”快，但一离开“典型产品”就什么也不懂了。

为拒绝学“无用的”文化知识，迟群打比方说：“就像是刚生下一个小孩，就发给他一个老花镜，即使将来有用，也是愚蠢的”。<sup>①</sup>以后这个比方频繁出现于各种报刊文章，并栽赃为“老工人说”。科学知识、理论知识、文化知识，就被实用主义作为“无用的老花镜”从课堂上扔出去了。

这种干啥学啥、用啥学啥的实用主义，批林整风中即有人非议。实用主义者心虚，1974年11月《教育革命通讯》发表《谁说开门办学是“实用主义”？》一文，即反映了这种心态。该

<sup>①</sup> 清华大学理论组：《一个修正主义的教育纲领》，载《人民教育》1978年第9期。

文说：“资产阶级攻击开门办学是‘实用主义’”，我们的“开门”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根本不一样。第一，杜威只是把社会生活搬一点来学校，而我们是完全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第二，杜威的“社会生活”是阶级调和，我们是搞阶级斗争。这真是不打自招：“我们”比杜威更实用主义。

1975年秋，《教育革命通讯》在整顿的形势下，于10月号发了开封师院写的一篇介绍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文章，含蓄地影射了“教育革命”中的实用主义。不久，梁效即化名柏青写《在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背后》反驳，说明害怕人家提杜威。

实用主义盛行的同时，蒙昧主义也以“革命”面目登场。蒙昧主义几乎反对一切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是文化专制主义帮凶，一同摧残精神生产力，把知识文化扫荡得一片荒芜，使8亿中国人处于精神饥饿之中。它颂扬愚昧无知，反对知识文化。不识字的“纯洁”，文化低的“觉悟高”，大老粗是“响当当的”。没读过书是一种光荣，读书有罪，“读书越多中毒越深”。没有知识反而“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有毒，是万恶之源，有了知识就不愿劳动，不想革命，思想肮脏了。体力劳动是解毒剂，知识分子所中毒素只有用劳动的汗水才能洗去。工农子弟进了学校，是进了“封资修”文化迷宫，他们只有不断搞“阶级斗争”、搞大批判、搞生产劳动，才能免于受“知识的毒害”。

它颂扬贫穷落后，害怕富裕进步。“卫星上天则红旗落地”，“生活好了就要变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贫困，不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富了变修，越穷越革命”。按这个逻辑：穷则革命，革命不是为了不受穷，革命为了革命本身，为了革命必须保持贫穷状态，欧美工人富裕便不革命。

蒙昧主义是一种流传深远的思潮，它专门揭示科学知识文明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主张向原始蒙昧状态倒退。每当社会出现大转折大进步之时，总会出现畏惧这种巨变的思潮。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出现，各种简单机械被发明出来，诸子百家文化学术思想高度繁荣，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大变革、大飞跃。蒙昧主义的思想代表庄子却数落知识文明进步的“罪过”：“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筴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罟罟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他赞美原始社会“山无蹊隧，泽无舟梁”，“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sup>①</sup>

当着西方文明打开中国大门，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转变的时候，曾经非常进步的梁启超、章太炎都表示了对科学文明的担心。章太炎反对生产力进步，说“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煤），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苦于地窟（矿井）之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获，鼓腹而游矣？”“知文明之愈进者，斯蹂践人道亦愈甚”。又说知识与道德成反比：“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自艺士下（指农、工、走贩、坐商及低级知识分子）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要之，知识愈进，权位益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sup>②</sup>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正是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蒙昧主义为思想盟友，以知识文化为“革命”对象，暴虐10年。这是数千年农业

① 《庄子》“胠篋”、“天地”、“马蹄”、“盗跖”。

② 章太炎：《四惑论》、《记印度西婆普王纪念会事》、《革命之道德》。



文明的最后回声与最后挽歌吧。

### 第三节 关于文化平均主义

#### 一、解决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回顾

##### 1. 革命时期的两种方案：改良与革命

中国古代教育是科举应试教育、读经教育，是少数人享有的教育。随着中国社会向近现代转变，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随着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迅疾发展，中国文盲众多，渐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1912年全国仅373所中学，学生52100人）。首先，在城市提出了普及教育问题。

随之，出现了两种解决方案。

（1）改良——普及平民教育的努力。五四前后，兴起平民教育思潮与运动。“平民教育”口号是各民主派的共同口号，是民主政治对教育的要求。胡适说得很明白：“杜威的新教育理论，千言万语，只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实指等级教育），归到平民教育的两大条件”。<sup>①</sup>李大钊说“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完全打破”。<sup>②</sup>陈独秀说要打破“关门主义”，让“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受教育。<sup>③</sup>北京大学邓中夏、许德珩、罗家伦、朱自清等人于1919年3月发起平民教育讲演团，以露天讲演方式义务施教，

① 胡适：《实验主义》，载《胡适文存》卷2。

② 《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427页。

③ 《新青年》第1卷2号。

活动了6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0月发起平民教育社，活动了5年。陶行知、晏阳初、朱其慧等于1923年发起平民教育促进会，活动了3年，办了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有50万人读过他们编的《平民千字课》。他们得到官方和民间资助，所以实绩较大。

平民教育运动中已孕有改良与革命两种倾向，后来终至分化两途。当时的共同观点是：有钱人受教，穷人失学，“则人民知识必大悬殊，社会上不平之现象必层见叠出，共和国体必根本动摇”，<sup>①</sup>因而要“开放这种‘独占的教育’，把神圣的教育普及到一般神圣的平民身上”。<sup>②</sup>可见，办平民教育是从民主一般原则和维护共和政体出发的。至如“不先有了平民教育，哪能行平民政治？哪能使用平民政治的工具？……所以我们要来细谈根本改造的教育，不愿去高论‘空中楼阁’的政治”，<sup>③</sup>则是明显的“教育救国”论，最后导向改良主义。

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支持下，筹一笔钱办起工读互助团，声称要实行“教育和职业合一”，“人人做工，人人读书”，不只解决穷人读书和读书人不生产，还可以“免去一场流血的革命”。这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改良团体，只几个月就失败了。胡适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它实行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集体生活，如果只求实地“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美国至少有几万人做这件事”，原是可以成功的。<sup>④</sup>这一时期还出现勤工俭学运动，以工养学，达到扩大教育的目的。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35页。

② 《发刊词》，载《平民教育》第12期（1919年10月10日）。

③ 同上。

④ 胡适：《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

吴玉章于辛亥革命前就提倡“俭学”。1912年蔡元培、李石曾发起留法俭学会，1915年6月2人又创勤工俭学会，在章程中说“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为宗旨”。中国本无工读机会，此运动起于法国伤于欧战，急需十几万华工这一经济前提。

晏阳初和梁漱溟同政府合作推行乡村教育。

陶行知主要接受民族资产阶级的资助，积极推进平民教育和农民教育。他创造了普及平民教育的几种形式：乡村工学团、小先生制、生活教育及“教学做合一”教学原则。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发源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国情，他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一种办“穷教育”的思想。他说“传统的学校要收学费，要有闲工夫去学，要有名人阔老介绍进去。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而“中国是个穷国，必得用穷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不用浪费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不需要的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sup>①</sup>

陶根据办“穷教育”思想所设计的“小先生制”方法，是一个既富想像力又比较求实的方法。他说“用传统方法，学龄儿童的教育要再过一百年才能普及，失学成人的教育要再过四百年才能普及”，因而发动一千万小学生和识字成人做“传递教师”的潜在资源，可解决师资之缺；用小学生的笔、墨、纸、时间抄书给校外生，以柳枝为笔，以地面为纸，以太阳为灯，可解决学习费用之缺。<sup>②</sup>这个设想只能局部和短暂实现，因为没有经济基础，教和学两方都缺乏动力。

一些“教育救国”论者和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进步教育家，所做的努力取得若干成效，他们的愿望是善良的，应予以历史

① 《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载《陶行知教育文选》，第153页。

② 《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载《陶行知教育文选》。

唯物主义的肯定，轻率否定，甚至斥为“帮助反动统治阶级麻痹工农大众”是不妥的。

(2) 革命——争取劳动者受教育权的斗争。①共产党人认为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下，不应首先抓普及工农教育，普及工农教育应在争取政权之后总解决。李大钊最先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提出：“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他说“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他于1922年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会杭州大会递交的提案说：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远胜于读书万卷和教育10年”。陈独秀说：“在现在的贪狠的资本家生产制度之下，工银如此之少，时间如此之多，有何神通，可以使一般工人得到平等的教育？”“饥寒救死不暇的人，还说什么知识不知识！”②肖楚女说：“平民教育是要紧的！但是起码的生活不更要紧么？”“现制度若不经一番彻底的翻砂功夫，平民教育么？——我恐怕还不是像汉口今天这样，只留下几张纸招牌。”③

1925年5月10日广州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人教育的决议案》说“在现存制度之下，即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人要想得到充分的知识，得到许多受教育的机会，是没有可能的，这些都只有工人夺取政权后，才能办到”。④

②“争取劳动者受教育权”口号，重点不是放在争受教育权，而在争政治权。马克思对此早有明确阐述。他批判哥达纲领提出的“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说：“前者

① 《答知耻》，载《新青年》第7卷6期（1920年5月）。

② 《陶（行知）朱（其慧）公底平民教育》，载《中国青年》第18期。

③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

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sup>①</sup>。意即资产阶级已经给予工人的权利，不应作为斗争口号再提，应该提资产阶级还做不到的要求，以之作为斗争目标，为夺取政权服务。正是认为工农受教育应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所以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办免费教育工人的技术学校或夜校（最先于1823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市出现，1824年在伦敦出现，到40年代已有200余处），持批判态度：“在这里讲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促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资产阶级收入的发明。”<sup>②</sup>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举行的一大通过《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提出普及义务教育。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对时局宣言》，提出“实行教育普及”，女子在“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利用召开“国会”“制宪”的机会展开合法斗争，拟定《劳动立法原则》，向军阀政府提出“政府每年支出巨额款项，专为资产阶级办教育，至无产阶级则毫未顾及”，“我等应求政府以法律保证男女劳动者有受补习教育之机会”。<sup>③</sup> 这些，都是向军阀政府以教育为题展开的政治斗争。

③革命中创办的工农教育，以宣传革命为主要目标，文化教育主要是为政治教育服务。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人教育的决议案》明确说：工人教育的两大旨趣一是“促进阶级觉悟”，二是“训练斗争能力”，这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教育的极重要原则”，“是我们教育的生命”，是我们

① 《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3页。

②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7页。

③ 《全国工会历史文献》，第13页。

“办教育的最终目的”。同时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也说：工会办教育的意义，在于“阶级斗争的”，是“利用许多公开名义，如办夜校、合作社等，去做职工运动的工作”<sup>①</sup>。

## 2. 革命胜利后普及工农教育的努力

早在革命取得局部胜利的苏维埃政权时代，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一次全国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第12条即说：“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应开始实施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大会报告中说：“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sup>②</sup>

新中国建立之初，于1949年12月召开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学校为工农开门，创办人民大学和工农速成中学，大办工人补习教育。教育部党组书记钱俊端于1950年5月6日在《人民教育》创刊号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提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方针。

创办人民大学突出体现“学校向工农开门”、“工农受教育优先权”，学生工农成分达70%。但举国一校，作用较有限。其余高校，1953年新生中工农成分上升为27.3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普通中学也采取措施扩大工农子女成分。中学生工农成分由1949年的15.7%上升为1954年的60%，小学上升为82%<sup>③</sup>。

在普通中学之外，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是向工农成人、主要是向工农干部普及中等教育。1950年开办，到1954年共办87

① 《全国工会历史文献》。

② 江西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

③ 《中国教育年鉴》总卷（1949-1981），第338页；苏渭昌：《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第54页。

所，有教师 3700 名。修业 3 年，供给制待遇，工龄照算，这不仅免费教育，而且包养，从此开创调干生学习办法。入学资格是 3 年工龄以上的工农干部（56.3%）和产业工人、军人（多是劳模、战斗英雄），年龄限在 18 岁至 35 岁。这也是实现“工农受教育优先权”的努力之一，先后共招生 64700 余名。但由于学习效果不佳，国家负担太重，1955 年秋决定停止招生。但其后一直采取了保送、调干、办工农预科等形式输送部分工农劳模入高校学习。由于年龄偏大、基础差，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如同济大学 1960 年招收 125 名工农，5 年中有 32 名跟不上学习而退学或留级，“文革”中竟说这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一个例证”。<sup>①</sup>

1950 年 9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把普及工农教育提上议事日程。随后以政府有限资助方式，开展全国工农识字扫盲运动。1952 年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有 700 多万人参加学习。以后经常发布扫盲决定，强调是“文化大革命”，是“重大政治任务”，实行以民教民、能者为师、各级领导订分期实行规划，定期检查（见 1956 年决定）。到 1954 年职工扫盲 130 万余人，农民扫盲 850 万余人。由于以运动方式搞扫盲，时紧时松，与预期目标仍有较大距离。1958 年搞“教育大跃进”，想以少花钱甚至不花钱、以群众运动办“穷教育”方式快速普及教育，违背教育规律，结果无成。“文革”前夕想以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形式普及教育，比较现实，但由于指导思想“左”了，加之“文革”冲击，亦成就有限。在普及工农教育的过程中，一个问题越来越暴露清楚，这就是发展教育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原以为工农受教育权只是一个阶级权利问题，只要夺取

① 《同济大学工农兵学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主力军作用》，载《文汇报》1974 年 3 月 28 日。

政治权，就可以夺回被地主资产阶级剥夺了的劳动者受教育权利。革命就是“根本的解决”，革命就把一切问题解决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工农受教育问题，并不单单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更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革命者碰到革命者过去所批判过的问题：“全民教育”与“有教无类”的困惑。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全民教育”，只存在“阶级学校”，“阶级学校”与“等级学校”相比有很大进步，“等级学校”只施教育于特权等级，平民不能进入贵族学校。而“阶级学校不排斥任何有钱读书的人”，但“即使是不收任何学费的中等学校，也仍然是阶级学校，因为学生在7~8年内的膳宿费要比学费多得多，而能够缴得起这笔费用的只有极少数人”。因而没有全民学校，只有“阶级学校”。<sup>①</sup>孔子的“有教无类”也被批判为虚伪，因为交得起“束脩”的只是有钱人，穷人交不起“束脩”，只好失学，因而只能是“有教有类”。革命者的批评是对的，资产阶级国家虽可以立法赋予劳动者受教育权，但是他们交不起学费，或虽可进免费学校却又养不活自己，就实现不了这种受教育权利，因而只能成为一种空话。现在革命者自己有权为教育立法，但要把全体劳动者平等受教育权利的立法变成现实，却也遇到读书交钱问题，遇到劳动者的经济能力和劳动者国家的经济能力问题。以前曾经采取过“劫富济贫”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大革命中湖南农民协会提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和闲杂公产办教育，这一财源不厚且不长久，却已出现县办国民学校与农会办的农民学校争经费的事。1932年6月永新第四次工农兵全体代表大会通过《文化教育问题的决议案》：

<sup>①</sup>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1~454页。



“苏维埃要保证劳动阶级免费教育的执行……书籍和纸墨笔等用具，酌量情形向富农、手工业主、店主要学校捐，与征收其子弟的学费，补助学校用费。”<sup>①</sup>

剥夺有产者的办法，只能解决“患不平”，而未能解决“患寡”问题，仍是一小块蛋糕，切法不同而已。剥夺的方法取财有限，远不能解决劳动者教育问题。建国初也只有力量办一所人民大学和 87 所工农速成中学，另资助少量调干生和工农学生不多的助学金，这仍然只惠及少数人，相对于几亿劳动者当然是不够的。

苏联的教育实践也表明，实现普及工农教育，取决于经济的发展。1934 年苏联才普及农村 4 年义务教育，城市 7 年义务教育。1939 年才提出普及农村 7 年、城市 10 年义务教育的计划，但到 1953 年也没完成。革命胜利、夺取政权 36 年仍未能解决普及中等教育，说明解决教育问题不同于解决政治问题，不能以阶级斗争方法和长官意志方法，只能以发展经济的方法去解决。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不断搞“劫富济贫”和平均主义。

### 3. 普及教育的两种方案：承认差别、发展经济与文化平均主义

发展经济是一个很长的、渐进的过程，因而在长时期内，难以实现全体人民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办教育只能承认差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三大差别和各种经济的、文化背景的差别而造成的不公正、不平等。建国初期正是采取了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如对城市的教育投资高于农村，如开始办重点学校，如保留入学考试制度，如虽提出了“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为工农服务”、“工农有受教育优先权”，但也只

<sup>①</sup> 王铁：《中国教育方针的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采取办人民大学、办工农速成中学、收调干生、向工农子女发放人民助学金等“改良”性的措施，没有立即去革除大、中学校中非工农子女比例高的历史遗留，没有重复革命年代几度犯过的“左”的失误（如土地革命时期，赣南苏区“禁止地、富、店东、厂主、手工业主的子女入初级中学”，对“从前那些教书的学究先生，因为他们的思想陈腐，不许他们再过教员生活”，结果引起“工农看轻读书，忽视教育”，怕“受了教育成为知识分子”；<sup>①</sup> 1947年东北部分地区一度停办学校，清除学校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教师）。<sup>②</sup>

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的构想。1964年8月1日，他再次重申实行两种教育制度的主张。他说这是从中国人多、贫穷的特点提出的办法，可以满足升学与就业两个方面的要求。他认为青年升学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经费有问题，调干生发75%工资是国家负担的极限了。现在只有一种全日制学校的教育制度，是不能解决普及教育问题的。到1964年，山东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49%，安徽更少一些，文化发达的江苏也才60%，以现在的教育制度，国家和家庭都负担不起普及教育的开支。接着他根据年轻时在保定育德中学半工半读一年的经验，提出逐渐实行第二种教育制度——国家和个人都花钱较少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让两种教育制度并行。后来“文革”中批判这是“资本主义的双轨制”，企图让全日制培养“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半工半读学校训练“为资本家卖力气干活的奴隶”，企图“扩大三大差别”。

实际上刘少奇只是承认差别，并制订了反映这一差别、符

①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中等学校的指示》，1948年2月。

合实际的教育政策而已。单一的教育结构不适应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口文化发展需求不平衡的现实，更不适应国家对各种高、中级知识人才和各层次工农业劳动力的多方面的不同需求。

教育究竟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立即去实现一种超越实际的抽象的“公正平等”呢？社会差别是不好的，但人为去消灭它却会造成更大的灾难，而发展经济才是消灭它的正确途径。

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的构想，在去除了当时必不可少的一些“左”的影响之后（如说以半工半读去消灭三大差别、培养“新人”、防止“复辟”等），已为新时期的教育所继承。新时期调整了“文革”以来的单一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起中等职业教育，将来还要实行初中、高中、大学三级分流，建立起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前苏联办社会主义教育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培养出大批红色专家。其中一条做法是承认差别，不是人为去缩小差别而是在政策上反映这种差别。他们较快地纠正了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教育革命”偏差（取消入学考试和入学资格限制、削弱文化教育、大搞劳动实践），在转入工业化建设时期适时地提出“技术决定一切”（1931年）和“（技术）干部决定一切”（1935年），强调正规化，同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了高薪高奖制。1934年颁布学位学衔命令，设正、副博士学位和正、副教授学衔。1935年实行高薪制，院士和名教授月薪达2万卢布，当时低薪只100卢布。1956年以后，扫地工30卢布，大学毕业月薪90卢布，研究生毕业120卢布，副博士240卢布，博士480卢布，院士2000~7000卢布。为提高教育质量，1937年教育部下令关闭学校工场。1944年教育部制订中学生金、银质奖章制度。这一系列措施，反映了当时苏联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的渴求。

另一种方案，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存在的差别，看成“阶级斗争的继续”，因而采取文化平均主义的政策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影响”。

## 二、文化平均主义的源流与实践

体力劳动者被置于文化教育圈外已有几千年长的时间，除了阶级压迫的因素之外，生产力尚未发达这一经济条件不可忽略。革命去除阶级压迫的因素之后，如前所述，经济条件仍制约工农教育的普及。不认识这一点，仍以“阶级斗争”看问题，迁罪于知识分子，文化平均主义遂抬头。平均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等贵贱”，经济上表现为“均贫富”，文化上表现为“平脑体”。

文化平均主义是看待脑体分工、脑体差别问题上的一种小生产者狭隘思想，有时表现为反文明倒退，有时表现为超阶段过渡的空想主义。

### 1. 认为脑体分工不是一种社会进步而是不公正

最典型表述了这种观点的是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彼·拉·拉甫罗夫的《历史信札》。他在第4封信《进步的代价》中说：“由于认识到文化和科学作为一种力量、一种享受的重大意义，自然就产生了垄断这种力量和享受的愿望。”“为了在几千年的过程中产生的几个伟大人物，为了极少数人的进步付出了几十亿人的生命代价……进行无穷无尽的劳动。”“为了使几个思想家能在自己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几个规模不大的培养教育家的学校，人类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这些教育家至今也未给人类带来多大好处。如果计算一下当代有教养的少数人的数目……估计一下世世代代的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发展而进行的劳动的价值……想到为了他们的发展花费了多少血汗和劳动的代价时，很可能会

大吃一惊。”“应该吃惊的还不是为少数人的进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是为它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而做出的事情却如此之少。如果少数人更早地、更加努力地注意在自己周围传播文化和思想领域中所获得的学识，则丧失的生命和劳动的数量未必会如此巨大。”“我们的祖先给了我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以享受这种进步的成果的可能性，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毫无必要地加重并延续了那些从未享受过进步好处的多数人的苦难和辛劳？”“他们靠别人而有闲暇，得到更好的饮食和受教育的条件，而别人则以越来越繁重的劳动，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或巨大苦难为代价，给他们提供闲暇、饮食和受教育的机会。”“要么是根本没有任何发展，要么是多数人先负起最幸运的少数人的重担，为他们劳动。”<sup>①</sup>

这些话没能揭示脑体分工所蕴含的阶级对立，只是以平均主义去反脑体分工所带来的不公正，而抹杀脑体分工带来的社会进步。否定脑体分工的进步作用，渲染取得这种历史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贬低知识分子的社会贡献，贬低精神生产的成果，是文化平均主义的出发点。“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是一不种田、二不做工的废物，白白让工人农民养活，生活却比贫下中农优裕，视同剥削阶级，因而处罚他们去干体力活，出现“搞原子弹的烧锅炉”、“考古专家放牛”的怪事。

## 2. 幻想立即消灭脑体分工和脑体差别

民粹主义者认为无需任何社会条件，无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以致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这么一种必备的历史条件，只凭对体力劳动者的正义的感情和公正的愿望，就可以建立起“理想的未来制度”。彼·阿·克鲁泡特金说：“教授在需要

<sup>①</sup> 彼·拉·拉甫罗夫：《历史信札（4）》，载《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他的村社里，在规定的七八个小时内，是否只应该从事讲课，或同时还应该在作坊里同钳工、技师一起制作物理仪器，在大学的楼里打扫垃圾等等呢？我们认为，是的，他应该干一些粗活。”“个别人不像现在这样专业化的这种分工，对社会要有利得多。”“承认享有特殊工种的阶级是不需要的，换言之：承认社会全体成员有从事最好的体力劳动的义务。”“我们否认社会最有益的进步运动是通过那些受教育比社会其他人多得多的少数人的发展来完成的，我们绝不希望用社会的经费来培养这少数人；因此我们既不需要大学，也不需要学院，因为大学和学院都是用社会经费来维持的，除非社会每一个成员无例外地都能进入大学或学院。”“我们不需要大学，大学造就医生，而这个行业的大多数劳动者都注定只能执行守门人、助理护士或医士的职务；大学培养律师，而大多数人只能充当录事；大学培养教授，而有人却当守门人；大学造就阁员、学者、技师，而多数人却充当干粗活的工人。”“我们不需要这些特权机构，我们不需要为少数人建立的大学、技术学校和海军学院；我们需要医院、工厂、化学企业、船只生产作坊和工人学校。”“承认必须关闭一切大学、学院和其他高校等学校，用社会资金普遍开设学校—工场。”<sup>①</sup>

这一大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如果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上大学，就必须关闭一切大学；如果还有人在干粗活，教授也应该同时干粗活。克鲁泡特金只能坐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的理想，100年后在中国成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这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使我们获得难遇的历史体验：读书使我们多么向往陶渊明、莫尔、康帕内拉描绘的理想国、大同世，但一旦实施

<sup>①</sup> 彼·阿·克鲁泡特金：《我们是否应该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载《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起来，或许就是一场灾难。

### 3. 消灭差别、造就“全面发展新人”、超阶段过渡的实验

1958年“大跃进”中，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成熟了，立即动手消灭三大差别，把消灭脑体差别列为首先的目标。当时编印了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广为散发，收录了经典著作中对未来社会的若干猜想，作为当前“过渡”的直接目标。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7月创刊的《红旗》上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当时“教育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文章宣称《共产党宣言》所提实现共产主义的10条办法中的8条，在我国已经实现了。第9条“工农结合，消灭城乡对立”和第10条“教育与物质生产结合”，正在实现。“大跃进”受挫后，消灭三大差别的宣传一直没有停止。开展“反修”斗争后，消灭脑体差别又成为最突出话题。1965年8月号《人民教育》短评说：“三个差别中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消灭这种差别不能等将来再进行，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进行。”短评提出的方法是学生上山下乡。12月号社论说半工半农也是一种消灭脑体差别的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定要使新培养的年轻一代，一开始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劳动者。”

脑体差别是脑体分工的产物，社会生产力还远没有发达到脑体分工自然消失的程度，怎么能就消灭脑体差别呢？

文化平均主义者说：能。消灭差别的途径不是发展生产力，是现在就造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这就出问题了：一是以现在分工鲜明的社会能不能造就分工消失后的未来社会的“新人”？二是以“未来的新人”去造就未来的社会，还是未来的社会造就未来的新人？这是一个关系到“人是社会的产物，还是社会是人的产物”的命题。文化平均主义遂陷入唯意志论：既然马克思说社会分工造就片面人，我们就打破社会分工造就

全面人，谁要维护和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不可免的脑体分工，谁就是妄图永远保存和扩大三大差别、坚持搞“劳心者治人”，让“劳心者”永远骑在工农头上。

究竟什么是“全面发展的新人”？他既不是旧时代“能文能武”的全才和“通才教育”培养出来的“通人”，也不是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现时代优秀学生。那么是不是“有文化、能劳动”的“脑体结合的新型劳动者”？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论文在论：脑体结合 = 人的全面发展。

问题在“脑体结合”的含义已经搞得混乱（“结合”一词，尚无确切含义，如“相结合”、“三结合”等等），各人各说一套。最庸俗的理解：既用脑力又用体力。农民种田用脑，画家作画用手，因此他们都是“脑体结合”的劳动者。另一种说法是脑力劳动专指精神生产，体力劳动专指物质生产。那么，专家研究生产流程、企业家管理生产、高科技工人操电脑生产，算哪一种劳动？还有一种说法是，艰苦的简单的原始的劳动才是体力劳动，用手术刀、刺绣针不是体力劳动。

后两种理解是通行的，以这种理解为基础的“脑体结合”就是：知识分子去种田做工，工人农民搞哲学写诗。这种水平的“脑体结合” = “全面发展的新人”吗？我国知识分子经 20 多年历练，许多人已学会种田种菜、养猪放牛、打柴网鱼、木工石工、油漆缝纫，可是他们还是“旧人”。工人农民学会搞上层建筑工作的也不少，这些人也未成为“新人”。至于“大跃进”中提的口号“人人成为多面手”，“六亿人民六亿诗人六亿哲学家”，由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未能成功，也就未能实现。

1400 多年前的颜之推、300 年前的颜元，都是能务农能著书的人。那些年宣传的“脑体结合”，也就是这种水平的结合。为什么不能将“脑体结合”提高到马克思所说的水平？首先看看马克思“全面发展”的真正含义吧。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说：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将需要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这是“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一项活动的人们”，没有“个人局限在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全面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哲学的贫困》一书说：“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通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

以上所引，说明：①“全面发展”指所有才能的全面发展，并不单指一种脑力劳动能力+一种体力劳动能力。②“全面发展”只有在分工消失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在分工还是十分必要的现在，要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不能不陷于空想。通过“有文化、能劳动”的低水平的“脑体结合”途径，去建立一个消灭脑体分工和脑体差别的“未来社会”，则更是幻想。

克鲁泡特金曾提出一个建立神奇的“工人学校”的方案，说这种“工人学校一旦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便将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超过现有的大学和学院的水平。学校将消除一切无益知识的无用负担、发明出快速的教学法（据作者说，只要迫切需要，就会产生出来），培养出健康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既能从事进一步智力劳动，也能从事进一步体力劳动”。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健康”新人，同我们所理解的“脑体结合”是有相似处的。这种程度的“脑体结合”，不消灭脑体分工就能做到，不过是暂时打破分工，脑体互相客串一下，看起来脑体统一在一人之身，实际上仍是分离的。只有到了马克思所说的脑体分

工消失不了的社会，任何一个人都能参加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和任何一种艺术劳动，没有单纯的工人和单纯的画家，那时才是真正的“脑体结合”，也即脑力劳动取代了体力劳动，全社会的劳动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者（发达国家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数量已超过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数量，占80%。最终趋势是全部取代）。

#### 4. 用拉平的方法消灭脑体差别

如果说造“新人”的方法是一种超阶段过渡的幻想，那么用降低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及知识水平的方法来拉平脑体差别，则是一种倒退。

知识分子要接近工农、了解工农、学习工农，克服自身的缺陷和弱点，这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要向大众传播文明则不甚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不确，知识分子难道是不劳动的？要知识分子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有益，但将知识分子“体力劳动化”作为消灭脑体差别的手段就是倒退了。斯大林曾经批判过这种倒退的办法：“有些人以为可以在脑力劳动者、工程师和技师的文化技术水平降低到中等熟练工人水平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的方法来做到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才这样来想象共产主义。其实，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sup>①</sup> 斯大林重视经济建设，看到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所以他认为消灭脑体差别正确方法是提高体力劳动者文化，重点在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

“文革”中竟把脑力劳动者视为敌对力量，把脑体差别视为阶级对立，因而采取阶级斗争手段来解决脑体差别。对脑体差

<sup>①</sup>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6页。

别的存在，采取推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革命行动”，采取“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建立全面专政”的“革命措施”。结果不是消灭脑体差别，而是制造脑体不平等：脑力劳动者低于体力劳动者，沦为“臭老九”，成为“治于人”的半专政对象了。

许多知识分子被剥夺从事精神生产、文化工作的权利，撤换到农村、下校从事体力劳动，荒废所学，另一方面将体力劳动者派往上层建筑各文化部门从事他们所不熟悉的工作。在学校是一面大批下放教师，一面大批工农兵脱产“登上讲台”。这种脑体岗位互换，称为“再教育”与“掺砂”。结果带来对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双重破坏，带来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浪费与摧残，带来社会的倒退而不是进步。

#### 5. 大学不培养知识分子

培养目标是整个教育方针的核心，是办学的出发点。1957年教育方针主要针对普通中学教育提出培养“两有”劳动者，并未绝对化，大学还是被认为培养专门人才的，各大学“文革”前都放言自己的培养目标（“红色工程师”、“红色农艺师”、“灵魂工程师”等，“劳动者”含义各家各时期有不同理解，容另述）。“文革”中认为知识分子是“精神贵族”。中苏论战时就常有此提法了，1965年12月《人民教育》社论说“培养凌驾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扩大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造成了一个跟工农对立的社会阶层，成为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之一”。各大学不敢再提培养专门人才，只含糊提培养的人“要回到工农中去，回到生产劳动中去”。因为“七·二一指示”只明确了招生对象是“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而未明确培养目标，也只是含糊说“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培养目标不明确，引起办学方针的混乱。后来朝阳农学院提出“培养新农民”，“培养与工农兵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这实际上是

“教育革命”中的大学教育方针。朝阳农学院党委在1976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上了大学就不应该再当工人农民，这不就是说应当永远保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应当永远由少数特权者垄断文化科学吗？”以大学来培养普通劳动者，应是“人人上大学”的共产主义时代。现阶段的中国不仅无能力普及大学教育，连初中也难普及，办少量的大学究竟为了培养什么人呢？

如果为经济建设需求办学，那么目标很明确：中国急需与普通劳动者有所差别的专门人才，又由于生产力尚不发达，尚不需求具大专水平的普通劳动者。但是，文化平均主义要求为一种空想的社会平等办学。既然大学培养知识分子是“继续保存和制造三大差别”，所以文化平均主义的教育方针就取消大学培养知识分子的任务，只让大学培养与未上大学“划等号”的人。这样，经若干年倒也真能消灭了脑体差别。然而，通过取消高等教育和消灭知识分子的办法，所达到的无脑体差别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只能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半文盲的倒退的社会。

#### 6. 取消考试竞争，文化学习吃大锅饭

学校教育制度采取以考试为中心的激励机制，鼓励学习竞争，奖勤惩懒。这是各时代各阶级都共同遵循的客观教育规律。文化平均主义却将诸考中的大考、各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高考制度首先废除了，拦腰切断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在学习上的联系，同时打击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推荐制意在排除知识分子家庭在文化上的优势，实现工农在入学机会上的平等。但由于高等教育未普及，这个馅饼并非人人可享。由此，刚废除了考试的竞争，又展开了后门的竞争、人情的竞争、权势的竞争。推荐制所幻想的公正平等并没有实现，而仅仅在文化资格这一点上实现了平均主义目标——它不承认所有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差别，也不承认所有学习勤奋与懒惰、学业优秀与

低下的差别，所有初具文墨者在入学资格上，都是平等的。

大中小学校都取消或削弱了平日的文化考试，“学不学，都一样，考不考，都升级”。批判“个人奋斗”、“分数挂帅”、“爬宝塔竞赛”，学习不能冒尖。学习成绩的分化，会演变为日后的“阶级分化”。尖子会成为“修正主义苗子”、成为“精神贵族”的后备军。

这样，文化上的“贫富”就彻底拉平了。这是小生产“均贫富”思想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恶性发展。

文化专制主义利用文化平均主义，貌似帮助工农“文化翻身”，在“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阶级对立状态消失之后，仍利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的脑体差别，大搞文化上的“劫富济贫”，“剥夺知识资本家”，“夺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世袭领地”，实则是制造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两支劳动大军之间的分裂，硬将平等的两种劳动、平等的两种劳动者弄成不平等：“大老粗”改造“臭老九”。结果，这种人为的“阶级斗争”酿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幸，不仅降低了知识分子的文化，也降低了工农大众的文化。

## 第四节 关于“教育为政治服务”

### 一、“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经验教训

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转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后，对教育的要求也就相应地发生变化。如1950年提出“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又如新时期提出“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这些，与“教育为政治服务”并不矛盾。因为确立经济建设为党

的中心工作时，它也就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了。

但是，多年来一直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这样，“教育为政治服务”就一直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这就发生问题了。另外，还发生简单化、狭隘化的问题。如建国之初，囿于战争年代的经验，简单化地让教育服务于一时一地的政治任务，学校政治运动不断。学生大都下乡土改半年，“三反五反”运动也停课进行。同时，党、政、工、团多头向学校布置政治活动，随便停课，拉出师生配合中心工作。某市一所小学4个月演革命戏30多个，计50来场。某省一所学校全年演戏139次，作文工团使用。由于没有明确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人材，造成学校忙乱。为纠正教育上的混乱，1952年5月2日中央发出指示：不得抽调学生参加工作和停课搞中心工作。1953年3月5日《人民教育》发表社论《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批评师生社会活动过多。同年政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1954年又发出《关于改进和发展中等教育的指示》，总结了建国初教育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教学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校长与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为了纠正教师、学生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和校内非教学活动的偏向，克服当前学校中的混乱现象”，规定“学校的工作和学习，应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布置，其他单位和团体，不得直接向学校布置工作”。“除政府规定的假日外，学校不得任意停课、放假，教师不得随意旷课”。<sup>①</sup>这就初步纠正了简单化的错误。

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在1958年再次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

<sup>①</sup> 转引自《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兼论教学为主》，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81~83页。

之后。当然，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都是要求教育从属于党的政治路线、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的。这在当时并没有错，为何1958年以后却发生了偏差？这个偏差在于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党对于“政治”即党的中心任务的認識出现了转移。本来1956年党的八大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可是反右斗争之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渐渐偏离了八大的认识，最后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这样，本来并不算错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方针，实际成了要求教育为“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服务，所以1958年教育方针在20年的教育实践中所起作用应是否定性多于肯定性。

可见，在“教育为政治服务”问题上是有经验教训的：①前提是政治路线本身必须是正确的；②服务方式上必须尊重教育自身规律，不能随意抹杀教育的特点。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教育工作沿袭战争年代的非常做法，随意停课配合中心工作，师生直接参加社会上的政治运动，“文革”中更发展到“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一切”，排斥文化课和智育，把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对立起来，在师生中间开展所谓“阶级斗争”，搞乱了学校、破坏了教育。邓小平总结几十年“教育为政治服务”实践中的经验教训，1978年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论断：学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学生，就算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这就最终澄清了是非，从而否定了二十多年来“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种种不妥做法。

## 二、关于“智育第一”

由于认为“智育第一”是一条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方针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所以“文革”前和“文革”中批判最多的就是“智育第一”了，以致学校工作一抓文化课，就有“智育第一”之嫌，就是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方针。

那么，到底什么是“智育第一”？“智育第一”是不是所谓“教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

“文革”前夕开始“反修”，不点名批判苏联教育家、教育部长凯洛夫的《教育学》，并把他的教育观点概括为“智育第一”。凯洛夫在书中说：“马克思认为在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中，智育即教养，应占第一位。”<sup>①</sup>此话是有所本的。马克思1866年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就争取工人子女受教育权问题说：“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情：第一、智育。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操练所传授的东西。第三，技术教育。”<sup>②</sup>马克思这里未将智育同德育比较，但重视智育是显而易见的。凯洛夫则更为强调智育，但他断定马克思认为“智育应占第一位”，似并不很准确。这是“智育第一”的出处。凯洛夫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再版他的《教育学》，接受了乌申斯基的观点“学习是劳动”，提出“学习是学生所进行的系统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把学习的位置抬高，这与重视智育是一致的。历史上进步的教育家都强调“开民智”以抵御专制君主的愚民政策。如夸美纽斯提倡办“泛智学校”，提出“人人均须学习一切”，“把一切知识领域中的精粹的总和灌输给他们的头脑”。

“智育第一”反映了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如果因此而忽视了德育和政治思想教育，也不过是认识上的问题，属片面性错误，何以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呢？诚然，各统治阶级都是执行“政治第一、智育第二”方针的，但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或思想代表在某一时期、某一情况下处理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

① 凯洛夫：《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第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页。



德育与智育的关系时，是有可能把后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的，犯一点轻重倒置的“错误”。可见，“智育第一”并不等于“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剥削阶级常犯的错误恰恰不是“智育第一”，而是政治说教过泛。如旧时强迫读书人只读“圣贤书”而鄙薄实学。又如提倡“泛智论”的教育家夸美纽斯所批判的欧洲旧学校“笃信宗教比形成德行重要，德行比学问重要”。恩格斯批判英国教会办的国民学校“宗教，而且是宗教最无耻的一面成了最重要的课程……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

17年教育工作中到底存在不存在“智育第一”的错误？从“文革”的指控材料来看，17年教育工作中成绩的一面恰恰是摆正了德育与智育、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关系之时，即重视智育、抓了文化教育之时。如果这就是“智育第一”，那么这种“智育第一”是对的。与之相对，有几度智育和文化教育受到所谓“无产阶级政治”冲击，倒恰恰是17年教育工作中的偏差。至于“文革”中大反所谓“智育第一”，实在是一种反智育的愚昧主义思潮。1975年12月16日《文汇报》文章《“智育第一”批得深，教育革命搞得更好》说：“智育第一”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搞“‘智育第一’，必然否定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使师生只记得‘专业’，忘记了‘专政’”。还有一篇文章说：“智育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就是“培养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说明学校是“资产阶级专政”。<sup>①</sup>因而“有资产阶级存在，就要批判‘智育第一’”，“什么时候批判‘智育第一’，什么时候教育革命就前进”，“放松批判‘智育第一’……教育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得不到巩固”。<sup>②</sup>其实，无论“文革”前和

①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万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页。

② 《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载《文汇报》1976年1月24日。

“文革”中都不存在一条“智育第一”路线，但倒确实存在一股强大的反智育思潮。这股思潮把智育同德育对立起来，竟然认为越是反智育就越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智育为什么只能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呢？原来这股思潮认为重视智育的人是“资产阶级”，而反智育的人是“无产阶级”，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变为“教育为极左政治服务”了。

### 三、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这是“文革”中引用最多的列宁的一句话。这是有问题的。因为：（1）这是列宁1919年初为俄共（布）拟的党纲草案中国民教育条款中提出的，而俄共八大正式通过的党纲已删去此句，说明此句的表述欠完善。（2）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专政工具”皆指国家暴力机关，从未将作为文化机关的学校列为专政机关。（3）经典著作中“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常与“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政权”通用，因而理解为“学校应当为无产阶级国家（或政权）服务”，似更妥当。从全文看，“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这明明白白是将学校视作宣传工具而不是专政工具。

“文革”中故意理解为学校是专政工具，完全歪曲了学校的性质。张春桥于1975年4月初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系统地提出了“全面专政”论。所谓“全面专政”，即在“一切领域”和“一切阶段”实行“专政”。“一切领域的专政”，主要指把专政范围扩大到文化各领域，首先是教育领域，即在学校建立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专政。为论证对广大知识分子专政的合理性，又虚构了学校的“阶级关系”。

他们说“旧学校资产阶级专了劳动人民的政”。表现在：

(1) “考试专政，分数封锁。”梁效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分数线，分数线，劳动人民的封锁线。”《解放日报》1975年12月12日发表上海机械学院的调查，说该院17年招收过3次工农学生：1952年不考试招了2181人；1955年设单独考试，只招了173人；1960年让参加高考竞争，结果仅取17人。于是下结论说：“资产阶级”用考试和分数“排挤工农子女”，对工农“专政”。其实，考试和分数仅仅是教育检查手段，它并不特别亲近或故意疏远任何阶级出身的人，更不是专政工具。这里有意把一个教育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变成耸人听闻的“阶级压迫问题”。工农子女掌握文化知识所遇的困难是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把这个困难说成是有文化的人专没文化的人的政，说成是阶级斗争，则是别有用心，是挑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2) “教师专学生的政”。把教师管教学生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工农子女的政”。这种文章充斥于“文革”时期的报刊。一篇文章说：“‘师道尊严’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管、卡、压工农子女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学校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一个重要方面。”<sup>①</sup>“文革”中大反所谓“师道尊严”，反的实际是教师的正当的权威。负有“传道授业解惑”使命的教师，在学生中应不应拥有权威是一个常识问题，当然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权威会不会压抑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等等。但是，说教师的权威是“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专政”，则是歪曲事物的性质了。学校的性质决定了它既不曾担当过“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担当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可

<sup>①</sup> 《坚决同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载《新教育》1975年第7期。

以为各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但是，它是通过培养、教育的方式而不是充当专政工具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服务的。

“全面专政”论的反证前提——“考试专政”、“教师专政”是不存在的，是虚构的，而“全面专政”自身却是真实的，它是文化专政主义的现代版，是用马列词句包装过的文化专制主义。

## 第五节 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中国的实践

### 一、教劳结合溯源

原始社会时代，原始劳动与原始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进步，随着脑、体劳动分工和学校教育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出现了教、劳分离。这既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也造成人的片面发展。随之也就出现了主张读书人参加一定农业劳动的思想，这就是早期的劳动教育思想。“耕读传家”是古代中国非常有影响的思想，在颜之推、颜元等人的著作中有集中反映。《颜氏家训》要求子女“知稼穡之艰难”，劝诫说：“未尝目观起一垆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知世间余务乎？”“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这部书千余年中影响巨大，“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朱熹撰《小学》，亦从中取材。“惟有读书高”并非中国传统社会的绝对思想，“读”是以“耕”为补充的。近代大官僚曾国藩也有类似主张，他的家书中劝子女劳动处很多：“以耕、读二者为本，乃是长久之计”，

“早、扫、考、室、书、蔬、鱼、猪”，“大、二、三诸女已能做鞋否？……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除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饭。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sup>①</sup>

以上还只能算是劳动教育，不能视作教劳结合思想。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十分落后的原始体力劳动，这种生产劳动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几无要求，这时还提不出教劳结合的思想来。

教劳结合思想萌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兴起的前夕。到马克思的时代，大工业正消灭着手工场的旧分工，而代之以新的“工厂中的分工”，“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工厂正在“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趋势”出现了。“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sup>②</sup>因而要求通过教劳结合来培养全面发展的工人，以取代手工工场造成的终身固守一技的片面发展的工人。在欧美国家，大工业已经提出实行教育与劳动结合的自发要求，而马克思敏锐地由此察见“未来社会的萌芽”。

在中国，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一些进步学者已经注意到脑、体劳动结合和教育与劳动结合问题。蔡元培提出“工学并进”，“工学互助”，“日日工作，日日求学”，“养成全国人民劳动的习惯，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而劳力者亦可减少工作时间，而求得研求学识机会，人人皆须致力于生产事业，

<sup>①</sup> 见《曾文正家书》，同治六年五月五日条，咸丰六年十月二日条，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条，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条。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5～136页。

人人皆得领略优美的文化”。<sup>①</sup>“希望学生成为劳心而又劳力的完全劳动者”。<sup>②</sup>

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高师、北京大学学生中间兴起“工学主义”。“工学主义”者认为自己与“工读主义”不同：“工读”是做工的人求学或学生做工助学，工与学是分开的；而“工学”是劳力与劳心、教育与劳动的完全结合。“工学主义”革分工的命，开“全工”的端。分工使工人成机器人，“全工”沟通脑、体劳动，让工人“轮流变换，不守故常，使个人的能力，在各方面尽量发展出来”。“工学”是“完全教育的起点”，是“经济革命、教育革命”。<sup>③</sup>

这一时期不仅讨论了教劳结合的理论，而且一些进步教育家把教劳结合原理付之于实践。如蔡元培倡导的勤工俭学、陶行知试行的生活教育、黄炎培所办的职业教育。然而由于中国现代工业发育程度甚低，传统教育影响甚深，教育与劳动结合未能成为有影响的教育主张。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教劳结合的教育政策，到1958年把它作为教育的根本方针，并且发动了以教劳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然而这一场“革命”很不成功。原因在于指导思想过“左”，给教劳结合附加了许多不恰当的政治意义。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红旗》创刊号发表文章说教劳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与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分水岭，这种无根据的说法流行多年，影响深远。教劳结合一开始就作为“思想革命”、“政治革命”来搞，将知识分子作为对立面来“革”。教劳结合还被视

① 蔡元培：《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劳工神圣》、《全国教育会议开幕词》，分别收入《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57页、184页。

② 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第231页。

③ 《我的工学主义观》，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2号，《工学》1919年2月号。

为培养“全面发展新人”、向共产主义跃进的捷径。推行教劳结合又采取了群众运动、一刀切、长官意志等不当方式，造成教育界的混乱局面。以下谈谈1958年教劳结合的经验教训。

## 二、1958年的教劳结合没有找准结合点

中国教育进入20世纪以来，渐由传统读经教育转变为现代文明教育。新中国的基础教育如不计人口比和硬件规模而只就其教学内容的程度和深度，较之欧美国家并不算落后。但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却严重滞后，现代工业总值到1949年只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0%。后来这一比例迅速提高，但是几十年来从事传统农业、手工业的人力始终高达总人口的80%左右。因而可以说新中国教育的发展，相对于国家工业化的进展来说，是具有一定超前性的。

这种不平衡性，表现为学校毕业的高小生、初中生、高中生数量，超过了工业部门所能吸纳的劳动力。因而首先在1954年和1957年两次发生高小、初中毕业生升学与就业危机。当时的对策是动员这些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很大不同，后者在工业化过程中是乡村人口涌向城市。1957年3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加强中、小学毕业生的劳动生产教育。4月8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的多次讲话写成著名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6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强调说服动员毕业生去农村。此后由于经济发展受挫，工业部门无法吸纳日益增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政策就成为长期执行的国策。当时农业落后而原始，知识青年在农村无法发挥他们所学，许多人荒废了学业。因而有“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数理化在农村用不上”的批评，当时一律作为“惟有读书高”、“不爱劳动”的思想问题来处理。实质是“知识青年相对过剩”。

其实早在旧中国就发生学生失学失业现象，曾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程天放忧虑地说：工农子弟一受教育就不肯务农做工，就失业，失业一年多一年，不安定一年甚一年，“非促成亡国不可”。<sup>①</sup>国民政府的对策，也是提出实施生产教育。这同样是由于现代教育普及的速度超前于工业化的速度所引发的“知识青年过剩”问题。

中国的全部教育转向现代教育，而中国的最大经济部门却是传统农业。1958年的教劳结合，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导致当时的教劳结合主要是把现代教育与传统农业生产劳动强扭在一起。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在批判教育脱离生产劳动时都着重追究学生“非麦不辨”、“五谷不分”，要求学生“拿起锄头能种田”。有文章认为教育与手工劳动的结合也是教劳结合。其实这只是古已有之的劳动教育，而并非马克思所高度评价的教劳结合，因为教劳结合只能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提出的要求。

当然，都市大学是有条件把教学与现代大工业结合起来的，但一般大、中、小学师生多是参加与教学内容无关的体力劳动。即如武汉大学这样条件的学校，化学系也下的是化工厂，但全部教师和大部分学生都持否定性看法，认为：这样劳动只能培养化学工人，中国的生产如此落后，若这样子联系生产实际，就永远赶不上英国，这样搞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是狭隘的实用主义。<sup>②</sup>1958年的大规模教劳结合实验，由于客观上缺乏结合点、主观上又未意识到结合点的至关重要，所以大都未能真正做到教劳结合，而只是教劳分立，后来发展到教劳冲突、劳冲击教。

① 《改造中国学校教育刍议》，载《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5期（1932年11月）。

② 《拔掉白旗插上红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页。



当时对教劳结合的理解，就是既读书又劳动，就是师生多参加体力劳动，越多越好，并未考虑结合问题。只批判教育脱离生产劳动，未想到大量的课外劳动脱离了教育。

中共中央《九·一九教育工作指示》下达后，全国掀起教劳结合热潮，大、中、小学劳动急剧增多。北师大党委稍前就提出师生劳动实践时间为学年的一半（4~6个月）。<sup>①</sup>9月农业部召开农业院校教劳结合现场会，传达中央指示：全体师生一律下放农村锻炼半年。10月林业部决定林业院校师生下放农村1~2年，学院迁出大中城市。与此同时，全国大、中、小学生停课大炼钢铁。9月底据20个省市统计，22100所学校共建高炉86000多个。到10月中旬，397所高校办厂7240个，13000多所中专、中学办厂144000多个。<sup>②</sup>

广西黎塘中学干部于1958年12月28日致信教育部告状：开学4个月中，半天上课半天劳动一周，办厂若干天，挖矿炼铁17昼夜，运木头4天，采树种4天，半天上课半天办厂场一段时间，做棉衣一周，种400亩亚麻苦战5天，过劳卫制苦战7天，水利积肥苦战20天。<sup>③</sup>到1959年初，有的小学开学两个月，劳动41天。<sup>④</sup>当时有篇《论教育大革命》的文章说：“‘学习’二字在社会上要把它消灭掉，用‘劳动’二字代替。因为‘劳动’二字包括了任何生产和任何学习的涵义”，学校可以改叫“新生一代劳动生产园地”，不按大、中、小学划分学业阶段，而“在劳动程度上分阶段”。<sup>⑤</sup>

①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58年条目。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58年条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467页。

③ 《教育部档案》，1959年永久卷，卷49。

④ 《教育部档案》，1959年永久卷，卷50。

⑤ 同上。

由于大量停课，学校教学秩序大乱。不少家长认为子女在校“读不到书”，首先是劳动家庭子女退学改当劳工挣钱。甘肃省流失 1.1 万中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 1/5。青岛市有的高中流失学生达 1/3~1/2。<sup>①</sup>

教劳二者没有互相促进，而是劳动冲击了教育，再如此搞教劳结合显然是不行的，中央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劳动安排过多。国务院于 1959 年 3 月发出《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明令各级政府布置学校生产任务时应考虑教学计划的完成，其他单位不要直接向学校布置劳动任务。周恩来总理也于 5 月 28 日在对天津大学师生的公开讲话中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是主导方面的……认不清主导就没有重点”。<sup>②</sup> 1961 年起，先后制订大、中、小学工作条例，总结 1958 年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说“生产劳动过多、科学研究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等妨碍和削弱教学工作的现象，应该纠正”，限制全日制中学劳动、休假、学习的比例为 1:2:9。同时提出“教学为主”的原则。这在实践上纠正了 1958 年教育与劳动结合运动中的错误，但遗憾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是是非非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1958 年提出“以生产为结合点”，但是现代教育很难找到与传统手工劳动的结合点。因为教劳结合只能是现代工业与现代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它不会服从主观的行政命令。“有心栽花花不发”，然而在新中国的新兴工业部门中，教劳结合却插柳成荫。高科技的生产线，要求低文化的工人读书学习。在生产与学习中，涌现一批一批劳动模范、土专家、土发明家，他们正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1958 年条目。

② 周恩来：《要保证教育质量》，收入《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1 页。

是教劳结合的产物。教劳结合的运动发生在学校以外，发生在新兴工业部门的新一代工人之中，他们迫切需要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学习现代科学文化。而让学校的现代教育去跟传统手工劳动结合，却是一个历史的错位。当然，让四体不勤的脑力劳动者去参加一些艰苦的体力劳动，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劳动锻炼，今天或将来也值得提倡。但这已不是教育与劳动结合的本义。

### 三、把教劳结合变成“革知识分子命”的阶级斗争命题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教劳结合的全部 10 余条语录，都不含有用体力劳动来改造知识分子的内容。他们只是指出：（1）教劳结合是现代大工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2）教劳结合提高生产力；（3）用教劳结合提高工人阶级文化素质；（4）教劳结合造就全面发展新人，是改造社会的手段。

以上全都针对工人阶级，并未涉及知识分子。10 条语录中大部分与争取工人阶级及其子女受教育权有关。如：（1）“所有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sup>①</sup>而不能让工人子女只劳动不受教育。（2）“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sup>②</sup>（3）“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sup>③</sup>（4）“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共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sup>④</sup>（5）马克思获悉英国

① 《共产主义原理》，1847 年。

② 《共产党宣言》，1848 年。

③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 年。

④ 同上。

《工厂法》规定 14 岁以下童工劳动的同时必须受强制性工厂教育时，说“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从实践上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反过来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sup>①</sup> 注意，这里说的体力劳动，指英国现代工厂中的体力劳动。(6) “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的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占据应有的位置”。<sup>②</sup> 这里说的是工人阶级在革命后将获更多的受教育权。(7) 马克思肯定日内瓦代表大会维护工人受教育权的决议：“要求把智育同体力劳动、同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sup>③</sup>

10 条语录中剩下的 3 条谈教劳结合的历史作用：(1) “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sup>④</sup> (2) “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sup>⑤</sup> (3)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sup>⑥</sup> 马克思这里说劳动将作为“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可见是指现代工厂劳动，而不是传统农业体力劳动。

可是，1958 年的教劳结合不是在工厂、在工人中而是在学

① 马克思：《资本论》（1872 年），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94 页。

② 同上。

③ 《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中普及教育的发言记录》（1869 年），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6 卷，第 655 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1867 年），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29 页。

⑤ 《哥达纲领批判》，1875 年。

⑥ 《反杜林论》（1876 年），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60 页。

校、在教师学生中作为一场“教育大革命”来开展。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于《红旗》7月号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是指导这场“革命”的权威性文件。他说教劳结合“必须经过斗争，而且将会有长期的斗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育工作中反对几千年的旧传统的一个革命”。实际上这场“教育大革命”，只是肇始于1957年反右的“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右斗争的意义被夸大为“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革的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命。1958年继续进行“思想战线上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革的是“中间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革“中间派”的命不采取政治打倒的办法，而是剥夺他们的声望资本。为此发动了一系列的小运动：用红专大辩论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在“双反”运动中搞臭他们的“个人主义”，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剥夺他们的业务资本，而在教劳结合运动中抓住了知识分子的总病根——“脱离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这场革命组成部分的“教育大革命”要解决三个问题（陆文所列）：“为教育而教育”，“教育由专家领导”，“劳心劳力分离”。第三条是中心。

第一条不过是教育思想上的一般性偏差。第二条有合理性成分。第三条倒确实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多年来，“脱离劳动”、“轻视劳动”成了知识分子的原罪，因为这是知识分子与剥削阶级的“共性”。当时文章说：“知识分子在未彻底的改变其剥削阶级的观点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时，不论其在经济地位上是否剥削劳动人民，但始终总是属于剥削阶级，也绝不会因为是脑力‘劳动者’，就改变了剥削阶级的地位。”<sup>①</sup>因而对知识分子

<sup>①</sup> 《拔掉白旗，插上红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

的革命，就是对其实施“劳动改造”、“思想改造”。因而教育与劳动结合到中国来就改变了马克思赋予它的原义，另外附加了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这就是对学校师生（现在的知识分子与未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改造”。

1964年至1965年，再次掀起以教育与劳动结合为目标的半工半读热潮。《人民教育》于1965年5月发表社论说：教育与劳动结合就是要消灭脑、体力劳动差别，如果让“保持脑力劳动特权的人”存在下去，就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这里把教育与劳动结合说成是防止知识分子成为“脑力劳动特权人物”，“复辟社会基础”的革命手段。12月号的《人民教育》社论说得更明确：如果不搞教劳结合，就会“培养凌驾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扩大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造成了一个与工农对立的社会阶层，成为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之一”。

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更为明确地视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把教劳结合作为“革知识分子命”的手段更为突出。前已详述，此处从略。

#### 四、把教劳结合作为培养“全面发展新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捷径

陆定一的文章还说：教劳结合在目前是培养“工人兼农民”、“农民兼工人”的多面手，而不久即可培养“能够担任任何职业的”、“全面发展的人”。说校办厂场、厂社办校，出现学生即工农、工农即学生，是“共产主义萌芽”。《九·一九教育工作指示》要求教育“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

当时认为已摸索出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教劳结合就是捷径之一。试图通过师生参加劳动、工农业余学习这么一

些虽然规模巨大却极普通的活动，来轻而易举地实现“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从而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宏大社会目标，这自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场实验很快归于失败。

然而在1964年至1965年的半工半读高潮中，仍未放弃这些超阶段的社会目标。1965年12月的《人民教育》社论说：半工半读是教育与劳动结合的最好形式，是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是消灭三大差别的根本措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是要使新培养的年轻一代，一开始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劳动者”。

到“文革”中，“五七指示”描绘了教劳结合、全社会成员亦工亦农亦学亦军的“五七公社”图景。

从以上三个阶段的教劳结合活动来看，这种结合的基础主要是传统农业手工劳动。而所要跑步进入的“共产主义”，也不是以大工业文明为基础而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平均主义社会。至于所要消灭的脑、体劳动差别，也并不是如同现代科技发展所展示的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的最终结局，而是立即消灭脑、体劳动分工，人人劳动又读书。这只是一种文化平均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泯灭脑、体劳动差别。这种水平的脑、体力劳动结合，在古人身上不是早出现过吗？

### 五、以教劳结合作为解决普及教育问题的手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初等教育发展迅猛，而中等教育一时赶不上这种速度，这种结构上的失衡，导致1954年和1957年两次出现初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危机。同时由于现代教育发展速度超前于现代工业发展速度，工业部门亦无法吸纳这些毕业生。当时的对策是让农业生产劳动容纳这些新生劳动力。1953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实事求是地解决小学毕业生升

学问题》，提出用增班、二部制、夜校、广播讲座及新增学校、团体私人办学来解决升学问题。可是不久之后即改变思路，转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找出路。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社论。1954年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学教育会议，讨论高小、初中毕业生升学问题，正式提出“宣传参加农业生产”的对策。4月22日团中央发出组织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5月24日中央批转教育部《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批语中把“目前紧张的升学问题”归结为教育部指导思想“忽视劳动教育”，没有着重批判“鄙薄劳动的思想”。这样就把升学愿望及升学压力简单化为一个思想意识问题。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提纲》，进一步把升学问题归结为思想问题，以劳动教育来对症治疗，严厉批判“上学不当农民”、“种地不用文化”的论调。“小学、初中毕业生当农民”的宣传，引起一阵混乱，结果，从1954年秋起，发生15省农村小学大量学生退学。河北公立小学减少学生30万。福建大田县流失小学生总数的1/7。

1956年上半年经济过热，增办学校，扩大建设，就业升学危机暂时缓解。可是随着下半年的经济调整，到1957年形势又趋严峻。3月16日中宣部发出通知，宣称今年大批高小、初中生不能升学，对策仍是“加强中、小学毕业生劳动生产教育”。《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劳动教育必须经常化》。4月8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二三月份视察外地的多次讲话整理撰成一篇非常有影响的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6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指示》，提出两条办法：一是说服动员他们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一是在家自学，等待就业或升学。



以上所列，说明以教劳结合来普及教育是在怎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普及工农教育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但是普及教育受制于社会经济条件，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教劳结合这一富于理想的经典命题于是被赋予非常现实的棘手任务。

应当肯定，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探索。1957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刘少奇执笔的社论《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他坦率地说，尽管国家1955年投入教育经费为1949年的26倍之多，1956年又增25%，但还是负担不起日益增长的助学金（大学生的80%，灾区中学生达50%）。他认为勤工俭学有可能成为普及教育的重要途径。他举郑州七中为例，700名师生一年劳动收入1.04万元，比全年助学金0.86万元还多。6月6日《人民日报》刊文《一面劳动，一面读书》，初步提出以师生参加生产劳动来节省学校经费开支。不久，刘少奇对11月8日《参考资料》一篇外讯《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读》作出批示：“此件送团中央一阅，中国是否可以个别试办？请你们研究”。团中央即印发各省团委，引发了一个勤工俭学运动。

1958年初掀起勤工俭学热潮。1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表扬两所中学的勤工俭学。1月27日团中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说：勤工俭学既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脑力劳动结合的途径，又可以省下教育经费，利于更多工农子女入学。2月教育部召开勤工俭学座谈会，部署大规模的师生下厂下乡运动。2月3日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经济计划报告中，谈到有步骤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师生动手参加学校杂务劳动和部分工程建设劳动。3月8日教育部调整中学教学计划，要求加强劳动教育，逐步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教育制度。

与此同时，年初还兴起一股大办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的热

潮。3月中旬陆定一专程出席江苏省民办农中座谈会。4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大办农中。4月初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提出大办农业中学、工业中学、手工业中学，说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是体现党的教育方针的根本措施。这种半劳半读的农中，不花或少花国家资金，就地取资，学生以劳助学，短时间内竟解决几乎全部农家子女入学的问题。但须说明的是，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只是以劳求资，以资济学，中外均早已有之。这并不等于教劳结合，但当时认为学生既读书又劳动就是教劳结合，而不问所读之书与所事之劳是否有机结合。

刘少奇于5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6月8日、20日对教育工作的指示中第一次提出两种教育制度的主张。他说因为经费困难，曾写文提倡勤工俭学，现在想到了半工半读，这是普及教育的好办法，可以走出教劳结合的路子来。

7月陆定一发表文章，总结建国9年来的教育工作，说9年的缺失处主要在于教劳脱离，直到现在才实现了教劳结合。文章一方面赋予教劳结合许多不切实际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也务实地谈到教劳结合对普及教育的推动作用。他追述年初大搞勤工俭学与大办农中的两个决定推动了教育大跃进，不花国家资金，几个月就办起6.8万所学校。

8月1日，江西31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同时开学，实行半工半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花国家一分钱（实际挤占地方开支）。

《九·一九教育工作指示》总结“实现教劳结合”的多种形式：学校开劳动课、定时劳动制度、勤工俭学、校办厂场、厂社办校、办半工半读学校等。由于发现教劳结合是省钱办学的妙法，“教育大跃进”便可轻而易举了，遂提出3~5年普及小学教育、15年普及高等教育的惊人口号。办学的物质条件可以用教劳结合解决，剩下的就是破“思想障碍”，破“保守观念”，

破“专家迷信”，大搞群众运动，“全党全民办学”，一哄而上。于是从9月到年底，全国掀起贯彻《教育指示》、大搞教劳结合的狂潮，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厂社大办学校，厂场校合并，厂社机关街道办高校、中专、农中、红专大学、劳动大学、市民学院，据称出现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体制”。10月1日《光明日报》夸张地报导：8个月扫盲近1亿人口，比过去8年总和多2倍；儿童入学率由不足50%跃升到93.9%；新办中学2.6万所，中学生达924万，比上年猛增47%；中专学校达6000余所，在校生比上年增220%；新办大学800余所，比原数翻了几番，在校生比上年增2/3；红专大学、红专学校、业余学校比上年增5倍多，学生竟达0.5亿。该社论还提出“全民办学，全民上学”的共产主义教育口号。

但是，这种以教劳结合办法实现的“教育大跃进”和教育大普及，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几乎所有的新办学校都垮了，大部分学生都退学了，而正规学校因受冲击、干扰也元气大伤。学生退学的原因是“劳动太多读书太少”，学不到文化。学校垮掉的原因是师生劳动多而经济效益低，无法支撑办学经费。而根本原因是“办教育没有国家投资是不行的”。其实，几个月中的办学成绩也大多虚而不实。以大学为例，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59年5月24日《关于整顿1958年新建的全日制和半日制高等学校的通知》披露：这些大学大都是招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其教学计划低于中等学校的水平。《通知》要求将这些大学改为高中、中专、初中、初级技校。

经60年代初的调整，“教育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的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再次提出两种教育制度的主张。他说只有全日制学校是不能普及教育的，目前儿童入学率，低的省份才百分之四十几，高的也不过百分之六十，国家负担不起普及教育的经费。他提出：现有学校数

不再增加，经费也不增加，后加的教育经费，专办半工（农）半读学校，渐渐使半工半读成为主要的教育体制。50~100年后，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在城市人口中占70%~80%，在农村人口中占50%。他回顾1958年办半工半读学校时说，这几年里大多自生自灭，垮了。他要求各省市重新试办这些半工半读、教劳结合的学校，5年总结，10年推广。教育部随即成立半工半读教育办公室，部分省、部也成立专管机构（如天津的第二教育局、江苏的工读教育局、农业部、化工部的半工半读领导小组）。下半年全国城乡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又掀起一个浪潮，这次比“大跃进”时要谨慎得多。到10月底，新办农村耕读小学占全国小学数的29.1%，学生数占12.1%。<sup>①</sup>到1965年，全国又办起半工（农）半读中学4000余所，在校生80多万。

应当说，刘少奇这种以半工半读为实际内容的教劳结合，虽未能做到真正的教劳结合，但是为发展中国家普及教育探索出一条路子，也取得一定成效。不过也存在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

其一，不免带上一些“左”的色彩。正如1965年5月《人民教育》社论所表达的看法，把这些实质上是普及教育的举措说成是“消灭三大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说贫下中农子女入学是办学“阶级路线”问题。

其二，办学方式仍是行政命令与群众运动手段。“学区定指标，公社分任务”，办起无人管，大批垮下来。江苏句容大卓公社群众反映：“我们村上办的是‘运动’学校，运动结束，学校

<sup>①</sup> 《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争取半农半教事业的新胜利》，载《人民教育》1965年第5期。

也停办了”(由社教工作组包办)。<sup>①</sup>

其三，办学经费严重匮乏是这类学校垮掉的主因。办校经费来源有三：(1) 师生劳动收入。个人行为的勤工俭学经济效益高一些，而作为学校集体行为就复杂多了，中间环节多了，个人收益少了。尤其当学生的劳动不是为个人的学费而是负担本应由国家负担的学校教育经费时，许多家长觉得：在校劳动不如回家种地。(2) 农中耕小的教师自己负担生活费的大部。有的生产队定教师劳动任务，有的生产队教师昼耕夜教，十分辛苦，影响教学。(3) 集体或家长负担一部分办学经费。如有的队每月补教师60工分(只相当6个工作日)，无学童的社员还不同意。这三方面的经费都是不稳定的，缺一即造成学校危机甚或垮塌。

其四，学生无出路。由于教学质量太低，学生鲜有升入高一级正规学校的，只能在耕小——农中——农职的非正规教育系统中升学，毕业回队当农民。不少学生因此退学。

尽管存在以上问题，还是有一些办得好的学校(往往得到地方党政扶植)，还是使相当数量的农民子女得到粗浅的文化教育。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少奇受迫害，他的两种教育制度主张亦受牵连。但十分奇怪的是，刘少奇解决中国教育困境的思想，并未在批判中被剿灭，反而被批判者吸收了。“文革”中再次办起了大量的教劳结合其名、半工半读其实的学校，并且强迫全日制学校转型为半工半读。但是由于批判刘少奇的“右”，批判者自己大大“左”转，这使得第三次以教劳结合普及教育的试验又归于失败。虽然这一次试验持续时间最长，但也只有入学率的大扩张，而无真正的教育大普及。数量的扩张

<sup>①</sup> 句容县农村教育工作组：《大卓公社巩固耕读小学的初步经验》，载《人民教育》1966年第3期。

与质量的下降相抵之后，显示出的是教育的倒退。

三次以教劳结合普及教育的试验，均归于失败。新时期以来，认识到教育主要靠国家投入，以师生劳动自助代价过大，遂弃而不用。

几十年教劳结合实践，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多是停课劳动、下乡支农之类。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教劳结合在理论上讨论了很多也肯定了很多，至于如何在实践中操作，仍然是一个陌生的老课题。

## 第六节 关于“精神贵族”及“培养劳动者”方针的演变

### 一、关于“精神贵族”

在本书第一章已经追述过建国后尤其反右以后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定性问题上的变化。事实上党的不同领导人、不同时期里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并不相一致，实际政策也经常发生波动。再往上追溯，经典著作中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是应时而变的。大概由于知识分子自身是最复杂最多变的一个阶层，其政治态度比任何阶层都难以捉摸，一时最激烈，忽而最保守，一下子最无情地批判别人，一下子自我忏悔得一无是处。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最乐于自我批判、自我解剖，虔诚地讴歌“劳工神圣”，偏颇地自认“不劳动”、“不劳而获”，是可耻的“精神贵族”。留学生归国游西湖，见了一个锄地老人，“想去跪

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sup>①</sup>。知识分子认为，“劳动者花了生命、血汗换来的生产，一古脑被种种阶级的分利者享用，自己除去生活，反毫无所得，这不能不说是分利者的罪过。求学者便是各分利阶级之一。‘知识阶级’甘心分利，作社会的寄生虫，岂非‘知识阶级’的罪过？”<sup>②</sup>更有的说：“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sup>③</sup>

这时的批判再激烈再无情也是无碍的，因为是自己骂自己，是忏悔，没有外加的压力。但是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已经不够，于是有了具有杀伤力的外部批判——来自革命阵营的批判。毛泽东在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系统总结了革命党人改造知识分子的理论，提出了为马、列尚未涉及的独创性的命题——“同工农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最有特色的革命理论之一。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断言这个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而热烈参加这个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毫无精神准备，他们只熟悉资产阶级，而不熟悉工农。既然知识分子所热心参加的革命——其主体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农，这就发生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主体工农相融合的问题。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自己（实际是部分的改变），这就是“改造知识分子”。

① 郭沫若：《女神：雷峰塔下》（1921），收入《郭沫若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② 《释工学》，载《工学月刊》第1卷1号。

③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延安时代是对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1）改造对象起点高，改造的要求高——这阶段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敢于奔赴延安的最革命的分  
子，改造的要求是把他们训练成革命的领导干部与骨干分子，而不是再作一般知识分子的工作。（2）使知识分子适应革命战争的要求——用革命战争铁与火的纪律整掉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习气。（3）使知识分子适应与革命队伍的主体——工农干部、工农战士亲密共事，改掉知识分子作风，生活方式工农化。

这个阶段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大批知识分子造就为革命战士和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干部。

建国后以“思想改造运动”为代表，是对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1）改造对象是留在大陆的全体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中间分子占绝大多数，这仅仅是一个政治估计。对于这些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仅占总人口不足一个百分点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将起的进步作用显然是估计不足的。（2）改造的要求放低了——使这些知识分子适应新的社会，适应革命队伍的作风，适应共产党的领导，以新的工作方式继续其旧有的职业。（3）改造的方式内容与延安时代一脉相承而气氛较为温和。除少量老知识分子感觉受伤害外，大多数知识分子以新奇和欢迎的心情接受了思想改造。例如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就是这次自我改造学习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心悦诚服地、而不是被迫地清算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次改造也是成功的，连西方学者都惊叹共产党的“洗脑”技术。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改造是有其内在因素的。其一，他们是爱国主义者，谁把百年挨打、动乱分裂的中国变为独立自主、和平统一的中国，他们自然就拥护谁。其二，他们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最快，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并不陌生，在旧时代他们就



秘密接触过、同情过这个革命理论。其三，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几乎都是民主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有革命要求，有忏悔和自我批判意识，同情和亲近劳苦大众。由于这次改造的圆满，更由于战争结束、经济建设大潮的到来，客观上需要依靠而不仅仅是团结这些知识分子，所以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宣布知识分子已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反右至“文革”是对知识分子改造政策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1）改造对象由旧知识分子扩大到新知识分子（新中国培养的），又扩大到初中以上毕业学生。（2）从过去思想改造（在业务实践中进行）为主，改为以体力劳动改造为主（强迫脱离专业岗位）。（3）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升级为“思想政治战线、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打倒地主资本家之后，社会主义革命仍未完成，需要继续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知识分子的存在，是脑、体力劳动差别存在留给我们的恶果，是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留给我们的恶果，是“修正主义”产生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文化领域中最有力的长期的对手，因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根据以上“左”的观点，1957年后逐渐形成一整套关于知识分子的“左”的理论。

首先是歪曲知识的属性。知识属于脑力劳动力范畴，是构成劳动力的要素之一，正如同劳动技巧是构成体力劳动力的要素。知识载于个体，构成一个人的能力，因而被喻为力量、喻为财富。它可以转化为财产，然而它不是财产，这一特点与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技巧相同。但1957年以来流行的观点却认为：知识是财产，因而也是生产资料，还会转化为资本。1958年以后就有“知识私有”、“知识资本家”的提法。1965年1月号《人民教育》批判冯定的文章说：知识分子“把知识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他们认为“地主的土地，土改被分；资本家的资本

被公私合营了；只有知识分子的知识，抢不走，夺不着”，终身拥有。这已经把知识同土地、资本相提并论，视为生产资料，列为剥夺对象了。

1967年夏，造反派把作家诗人押到北京市郊，与地主富农同台批斗，说艺术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工厂的资本家”，把艺术家的知识等同于土地、工厂一类的生产资料。1970年2月号《红旗》批判教育家凯洛夫是一个“知识资本家”。1975年1月及2月上海出版的《教育实践》说得更为系统：知识这个东西既不能没收，也不能剥夺，这是知识私有的特点。按“知”分配即是按资本分配。家教即是拍卖知识，学校就是开学店，把知识当商品卖。谁的知识积累得越多，等于资本越雄厚。知识分子钻研业务是“拼命发展私有制”，“无限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知识私有’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学校里的反映”，“在那里，学生、教师、校长之间都是商品交换的关系”。

知识 = 生产资料，这如同说体力 = 生产资料，如同说劳动者是“体力私有”、“体力资本家”一样荒谬。

其次，歪曲知识分子劳动的性质。认为脑力劳动不算劳动，知识分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获的精神贵族”，白白让工人农民养活。把知识分子与“治人的劳心者”混为一谈，列为“特权阶层”。其实马克思早已论述过脑力劳动是高级的复杂劳动，能创造更多的价值，知识分子是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

再次，歪曲知识分子的劳动方式。流传甚久的一句话，说知识分子“知识私有化，劳动个体化，成果商品化”。脑力劳动的方式有其特点，主要是个体劳动。有人参照工厂及合作社的生产劳动，指责知识分子爱“个人单干”，不爱“集体劳动”。早在50年代初就出现对知识分子劳动方式的干涉，学校“把教师们组织起来，提倡集体主义的精神，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

义”，“凡事都来一个集体，学习、备课什么都必须在一起”，“反对各自为政的所谓自由讲学”，“有的学校提倡‘肃清单干’的口号，好像进行个人备课和研究就是个人主义”。<sup>①</sup>

对脑力劳动者的职业特点、职业习惯、职业局限也挑剔出不少毛病。诸如：清高、复杂、孤芳自赏、脱离群众，等等。而夸人体力劳动对净化灵魂、纯洁道德的作用，甚至颂扬农民迫于生活条件而形成的落后、不卫生、不文明的陋习。知识分子沾上“文明病”、“知识毒”，只能“脱胎换骨地向工农学习”，而不配当工农的老师。

通过对知识的属性、对知识分子劳动的性质与方式进行歪曲，把劳动者的知识分子错误定性为剥削阶级精神贵族，对知识分子改造政策也就转变为“革知识分子命”的政策。这对于知识分子个人、对于中国社会，都是一个悲剧。

新时期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党最终废弃了对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当然知识分子也还需要向工农学习，但不必通过上山下乡体力劳动改造那种与工农结合的传统方式。列宁曾说过：“要记住，工程师承认共产主义所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农艺师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林学家也将循着自己的途径来承认共产主义，如此等等。”<sup>②</sup>

## 二、“培养劳动者”方针的演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

① 柳湜报告提纲（代表教育部），载《人民教育》1954年第1期。

② 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5页。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德育、智育、体育的排位，提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较之以前非正式提出的教育方针，有了两个变化。其一，完全固定了德、智、体的排位。此后“德育第一，智育第二”，由顺序关系发展成为主次、纲目、体用关系，即决定与从属的关系。而在此之前，诸育的排列顺序并不固定。如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暂行章程中是这样排列的：“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

其二，建国后许多文件中提法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甚或“红色专门家”。尤其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后，3月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订出12年远景规划，7月11日高教部颁发《1956年高等学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暂行办法》，并于当年首次招收4年制研究生490名。周扬后来追述此事的变化时说：教育培养目标经过一番曲折。1957年以前高校培养目标是专家，很短一段时间里提倡博士、副博士，提倡向科学进军，因而形成成名成家、只专不红的风气。<sup>①</sup>毛泽东对此深感忧虑，另外还有其他的忧虑，所以经深思熟虑，他才提出“培养劳动者”方针。此方针提出一个月之后，高教部作出回应，于1957年3月25日发出通知，决定废弃所招研究生的“副博士”衔头。

发生这两个变化是基于这么两个背景。一是1954年和1957年发生的升学压力及尔后长期采取的对策：加强生产劳动教育，批判轻视体力劳动思想，批判“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二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忧虑。1956年下半年相继发生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事之秋，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工人罢工和学生闹事案件。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讲话中多次批评青

<sup>①</sup> 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收入《中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版。

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出现埋头业务、忽视政治、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所以，毛泽东把德育和“有社会主义觉悟”列在首位，而把最后培养目标定为“劳动者”，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时对“劳动者”一词的理解大体一致，都认为专指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而不包括知识分子。如当时即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生产落后，对劳动者文化素质要求不高，目前教育应着重培养专门人才而不是劳动者，“提出培养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是不是提得过高，或提得太早呢？”<sup>①</sup>在大学中也发生了一些思想混乱。不少师生认为，“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专家，提劳动者太低了”。<sup>②</sup>另有些学生认为大学生按这提法就是当普通劳动者，就是当工人农民，听课都没劲了。<sup>③</sup>

鉴于此，当时有些领导人力图作些补充说明，大体意思是：普通教育培养体力劳动者，另外还需要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如薄一波在一届四次人大会上说：“我国普通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者，其次才是为培养专门人才打好普通知识的基础”。<sup>④</sup>按照这种思路，可以把问题说清，也可以澄清大学生中的思想混乱。但是这种补充影响到毛泽东教育方针的严肃性，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重大的修改，把“劳动者”的一元培养目标，变成了“劳动者+专门人才”的二元目标。所以尔后的种种补充说明都未经正式认可，都不具权威性。但是，教育界的许多人，尤其高等院校师生心里都是认可一元目标的。一元与二元

直到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作了突破性的开拓。他于1961年4月12日的讲话中，对“劳动者”一词作了新的阐发。他说：毛主席提出培养“劳动者”，但不同性质的劳动者这个问题许多同志没有解决。如艺术学校不赞成提培养“艺术劳动者”，而只提“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是讲根本态度、根本作风，用平等态度待人。<sup>①</sup>

周扬提出“不同性质的劳动者”一词，把“劳动者”的内涵扩大了，包括艺术家及专门人才在内。这就解决了“劳动者”与专门人才的二元培养目标的矛盾，把知识分子归入了劳动者范畴，把“劳动者”内涵扩大为包含体力、脑力两种性质的劳动者。如此解说教育方针，显然更为全面与完整，用不着再作补充说明了。周扬敢于把知识分子归入劳动者队伍，系受年初广州会议周恩来及陈毅讲话的鼓舞。

但是党内的正确意见，并不为毛泽东认同。他在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此后不久又掀起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结束了短暂的宽松期。报刊的批判火力甚至及于学生的作文，批判那些真实说出自己想当科学家、工程师的学生为何不想当普通劳动者，声称我们的教育方针决不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工人农民。至“文化大革命”中，更明确宣称大学也只培养“与工农划等号的大学生”。这就再次明确了“培养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所指不包括脑力劳动者，再次绝对化与片面化。

从1957年教育方针在20年中的演变情况看，受知识分子政策影响很大：尊重与信任知识分子时，它的内涵就全面、正确；

<sup>①</sup> 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收入《中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排斥与打击知识分子时，它就走向绝对化、片面化。值得深思的是，前苏联虽也存在过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却没有成为主流，斯大林还亲自驳斥过这种倾向：“我们还有些人决心歌颂我们的没有文化。如果你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并以自己的落后自夸，那你就是‘产业’工人，你就得到荣誉和尊敬。如果你摆脱了没有文化的状况，认识了字，掌握了科学，那你就不是自己人了，你‘脱离’了群众，不再是工人了。”<sup>①</sup>“这些人武断地认为，那些不久前还是按斯达汉诺夫方式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后来一被送到高等学校里去受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sup>②</sup>重视知识分子，或许与斯大林重视经济建设及苏共干部较早较快地知识化有关。<sup>③</sup>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左派共产主义者曾鼓吹过“教育革命”，但是很快偃旗息鼓，以后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教育革命”。这说明“文化大革命”与“教育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下必然要发生的，它不是规律性的错误，而是路线的错误。路线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即是对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量。“教育革命”即导源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定性错误。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4页。

②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收入《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87页。

③ 斯大林后期，苏共党员知识化达50%，而中共到1985年高中程度以上党员仅为15.8%。

---

---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 2 教育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编. 毛泽东论教育. 1967
- 3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论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 4 毛泽东选集 (1~5卷). 人民出版社, 1977
- 5 邓小平文选 (1~3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 6 周恩来文选. 人民出版社, 1984
- 7 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 8 金春明、席宣. “文化大革命”简史.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 9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内部学习资料, 1969
- 10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编. 为毛主席而战. 1967
- 11 国防大学编.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 1988
- 12 肖瑜. 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昆仑出版社, 1989
- 13 [美]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14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15 王年一. 大动乱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16 毛礼锐、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 (1~6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1989
- 17 王炳照、阎国华.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1~8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 18 [美] 阿妮达·陈. 毛主席的孩子们. 渤海湾出版公司, 1988
- 19 辛子陵. 毛泽东全传. 香港利文出版社, 1993



- 20 亚子、良子. 孔府大劫难.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2
- 21 火木. 光荣与梦想. 成都出版社, 1992
- 22 俄国民粹派文选. 人民出版社, 1983
- 23 [美] 赫·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24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编.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69
- 25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 26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 27 王铁. 中国教育方针的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2
- 28 瞿葆奎. 中国教育改革.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 29 学习朝阳农学院的新鲜经验. 人民出版社, 1975
- 30 医学教育要改革.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5
- 31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万岁 (上海中小学经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32 广东师院编. 教育革命参考资料. 1973~1975
- 33 国务院科教组编. 教育革命通讯. 1973~1975
- 34 潘开沛.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大众书店, 1952
- 35 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65
- 36 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5
- 37 加强对青少年的阶级教育.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3
- 38 为工人和贫下中农办学.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65
- 39 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0
- 40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好.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4
- 41 七·二一道路放光芒.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5
- 42 高举共产主义教育红旗 (大中学校大跃进). 北京出版社, 1958
- 43 又一朵教育革命的新花 (记朝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5
- 44 教育要革命 (1~5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4~1976

- 45 教育十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0
- 46 文化考查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3
- 47 工人师傅上讲台.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48 面向农村改革中等教育.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5
- 49 满腔热情支持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4
- 50 喜看今日工农兵大学生.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51 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52 插红旗拔白旗把资产阶级的最后阵地夺取过来.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 53 怀德教育局编. 勤工俭学发展教育事业.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6
- 54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 55 吉林教育大事记.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
- 56 文化大革命中上书集. 湖南出版社, 1989
- 57 孙喜亭. 教育原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 58 彻底揭发“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人民出版社, 1977
- 59 培养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一代新人. 人民出版社, 1977
- 60 努力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局面. 人民出版社, 1978